括号里的日本人

日本人

谈论日本和日本人，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绕不开的经典。然而，时过境迁，这部奠基性著作的时效性、局限性日益显著。

而《（日本人）》颠覆了对日本人的所有思维定势，运用进化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最新研究，对日本和日本人进行系统分析。作者指出，以往强调的所谓“日本人的特性”，或者是人的共通本性，或者是农耕社会的行为准则。日本人唯一不曾改变的是他们的世俗性价值观。从万叶时代以来，历经江户时代的封建制、明治时代的天皇制、战后的民主制，日本人始终认为快乐地度过现世就是一切。他们只认可灵验的神祇和给自己带来好处的权威。

由此入手，《（日本人）》进而分析经历了两次“体制转型”——19世纪的明治维新和20世纪的战后改革——的现代日本社会，富有洞察力地揭示出当今日本的混乱迷失及其深层原因，并对日本该如何重新找到“国家定位”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日本人）》的论述精辟、犀利且引人深思，完全颠覆以往我们对日本的想象。对于任何想认识真实日本和日本人的读者而言，这本书不可或缺。

写在前面 放入括号里的“日本人”

《（日本人）》读作“括号里的日本人”。如大家所见，即将“日本人”放入括号里的意思。

在我们周围，充斥了“日本”与“日本人”。我以为，我们过分地沉溺于“日本”之中，陷于迷茫：我们究竟为何人？世界为何处？

“3·11东日本大地震”以及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之后，在大众媒体、网络上，人们谈论“日本”及“日本人”，五花八门，但主要论点大致可以用以下一句话概括：

日本的灾民让世界感动，日本的政治让国民绝望

在这句话中，有两类完全不同的日本人。

海啸让人们失去了亲属，核电站事故夺走了人们的故乡，然而，人们没有切断纽带，而是大家相互支持，相互安慰，这是美丽的日本人。另一方面，有的人逃避责任，争权夺利，趋炎附势，

这是丑陋的日本人。不过，所有的人都站在美丽的日本人一边，抨击丑陋的日本人。

然而，这种极其简明易懂的图式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近几十年来，我们对此反复进行过讨论，其结果还是一成不变。

本书的出发点非常单纯。

我们在成为日本人之前，首先是人。不论人种、国籍，人有共通的本性。因此，所谓的“日本人性”就是把我们身上的人的共通本性抽取出来后剩余的东西。

我们无法通过他人的眼睛看自己，只是确信“日本人是独特的”，但究竟如何独特？我们几乎从来没有意识到对它的客观的评价。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人士以世界上80多个国家的人们为对象，对他们进行定期调查，内容涉及政治、宗教、工作、教育和家庭观等，这就是“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目前来看，这是一个有关国民性的最完备的调查。2005年的调查共设置了82个问题，在其中的3个问题上，日本人与其他国家的人呈现出极大的差异。

看此差异，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日本人的“特别”，不过，这与我们的印象极不相同。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这3个问题及调查结果。[①]

问题：不希望战争再一次爆发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但是，假设出现了战争爆发的事态，为了国家你会积极地参加战

① 电通总研、日本调查中心编，《世界主要国家价值观数据总汇》（同友馆）。

争吗？

图1是回答“会”的人的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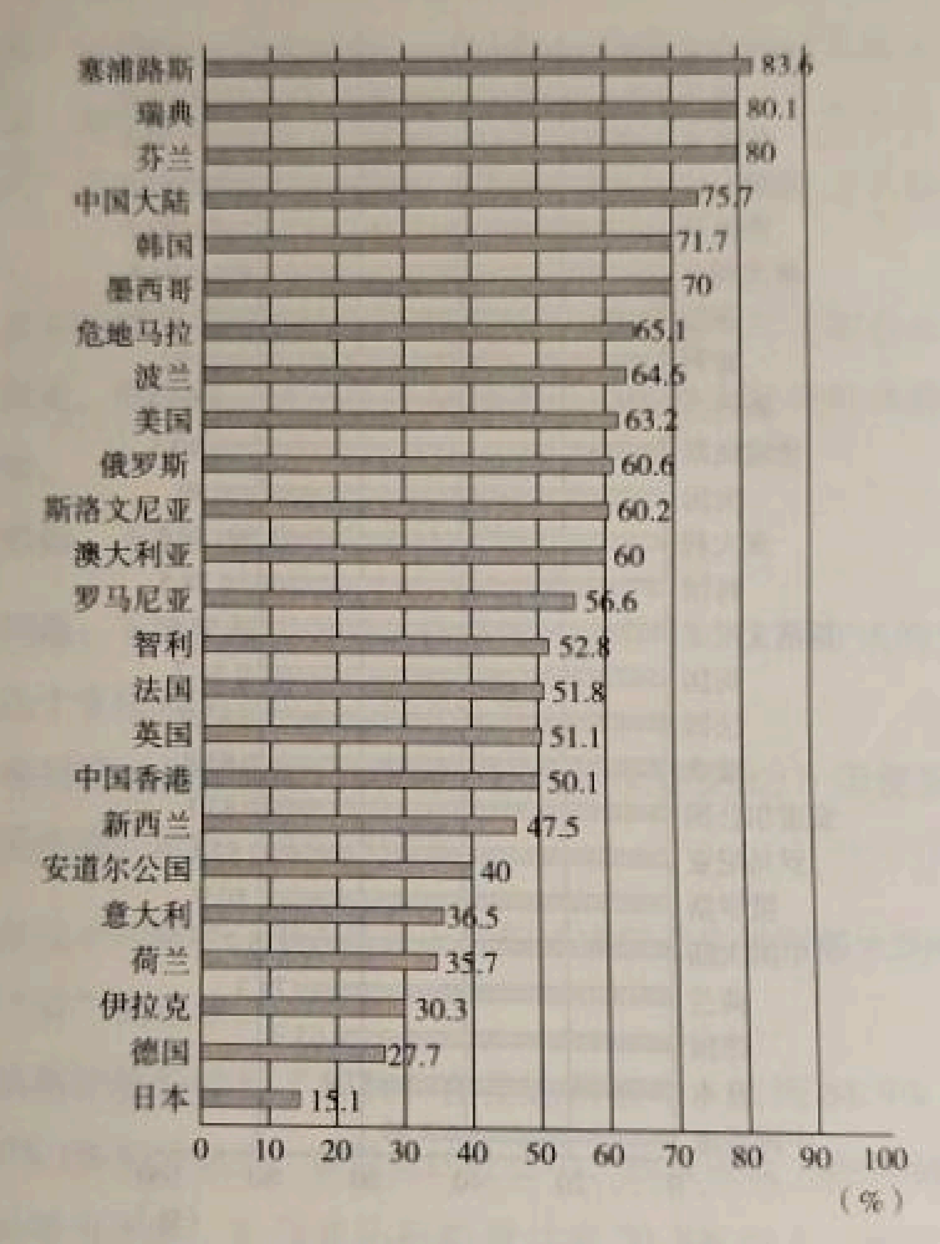


图1　为了国家你会积极地参加战争吗？

问题：你对自己身为____（这里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名称）人感到自豪吗？

图2是回答“感到非常自豪”和“感到相当自豪”的人的比率。



图2 你对自己身为______（这里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名称）人感到自豪吗？

香港不是国家，而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因此，从这个比率来说，实际上日本也处于世界最末位。即便爆发了战争，日

（日本人）

本人也不会为了国家而战斗，而且也不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

你对这个结果作何感想？如果是保守派的话，他们也许会愤愤地说：这是以“自虐史观”对日本人进行洗脑的战后民主教育的罪过。如果是自由主义者的话，他们也许会说：日本人以“和平宪法”的形式拒绝任何战争，因此，这是战后民主主义的伟大成果。

且不论哪一方正确与否，与日本一样，德国的比率也处于低位，因此，很显然，这个结果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体验的极大影响。

然而，下面的结果更加令人震撼。

问题：下面列举了最近的将来可能会发生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假设这个变化真的发生了，你怎么看？

感到好（希望变化）？感到不好（不希望变化）？即便发生变化也无所谓？对此，请分别回答。

在这个问题中，图3是关于“权威或权力应受到极大的尊重”回答“好”的比率。

从统计结果我们了解到，在发达国家中，法国84.9%的人、英国76.1%的人认为，在健全的社会中，权威或权力应得到尊重。在允许吸食大麻、实行安乐死的荷兰有70.9%的人，在以自助、自立为宗旨的美国有59.2%的人回答：权威或权力是必要的。即使在大肆批判权威体制的中国，也有43.4%的人认为权力是需要的。

与此不同的是，在日本人中，回答“尊重权威或权力是一件好事”的人只有3.2%，相反，回答“是一件坏事”的人竟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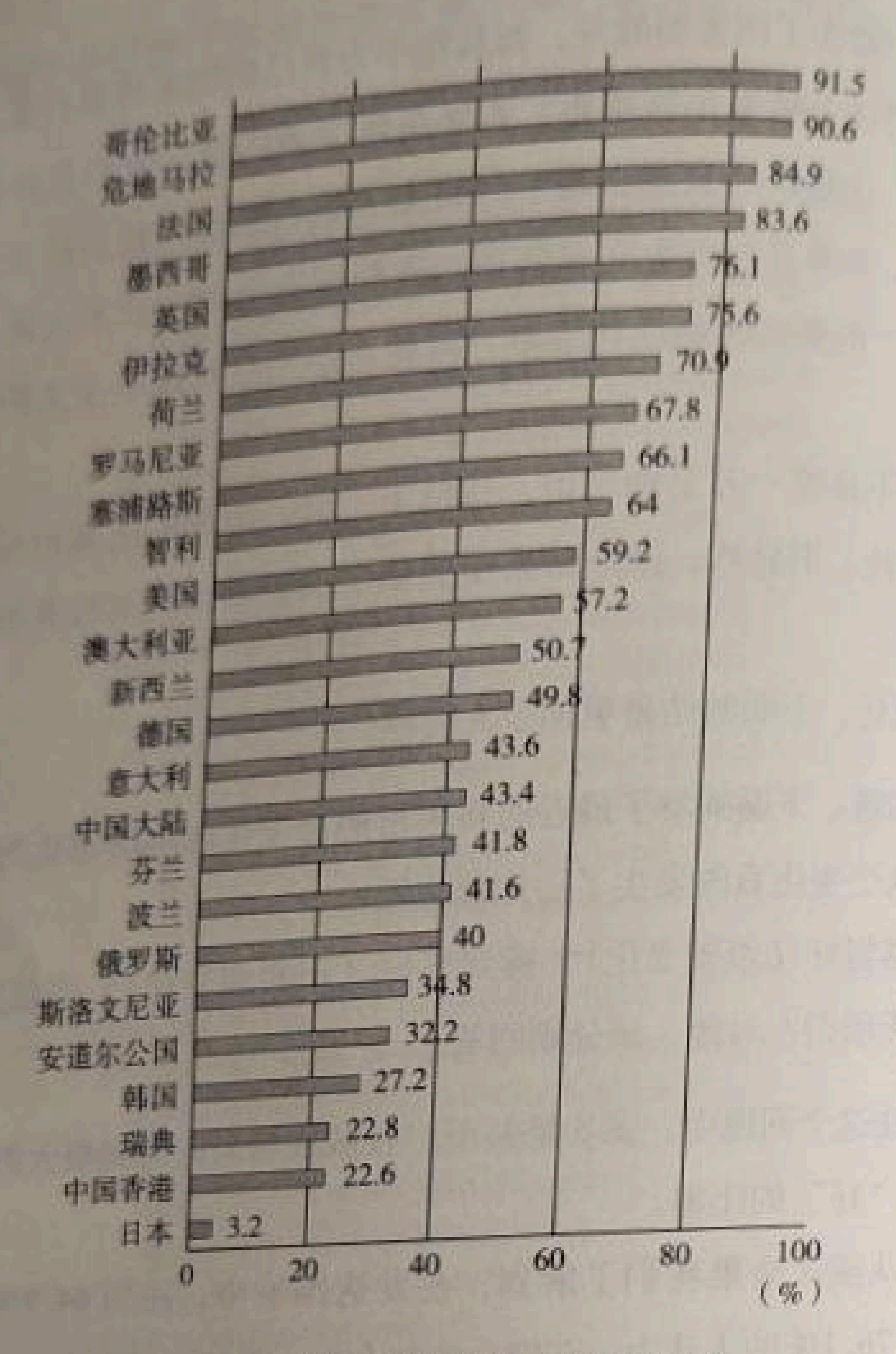


图3　权威或权力应受到极大的尊重吗？

80.3%。在世界范围内，很明显，日本人是一种非常厌恶权威或权力的国民。

我们之所以拥有这样特殊的价值观，或许受到战争体验的影响。由于我们日本人相信了标榜权威或权力的政治家、军人，广岛和长崎受到原子弹的攻击，整个日本变成荒野，包括平民在内

的300万民众失去性命，我们深受其害——人们有这样的想法一点儿也不奇怪。

但是，即便如此，仍有需解之谜。德国人也同样经历了战争的惨剧，即便如此，有一半（49.8%）的人认为“权威或权力应受尊重”。日本人的“反权力（或可称为厌权力）”的倾向过于极端。

本书以此“谜”为出发点，对日本人究竟为何人、究竟生活在怎样的社会之中进行剖析。在这里，进化心理学的知识可能会对我们的剖析之旅提供帮助。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政治或行政能够做到的事情其实并不多。然而，我们却对“国家”寄予过多的期望和要求。与此同时，在个人拥有复数身份的社会中，我们对“国民”意识强调过度。

将日本人放入括号里的最大功效是，通过远离既有的“国家”或“国民”概念，我们能够简明地理解世界上发生的各式各样的事件。我们所有的日本人几乎都出生在日本，在这个岛国里成长，以及在这里死去，即便如此，个人的人生与国家的命运并非生死与共的关系。

国家的权威目前正发生着极大的动摇，正因为如此，我们每个作为独立、自由的日本人必须思考正义、幸福、社会，以及最重要的未来。

目录

写在前面

放入括号里的"日本人"

0 微笑的国度

表达微笑的说法有 13 种 002

察言观色的"格莱恩查" 004

数值化的身份 006

领导者的素质是"妥协" 008

面子与关心 010

普通的"日本" 012

PART 1 LOCAL

1 武士道与新世纪福音战士

实体不明的侵略者 017

另一个"福音战士" 019
政治空间与货币空间 021
"统治的伦理"与武士道 023
"市场的伦理"与挣钱游戏 026
零和与正和 027
终极武器·武士道 029

2 "日本人"的东方主义
认识"自我"的工具 032
"武士"是形象商品 034
"日本人论"是舶来品 037
第十八个使徒 040
小结（1） 042

3 用进化论说明"爱的荒芜"
概率的骗术 043
被装进大脑中的因果律 045
概率的世界与复杂系统的世界 047
乱交与纯爱 049
疾病为什么会存在？ 052
作为年轻代价的老化现象 054

4 "人的本性"是从进化中产生的
互酬与交换 058
赠予的军备竞赛 059
吃人是人的本性 062
"咱们"与"那伙人"的实验 064
神为何而存在？ 066
狩猎采集部落人的世界 069
小结（2） 072

5 哥伦布的鸡蛋
农耕革新 073
温带地带与文明的发祥 075
妥协与全体一致 078
没有历史的世界 080

6 东方人的头脑，西方人的头脑
日本人与美国人的默认策略 085
你的话到此为止吧 087
关系与分类 089
小结（3） 094

7 空气与水
敬启者，麦克阿瑟将军 095
将日本纳入美国的领属 097
"水"的秘密 098
世界范围的价值观调查 101
由"价值观地图"看日本的特殊性 104
有自己活法的日本人 109
战争的得失计算 110
一切从万叶时代开始 113

8 从"水"看日本论

公务员为什么不接受贿赂？ 117

"家"是社会的最小单位 119

一人一个家庭的奇妙社会 121

公司交际 123

妈妈党的交际圈 125

日本人的命运 127

小结（4） 130

PART2 GLOBAL

9 全球主义是乌托邦思想

日本人是"劣等人种" 133

因无能为力而变得富裕 136

绝对优势与相对优势 139

自由贸易的乌托邦 141

看守与囚犯 143

市场原理主义与美国主义 146

10 公元前的全球主义

古希腊的民主政治 150

犹太人发明的绝对神 153

近代的改革 155

小结（5） 159

11 关于"正义"的哲学

从道德上讲，涨价对吗？ 161

双重房贷能够使人得到救济吗？ 162

猩猩的"正义" 164

善恶二元论与原则原理主义 166

政治哲学的四种正义 168

关于"原理"的斗争 170

"农村社会"的极限 173

12 何谓美国主义？

那不是侮辱吗？ 176

绝对的权力 178

从道德上讲，能力主义是正确的 180

两个共同体 182

自由民主主义的正义 184

善意与傲慢 186

美国主义侵蚀着美国 188

全球化空间的规则 190

小结（6） 192

13 核电站事故与暗杀皇太子事件

昭和天皇退位论 194

乱发脾气的大臣 196

消失了的核电站事故责任 198

无限责任与无责任 200

14 福岛的中心是空的
战国时代的会战是公共事业 203
穷人的银行连带责任 206
法律的绝对性和自我责任 208
股东拥有主权是“谎言” 210
巫术式的无限责任 212
小结（7） 215

15 我们的失败·政治篇
公共选择的理论 217
官僚内阁制与政府机关代表制 220
日本是政府机关联邦国家 222
“日本改造计划”的失败 224
民主党内阁 VS 官僚内阁 226
北风与太阳 228

16 我们的失败·经济篇
1940 年体制 233
统制经济的局限 236
通产省的败北 238
最后的守旧派 241
日本能走向“全球化”吗？ 244
落后一圈的第一名 246
小结（8） 249

PART3 UTOPIA

17 “大停滞”的时代
股票投资产生不了利益 255
借债度日的美国 257
中产阶级的没落 259
硬币的正反面 261
“美梦”成泡影 264
吃光了的果实 265
问题出在国家 267

18 “桥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 272
后福利国家的政治哲学 274
应时代之需的新自由主义 276
极端的个人主义 278
新自由主义与爱国 280
140 个字的反驳 282
包容所有建设性的批判 285
超越新自由主义的东西 287
小结（9） 290

19 赛博空间的评价经济
迈克尔·杰克逊与投资银行家 291
自我增殖的资本主义 294

网络竞拍的道德 296

所谓"心情好" 298

匿名贴吧的小奇迹 301

推特可以扩散好评 303

脸谱的实名制 305

后现代的开始 307

20 走向自由的乌托邦

以"我"为中心的时代 310

液体化的社会 312

无限循环的"我" 313

酷日本（Cool Japan） 315

捣毁伽蓝 317

乌托邦的自由市场 319

走向未知的世界 320

小结（10） 324

后记

传播新世纪福音的战士们

译后记

0 微笑的国度

也许大家觉得奇怪，为什么本书先从微笑说起？

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核能安全保安院”这样一个机构的存在。这是直属于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下的一个特殊机构，是针对以核能为首的电力、城市煤气、矿山等产业活动进行安全控制、保安维护的一个机构（将来可能与核能安全委员会统合成为“核能控制厅”）。核电站发生事故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核能安全保安院”在官方网页上关于行为规范第一条“强烈的使命感”，“常常将国民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执行任务时，保持警惕性；发生紧急情况时，为确保安全，积极果敢地采取行动”的内容，现在已经被删除了。

他们在紧急情况发生时究竟采取了怎样的行动？今后，“核能事故调查论证委员会”可能会做出结论，关于比较复杂的责任何在的讨论并非本书的主题。我感兴趣的是担任发言人的审议官的微笑。

一号炉和三号炉相继发生氢爆炸，核电站的情况每时每刻都在恶化时，传达官方信息的审议官的脸上看上去一直都泛着淡淡的微笑。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那微笑有时还充溢脸庞。

相同的情景还出现在东京电力公司的见面会上。以社长为首的管理层就像戴着能面具一般，以相同的表情回答提问。公司职员在说明原子炉的建筑物被损毁、露出破损的燃料棒等重大事故时，不止一次地脸上露出微笑。比如说有这样的场景：当记者指出资料不完善，公司职员急忙向旁边的同事确认情况时，他们满脸堆满笑容。

当然，我并不想通过此事来责备"核能安全保安院"或东京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并非将事故当作儿戏，可能由于过于紧张，没有时间调整脸上的表情。然而，从西方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场景。因为在西方社会里，当说明一个重大的事故时，他们是根本不可能面带微笑的。

但是，如果泰国人看到这个场景的话（实际上许多泰国人都看到了），他们可能丝毫不会感到不可思议。

表达微笑的说法有 13 种

在哈佛大学和马萨诸塞大学学习人类学和教育学的亨利·霍姆斯曾在亚洲各国从事调查研究，后来他与泰国的社会学家斯查答·丹顿塔维结婚，作为一名经营顾问为驻泰国的外资企业进行咨询、培训工作。

有一天，霍姆斯在曼谷的街道上看到一起交通事故。①

---

① 亨利·霍姆斯、斯查答·丹顿塔维，《与泰国人一道工作》（渊公）。下面的记述都引自该书。

一个欧洲人驾驶着一辆新式宝马汽车停靠在一辆等候信号的奔驰车后。在信号灯变绿后，开奔驰车的泰国女子可能没有开惯这种车，错挂了倒挡，直接撞上了宝马车。

泰国女子赶忙下车，确认双方车辆的损坏程度，在此期间，女子的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根据霍姆斯的说法，这种微笑（伊姆）用泰语讲，就叫作“伊姆·伊蔼伊蔼”。它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我知道事情的对与错，但事已至此，无法挽回，叹息也没有用。”

在日语里，表达微笑的说法各式各样，如苦笑、嘲笑、破涕为笑等，但在泰语中，表达伊姆（微笑）的说法有13种。

例如，“伊姆·塔克·谭”是这样一种微笑：“我无法赞同你的意见”或者“请提出你的看法，不过你的看法并不好”。在核电站事故发布会上，东京电力公司的职员受到记者无端的提问时，脸上露出的笑容或许就是这样一种微笑。泰语中还有一种叫作“伊姆·噝”的微笑，它是在发生重大事故被追责时，无意识地露出的笑容。其意思是：“直接面对毫无胜算时的微笑。”

泰国、缅甸被称作是“微笑的国度”，但他们的微笑并非毫无意义。在东南亚，笑容出现在人们各式各样的生活交际之中。因此，如果是他们的话，也许就会正确理解成为记者见面会上众矢之的的审议官或东京电力公司职员微笑的含义，并且能够洞察他们的窘境。

当然，虽然他们在记者见面会上笑容满面，我们也不会误解其笑容的含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日本人也是“微笑国度”的居民。

察言观色的"格莱恩查"

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号炉失去冷却功能后，核电炉的温度急剧上升。在大地震的第二天，即3月12日，废弃该炉、向炉内注入海水的工作展开。然而，当海水开始注入核电炉后，东京电力公司总部发出了停止注水的指令，说"这种方法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于是注水工作停止了55分钟。对此，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我们还清楚地记得，在国会，人们追究、谴责这个可能是由菅直人首相发出的停止注水的指令。

这个喧哗最终归于平静，因为人们了解到事实真相是：该核电站站长吉田昌郎无视总部的指令，持续注水。但是，事情的起因在于集中到首相官邸的东京电力公司负责人员的报告。该报告说："在首相尚未做出判断时，注水工作无法实施的氛围很浓。"对此，当时东京电力公司的副社长这样解释道："首相官邸的（没有得到首相批准的）氛围被传播了出来，因此，我们决定停止注水。"

根据"氛围"进行重大决断并非只是东京电力公司经营者特有的方法。霍姆斯曾介绍过这样一个例子。

一个泰国女性职员有一个重大问题必须与身为老外的上司进行讨论。她走到上司办公室的门口一看，发现上司手拿文件，紧锁眉头，表情十分严肃。于是，她决定利用其他时间再与上司讨论，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过后，她知道那个问题果然非常紧迫……

在泰国的外资企业中，像这样的麻烦事频发不断，每当这时，

外国老板就会不知所措。但如果是日本人的话，任何人都会非常容易地想象出那样的情况。

察言观色，在泰国称作“格莱恩查”。这是出于“客气”、“担心”的考虑，是“在可能会产生不愉快或对立时，以及有必要保持良好的协作关系时，试图抑制个人的关注力和欲望的一种个人态度”。但泰国人并非对任何人都察言观色。

霍姆斯说，在泰国社会里有三个世界。一是“家庭的世界”，像在亲子或夫妻这样的极其亲近的关系中，根本没有必要察言观色。一是“自我本位的世界”，亦即“他人的世界”。泰国人不遵守交通规则是出了名的，这是因为对陌生的路人根本无法察言观色。

客气、担心在“家庭的世界”和“自我本位的世界”的中间地带非常重要。霍姆斯将这个实行察言观色的人际关系称作“关心的世界”（图4）。在这个世界里，他广泛地观察到以下一些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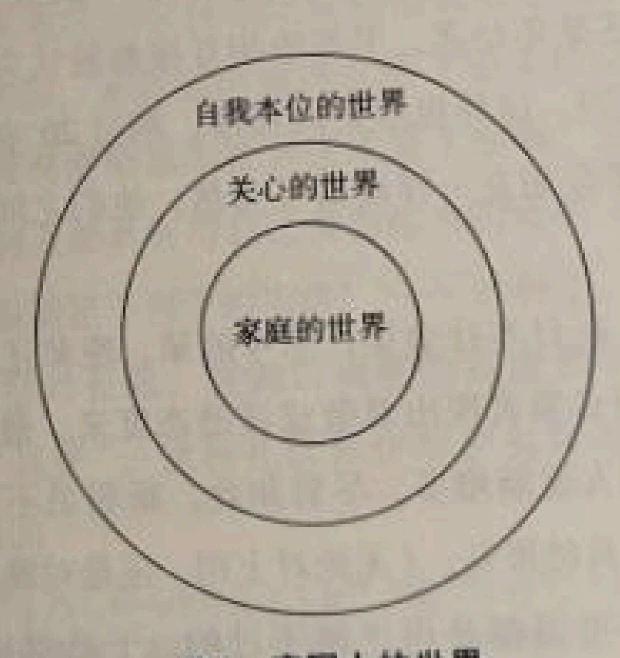


图4　泰国人的世界

- 合乎对方的希望和要求。
- 不给对方增添麻烦。
- 为了不使对方不愉快，抑制自己的不愉快和愤怒之情。
- 避免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要求。
- 尽量不对“上司”、年长者或有经验的同事发号施令。
- 尽量不评价同事或“上司”。
- 避免提出自己的各种权利。
- 即使没有理解对方的言辞，也要避免提问。

我们将上述这些态度看作西方人的“日本人论”恐怕也是非常合适的。

数值化的身份

英语中也有一些有关尊敬、谦逊的表达方法，但它并不像日语那样，在日常生活中用尊敬语或谦逊语来确定上下关系。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中，人们不喜欢以年龄来区分不同的人。无论年长者，还是年幼者，平等地相互接触被认为“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在美国，这种思维走向极端，刚过 20 岁的新职员对总经理、老职员都像朋友一样谈话（当然，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划分得很清楚）。

与此相反，在日本社会里，至今前辈、晚辈还具有重要的意味，对顶头上司必须表现出尊敬或谦逊态度来。最近，对这种习惯持批判意见的人逐渐增多，尽管如此，新职员不可能对社长使用对等的语言。其结果是，（无论对上司，还是对晚辈）对任何人使用尊敬语或郑重语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于是就出现了大量像

"好好吗"① 这样神乎其神的说法。

在泰国，不仅在横向人际关系的"关心的世界"中要察言观色，个人与个人的纵向关系（阶层）也受到人们极大的重视。这种上下关系是由财富、职业上的地位、年龄、德望以及出身决定的，但令人感到十分惊讶的是，自15世纪至19世纪中叶，包括国王、奴隶在内的所有国民的地位都被数值化了。

"萨克迪纳"（位阶田）原来是以土地的大小划分国王的臣民位阶秩序的，与日本江户时代的俸禄相同。但阿尤塔亚王朝时的波洛马特拉伊罗卡纳特国王将萨克迪纳扩大化，以"赖"为单位，规定了所有国民的位阶秩序。

根据这种阶层制度，奴隶分与5赖，自由农民分与25赖，下层官吏最多分与400赖。拥有400赖以上位阶田的是敕任官吏，高层的大臣则有1万赖，皇太子10万赖，国王是全国土地的主人，因而拥有无限多的位阶田。也就是说，在泰国，只要了解了对方的位阶田，立刻就判断出上下级的关系。

这种以数字来表示全体国民地位的制度在世界上也属罕见，它持续了400年后，被进步的拉玛五世（即朱拉隆功）废止。但这种严密的等级制度给泰国社会造成重大影响，深深地埋下道德观——即"任何人都具有与自己身份相当的场所（即'分'），没有非分之想，应满足于当下的生活"——的种子。

在泰国，面对长辈，在胸口或嘴的高度双手合十，以示敬礼，这叫作"瓦伊"，这种礼仪称作哈伊克阿特（向对方表示

---

① 原文是"よろしかったでしょうか"，即"好吗"、"可以吗"等意思，为了表达出神乎其神的意味，现译作"好好吗"。——译者注

尊敬）。对朋友、上司、下属等表示关心（纳木查）或同感（亨查）十分重要，为此，自我抑制（萨姆罗瓦姆）就显得非常关键。

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恩情（本昆）。获得财富或权力的人，对不走运的亲戚或单位的年轻下属要像家长一样庇护他们，这被视为理所应当。在泰国的公司里，从住院费到孩子的学费、安葬费等，上司对下属要伸出援助之手。“本昆”被看作像零存整取似的东西，接受“本昆”的人们一定要怀着一颗忠诚的心（琼拉克帕克迪）偿还这种恩情。

在这种密切的人际关系中，泰国人尽其所能地利用一切机会——包括成人、结婚、丧葬、祭祀以及赠答等——完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领导者的素质是“妥协”

2010年9月，日本海上保安厅在冲绳县尖阁诸岛①一带以妨害执行公务罪逮捕了中国渔船船长，并对船员进行取证调查。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强烈反对并采取了反制措施。迫于这种压力，那霸地方检察厅以暂缓惩处的形式释放了中国船长，让其回到中国。

关于这个事件，民主党政权受到严厉的批判，认为是“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实际上，泰国也与邻国马来西亚之间围绕领海问题发生过相同的争议。

1995年，马来西亚政府宣布200海里大陆架为其经济专属区，

① 即我国的钓鱼岛。——译者注

凡在区域内航行的外国船只有义务事先进行通告。泰国领海内的水产资源由于滥捕而逐渐枯竭，泰国的渔民组成大规模的船队在其他国家的水域进行捕捞作业。马来西亚对这种如入无人之境的状况实在忍无可忍了。

在发生冲突最激烈的时候，马来西亚军舰与泰国渔船之间发生枪战，泰国渔民或伤或亡。其结果是，泰国渔民怒不可遏，封锁了海湾。

对此事件，著名泰国历史学家尼提·伊奥希翁这样说道：渔民们的愤怒与其说是朝向马来西亚政府的，不如说是向不作为的泰国政府发泄的。

到事件发生为止，泰国政府从没有试图改善过经济专属区的航海权，也没有表示出解决在他国水域捕捞作业的泰国渔船问题的愿望。而且，即使在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之后，也没有决定是否发出正式的抗议书，对采取怎样的态度去交涉也迟迟拿不定主意。一句话，泰国政府没有丝毫的领导力。

不过，伊奥希翁教授认为，这正是泰国文化的本质。因为在泰国的政治中，领导者最重要的素质是“妥协”。

> 在泰国官场上，性格激烈的人、心地实诚的人、按规律行事的人等是很难晋升到精英阶层的。对一般人来说，那样的性格是一种美德，但极难产生出妥协的氛围。
>
> 在泰国文化中，能够达到领导者能力的人是“优柔寡断”的人。也就是说，领导者十分在意与他人的关系，珍视这种关系，不轻易地破坏它。只有这样，才不会与任何人产生对立，很容易达成妥协。与所有的派系和平相处的能力就是不

做任何的决断。这正是泰国式领导者最重要的素质。①

伊奥希翁教授感叹道：泰国社会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负得起责任。他说："决断一件事究竟是否付诸实行，是由没有实体的'制度'决定的。"

在泰国的外资企业工作的英国职员对这个特点这样解释道：

泰国是一个妥协的社会。失败者的数量非常少，在对立方面花费时间的情况也很少见。相反，如果是为了寻求一个妥协的方案，他们花费时间之长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大家感到都在享受人生，感到这样的做法于人于己都是很好的……

（但是），这样做起来非常困难。倘若整个社会必须寻找一种让所有人都幸福的行为的话，那么，只有将碍事的人拒之门外。②

面子与关心

在美企航空公司负责人事工作的泰国人（女性）曾考虑过一种奖励制度，即全体职工出全勤的话，就另外追加两天的特别休假。当她与常务董事（外国人）商量时，上司对她的提议十分欣赏，下令用她的名字发出通知，但她坚决地拒绝了。因为如果署她的名字的话，恐怕会引起其他部门经理的嫉妒。

将人际关系放在第一位的泰国社会是一个"忌才妒贤"的世

---

① 尼提·伊奥希翁，《虽不靠谱，但决不可瞧不起的时代》（NTT 出版）

② 亨利·霍姆斯、斯查答·丹顿塔维，前引书。

界。在一个组织内部，关心还是一种技术，既要尽可能地不显山不露水，又要避免成为嘲弄的对象。

泰语的“微哈”被翻译成“批评”。但这仅仅表达了“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即使对方犯了错误也不会遭到指责的含义（在泰语里，根本就没有“批评”这个词）。泰国社会中最大的禁忌是让对方失去面子，使下属遭受耻辱，这是驻泰国的外国企业经理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泰国人不管顶头上司的指责对错与否，决不原宥让自己失去面子（使自己蒙羞）的人。

泰国人之所以那么拘泥于面子，是因为它是维持“关心的世界”的绝对条件。失去面子的人也失去了社会中的位置。对他们来说，这是绝对恐怖的事。

关于面子，日本泰国文化研究泰斗末广昭——他也是霍姆斯著作的译者——曾这样论述道：

> 泰国人将所有的努力都放在如何不伤害对方的面子上，放在如何保住自己的面子上，或者放在如何不动声色地重新找回失去的面子上，以及放在如何挽回失去了的名誉上。而这可以说就是泰国人式的“关心”。①

那么，泰国社会中的权力（权限）到底是什么？它是“巴拉弥”（即佛教中的波罗蜜），是抵达涅槃时必需的道德，即人的品德。

末广还说：“巴拉弥”并非与生俱来的，人在社会关系中或得

① 末广昭“泰国人的关心与工作·企业观”（亨利·霍姆斯等，前引书，解说）

到它，或失去它。具有众多“巴拉弥”的人，可以行使极大的权限。人一旦失去“巴拉弥”，权限也随之失去。也就是说，权限并非源自地位、职位，而是属于个人的。

除此之外，泰国社会中还存在着一种叫作“伊提彭”（影响力）的力量。它与公司内部的地位或公共场合均没有关系，而是依据某种非正式关系——如对人情、利权的追求等——而行使的力量。

泰国人虽然为纵横交错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所束缚，但他们通过积聚“巴拉弥”、获得“伊提彭”，日夜为在“关心的世界”里占据有利的地位而奋斗着。

普通的“日本”

在位阶（阶层）受到严密规定的泰国社会里，不可能翻越部门或省厅的围墙。即使像欧美公司那样，设置一个超越多个部门的特别岗位，最终泰国人也只是将它作为一个特定经理的下属，放在某个部门里。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其手下的员工对他的指令阳奉阴违，不会去执行的。

要想在泰国的公司里出人头地，不在组织内部显山露水，不须发挥自主性，尤其不对任何事负责是很重要的。前往泰国任职的欧美的经理遇到的第一个难关是：泰国人的下属从不表明态度，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当你指出他工作中的失误时，他还是“满脸堆笑”。

这样的组织可能十分安稳，不会由自己的力量进行“变革”。因此，泰国社会常常需要“外部的压力”。

如此这般的泰国文化与日本的情况非常相似。"曼谷日本人商工会议所"理事、长期担任泰国当地公司法人的斋藤亲载曾说过这样的话：日本企业在东南亚成功的理由之一在于，与欧美国家的人不同，日本人能够理解泰国人的文化。①

在泰国，没有"契约"的概念。无论日本人，还是泰国人，"都不喜欢将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谈判是一种以心换心的事情，"嗯嗯，不是挺好吗？""这个地方总会……"这样的默契同样适用于双方。日本人与泰国人都是"非契约性的国民"，因而两国之间商业活动的进展非常顺利。

这当然并不是说日本与泰国之间具有特殊的亲和性，而是说，在密切的人际关系中，将关心和面子放在第一位，是在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国都能够看到的文化现象。

在某日资企业工作的泰国人写下的以下的感想颇具象征性意味。

> 我们生产的车辆出口到老挝，为了了解销售状况，我去了老挝一趟。现在我算是明白了日本人的情况。从前，日本人批评我们懒惰，说我们的行政机构拖拖拉拉。当然，对这种批评我们不抱有好感，因为我们觉得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了。但到了老挝之后，我才发觉我们自己因同样的事情在批评老挝人。②

欧美的专家们为寻求"经济成长的奇迹"而来到日本，发现

---

① 斋藤亲载，《泰国人与日本人》（学生社）。

② 亨利·霍姆斯等，前引书。

了亚洲农耕社会的各种特征，如“耻”、“和”、“表和里”等，他们将这些看作“日本的特殊性”。接受他们观点的日本人也认为自己是一个“特殊”的民族，从而写下各式各样的“日本人论”，流行一时。

然而，日本人真的很特别吗？我们社会文化、习俗、行为规范中被认为是独具“日本性”的东西，实际上绝大部分是亚洲世界中极其普遍的东西。

洪水吞噬曼谷时，泰国民众相互安慰、相互帮助，面对灾害，泰国社会并没有出现大的混乱。

此外，泰国政府与军队之间、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相互推卸责任，政府发言人在告知民众洪水到来时脸上泛着淡淡的微笑，因而缺乏统管的灾害现场为朝令夕改的指示所摆布。

了亚洲农耕社会的各种特征，如“耻”、“和”、“表和里”等，他们将这些看作“日本的特殊性”。接受他们观点的日本人也认为自己是一个“特殊”的民族，从而写下各式各样的“日本人论”，流行一时。

然而，日本人真的很特别吗？我们社会文化、习俗、行为规范中被认为是独具“日本性”的东西，实际上绝大部分是亚洲世界中极其普遍的东西。

洪水吞噬曼谷时，泰国民众相互安慰、相互帮助，面对灾害，泰国社会并没有出现大的混乱。

此外，泰国政府与军队之间、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相互推卸责任，政府发言人在告知民众洪水到来时脸上泛着淡淡的微笑，因而缺乏统管的灾害现场为朝令夕改的指示所摆布。

PART 1
LOCAL

1 武士道与新世纪福音战士

2000年9月13日，在南极大陆发生了一次超级大爆炸，这引起地球环境的巨大变化。紧接着15日，一颗新型炸弹从东京空中投下，造成50万人死亡。日本政府放弃首都，在芦之湖北岸，与特务机构NERV一道建设一座规模庞大的地下都市。在这个第三新东京市的最中心处隐藏着谜一般的生命体——"莉莉丝"，似乎受到"莉莉丝"的吸引，日本遭受到名为使徒的巨大奇异生物的侵袭……

实体不明的侵略者

《新世纪福音战士》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动画作品，它讲述了14岁的少男少女与使徒作战的故事，这些少男少女们使用一种专门对付使徒的武器——泛用人造人型决战武器（Evangelion）。

这部作品的结构非常复杂，大量引用了包括"伪经"在内的

《圣经》中的内容，对此加以解读不是我的任务，在这里我也不打算对"弑父"的主题进行心理学的解释。我的疑问是，"福音战士"为什么会超越大部分动画，被广泛接受，甚至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神户大地震、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发生之后，《福音战士》开始在电视上播映（具体地说，是从1995年10月到1996年3月间）。当时，令人毛骨悚然的遭受到不明物体侵袭的感觉遍布整个日本社会。大家都茫然地认为，今后一定会发生更加严重的事件。

这种无法形容的不安立刻变成了事实。1997年，亚洲通货膨胀危机使得山一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相继破产，这是日本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同一年，"福音战士"剧场版（《死与新生》《Air/真心为你》）公映，"福音战士"达到流行的最高潮。1998年，俄罗斯发生经济危机，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以及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倒闭，战后日本繁荣象征的大藏省（现名财务省）"护送船团方式"完全崩溃。

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世界的确开始发生变化。

破产和裁员使得日本的失业率上升，新宿地下通道里突然出现了硬纸板房屋的村庄。中老年男性的自杀率急剧增加，年度自杀人数超过了3万人。

"福音战士"的"敌人"完全变了样。

在《福音战士》第一集里出现的第三使徒萨基尔（Sakierl）肩膀特别宽，手脚细长，头缩在身体内，是一个奇形怪状的物体。不过，我们还是能够看清楚这个敌人的实体。第五使徒雷米

尔（Ramile）是一个飘浮在空中的正八面体，第十一使徒伊洛尔（Iroul）是微生物形状的纳米机械。第十二使徒雷里尔（Leliel）是实体与影子刚好颠倒的生物，在其只能看见影子的实体内部是一个广阔的虚数空间。第十六使徒阿米沙尔（Almisael）具有像DNA一样的二重螺旋结构，他与人的心结合，试图统治人类……

实体不明的侵略者侵蚀着人类的日常生活，人类最宝贵的东西遭到侵犯，并被夺走。如果说这就是时代的感觉的话，那么，导演庵野秀明通过塑造使徒——他们的名字是以《圣经》“伪经”的“伊诺克书”中天使的名字命名的——的形象就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

另一个“福音战士”

诺查丹玛斯曾经预言人类将灭亡，时间在1999年，这一年，世界的IT泡沫正沸沸扬扬。日经平均股价重返20 000日元大关，新兴股票市场[①]出现，雅虎、光通信等“IT名企”的股价暴涨，日本也陶醉于一时的幸福之中。

然而，这个幸福时代随着IT泡沫的破灭以及“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而结束，世界性股价暴跌再次引发不良债券的问题，2003年4月，日经平均股价跌至7 606日元，仅为1989年最高值的1/5。

另一方面，新兴企业“活力门”的堀江贵文试图收购日本职业棒球队和日本放送，原通产省官僚村上世彰领导的村上基金寻

① 即东京证券交易所为新兴企业开设的股票市场。——译者注

求“日本企业的经营改革”，他们以六本木大厦为舞台，开始了精彩的活动。此间，数学家藤原正彦出版了《国家的品格》一书，销售量很快超过200万册，成为畅销书。

崭露头角的数学家藤原29岁时（1972年）曾留学于美国，以其留学体验写成的稚嫩的散文后来编辑成册，题为“年轻数学家的美国”。藤原于44岁时（1987年）接到剑桥大学的邀请，携妻儿前往英国，此时的体验被写入《遥远的剑桥》一书中，文笔优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藤原无疑是一个国际人，其创作的《国家的品格》也并非如坊间所说——这是一部宣扬民族主义或排外主义的书——的那样。

在《国家的品格》这部书中，藤原强调道：要排除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心），提倡爱故乡的爱国主义（爱祖国）。对自己出生并成长的地方怀有眷恋与骄傲之情是人之常情，因此，这种稳健的保守主义极其正常。

议论产生分歧的地方可能在于以下两点，即将“市场原理主义”当作毁灭祖国的真凶，以及以“武士道精神”对抗近代的合理性。

正如经济学家们所批判的那样，藤原的市场原理主义批判中有许多值得怀疑的地方。

例如，藤原批判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时，认为“成为拜金者可以为社会做贡献，这完全是谬论，令人愕然”。然而，亚当·斯密在冷静而透彻地分析人类的欲望并阐明市场机制的同时，在与《国富论》齐名的《道德情操论》中反复论述道：支撑市场的是每个人的道德心和正义感，拘泥于财富和权力是无法获

得幸福（心灵的平静）的。[1]

藤原还断然批判道：亚当·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学派导致了“发动战争、攫取殖民地、引发恐慌的20世纪”。然而，众所周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猛烈批判英国的殖民地政策，支持美国的独立和印度的解放。古典经济学学派理论批判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为依据的重商主义，致力于宣扬以贸易促进世界繁荣，而不是战争。

藤原还指出，约翰·洛克的社会契约论是“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他将自由、平等、民主主义当作“欧美国家虚构的谎言”而加以全盘的否定，提倡基于恻隐之心、“物哀”等日本固有文化（武士道精神）的复兴。对藤原来说，所谓近代，是一个肮脏的时代，我们日本人应回到江户时代之前的年代，那时的人们生活得非常“单纯”。

当然，将这种极端的看法当作不识时务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这并不能让我们了解到为什么《国家的品格》会触动日本人的心，甚至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先把结论告诉大家，《国家的品格》是另一部“福音战士”。不过，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先就政治空间和货币空间作一番论述。

政治空间与货币空间

我们生存时最重要的东西是与家人或与恋人等的关系（爱情[2]

① 堂目卓生，《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的世界》（中公新书）。

② 在日语里，“爱情”一词的使用范围较广，包括亲情、友情、爱情等许多情感在内。——译者注

空间）。在爱情空间周边，还有亲朋好友的友情空间，而在友情空间周边还有“熟人”，包括前辈、后辈、上司、下属等。这就是政治空间，这也是“敌我”的世界。

在政治空间的另一面是杳渺的“他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既有每天打招呼的卖菜的，也有只在电视里出现的非洲难民等。与我们的家人、朋友相比，我们几乎没有觉察到他们的存在。

尽管如此，我们的生活并非与他们毫无关系。地球为市场所覆盖，人们以货币为中介联系在一起。由他人构成的、交换金钱和物品的世界就是货币空间。

“爱情空间”是由 2 至 10 人左右构成的小小的人际关系网，半径局限于 10 米左右。但这个小小的世界却占据了人生价值的绝大部分。人类从远古时代起就绵绵不断地讲述着“爱情空间”里发生的事情。小说、电影、音乐，阿狗阿猫们都以“爱”为主题的原因就在于此。

“友情空间”的人际关系最多也就二三十人（一般在 10 人上下），半径在 100 米左右。即便范围扩展到政治空间，这个人际关系网中的人数也就是 100 人左右（这与每年邮寄贺年卡的数量基本相当）。

另一方面，货币空间是以金钱为中介的，它关系到所有的人，因此从理论上讲，它的范围是无限大的。假设外星人来到地球，开始与地球人交易，那么，货币空间或许就会扩延至整个宇宙。与这个广阔的空间相比，我们人生中的货币空间价值极其渺小。假定“爱情空间”的比重占据人生的 80% 的话，货币空间的比率只不过占据 1% 而已（剩余的 19% 是“友情空间”）。

这样的“爱情空间”、“友情空间”和货币空间的大小与价值之比呈指数函数型的逆转状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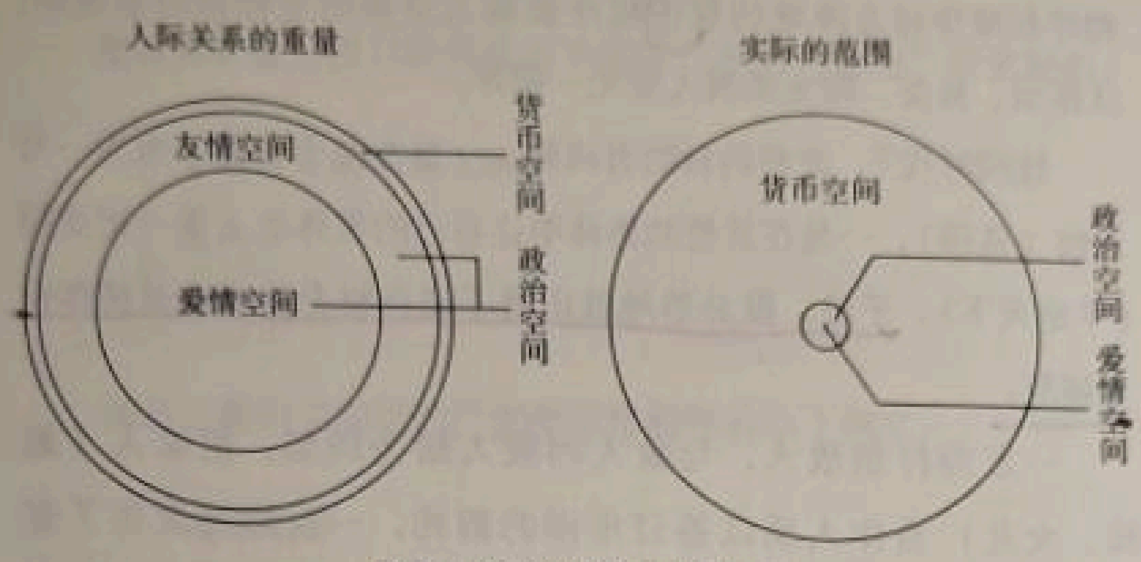


图5 政治空间与货币空间

“统治的伦理”与武士道

在政治空间与货币空间中发生作用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逻辑。首先对此加以关注的是美国民间社会学家简·雅各布斯，她将这种逻辑命名为“统治的伦理”和“市场的伦理”。①

政治空间与货币空间的游戏规则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获得财富的方法有两种（而且从原理上讲，没有获得财富的其他方法）。

一种方法是从对方手里掠夺（权力游戏），另一种方法是交易（挣钱游戏）。

这里所说的财富，不仅指货币。自从自然界分化出雌雄以来，对以两性生殖的生物来说，最重要的财富是异性。雄性从其他雄

① 简·雅各布斯，《市场的伦理，统治的伦理》（日经商业人文库）。

性那里抢夺雌性，只有通过独自占有，才能够繁衍后代。为此，最有效的策略就是划分势力范围。构筑阵地阻止敌人侵犯的防御程序和掠夺对方阵地的攻击程序被植入众多的生物遗传系统中，从昆虫、鱼类、爬虫类到人类无一例外。

战国时代[①]，武将的目的有两种，一是在某个集体中成为一号人物（盗国），一是在其他的集体中让自己的集体坐上第一把交椅（平定天下）。于是，很必然地就出现了适合权力游戏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一方为打倒敌人，与敌人的敌人结为同盟，把家人（姐妹、女儿）当作人质以签订牢固的盟约，一旦形势发生了变化，盟约就成为一张废纸，倒戈一击。一旦成为家臣，他们可以为主上献出生命，但一有机会，他们可以乘人之危，不惜犯上作乱。就像观看战国时代剧一样，政治空间里上演着人类所有的剧目，这里不仅有爱情、友情剧，而且也有嫉妒、憎恶、背叛、复仇剧等。

构成政治空间的基础是残酷地杀掉敌人、争权夺利的权力游戏，另一方面，武将们与朋友相互守约，有时会赌上性命，有时则会尊敬敌人，为敌人的死而流下眼泪。既然将整个团体的成员都逼向死亡的境地，那么处于高位的人就不能有私心，他必须展示出勇气、名誉等普遍的价值观。

政治空间里另一个特征是拥有坚固的阶层结构。一旦一个权

① 关于日本战国时代的时间段有不同说法，一般指应仁之乱（1467～1477）至织田信长进入京都（1568）之间的时代。这是一个群雄割据、战乱不断的时代。——译者注

力游戏决出胜负，那么以胜者为顶点的阶层就形成了。于是，在这个社会中就出现了"安分守己"的规则。江户时代的为门第、成规所束缚的武士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雅各布斯说，权力游戏是由下述的"统治的伦理"所支配的。

为达到目的而欺上瞒下

复仇

排他性

而且，政治空间里的严密阶层结构有着以下规定：

遵守规律

坚持传统

尊重位阶

忠实

在这样的政治空间里，能够获得权力游戏胜利的人需要具有以下独特的个性：

勇敢

尊重名誉

听天由命

在日本人偏爱的戏曲《忠臣藏》[①]中，大石内藏助为了替主公报仇，以敌为友；47名武士精诚团结，他们一旦报了仇，为尊重

① 全称《假名手本忠臣藏》，日本古典戏剧"人形净瑠璃"的剧目之一，作者为竹田出云等人，首演于1748年。——译者注

名誉，甘愿接受命运的打击，肃然剖腹自杀。"武士道"并非日本人特殊的价值观，而是"统治的伦理"的一个典型。

"市场的伦理"与挣钱游戏

如果将政治空间看作掺杂着爱与恨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的世界的话，那么，货币空间就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世界，在这里，人们在协商的基础上从事金钱与商品的交换活动。我们既不会对经常光顾的菜店的大叔产生爱与恨的感情，也根本没有想过网购时对方到底是什么人。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平等，货币空间就被无限地延展开来。

在货币空间的挣钱游戏中，所有的参与者都在有条件的范围内努力追求有效的货币增值。权力游戏的目的在于杀死敌人（军事产业以及军火商除外），挣钱游戏里不需要战争。

在货币空间里，"市场的伦理"占统治地位。其内容如下：

正直

尊重契约

与他人或外国人无拘无束地相互合作

统治的伦理尊重名誉、重视位阶、坚持传统，与此相反，市场的伦理则以合作回报合作，积极地与外面的世界进行交易，建立与对方的长期信赖关系，避免玩弄权术。

此外，挣钱时也有必要的伦理，这就是：

勤勉

节约

提高效率

采用新规、发明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以下的伦理：

竞争，但不置人于死地（禁止暴力）

统治的伦理是在人类进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亿年前的生命诞生——中形成的，与此相反，市场的伦理也不过5000年左右的历史——美索不达米亚、黄河流域出现都市文明，人们开始交易的时间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统治的伦理是事先在人的遗传因子中被程序化（预装）的本能，相反，市场的伦理则是通过学习而掌握的文化。

愤怒、悲伤、欢乐等情感也是遗传性的程序（本能），我们于无意识之中将所有的现象都解释为政治空间的权力游戏，诸如，如果有人赚了钱，那么肯定就有人赔钱；为了在“经济战争”中取得胜利，一定要将“敌人”毁灭不可等。

“通过交易，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财富都得以增加”，这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由于人的本能与对立，无论东西方，这个基本原理几乎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

零和与正和

藤原正彦在《国家的品格》中还批判道：市场原理主义（古典经济学学派）是造成日本社会不幸的元凶。

市场原理主义的前提是“公平地决战”。由于交战双方是

公平的，胜者就获得全部的利益。用英语说就是 Winner takes all（胜者为王）。因为是公平决战的结果，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没有什么不对。胜者获得全部利益无可厚非。就是这样一个逻辑。①

这里所说的“胜者为王”是“新经济”词汇，它出现于 ICT（信息通信技术）兴起的 20 世纪 90 年代末。此前的经济由于语言、文化、库存、流通等制约，企业难以扩展超越一定规模的实业（收益递减）。但是，在 ICT 时代，超越语言、文化框架的世界性平台可以无限制地加以利用，犹如微软的视窗、谷歌的检索一样（收益递增）。这样，就出现了极少数企业掌握事实上的标准的新现象。

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在“权力斗争”中获胜的寡头企业获利，失败者破产倒闭，从市场上消失踪影。平台的共通化使得与互联网相关的企业呈爆发性扩张趋势，由此创造出极为壮观的财富。权力游戏为零和，与此相反，市场的游戏为正和。

如此一来，市场就以与战国时代的“窃国故事”截然相反的原理进行运作，即便如此，藤原的不安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事实上日本的经济一直处于“失败”的状态下。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市场诞生，世界的财富的确增加了。然而问题在于这个果实并非是由大家平分的。

最近 20 年，在拥有 13 亿人口的中国和 12 亿人口的印度，人们的收入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

---

① 藤原正彦，《国家的品格》（新潮新书）。

劳动者的生活相对贫困。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此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过于巨大。

如果发达国家的劳动者 10% 陷于贫困，中国、印度的人们会富裕两倍的话，整个世界的幸福总量的确会加大。所谓扩大货币空间（市场原理主义）就是使世界的不平衡走向均衡化的一种运动。

经济全球化是消解南北经济差距的巨大压力，但从来不讲感情的市场机制通过抛弃经济上的弱者造成发达国家内部的差距逐渐加大（在发展中国家，先富裕起来的人们与贫困的人们之间的差距也变大了）。

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变得幸福了，人们也不会忍受自己（相对地）变穷。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化是破坏我们生活的侵略者。

终极武器·武士道

市场原理主义的悖论在于，通过掠夺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富裕让全世界的人们过上更加富庶的生活。货币空间的扩大之所以给人以“侵略”的感觉，这不是唯一的理由。

政治空间是所有人际关系的世界，而货币空间则是人与人以金钱连接起来的平面的世界。因此，当货币空间侵蚀政治空间时，家庭、学校等共同体就走向崩溃，爱情、友情也走向破灭。这就是我们直观地厌恶金钱，感到“金钱是肮脏的”的理由。

与女子幽会时，不送戒指而送金钱的话，就会遭到“买春”的嫌疑。如果给干家务活的人工钱的话，那么干活的就不是妻子

而是保姆了。像这样，将金钱带入“爱情空间”，人际关系就会逐渐发生破裂（有的家长以孩子的成绩决定零花钱的多少，这是最恶劣的手段）。

然而，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下，没有钱就无法生存。而且“能够用金钱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

日本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社会，人们生活在单身公寓里，在附近的便利店或干路旁巨大的购物中心买东西，在快餐店或家庭餐馆里用餐，打打弹子机，在漫画茶馆喝喝茶，或在卡拉 OK 的房间里打发时光。

货币空间之所以能够扩张，是因为这是我们所希冀的。在几乎能够用货币购买所有服务的社会里，亲戚之间的往来不是必需的，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疏远。总之，全方位的人际关系变得累赘。

与此同时，我们又对这样的“不相往来的社会”从根本上感到不安。人类在长时期进化的历史长河里，一直生活在集体（共同体）之中。从集体里被赶出来就意味着死亡。因为，这时一个个人可以生存下去的环境还没有形成。

货币空间侵蚀世界，这样下去，最后只剩下家人、恋人之间最小的“爱情空间”。倘若连这种共同体也消失了话，个人就被赤裸裸地晒在茫然一片的货币空间里了。于是，人们变得孤独，社会走向不稳定。

面对这样巨大的潮流，从根本上来说，只有两种应对的方法。

一是接受货币空间扩大化的事实，学习在与之相适应的规则（市场的伦理）下生存的方法。

一是阻止货币空间的侵蚀，找回爱情、友情的共同体。

当然，无论政治空间（共同体）抑或货币空间（市场）都是社会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无法选择一方或抛弃一方。

市场与共同体相互依存，共同组成社会。但它们并非事先设计得非常协调，在任何时候，让不同的逻辑同时并存都很艰难。在两者激烈对抗时，针对货币空间（市场的伦理）的侵蚀，我们只有以政治空间（统治的伦理）加以抵制。

面对恐怖的使徒侵略家人、朋友、故乡等具有宝贵价值的东西时，虽然看上去非常传统，甚至有点儿愚蠢，但我们只有一种方法进行抗争，这就是拿起“终极武器”的武士道。

通过展示这种简洁明了的结构，《国家的品格》捕获了日本人的心。

2 “日本人”的东方主义

爱德华·萨义德出生于英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他在开罗接受教育后前往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取得学位，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此间，在萨义德的故国巴勒斯坦建立了犹太人国家以色列（1948 年），巴勒斯坦人反而失去了祖国。

萨义德于 1978 年出版了《东方主义》一书，给当时的学术界以巨大的冲击。①

认识“自我”的工具

所谓东方主义，是指欧美学界对东方（萨义德的书中专指中东）的研究。当时的学者们声称自己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客观地、科学地研究“东方”的（而且这被当作理所应当的前提）。对此，

---

①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平凡社）。

萨义德通过查证欧洲（主要是英国和法国）有关中东的庞大的文献资料，发现他们的研究不仅极其随意，而且他们将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套话强加于研究之中。

萨义德的理论极其简洁有力。即西方人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白种人是优秀的人种）必须说"东方人是劣等的人种"；或者，他们为了批判"为文明所毒害了的西方人"而憧憬于"文明开化之前"的"纯粹的东方人"。无论哪一种"东方人"，都与实际上天天生活在中东地区的人们毫无关系，它们无非是西方人幻想出来的东西。

然而，萨义德的批判并没有就此结束。此前从未认真考虑过自己是东方人（或阿拉伯人、穆斯林）的人们开始将自己的自画像放入"东方"的框架内加以描绘。他们开始以"西方"这个变了形的镜子发现自己的形象，并对自己加以描述。

如此一来，从东方主义诞生出来的虚构的"东方人"就成为现实中的东方人（阿拉伯人、穆斯林）。所有人种、民族的对立就是从这样一个变形的自我形象的再生产中产生的。

这样的东方主义不仅局限于欧洲与中东的关系之中，也完全适用于最先走向现代化之路的欧美各国与除欧美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关系。

像福泽谕吉[①]这样曾提倡"脱亚入欧"的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以西方为参照系塑造"日本人"形象的同时，也用东方主义的视角观察过中国和朝鲜。当然，这并不是说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

---

① 福泽谕吉（1834－1901），日本思想家、教育家，著有《劝学篇》《文明论之概略》等。——译者注

愚不可及，或者说他们是歧视主义者。人是无法通过自己认识自己的。对他们来说，东方主义是认识"何谓日本人"的唯一的工具。

"武士"是形象商品

新渡户稻造[1]于江户时代末期出生于盛冈的一个藩士[2]家庭。在札幌农校（后来的北海道大学）学习期间成为基督教徒，23岁时独自前往美国。他在美国的马里兰州琼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的时候，对具有浓厚神秘主义倾向的贵格会（Quaker，基督教教友派）十分崇敬，在这里，他遇见玛丽·埃尔金顿（日文名是万里子）[3]，并与她结婚。

新渡户稻造在德国公费留学后，回到母校札幌农校担任教授，不久因身体原因，不得不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疗养。30多岁时，他在美国用英语写作了《武士道》一书。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是人们了解在日俄战争（1904～1905年）中打败强大俄国的"新兴国家"日本秘密的著作，不仅在美国，在欧洲各国也非常畅销。

新渡户稻造7岁时，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虽然他出生于藩士之家，但对武士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只要看一下他的经历，就可以了解到，新渡户稻造年轻时曾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学习欧美

---

① 新渡户稻造（1862～1933），日本思想家、教育家，著有《武士道》等。——译者注

② 藩属的武士。藩是江户时代的行政区划，1871年废止，改藩为县。——译者注

③ 玛丽·埃尔金顿（Mary Elkinton，1857～1938），出生于美国费城，1891与新渡户稻造结婚。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就是在与她会话交流的基础上写成的。——译者注

文化方面；在东京大学学习期间，由于方言的缘故，他疲于与对方交流；因而，他很喜欢用英语与人交谈（明治时代初期，日本尚未实行“标准语”）。

后来，新渡户稻造曾这样回忆年轻时的情况：

> 我第一次到东京是明治四年[1]，那时日本的学问基本上处于荒芜状态。很少有人去阅读《论语》《孟子》，更不用说我国的语言了，关注它的人少之又少。[2]

当时，所谓“学问”是用外语习得的。在美国大学接受教育、与美国人结婚的基督教徒新渡户稻造与其说是一个“国际人”，毋宁更加接近“美籍日本人”。在《武士道》的“序言”中，新渡户稻造指出，妻子、朋友常常向他打听日本人的习惯，为回答他们的问题，他写作了这本书。那时，他首先想到的是，美国人都知道“骑士精神”，为与它作对比，他想阐明日本的“武士道”。

在《武士道》中，新渡户稻造对比了日本的皇室与英国的王室、水户光圀[3]与柏拉图以及上杉鹰山[4]与腓特烈大帝。在与西方的比较中，由于他未能在西方找到与“忠”并列的“日本道德的两驾马车”之一的“孝”的例子，所以不得不割爱（增补第十版

① 明治四年为1871年。——译者注

② 新渡户稻造，《英语及英语文学的价值》（《内观外望》）。转引自佐伯真一《战场的精神史——武士道的幻影》（NHK丛书）。

③ 即德川光圀（1628～1700），日本江户时代前期水户藩的藩主，人们也称之为“水户黄门”（“黄门”乃中纳言的中国式称呼），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地方诸侯。——译者注

④ 上杉鹰山（1751～1822），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大名，米泽藩藩主。在藩政改革方面有诸多的建树。——译者注

“序”）。

当时的美国，许多知识分子对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边沁式的功利主义）侵蚀古老而美好的传统而感到十分忧虑（无论哪个时代，人们的不满都是相同的）。对自认为是欧洲文明直系子孙的美国人来说，那个“传统”就是中世纪的价值观，那时，基督教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支柱。

新渡户稻造向他们的内心深处强烈地灌输着这样一个道理：欧美社会已经不复存在的“骑士精神”在日本以“武士道”的形式保存了下来。

新渡户博闻强记，纵横捭阖，不仅在书中引述了从孔子、老子、王阳明到当时最新的思想——尼采、马克思，而且还论述了仁（恻隐之心）、礼、忠义等儒家道德观、美国人比较容易理解的勇气、名誉等英勇准则，以及他们极其喜好的异国习俗（剖腹）等（与此相反，日本历史上的人物，如德川家康①、西乡隆盛②等人一带而过）。

新渡户对他的论述是否能够将日本武士的“真正形象”传达给美国人几乎毫不关注。其实，新渡户不是历史学家，在毫无资料可供利用的加利福尼亚，他是根本无法做到传达日本武士“真正形象”的。

作为基督教徒的新渡户的目的在于证明这一点，即让欧美国家的人知道，在日本，也存在着可以接受基督教的“文化”土壤。

---

① 德川家康（1542～1616），日本江户时代第一任幕府将军。——译者注

② 西乡隆盛（1827～1877），曾是萨摩藩的低级藩士，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立下汗马功劳。——译者注

于是，他运用了以东方主义加工过的“武士”这个形象塑造了理想中的“日本人”，创造了在世界上都很畅销的商品。

“日本人论”是舶来品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受到美国战时情报局海外情报部的委托，分析日本社会及日本人，为占领日本作准备。在此之前，本尼迪克特对日本几乎一无所知，她通过对美籍日本人的采访、观看日本电影以及阅读与日本相关的书籍，研究日本。战后，她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册，这就是“日本人论”的名著《菊与刀》。（本尼迪克特于该书出版后的第三年因病去世，因此，她从未到过日本。）

众所周知，本尼迪克特发现日本人有“菊”和“刀”的两种特性，即审美性和好战性（武士道）。她认为，与欧美国家的“罪文化”意识不同，“耻文化”意识才是日本人的本质。[①] 如果从当时她所获得的时间和研究材料十分有限的情况来看的话，这样的分析，即便以现在的水准判断，应该说也是高水平的。

但是，如果从本尼迪克特从事研究的前提条件（受美国军部的依托）来看的话，她的结论就有着根本性的制约。这就是，她不是寻求日本人与美国人的相似之处，而是必须找出他们之间的相异之处。对占领日本迫在眉睫的美军高层来说，如何统治文化、生活习惯截然不同的民族成为头等重要的课题。即便日本人与美国人之间有“共通性”，作为情报也是毫无利用价值的。

《菊与刀》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的畅销书，是因为书中写

---

① 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光文社古典新译文库）。

着“日本人与西方人是如此不同”。这正如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西方读者（包括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部的高层）从本尼迪克特的分析中找到西方与日本的差异，由此确认了自我的身份（优越性）。

然而，在日本，《菊与刀》也空前地畅销，成为后来不断出现的“日本人论”的原型。因为日本的读者也想知道自己与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

此后的“日本人论”成为日本读书界最常见的商品，如精神科医生土居健郎[1]的《日本人的心理结构》、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2]的《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等相继问世，极为畅销。这两本书还被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引起极大的反响，因为日本经济高速成长之后，“日本的奇迹”再次引起国际上的关注。

战后出版的日本人论数目庞大，且分析结构各不相同，论点和结论也五花八门，但每本书都只是谈“日本人的特殊性”。（其结果是写“日本人的特殊性”的书被归类于“日本人论”。）

首先发现这种情况的是美籍日本人类学家哈鲁米·贝夫（别府春海[3]），他认为，日本文化论已成为“大众消费对象”，其实日本人与美国人并没有太多的不一样。[4]

---

① 土居健郎（1920～2009），日本精神病医生、精神分析学家。《日本人的心理结构》（直译为《“撒娇”的结构》）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作。——译者注

② 中根千枝（1926～　），日本社会人类学家。《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单一社会的理论》《以家庭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纵式社会的力学》等是其代表作。——译者注

③ 哈鲁米·贝夫（别府春海）（1930～　），文化人类学家，代表作有《作为意识形态的日本文化论》。——译者注

④ 哈鲁米·贝夫，《作为意识形态的日本文化论》（思想的科学社）。

一个叫作杉本良夫[1]的人从《每日新闻》社离职，前往美国，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所大学里任教，他曾发出这样的警告：正是将日本人"特殊化"的日本人论阻碍了日本的国际化[2]。

杉本认为，国外日本人的形象基本上都是战后由美国建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用英语介绍"日本人论"的社会学家们绝大多数都是在战争期间的美国教育机构接受日语教育的，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是占领军的工作人员，为推进美国国家政策出过力。他们最关心的是寻找到日本人整体的共通特性。经过冷战时期，这个特点越发显著，由财团等向研究机构提供的基金也优先分配给研究"日本人的特性"的课题。

向"日本人的特殊性"方向极端倾斜的"日本人论"拥有奇妙的悖论。

例如，日本企业相互竞争激烈，却又一丝不苟地践行着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的做法。日本人强烈执着于自然，却在公害、环境破坏方面问题越来越严重。日本注重禅宗，是一个重视精神世界的国家，然而也是一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消费文明社会。在"日本人论"的视野里，对这样的矛盾视而不见成为一种默契。

战败后的"日本人论"之所以要描绘一幅"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日本人"的形象，是由于直接引进了美国研究者的"日本人论"的缘故。此后，土居、中根等人的"日本人论"被翻译成英文，

---

① 杉本良夫（1939～ ），日本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著有《不做日本人的方法》《能不做"日本人"吗?》等。——译者注

② 杉本良夫、罗斯·摩尔，《日本人具有"日本性"吗？——走向超越特殊论的多元化分析》（东洋经济新报社）。

广为人知，这时，美国的研究者们又开始将日本人的“日本人论”作为参考。

我们耳熟能详的“日本人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都不相似”的观点就这样在“东方主义相互参照”的理论下应运而生。

第十八个使徒

明治三十一年（1898）二月，大日本武术讲习会创刊了一份名为“武士道”的杂志。

瑞穗太郎在创刊号上刊载了“发刊词”，他对埃及、印度、越南、缅甸、泰国、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纷纷处于西欧各国的蹂躏之下感到十分忧虑，言辞激烈地批判了欧美列强的帝国主义行径，他指出：“这是无情无义、伤天害理的强盗行为，这是弱肉强食的兽行。”接着，瑞穗认为，能够与基于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世界观的“世界兽欲倾向”进行对抗的唯有日本——它是“坐镇保护东方的灵社”，是“天人调和的守护神”。他宣称，日本一定要振兴“人类最大的精华”——“武士道”，一定要发挥“至诚”和“威势”[①]。

如果我们把《武士道》杂志中的帝国主义批判转换成市场原理主义的话，那么，它就成为《国家的品格》的孪生兄弟了，这绝非偶然。明治时代的人与我们一样，都强烈地感觉到一种不安：“实体不明的东西正侵蚀着我们”。为与西方近代主义——即全球主义——相对抗，那时他们所依据的是武士道，而我们现在之所以仍然重复着相同的行为，是因为即使过去了100年，日本人也没

---

① 佐伯真一，前引书。

有建立起取而代之的精神上的价值体系。

新渡户稻造为向西方人通俗易懂地解释他心目中理想的“日本人”而写下《武士道》。这本书之所以在美国成为畅销书，是由于“武士”正是美国人所追求的、具有异国情调的、东方式“日本人”的象征。

此后，这种“日本人”的形象就像咒语一般，一直束缚着我们。

在《新世纪福音战士》中，实际上人类是第十八个使徒，保卫地球的 NERV、主人公新吉一直都与“诞生出我们的东西”作战。

在西方的东方主义影响下，武士道被创造了出来，而人们又想用这个武士道与“美国”（全球主义）决一死战。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的品格》正是一部“福音战士”的故事。

小结（1）

- 人类社会是由“政治空间”与“货币空间”构成的
- 政治空间▶由家人、恋人、友人以及熟人等人际关系构成的一个共同体（统治的伦理）
- 货币空间▶与他人进行物和金钱的交换时连接成的世界（市场的伦理）。
- 市场原理主义（全球主义）▶货币空间侵蚀政治空间
- 反全球主义▶针对货币空间的侵蚀（市场的伦理）试图以统治的伦理相对抗
- 武士道▶日本版的“统治的伦理”
- 日本人▶明治维新以后，通过与西方的接触而人为描绘的自画像（东方主义）

3 用进化论说明“爱的荒芜”

从品川经横滨前往横须贺方向的京滨特快列车上有许多博彩广告，这是因为沿线有大井赛马场、和平赛艇场的缘故。其中有一个模仿电影《卡萨布兰卡》里亨弗莱·鲍嘉形象的广告，画面上一个身穿白色衬衣、头戴软呢帽的男子，大声吼道：“我不是预言家！”

赛马迷们只需向指定的地址“投放”空信就行，于是，鲍嘉就会无偿地告诉他哪个马票会中。

所谓的赛马预言家，按字面意思就是“预测”赛马比赛的人，中或不中的情况都有发生。但这个广告上有失风度的鲍嘉先生却能让你的马票中奖。因此，他说“我不是预言家”。

概率的骗术

这是一个怎样的买卖呢？只要你了解了概率的秘密，这个骗术容易识破。

假定看到这个广告之后，有100人投了空信，那么，鲍嘉先生

将这些人（打比方说）划分为10个组，然后分别告诉他们不同的预测结果。从概率上来讲，这个预测肯定会有人中，因而虽然有90个人被套牢，但运气好的10个人则获得奖金。

破了财的其余90个人很快就忘掉此事，心想："这无非是不花钱的预测，没中就没中呗。"然而，对中了马票的10个人来说，影响力巨大，他们坚信，鲍嘉先生一定知道赛马必胜的秘密。

这时，鲍嘉先生给他们发来一封信。

"你们肯定一直在怀疑我的做法，因此，一开始我出于好意将我的实力证明给你们看，你们不想知道下一次中奖的马票吗？不过，这一次，你们得付费哟。"

实际上，这是很久以前在美国流行的一种欺诈手段。

诈骗者首先免费给你邮寄中奖行情信息，这个行情不是中就是不中，因此，预测的准确率为1/2。

最初，假定他发出64 000封信件，第一次收到中奖信息的人数达到一半，即32 000人，第二次连续中奖的人又是一半，达16 000人……这样下去，连续6次收到猜得中奖信息的人数就有1 000人。

于是，他就向这1 000人强调他可以完全猜中中奖信息，向他们发去"如果你想收到中奖信息邮件的话，需支付1 000美元的邮费。"假设所有的人都向他转了账，那么他马上就获得100万美元……①

我在京滨列车上看到的广告就是这样一种生意，它从美国流

---

① 约翰·阿伦·帕乌罗斯，《天才数学家迷上股票——数字迟钝的人的投资方法》（宝石社）。

传到远东的岛国，扎下根来。

在美国诞生的心理经营法为什么在历史、文化均有差异的日本也同样奏效呢？这是因为这个骗术与国籍、人种没有关系，它利用了“人的本性”。

这个所谓的本性就是“人无法很好地从概率的角度理解所发生的事”。

预装进大脑中的因果律

涡虫（Planaria）又叫日本三角涡虫（Dugesia Japonia），这是一种扁形动物，虽有神经、消化器官，但没有骨骼和血管，是有大脑的最原始的生物（生息在日本的河流里）。涡虫最显著的特征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再生能力。当它被切成100个切片时，它会再生出100个涡虫。

人们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将涡虫放入透明的塑料管内，点亮台灯两秒钟后，给塑料管的两端通上电。将这个实验重复进行50余次时，只需点亮台灯，涡虫预测到会通电，就会蜷缩身体。这个实验告诉我们：涡虫是一个习得的动物。

当我们将涡虫一切两半，在其再生的时候进行同样的实验，于是我们会发现，不仅从拥有中枢神经的头部再生出来的个体，而且从尾部再生出来的个体也以相同的频率进行着回避行为。也就是说，即使再生，“记忆”也被遗传了下来。

进而我们再做这样的实验：利用涡虫互食的特性，让没有习得过回避行为的涡虫吃掉习得过的涡虫，于是，没有习得过的涡虫也进行着回避行为。“记忆”可以通过吃而实现（即“记忆”

可以吃），这令人感到十分惊异。

20世纪50年代，由这个实验人们认识到：记忆，如同DNA一样，通过化学物质可以被程序化，通过互食，可以被移植到其他个体中去，且程序可以被破解。于是，全世界的生物学家们致力于发现"记忆物质"，不到10年，就没有一个生物学家再从事这项研究了。因为经过无数次的实验，甚至没有人能够发现"物质化记忆"的一鳞半爪。①（现在人们认为，涡虫的"记忆"是应激反应荷尔蒙起的作用。）

我在这里要想说的并非"记忆能吃吗"这样一个深不可测的谜。而是想说，这个生物只拥有极其单纯的大脑（或许只能称作神经束），只要认识到这一点，最初阶段的涡虫的习得行为就令人十分惊叹。

在这个实验中，涡虫习得了什么呢？毫无疑问它习得了一种因果关系：从"亮灯"到"通电"。这样的条件反射实验以巴甫洛夫的狗实验最为著名，涡虫实验证明了不仅狗、老鼠、鸽子，而且即使无脊椎"低等"动物也能够正确理解（?）因果关系。

人们认识到，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将因果论植入神经系统的生物要比不具有这种程序的生物更加有利于繁衍子孙。为了生存，从"听到声音"到"敌人靠近"这样一种因果律可以让人们迅速地隐藏起来。

我们常常以因果律来思考问题，不是因为这种方法正确，而是因为人的大脑是从因果律的角度解释世界的。人如果不将原因

---

① 铃木光太郎，《狼女并不存在——围绕心理学神话的冒险》（新曜社）。

与结果联系起来，就不会认为“我明白了！”（不理解）。这不仅是人类的基本原理，也是生物本身的基本原理。

不过，这里要讲明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预装进大脑里的基本程序（OS）即便可以用因果律加以说明，但世界并非由因果律构成的。

概率的世界与复杂系统的世界

所谓因果论是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非常通俗易懂，然而，现实中认真生活的人却招来不幸，极恶之人却过着酒池肉林的生活，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

于是，佛教就提出这样一个奇崛的道理：通过轮回，“因果报应”可以得到彻底执行。现世的恶人在来世会变成虫兽，在现世生活清贫之人到来世可以进入极乐净土*。

* 有学说认为，轮回本是印度教思想，释迦牟尼（乔达摩·悉达多）虽然否定前世、来世，但只是在他死后，轮回思想再一次掺入佛典之中。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在这里我不作更深入的探究。

因果论式的世界观的特点是：由原因（恶行）导致恶果（来世的虫兽）是唯一的。物理学上，这是一种经典力学的世界观，某个物体的条件如果确定了话，那么后来的变化是完全可以预测的。

然而，此后，在电子、基本粒子等微观现象中，人们无法同时测定位置与运动量（不确定性原理）；或者人们了解到光、电磁波既是一种波，又是一种粒子（物质波），经典力学的因果律变得

破绽百出。由此便产生了量子力学。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所有的物理现象都是概率性的，适用因果律的经典力学只是其中的特殊情况。

不过，话题没有就此结束。概率论后来被移植到市场的分析当中，人们了解到，通过调查股价、商品价格就会发现，无法纳入正态分布（标准偏差）范围的情况频繁地出现。

后来，数学家本华·曼德博发现这种不确定性的真面目其实是相同因素紧密结合的小世界（small world）的相互自动调节（feedback），即复杂系统。[1]

在正态分布一统天下的概率世界里，拿男性来说的话，以身高170厘米为中心，身高160厘米、180厘米或者150厘米、190厘米的人按一定的比率分布。与此相反，在复杂系统的世界里，身高10米或100米的巨人昂首走在身高1米的小人国中。

互联网就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的小世界，在无数的几乎无人点击的网站中存在着极少数的巨大集线器（hub），如雅虎网（Yahoo）、脸谱网（Facebook）等。地球的内部也是复杂系统，在不同板块相互碰撞的活断层带，当无数体感不到的地震持续发生后，就会出现带来巨大灾害的强烈地震。我们的社会（人际关系）、地球的生态系统、人的身体和大脑的构造［突触（synapse）的结合体］等也是复杂系统的小世界。

曼德博认为，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是一个复杂系统，能够用概率论加以说明的只是由各因素间的自动调节限定的特殊领域而已。

---

① 本华·B·曼德博、理查德·L·哈德逊，《禁绝的市场——通过分形看风险和盈利》（东洋经济新报社）。

因此，因果世界、概率世界、复杂系统世界的关系结构如图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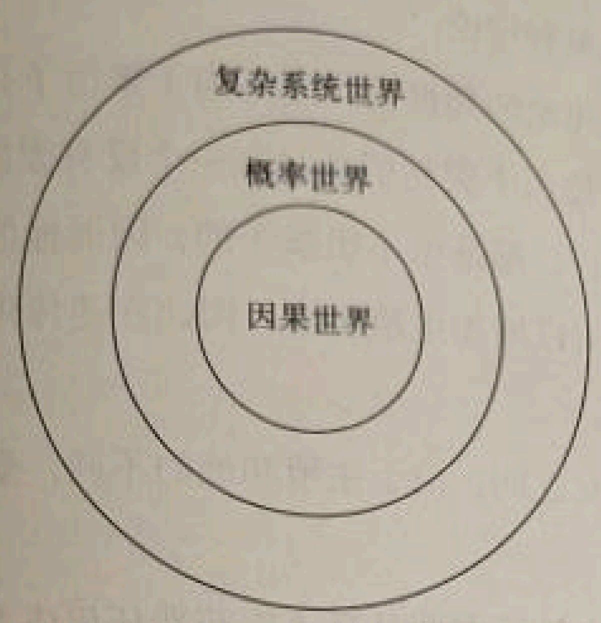


图6　因果世界·概率世界·复杂系统世界

用因果律无法理解概率世界和复杂系统世界，用概率论也无法把握复杂系统世界。而复杂系统世界从原理上讲，是无法预测未来的。（用数学的形式逻辑是不能够记述各因素间复杂的自动调节的联系的。）

然而，由于我们的遗传因子中预装的程序并不能应付概率世界或复杂系统世界，因此，我们就会无意识地将概率事件（如彩票）或复杂系统的疾病（如肿瘤）用因果论加以解释。这样一来，“拜庙100次就会中彩票”、“吃蘑菇可以治癌症”等“通俗易懂”的说法就会广为流传。

从进化论的角度说，鲍嘉先生出现在京滨列车的广告上是必然的。

乱交与纯爱

进化心理学认为，与身体的特征一样，人的心理（心灵）也是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形成的。这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同时又遭到

人们强烈的抨击。这是因为我们将具有宝贵价值的所有的东西都赤裸裸地还原成某种理论。

比如，从进化论的角度看，爱是为了繁衍子孙而与异性性交形成的感情。即使由于突然的变异，一个没有爱的人诞生，如果他不能够获得异性，那是生不出孩子的，因而他的遗传因子也不会有接班人。爱可以增加生殖机会，因此在遗传因子的生存竞争中能够占得上风。

此外，在男女之间，由于生殖功能的不同，爱情的形式也呈现出差异。

男人在释放出精子方面几乎不需花费任何成本，因此，倘若他想多繁衍子孙的话，只要与尽可能多的女性性交即可。也就是说，乱交是进化最合适的策略。

与此相反，女人从受精到生产需花费10个月左右的时间，即便顺产，也还需要一年左右的哺乳时间。这是极大的成本，因而，她们非常慎重地选择性交对象，建立长期的关系——包括抚育婴儿的时间——是她们进化最合适的策略（如果她们性交后即被抛弃，就会与孩子一道死于非命）。

男人性交的次数越多，繁衍子孙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从欲望的角度说，这是无限的。相反，女人在一生中只能生产出数量有限的孩子，所以，她们将性交当作“宝贵的事情”，尽量有效地进行性交。所谓“罗曼蒂克的爱”（纯爱）就是女性的这种“长期愿望”对男性乱交欲望的抑制。①

---

① 斯蒂芬·平克，《心灵的构造——如何与人际关系相关？（上中下）》（NHK丛书）。

至今人类在文学、音乐、电影等领域反复地描述着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的荒芜"。但进化心理学只用一句话——你与恋人是无法相互理解的——就阐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具有不同生殖策略的男女双方在'利害关系'上无法取得一致"。

或许你对这种理由嗤之以鼻，但男女之间"爱"的差异经过无数次的社会实验反复得以证明。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存在同性恋者的缘故。

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在爱情（欲望）的对象上截然不同，男性与男性之间或女性与女性之间组成一对伙伴关系，在这种伙伴关系之间不存在生殖策略的差异，因而双方之间就有可能产生利益一致的"纯爱"。

众所周知，男性同性恋者（gay）与女性同性恋者（lesbian）的爱情或性交方式有着巨大的差异。

男性同性恋者在酒吧等仅男性聚集的场所寻找伙伴，喜欢在洗桑拿的地方乱交。在艾滋病流行之前，有调查显示，在旧金山，与百人以上的性交伙伴发生关系的男性同性恋者占 75%，其中有近四成的男性同性恋者与千人以上的伙伴发生过关系。他们与特定的伙伴没有保持长期的关系，对抚育孩子一事几乎毫不关心。

与此相反，女性同性恋者重视伙伴关系，她们中间的许多人通过收养、人工授精的方法获得孩子，以经营家庭。除了双亲都是女性外，女性同性恋者的家庭与普通的（异性恋者的）家庭并无二致，孩子们也正常地抚育长大（他们的社会性成长比单亲家庭的成功率要高）。

男性同性恋者与女性同性恋者之间为什么会在生活方式方面

产生如此大的差异呢？只有进化心理学才能够给出明晰的答案。

男性同性恋者的乱交与女性同性恋者的一妇一妇制是男性与女性的进化论策略的差异单纯化的结果。**

** 说一个私人话题，年轻时，一个男同性恋设计师曾整晚对我述说他恋爱的烦恼。他有一个打心底里喜欢的恋人，却按捺不住追求新欢的欲望，于是在情感方面，他不断地背叛着对方。

那时，如果我了解进化心理学的话，也许我就会告诉他，这并不是他的错，而是人的本性所致，这或许会极大地安慰他的心灵。

疾病为什么会存在？

进化心理学认为，喜悦、悲伤、愤怒等感情都是在进化过程中作为生存策略而形成的。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只能于群体（共同体）中生存下来。这时，对对方的热情感到不高兴，对对方的无理不愤愤不已，对朋友的不幸不感悲伤的个体将被排除在外。（这样的情感在类人猿的黑猩猩、倭黑猩猩身上也有。）

这样的话题如果一直延续下去，只会刺激人的神经，因此，在这里我将尝试通俗易懂地解释进化心理学以及进化生物学乃是科学、思想的悖论转换。

现代进化论可以向至今无人虑及的问题提出质疑。例如，“疾病为什么会存在”的问题。

所谓进化并非指低等生物向高等生物历史地发展，这一点常常被人们误解。无论是否低等，将自己的遗传因子留给后世就是生存，不能遗留就会消失。这就是自然淘汰。

细菌是没有细胞核的单纯性生物。至于病毒，只不过是可复制的数据（DNA/RNA），它连细胞都没有。即便如此，病毒之所以没有被淘汰，是因为它具有非常有效的结构，即寄生于动物以扩散其遗传因子。这就是疾病（感染症），患了流感的人打一个喷嚏，病毒就会扩散到周围，扩大感染。

病菌能够让其寄生的主人患病，是为了启动其防御机关，如咳嗽、打喷嚏、拉肚子等。被病菌寄生的主人通过排除体内的病菌，没有手脚的病菌就将其遗传因子移植到其他人的身上。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病菌、病原体等“寄生”的目的不在于杀死其寄生的主人。对病菌来说，在进化论方面最正确的做法就是尽量延长病状，并将大量的遗传因子排出体外，至于后来病人是死是活都与它无关。

像这样，生物采用了各不相同的生存策略。人类祖先的进化策略是，从树上来到热带稀树草原，开始直立行走，让大脑极度地发达起来。与此相反，细菌、病毒尽量缩小自己的身体，通过寄生来延续生命，通过引发疾病，将自己转移到新的寄生主人身上。

当然，自然界也存在着选择与寄生主人共生之路的细菌，如乳酸菌、大肠杆菌等。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寄生主人与寄生者的利害关系不相一致，这就是疑难杂病的成因。此时，我们会通过自身的免疫功能或打疫苗、服用抗生素来抑制病菌和病原体的繁殖。

但是，在这场与感染症进行搏斗的过程中，人类绝非最后的胜者。这是因为寄生者的生存策略更加巧妙，更强有力。

寄生者的武器是数量的庞大及寿命的短暂。它们通过频繁地更新换代以提高进化速度，针对新型的抗生素，细菌或病毒很快就会繁衍出与之抗衡的生命力。所谓感染症是围绕进化，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军备竞赛”，寄生者通过突然的变异，轻而易举地就攻破了医学上的防御网。①

作为年轻根源的老化现象

我们的身体中具有疾病痊愈、恢复健康的自然治愈能力。比如，发烧时，通过体温上升，驱除对高温敏感的病原体。有时，使用解热剂反而阻碍了这种防御反应能力，使得病情进一步加重。（当然，这并非说一定不要使用解热剂。）

与此相反，从进化论的角度说，最佳化的身体结构有时会引起疾病。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肥胖症、糖尿病等由生活习惯引发的疾病。②

人类在历史上基本上都是以狩猎和采集生存下来的。20万年前，人类最直接的祖先智人（Homo sapiens）出现于非洲，大约1万年前，在中东一带开始农耕生活，因此，我们的遗传因子被设计成最适应于旧石器时代的形式。

人从非洲进入亚欧大陆之后，数量急剧增长，以至后来漂洋过海来到美洲、大洋洲。这也是寻找食物之旅，我们的祖先对饥饿常常恐怖不安。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我们的身体内部构

---

① 长谷川真理子，《人为什么会得病?》（WEDGE社）。

② 下面的记述出自兰多夫·M·奈斯、乔治·C·威廉姆斯，《疾病为何存在：进化医学的新解释》（新曜社）。

筑了各式各样的功能，以作好食物匮乏及储集营养的准备（例如代谢的基本情况首先是消费碳水化合物，然后是保存体内的脂肪）。

在狩猎采集生活下，我们从谷类、果实、动物等那里获得碳水化合物、维生素以及蛋白质，但脂肪、糖分等极为稀少。于是，当我们遇到极其难得的机会时（下一次机会何时出现还是未知数），我们的大脑就发出指令，尽可能多地进食。“吃甜的食品，人们会有一种幸福感”其实就是催促人们大量进食的程序。

然而，进入食物充足时代后，曾经匮乏的东西反而有了剩余，在这种情况下，遗传因子不能够应对环境的突变，因此，当人们看到蛋糕、薯条、冰淇淋时，就会为“多吃点，体会幸福吧”所催促。于是，在美国，以贫困阶层为中心，肥胖症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人的身体并非按照健康地生存下去的模式所设计，这一点我们心里十分清楚，因为人会衰老并走向死亡。如果仅仅是以长寿为目的，人的进化肯定会像涡虫那样不断分裂、再生。

作为生物进化的一种策略，从采取两性繁殖的时候起，人类衰老与死亡的命运就是不可避免的。

两性繁殖的生物在进化的过程中不是追求健康与长寿，而是尽可能多地繁衍子孙。因而，人类选择了这样一个策略，即在人类成长的某个时期最大限度地提高生殖能力。

血色病（hemochromatosis）可以引起人过分吸收铁质，人到中年时会因此被夺去性命。不过年轻女性可以在来月经时通过加速铁质流失而加以预防。

拥有胃蛋白酶原I（pepsinogen I）遗传因子的人会过多地产生胃液分泌，因此会患上消化性胃溃疡，很多人因此而死去。不过，这些人由于胃酸浓度高，年轻时，他们或许对传染病的抵抗力较强。

此外，免疫系统会释放出各式各样的化学物质，以保护我们避免患上传染病。但是，最近，有人认为，这种化学物质可能会伤害我们自己，引发癌症。

总之，老化现象是年轻的根源，青春期为了更多地繁衍子孙，人们就要为后来的时期做出牺牲，这就是人进化而来的结构。

进化论应用于医学的观点还刚刚起步，前面我所说的事例并非是定论。然而，仅仅通过这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就会明白这种新科学潜藏着某种可能性，即从根本上改变对人的理解。

进化塑造了我们的心灵，也培养了我们的感情，不仅如此，进化还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4 “人的本性”是从进化中产生的

从进化论的角度说，我们的行为准则达到了最佳化的地步，这就是尽可能多地繁衍子孙。如果以男性中心主义的观点对此加以说明的话，那么，对旧石器时代的男人们来说，最为重要的事情（除了为了生存获取必要的食物）就是获得女人。

*社会学上的“ethics”是指某种文化中特定的生活态度和道德、伦理态度，由于没有恰切的日语说法，我权且译为“行为准则”①，下文在强调其伦理方面的内容时，则使用原来的用法“ethics”。

一般认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组成30～50人规模的亲属团体（家庭集体），不断迁徙。果真如此的话，这个时代的男人们肯定受到“决不能以集体中的女子为妻”的制约。当然，这是因为有“近亲相奸禁忌”的缘故。

---

① “行为准则”的日语原文是“行動文法”。——译者注

互酬与交换

旧石器时代的人们之所以避免“近亲相奸”，并非出于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即所有的男性都希望与母亲性交，但这个欲望受到文化上的抑制）。

根据动物行为学已经证明了的情况来看，黑猩猩、倭黑猩猩以及红毛猩猩等类人猿中也没有“近亲相奸”的习性，而且几乎所有的两性繁殖的生物都具有避免“近亲相奸”的结构。这是因为“近亲相奸”与遗传性疾病相关，所以在人类很早阶段就成为自然淘汰的对象。**

** 在这里，对此我不作详细的说明，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约翰·H·卡特怀特的《进化心理学入门》（新曜社）一书。

那么，人类究竟是怎样规避“近亲相奸”的呢？

解开这个谜的是与弗洛伊德同时代的人类学家爱德华·韦斯特马克。他认为，幼时一道生活过的男女，无论是否有血缘关系，进入青春期后，仍然感觉不到异性的魅力。

韦斯特马克的这个假说，后来为在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utz）举行的“社会实验”所证明。在基布兹，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女，与他们的父母亲分开，进入托儿所一道生活。当人们追踪其后来的人生经历时发现，幼时十分亲密的男女步入结婚殿堂的情况极其罕见。

人类拥有一种机制，即无论双亲、兄弟姐妹（或者堂兄妹、表兄妹），他们从生理上厌恶与幼时亲密接触的异性性交。所谓“近亲相奸”的禁忌就是将这种生理上的厌恶规范化了。

当人们被禁止"近亲相奸"后，男人们为了繁衍子孙，就不得不从其他部落获得女人。从原理上讲，这种获取方法只有两种，一是运用武力强行夺取，一是以自己部落的女人（姐妹、女儿）进行交换。

这两种方法中，最直接的方法是前者，但强夺的方法也有缺陷。这种方法使得自己部落的女人无法获得配偶。因此，人们认为，几乎与人类诞生的同时，女人的"交换"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即便站在女性的立场，从进化论的角度说，女性自己成为"交换品"前往其他部落也是非常合理的。）

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对以美洲原住民为首的世界各地的亲属结构进行了调查，发现不存在不具有"近亲相奸禁忌"和"女性交换"规则的社会。[①] 这之所以成为普遍的亲属结构，是因为从人类的本性来说，人是无法建立除此之外的其他社会的。

赠予的军备竞赛

旧石器时代由于不存在货币，因而与其他部落的交易是通过物物交换的互酬方式进行的。在这种方式的"交换品"中，最贵重的就是女人，当然，除此之外，他们还互相赠予食物、贵金属等各式各样的东西。

所谓互酬是指"从对方那里获得某种赠予，再赠还给他们相同价值的东西"这样一种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在黑猩猩、倭黑猩猩等社会性较高的类人猿那里也能够观察得到。（吸血蝙蝠也通过

---

①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亲属的基本结构》（青弓社）。

互酬相互分享血液。）

黑猩猩互相清理体毛是一种确认相互关系的行为，当其他黑猩猩与之分享食物的时候，作为还礼，这是必需的行为。人们都知道，倭黑猩猩频繁地性交，却不以繁殖为目的。在这种“性自由”的社会里，只要雄性稍微表现出好意（比如赠予一只苹果），作为交换，雌性轻而易举地就会与之性交。对他们来说，清理体毛也好，性交也好，都是一种“清算借贷”的社会性行为。

同样，在没有货币经济的旧石器时代，交换并非为了追求实利。如果交换发生在个人与个人之间，这是结为盟友、把兄弟的仪式；如果发生在部落之间的话，这就是为对付共同的敌人而结为同盟的一种仪式。

互酬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当赠予对方之多，使得对方无法还礼时，就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习惯：夸耀权力。在北美以及南太平洋的原住民那里广泛观察到的“波多拉支”（potlatch）[①] 就是由更多的赠予决定部落间的力量关系的。

在“波多拉支”中，接受赠予的一方为了从服从的境地中摆脱出来，就必须返还给对方更多的礼物。从赠予的一方来看，由于人们意识到“赠予得越多，返还回来的就越多”，因此，“赠予的军备竞赛”往往超乎常规。（在北美，通过与白人交易，原住民们可以获得砂糖、贵金属、现金等，其规模之盛，使得原住民的“波多拉支”在法律上不得不遭到禁止。）

以家庭为单位营狩猎采集生活的旧石器时代的人们，与现代

① 也有人译为“夸富宴”或“冬节”。——译者注

的"传统型社会"一样，当与其他部落相遇时，就互相赠予女人、贵重品。果真如此的话，他们的社会是不是比现在更加和平稳定呢？

人与人相互残杀，只是受到文明污染的人才具有的行为，原始人类和平相处，这就是卢梭所说的"高贵的野蛮人"。不过，现如今，这种说法被认为只不过是一个臆想。

考古学家对能够收集到数据的社会进行调查后了解到，南部非洲、新几内亚的男性原住民有40%死于战争。（以"猎头"著称的厄瓜多尔的黑瓦洛人的男性实际上有60%于战争中死亡。）与此相反，在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的美国和欧洲，因战争而死亡的男性不到全部男性的1%。

人类学家曾经计算出这样一个结果，即狩猎采集社会90%的人经历过战争，64%的人至少每两年就参加过一次战争。还有的人类学家对37个国家的99个狩猎采集集体作调查时发现，调查当时就处于战争状态的集体有68个，此前5至25年前经历过战争的集体有20个，剩下的集体都于更早之前进行过战争。①

为什么人类的雄性集体要互相残杀呢？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以下这个单纯的事实加以说明，即当在集体内部缺乏可以交换的女性时，他们就不得不从其他的集体中强行夺取。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们的血统就会中断，因此，狡猾的进化程序是决不错过这个绝佳的时机的。

---

① 斯蒂芬·平克，《思考人的本性——心灵是一块"空白的石板"吗？（上中下）》（NHK丛书）。

吃人是人的本性

英国的动物行为学家珍·古道尔非常迷恋动物的世界，20岁时，她前往非洲，在坦桑尼亚开始观察、研究野生黑猩猩。她发现黑猩猩也具有使用工具的能力（如使用草茎从蚁穴中捕获它们喜爱的蚂蚁）等，成果非凡。不过，她最震撼世界的发现是，黑猩猩是相互残食的动物。①

黑猩猩的群体袭击其他群体时，它们会把年轻的雌性留下来，而其余的雄性、甚至是小黑猩猩都杀了吃掉。对它们来说，猿类的肉是最美佳肴，雌性以及小黑猩猩都围拢过来，贪婪地撕食"战利品"，这个情景让人们颇感震撼。

黑猩猩之所以要从雌性那里夺过刚刚出生不久的小黑猩猩吃掉，是因为哺乳期的雌性没有生育能力。黑猩猩通过杀掉小黑猩猩，强制性地让雌性停止哺乳，雌性就有可能再次怀孕。如果说，进化使得繁衍子孙成为最佳的行为准则的话，那么，互相残食就非常合理。

于人类这种生理状况也一样，在哺乳期间，母亲的生育功能是停止的，当给婴儿断奶后，这个功能会重新启动。这样看来，智人中的雄性也与黑猩猩一样具有"进化论的合理性"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事实上，人们经常能够观察到传统型社会中的吃人习惯。例如，在斐济保存着大量的传教士、贸易船只的船长、英美海军的士兵们等撰写的关于吃人的报告。考古学方面的资料——如用吃

---

① 珍·古道尔，《野生黑猩猩的世界》（密涅瓦书房）。

剩下来的骨头做成的针、碗以及搭在树杈上的许多人骨等——证实这些报告的真实性。

在斐济的文化中，年轻人用棍棒打杀敌人就成为“战士”，此后，他们就会相互竞争，看谁打杀敌人并吃得多。作为牺牲品，敌人的肉可以镇住神威，因此，他们相信：“如果不烧掉打杀的敌人并将它献给神灵，自己就会被神灵杀掉。”但是，欧美的自由主义研究者认为，吃人（不得不这样做）并非宗教性的仪式，对斐济人来说，它是令人心悸的节日和饕宴的机会。

1836年前往斐济的卫理公会教派的传教士曾这样写道：

> 我很确信本周的观察结果。这里的人们的确喜欢吃人肉，并乐此不疲。在斐济人的一部分地区流传着神官是不能接触人肉的说法，但这里（索摩索摩地区）却不同。他们会吃掉最好的部分，是名副其实的吃人族。我问图伊伊拉伊拉（索摩索摩的第二首领）的11岁的儿子：“你吃了吗？”他回答道：“吃了，很好吃。”“比乌龟肉、猪肉好吃吗？”我问道。他若无其事地说：“嗯，都一样好吃。”人们让他吃，他也不觉得那有什么不好。①

斐济人的吃人行为与黑猩猩相互残食极为一致。这时的人们并没有规避与生俱来的吃人习惯。如果我们追溯到一万年前的时代的话，其实我们都是吃人的人种。

这种耸人听闻的假说，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菲律宾、新几内

---

① 转引自春日直树，《吃人去毒》［《“落后”的思考——后现代的生存》（东京大学出版社）收录］。

亚等战火惨烈的地方成为现实。当人们被逼入绝地时，就开始吃人，这就是“人的本性”。

“咱们”与“那伙人”的实验

1954年，在俄克拉何马州东南部的罗伯茨·凯布州立公园童子军训练营，俄克拉何马大学的研究小组对孩子们的集体关系进行了实验调查。在这里，我为什么要举出半个多世纪前的调查呢？这是因为此后再也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调查了。其理由是，这种做法过于危险，而且结果也很显然，没有必要进行第二次实验。

共有22人参加了这个实验，他们都是11岁的白人少年，这些少年是按照尽可能均等选拔的意图被挑选出来的。他们均成长于新教徒的家庭，智商以及学校成绩都在平均值或平均值以上；他们既不戴眼镜，身体也不肥胖，而且还从来没有闹过事。所有的少年都是当地人，有俄克拉何马州的口音。在参加实验之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是从不同的学校选拔出来的。

实验时，这些少年被分成两组，让他们参加了为期3周的棒球夏令营。夏令营里的“辅导员”们其实就是研究人员，除了暗中观察、调查少年们的言行之外，他们与其他夏令营的辅导员没有任何不一样。

这两个组分别叫作“响尾蛇”（Rattlers）和“老鹰”（Eagles）（这是少年自己起的名字），他们乘坐不同的巴士抵达夏令营，分别住在不同的营地，因此，一开始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最初的计划是，第一周调查集体内部的行为，第二周将调查重心转移到不同集体间的竞争方面。

这些少年十分在意集体内部的人际关系的情况只出现在调查刚开始的几天内，当他们偶然间听到与自己同龄的集体玩耍的声音时，不断表现出与他们直接对抗的欲望，非常热衷于“要打败那伙人”。

当棒球比赛拉开战幕，两队的成员第一次会面时，“响尾蛇队”就已经于比赛开始前在场地上竖起自己球队的旗帜，这似乎在向人们宣告，今天整个棒球场是“我们队的”。比赛最终以“老鹰队”的败北而结束，但他们扯下“响尾蛇队”的旗帜，一把火烧了，辅导员们费了很大劲儿才阻止了一场混战的发生。

相反，在拔河比赛中，“老鹰队”获胜。就在那天晚上，“响尾蛇队”的成员偷袭了对方的营地，掀翻“老鹰队”成员的床铺，撕破他们的蚊帐，用从“老鹰队”成员那里抢来的牛仔服做了他们的新旗帜。针对这种情况，“老鹰队”的反击更加升级，他们白天拿着棍棒、棒球棒等闯进“响尾蛇队”的营地。（这个时间，营地里应该没有人，“武器”只是预防万一用的。）他们回到自己的营地后，为了防备还击，他们将石头装进袜子，还收集了大量的小石子装在桶里。

这个实验令人趣味横生，这些少年于无意识间想将自己与其他集体区分开来。

第二次棒球比赛“老鹰队”获胜，他们在回营地的路上谈论着这一次为什么会赢的话题，其中有一个人说道：“这是因为我们在比赛前向神祈祷了的缘故。”（这是典型的20世纪50年代的俄克拉何马州风格。）接着，又有一个人高声说道：“‘响尾蛇队’之所以输了，是因为他们在比赛中不停地口吐脏话。”于是，在“老

鹰队”里禁止队员说脏话。

22个少年都是在同样保守的基督教徒家庭中长大的，他们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截然分成两个组：脏话组和祈祷组。

在夏令营训练期间，所有的人都严格遵守着他们集体的规定。当两个小组敌对时，集体内的团结十分牢固，从来没有发生过谁欺负谁的现象。①

对这个“罗伯茨·凯布实验”的结果不需要任何过多的解释。

人是社会性动物，当人失去集体时，就无法生存下去，因此，所谓身份就是对集体（共同体）的归属意识。所谓的“我”是与“那伙人”相对的“咱们”，“敌人”可以说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定义。

我们从远古的祖先那里继承了的程序将世界分为内（咱们）与外（那伙人），它是为同伴之间加强团结以及杀掉那伙人而夺取珍贵的资源（女人）而设定的。

神为何而存在？

由于“近亲相奸禁忌”的存在，部落之间除了交换女人以及争夺女人外——通过划分“咱们”与“那伙人”，以杀掉敌人来实现，整个人类社会还有一个共通的本性，即祭神（祖先）。

进化心理学用大脑导线来解释“神为何而存在”这样一个艰深的问题。从信仰神的人的角度来看，这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但这个理论十分有趣，概述如下：

---

① 朱迪丝·里奇·哈里斯，《抚育孩子的误区——决定孩子性格的是什么?》（早川书房）。

什么是“心”？进化心理学认为，心就是一种“模拟装置”。[①]

对社会性的动物来说，于生死存亡方面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在集体内确保自己的地位。为此，他们就必须正确把握集体内的权力结构（谁是老板？谁的地位比自己低下？）、对方的情绪（是愤怒？还是喜悦？）以及对行为的反应（如果从对方手里强行夺走食物会产生怎样的结果？）等。

预测对方行动的最有效的方法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如果我是他的话，食物被强行夺走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这是在集体内生存下去的最有利的能力，因此，拥有“心”这样一种模拟装置的个体就能够更多地繁衍子孙，随着一代代的发展，这个功能肯定会加速进化并更加细致化。

一旦这个模拟装置启动之后，“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的对象就不只限于人类了。人们之所以喜欢饲养家畜，是因为人很自然地将家畜（狗、马）拟人化，并感受到人与它们之间的“友情”和“爱”的情感。

从原理上讲，这种拟人化的对象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因而，太阳、月亮、大海、高山等也成为“心”的模拟装置。（如“山神发威了”等。）这种自然的拟人化现象就是神灵信仰（animism），任何社会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心的模拟装置假定对方拥有某种“本质”，通过模仿那种本质，可以驱使它。石器时代因为没有计算机，因而，他们并不认为心（大脑）是一种程序，从来没有想过运用分析其编码进行模拟。

① 尼古拉斯·汉弗利，《内向的眼睛——意识的进化论》（纪伊国屋书店）。

其结果就是，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人是可以以"身心二元论"的方法解释世界的。"我"的头盖骨里装着的不是灰色的稠乎乎的东西，而是与物理性的身体不同本质的东西，即灵魂。

我们很自然地认为，本质（灵魂）具有影响世界的物理性能力。当我们接触到国王、圣人的身体时，疾病就会痊愈，如果你穿上杀人鬼的羊毛衫就会遭到报应。吸血鬼吸食年轻美女的血（本质）就会永生不死，死于非命的女人的怨念（本质）能够被复制到录像带上。这种思维模式在整个人类社会里都是共通的，因而我们没有必要专门解释电影《午夜凶铃》为什么令人毛骨悚然了。①

人类的祖先（智人）哀悼死者，向神灵祈求自然的恩惠，害怕恶神而向它们奉献牺牲品，这些都是从大脑基本程序中产生的必然的行为。神灵信仰与祖先的灵魂相结合就产生了"祖（先）神"。然后，所有具有血缘关系的集体（部落）开始拥有他们部落独自的神与神话，作为"咱们"与"那伙人"相区别的象征。所谓战争，就是以"神的名义"互相厮杀的行为。

受到近代启蒙主义思想熏陶的我们，实际上是无法感受到古代或中世纪的"神灵世界"的。在进入近代之前，人们不是"相信"神、恶魔、魔法以及怨灵等，而是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与人类、动物等一道，原本就有超自然的存在。

所谓共同幻想，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即某个集体内的成员所相信存在的东西实体化了。在我们的社会里，这种现象的典型就是货币，它不过是一张纸而已（现在已成为计算机服务器里储

---

① 布鲁斯·M·福特，《超灵——人天生就具有超科学的大脑》（Intershift）。

存着的数据），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相信这张纸是有价值的，因而这种价值就被现实化了。与此同理，在古代或中世纪（当然旧石器时代也是如此），神与恶魔毫无疑问都存在于现实之中。

从进化论的角度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超自然现象的存在提高了人的生存或繁殖的可能性。如此看来，"神"无非是从大脑导线（心灵的程序）中偶然产生的"附带品"，而这个"附带品"成为人们的共同幻想，加强集体间的联系，并最终统治了人类。[①]

狩猎采集部落人的世界

倘若狩猎采集的原始社会是按照人与生俱来的程序而运行的话，那么，我们大致上可以认清他们的行为准则。

旧石器时代的家庭集体（氏族）以 30 ~ 50 人的规模生存着，这些氏族联合起来，组成 100 ~ 200 人规模的部落，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神。这个部落是他们的整个"世界"。

附带说一句，即使是在现在，这个 50 人或 200 人的规模也是构成一个集体的基本数量。学校一个班的人数、公司里的一个部门或一个科室以及流行音乐组合 AKB48 等，他们的上限之所以是 50 人，因为这是他们的长相与名字相一致（可以将他们作为"个人"加以识别）的界限。大型企业之所以采用 100 ~ 200 人规模的编制，这是"咱们"能够保持统一性（集体内可以识别）的人数的上限的缘故。

部落之外的世界是"敌人"的世界，在把"那伙人"杀掉并

① 帕斯卡尔·博伊尔，《神为何而存在?》（NTT 出版）。

夺取他们的女人的同时，也是与之交换女人并结为同盟的对象。抛开为了确保食物的问题，男人们所关心的就是集体内的争权夺利、集体外的战争和联盟的政治游戏。

狩猎采集社会中，男性的权力由狩猎能力（于共同体内进行分配的猎物的数量）以及战斗能力（杀死敌人的数量）决定的。这就是所谓的极端的能力主义，获取猎物最多、杀敌最多的人是"英雄"，他就成为共同体的首领。

然而，首领只不过是狩猎者中的一位，他并不拥有像王公贵族一样的特权。这不是因为狩猎采集的人"在文化上落后"，而是因为在他们的社会里没有抚养过剩人员的生产力。

家庭制度以一夫一妻为基础，但如果有足够的食物抚养更多的女子和小孩，一夫多妻的情况也是被认可的。正如我们在哈勒姆（Harlem）地区或大奥[1]中看到的那样，只要没有物理上的制约，人的家庭制度很容易走向一夫多妻制。我们之所以能够广泛地观察到一夫一妻制，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因为生产力低下，他们没有抚养人数众多家庭的能力。

男人们集体狩猎，女人们一边抚育孩童，一边从事着采集果实、谷物的工作，这样的生活使得男人们产生出见异思迁的欲望（一有机会就想掠夺其他男人的妻子），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对妻子的强烈的猜忌心（是不是与其他男人有染）。自己离开家的一段时间里，妻子与其他的男人性交，最终可能抚育的是那个男人的孩子，对"自私的基因"来说，没有比这个损失再大的了。

---

① 大奥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将军夫人、侧室、女佣等人于江户城中的住所，将军之外的男性是禁止入内的。——译者注

对女性来说，无论父亲是谁，从自己的肚子里生出来的都是自己的孩子，这是百分百正确的。但对男性来说，除非对方是处女，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孩子的父亲是自己。如今，世界各地还存在着处女崇拜以及对女性的文化约束（阿拉伯世界的头巾等），这些被认为就是从这种男女的非对称性中产生的。

顺便说一句，旧石器时代的人具有埋葬的习惯，向死者献花等，这与现代人的情感是一样的，但他们并不建墓立碑。仔细想想，这再正常不过了，因为所谓墓地是一种“领地的标识”——这块土地是祖先遗留下来的，进入农耕社会以后，这个习惯才应运而生。

小结（2）

- 大脑的 OS 由因果律（原因→结果）构成，它无法应付概率性的事件以及复杂系统的世界
- 进化论▶为繁衍更多的子孙生物不断进化（无法繁衍子孙的生物被淘汰）
- 进化心理学▶为繁衍更多的子孙（爱情等）人的心灵（感情）不断进化
- 男女生殖能力的不同催生出爱的方式的差异
- 近亲相奸的禁忌▶雄性为获得雌性，或与其他部落交换，或从其他部落夺取
- 交换女人▶赠予·互酬的文化
- 掠夺女人▶“咱们”与“那伙人”之间集体性互相残杀（吃人）
- “神”是从大脑的程序中偶然产生的

5 哥伦布的鸡蛋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当他被人们揶揄“任何人只要往西一直航行，都会遇到陆地”时，他慢悠悠地拿出一枚鸡蛋，说：“那么，你们把它立在桌子上试试。”哥伦布看到谁也没能够做到这一点后，轻轻敲破鸡蛋的一头，将它立在了桌子上。

这就是“哥伦布的鸡蛋”的故事。（这似乎并非史实，而是人们的虚构。）这个故事常常用来比喻“一旦点破它，人们就会相信，但没有点破时，谁也没有注意”。

对美国进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来说，“哥伦布的鸡蛋”是在他观看地球仪的时候出现的。

农耕革新

戴蒙德发现欧亚大陆呈横向（东西）延长的形状，而非洲大陆和美洲大陆则纵向（南北）延伸。当然，这个知识连小学生都知道。但是，戴蒙德由此却冒出以下的疑问。

“横向长的大陆与纵向长的大陆在文明发达程度上究竟有怎样的差异呢？”

在一本国际上畅销的曾获普利策奖的图书的开头，戴蒙德这样写道：争取独立的新几内亚原住民的政治家曾向作者打听：“白人拥有铁斧、火柴、药品、衣服、饮料、伞等许多东西，而新几内亚人却几乎没有一件东西称得上是自己的，这是为什么呢？”[①]

25年来，戴蒙德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终于，他得出了结论：“白人与新几内亚人之间并没有人种上的优劣之分，历史、文明是从最早的地理条件的差异中产生的。”

戴蒙德的假说具有极大的启发性，而且还十分通俗易懂，下面我略加说明，读者最好一边旋转地球仪一边阅读。

地球仪以赤道（纬度零度）为基准将地球划分为南北两个半球，极点（南极和北极）为纬度90，每15度画一条纬线。也就是说，具有南北半球的地球各划分为六等分，从赤道往两极分别称作热带、亚热带、温带、亚寒带、寒带和极地。（由于地球是一个球体，因此，热带面积最大，极地面积最小。）欧亚大陆几乎占据了北半球的一半，南半球虽然有非洲、南美洲和大洋洲，但其大部分是海洋。

一般认为，人类最直接的祖先——智人——从5至7万年前离开非洲的稀树草原，移居到欧亚大陆各地。在大约1万年前，在埃及北部的尼罗河流域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开始了农耕生活。这是人类第一次到达温

---

①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13 000 年间人类的历史之谜（上下卷）》（草思社）。

带地区。(北非、中东地区现在已经沙漠化，当时却是世界第一大粮仓地带。)

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在中国的黄河流域也出现了农耕社会。(可能与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不相关联。)从温带区域来说，这个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最东端。

农耕是人类发明的最大的革新，它主要是指栽培小麦、水稻等温带植物的技术。这种技术革新不约而同地在温带欧亚大陆的东西两个地区几乎同时出现，并迅速传播到各地。

然而，由于技术方面的制约，这种农耕革新并非均衡地传播到整个地球。

温带地带与文明的发祥

技术上农耕革新的最大制约是指植物的栽培受到气候的影响。我们把温带植物带到其他地方，如果环境不一样的话，很难培育。

从美索不达米亚开始，沿着温带向西旋转地球仪，我们发现地中海沿岸（北部非洲和欧洲南部）完全包含在其中。在这个区域，人们完全有可能原封不动地移植农耕技术，这就是地中海文明诞生的理由。此外，与西伯利亚一样，欧洲北部位于亚寒带，由于受到墨西哥湾暖流的影响，相对比较温暖，这使农耕成为可能。

从美索不达米亚往东旋转地球仪，经伊朗（波斯）来到印度北部（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这里是波斯文明和印度河文明的发源地。

从印度越过中亚草原地区再往东，长江、黄河流域的广大平

原地带就出现在我们眼前。这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其东面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图7）。



图7　人类的迁徙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上主要的文明都诞生在北纬30～45度之间的“温带区域”。与此相反，同样是欧亚大陆，热带、亚热带、亚寒带地区或被文明遗忘，或文明姗姗来迟。

任何人都知道文明的发达程度有差异，但至今没人能告诉我们这个差异产生的理由。最具说服力的理由是，这由人种（遗传）上的优劣造成的，但在现代社会，这种说法是一个禁忌。就在这种情况下，戴蒙德简洁明快地告诉我们一个“哥伦布的鸡蛋”的道理：“农耕文明无法超越气候的差异。”

这个道理还可以说明纵向（南北）长的非洲和美洲大陆为什么文明未能充分发达的原因。在农耕文明中，所有的技术都是从农作物的栽培或家畜的饲养中派生出来的。例如，会计是为了记录收藏农作物时各自所拥有的份额而产生的一种技术，因而，与

农耕无关的会计技术流传开来是不可能的。

在非洲大陆，虽然南部非洲属于南半球的温带区域，但在近代以前，北部非洲的农耕文明受到撒哈拉沙漠和热带雨林的阻碍未能到达非洲大陆的南端。

在南北狭长的美洲大陆，技术传播的速度也极其缓慢。南美安第斯地区（厄瓜多尔高原）与墨西哥高原虽然环境极为相似，但由于中间夹杂着中美洲洼地的热带地区，它们之间几乎没有农耕技术方面的交流。从距离上讲，尽管只相隔着2000公里，但5000年过去了，安第斯地区的家畜（美洲驼）或农作物（马铃薯）也没有传播到墨西哥去。如果我们了解到，日本奈良时代或平安时代的文物中都可以看到地中海文明的影响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清楚地知道“纵”与“横”在传播速度上的差异。

戴蒙德的“温带地带”的假说也适用于进入近代以后的世界史的发展。

我们看一下北美大陆，属于温带地带的国家只有美国。按照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说法，美国与拉美经济发展的差异是根据殖民者属于新教（美国）抑或属于天主教（拉美）决定的，但迁徙到同为温带（地中海）地带与迁徙到生活环境截然不同的亚热带或热带地区之间的艰苦性方面的差异或许更大。

南半球位于温带地区（南纬30~45度）的只有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部非洲和智利、阿根廷（一部分地区）。

由此，为什么欧洲人对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殖民获得成功，或者为什么在南部非洲种族隔离政策（欧洲人统治下的）一直延

续到晚近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释。

在这些地区（包括智利、阿根廷）都是世界红酒的最大产地。在南半球，只有地中海性气候的地区得到发展。

妥协与全体一致

从根本上讲，农耕社会的行为原理与狩猎采集社会并无二致。无论在哪个社会，我们都只能按照由“人的本性”所制约的文化、规则行事。

不过，这两个社会还是有一些显著的差异的。

最清楚不过的就是，在农耕社会里，“对土地的执着”是随着农耕一道诞生的。

为获得食物，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人不断迁徙，他们对土地没有牵挂。相反，以农耕为生活的人无法从土地之外获得食物，如果他们失去土地，只有死路一条。

这时，人们开始意识到土地就是“领地”。对生物来说，保护领地是最原始的生存策略，因而，这种感情强烈无比。在日本，经济泡沫时期，人们常常使用“土地神话”的说法，这并非日本独特的现象，自一万年前起所有的农耕社会就被土地神话束缚住了。

同样，人们以批判的眼光指出日本人的特性是“岛国根性”，但划分势力范围，保护土地，防止敌人侵占，这是农耕社会的基本法则，从原理上讲，“开放性的农村”是根本不存在的。

中国的客家族用城墙围筑起一种叫作土楼的集体住宅，在这个住宅里，有50至100个家庭过着集体生活。他们使用着只有他

们自己明白的特殊方言，将土楼以外的人都看作敌人。①

中国历代王朝花费巨大的财力修筑的万里长城也是一种宏伟的锁国的尝试，以保护土地不被北方的游牧民族侵占。与之相比，如果说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游牧民族曾无数次侵略了中国的农村地带，而日本由于受到大海这个天然城墙的保护，（至少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从来没有受到外敌的侵略。

农耕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无法退出"。

你一出生就是我的邻居，直至我死，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变化，我的子孙与你的子孙永永远远都是邻居关系，所谓农村就是这样一种社会。

与此相反，在狩猎采集社会或游牧社会中还有这样一种选择，即只要你对这个共同体的规则感到不满，就可以举家（以及家畜）迁出。是否具有这种退出的可能性影响并决定着人们的行为。

所谓政治上的决断就是指，在共同体中发生利害冲突时，承认一方的要求，而拒绝另一方的要求。但在成员没有退出可能性的农耕社会里，从原理上讲，这种政治上的决断也是不可能下的。因为，被拒绝了要求的一方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一部分还要在这块土地上继续生活下去。

遭受到不利于自己评判的一方，对对方受到优待感到忿忿不平，将来一定要报复，他们具有这种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当这样的"不满分子"大量出现时，这个共同体就会走向崩溃，因此，要想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所有政治上的判断必须不会伤及到任何人的利益，或者这一次这一方受到了利益的损害，下一次一定

① 冈田英弘，《这是个复杂的国度——中国》（WAC 文库）。

要补偿给他。如此，农耕社会的政治上的决断只能是基于妥协的全体一致。

圣德太子[①]所说的“和为贵”是日本人精神上的象征。这当然没有错，但这并非日本人的特性，所有的农耕社会都是按照“和”与“妥协”的方法运转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游牧社会就有可能迅速地进行政治上的决断。蒙古民族最高指示决定机构忽里台（quriltai，大朝会）将全体一致作为绝对的原则，因此，当继承成吉思汗事业的窝阔台汗于1241年突然死去，围绕继承人发生争议时，一部分有势力的诸侯拒绝参加忽里台，第三代继承人贵由继位，花费了5年时间才得以实现。

没有历史的世界

农耕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文明，是由于随着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不直接从事获取食物工作的专门职业开始出现，分工形成的缘故。

在狩猎采集社会或游牧社会中，集体的首领与其他集体成员共同生活。而在农耕社会里，与神打交道的神官成为专门职业独立出来，紧接着开始出现以工商业为职业的人员。

随着生产的扩大，引起财富的集中，拥有广大土地并让奴隶耕作的有权力的人粉墨登场。这些有权力的人形成贵族阶层，他们中间最有权势的人成为大王，统治国家。由此，就诞生了阶层

① 圣德太子（574－622），日本古代著名政治家，以6世纪末、7世纪初实行的一系列改革而著称于世。——译者注

化的复杂社会，即农耕文明。

农耕文明是建立在农耕社会的行为准则之上的，它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其一是“身份”的固定。

在无法退出的封闭社会里，大多数人要想共同生活在一起，事先固定好各自在社会中的作用是最为合理的做法。于是，身份制得以产生，安“分”守己地生活的道德得以出现。这方面最极端例子是印度的种姓制度（caste），人一出生，其身份和职业就被决定了，亦即其人生被决定了。从近代的观点去看，这种带有极其浓厚歧视色彩的社会结构在印度之所以能够被广泛接受，与这个国家的人口众多、环境严峻不能说没有关系。

人的身份一旦被固定，个人的社会性地位（坐标）也就按照上下的“纵向关系”以及相同身份之间的“横向关系”决定了。日本的特征之一被认为是“纵向社会”，但在近代之前，人们从来没有考虑过“人”与“人”是平等的，因此，并非所有的集体都是按“纵向结构”构成的。

为维持制度的实施，身份制社会拥有各式各样的（农村式的）规则或禁忌。人们一旦打破这个禁忌，或从共同体中被驱逐，或受到全村的制裁，从社会关系中被分离（葬礼及失火时除外）。这种“农村式的社会性”作为日本前近代式的象征屡屡遭到批评，其实，不只是在日本，所有的农耕社会都是“农村式社会”。**

**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观看奥地利电影导演迈克尔·哈内克的《白丝带》就很清楚。这部电影非常出色地描绘了第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北部一所普通的小村庄是如何受到传统与习惯束缚的，这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其二是农耕社会里没有“进步”的概念。

所谓农耕，是指年复一年的春天播种，秋天收获的经营活动。无论饥馑还是丰收，这都是“天意”，今年发生的事情明年还会发生，后年、大后年以及世世代代都不停息，农耕社会就是以这种世界观为前提建立起来的。

中国和日本的纪年法中没有像西历或伊斯兰历那样的纪元（元年），每当皇帝或天皇发生变化的时候，年号就会改变。“历史”是由天命重组的，世界永远在循环。

在更加极端的印度，尽管它建构了程度极高的文明，但直至近代之前，这个国家是没有“历史书”的。对认为万物一直不断地轮回的印度人来说，记述过去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所谓“历史”只是印度诸神与人相互交流的神话。

与我们所认为的历史最为相近的或许是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在这部以描写希波战争而著称的著作中，不同的原理（欧洲与亚洲）相互对立，最终正义（希腊）获得胜利的主题是一种二元论，其中也没有历史是由过去到未来不断“进步”的认识。“进步”或“发展”是进入近代以后产生的特殊概念。[1]

一切人类社会都是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社会发展并基于“人的本性”（human universals）构筑起来的。农耕文明将“农耕

① 阿部谨也，《何谓历史》（文春新书）。

社会的本性”嫁接其中。于是，至今被认为是“日本人的特性”的东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用这两种“本性”（“人的本性”和“农耕社会的本性”）加以说明。

当然，泰国社会与日本社会的相似绝非偶然，无论东西南北，所有的农耕社会都是相似的。

6 东方人的头脑，西方人的头脑

社会心理学家山岸俊男[①]从“安心社会和信赖社会”的视角一直从事着独特的关于日本社会特质的研究，其最大的成就在于，并非按照个人的体验或印象式的批评，而是基于各种实验的客观数据，深入剖析“日本特性的东西”。

为探寻“日本人为什么要规避风险”的问题，山岸进行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②]

“独裁者游戏”的参加者分为两人一组，其中一人想分给对方多少钱就分多少，而另一人则从对方手中拿到所分配的钱。按规定，参加游戏的人是匿名的，即便有人不分而独占金钱，对方以及参加实验的人当然也是不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也会将手中的金钱分给对方一部分。（几乎没有人做出“合理的”选择，即

① 山岸俊男（1948－ ），日本社会心理学家。著有《信赖的结构：心与社会的进化游戏》《从安心社会到信赖社会：日本式体系的去向》等。——译者注

② 山岸俊男、玛丽·C·普林顿，《背向风险的日本人》（讲谈社现代新书）。

将所有的金钱据为己有。)

这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实验，它调查人是否具有非合理性的取向，以及调查不同国家、性别、年龄等的人具有何种差异。山岸在开始实验前，让他们做出选择：是参加分钱的一方，还是参加从对方手里分得金钱的一方。

一般来说，分金钱的一方肯定有利，但据调查，日本人有35%的人选择了“从对方手里分得钱的一方”。

山岸认为，这是因为“分钱就意味着责任”。规避风险取向越高的人，在任何场合下都尽量避免可能受到他人的责备。这也就是说，他们是“不愿意自己做决定”的人，即使利益受到损害，他们也认为从对方手里分得金钱是一件愉快的事。

山岸描述道：这些“背向风险”的人的特点是，自立精神低下，卑躬倾向严重，处世小心翼翼。针对这些人，山岸又采集了他们的唾液，分析其中的荷尔蒙，发现他们的应激激素的分泌很高。

带有责任心行事的人容易感到精神紧张，害怕受到他人的厌恶以及不愿意惹人眼目。畏缩不前似乎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日本人乃至日本社会所具有的本质性倾向。

日本人与美国人的默认策略

一般认为，美国人个性强，是利己主义者，而日本人则是集体主义者，很不擅长自我表现。谁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山岸决定做一次实验。

所有参加实验的人只要填写调查表，就可以获得一支圆珠笔

的礼物。圆珠笔共有5支，其中一支的颜色与其他4支不同，参与填写调查表的人被告知可以从中选择喜欢的一支。

这个实验分别在日本和美国进行，美国人大多数选择的是较少的、颜色不同的笔，而日本人则倾向于选择数量多的、颜色相同的笔。也就是说，日本人随大溜，美国人爱独特。这似乎证明了一直以来人们所拥有的"常识"。

但是，山岸对这个解释提出了疑问。在日本，从文具用品到家电产品，社会上充斥着追求"独特性"的各式各样的商品。如果认为日本的消费者从众意识很强的话，为什么那么多的各式各样的商品被开发了出来呢？

于是，他改变了实验的设置，让被实验者在所有参与实验的人的面前选择一支笔。这时，美国人也大都选择了数量多的、颜色相同的笔。美国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是有所顾虑的。

山岸还进一步做了以下的实验，等其他参与实验的人都选择完毕后，再作最后一次选择。这时，参加实验的日本人选择的则是只有一支的、颜色不同的笔，这样一来，日美之间的差异就完全不存在了。

由此，山岸认为，日本人与美国人之间，在个体方面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只不过各自的"默认"（default）策略不同。所谓的"默认"是指OS等的初始设定，对大多数不特定的用户来说，它是最佳的选择。

日本人当处于暧昧情况下时，就会无意识地选择规避风险。但如果情况很明确，（一旦明白怎么做都没关系时）就与美国人一样个性张扬。

相反，美国人在暧昧的情况下，张扬个性被认为是最有利的选择。但在过度张扬个性会遭到白眼的时候，他们会察言观色地加以抑制（顾虑）。

那么，为什么日本人与美国人之间的默认策略成鲜明的对比呢？那是因为人们所生活的社会，即环境不同的缘故。

这与一般人所认为的美国社会里是不存在个性不张扬的人的情况是一样的。在这样的环境里，当人们捉摸不定时就会张扬个性，这是为了生存而采取的最好的策略。相反，在日本，人们认为冒冒失失地惹人耳目会引起反感，因此，在这样的社会里，当人们捉摸不定时，会采取与他人相同的行为，而这才是最佳的策略。

学校这个封闭的社会就是这种日本社会的典型。

泡泡袜（loose socks）在日本流行的时候，所有的女学生都身着短裙，脚上套着这种奇异的袜子，这让大人们瞠目结舌，但这对她们来说并非时尚的问题。大家都穿泡泡袜的时候，只有一个人穿直筒袜是非常危险的。不管本人是否意识到，（无论合适与否）为了“生存”下去，她们剪着一样的发型，化着相同的妆，穿着一式的袜子。

你的话到此为止吧

上述“默认”策略的差异只是日本人所特有的吗？所幸的是，现在有人做过各式各样的实验，以对比东方人与西方人的行为准则。[1]

---

① 下面的例子均出自理查德·E·尼斯贝特，《看树木的西方人，看森林的东方人——思维的不同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宝石社）。

例如，让韩国人和美国人在几个排列好的图形中选择一个喜欢的图形，这时，美国人选择了最奇形怪状的图形，而韩国人则选择了最常见的图像。与山岸的实验一样，让他们选择一支喜欢的笔时，美国人选择了数量较少的、颜色不同的笔，而韩国人则选择数量多的、颜色相同的笔。

美国与中国心理学家进行了一项合作研究：当将单词与背景图像同时展示出来时，背景图像对单词的记忆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参加研究实验的是中美的大学生和成年人，他们在看了①与人的图像等“社会性”背景同时展示的单词，②与花的图像等“非社会性”的背景同时展示的单词以及③完全没有图像背景的单词后，要尽可能多地回忆起所看过的单词。

实验结果是，在②（与“非社会性”的背景同时展示的单词）与③（完全没有图像背景的单词）的情况下，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异，但在①（与“社会性”的背景同时展示的单词）的情况下中国人的成绩明显好于美国人。研究者们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于无意识间以社会性的联系为“检索手段”再现了记忆。

发展心理学家做了这样一个实验：让中美4岁与6岁的儿童汇报每天发生的事，比如像“昨天上床后都做了些什么呀”等问题。通过调查，研究者们发现了三个显著的差异。

第一，所有的孩子谈自己的事情要比谈别人的多，但谈自己的事情的比率，美国儿童要比中国儿童多3倍。

第二，中国的孩子能够很清楚地记住事情的细节，并以说明

的口吻加以叙述，但美国的孩子只对很少的自以为有趣的事情娓娓叙述。

第三，对好恶等感情问题，美国的孩子叙述得更多一些，是中国孩子的2倍。

综上所述，美国4岁和6岁的儿童显示了“你的话到此为止吧，说说我的事情吧”的态度。

还有一个这样的实验，即让北美的大学生（主要是加拿大的大学生）和亚洲的大学生（中国香港、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以及南亚、东南亚各国）回想一下自己受到瞩目的情况（如“令人难为情的事情”）。

当北美的大学生们回想那时的情景时，倾向于以自己的立场观点加以回忆。相反，亚洲的大学生们则想象着当时看到那个情景的其他人是如何感受的，很多人以第三者的眼光进行说明。

以上所说的各式各样的实验和调查告诉我们怎样的问题呢？

首先，美国人（加拿大人）与亚洲人在行为准则、记忆方式以及自我认识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

第二，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包括香港人、新加坡人等）基本上具有相同的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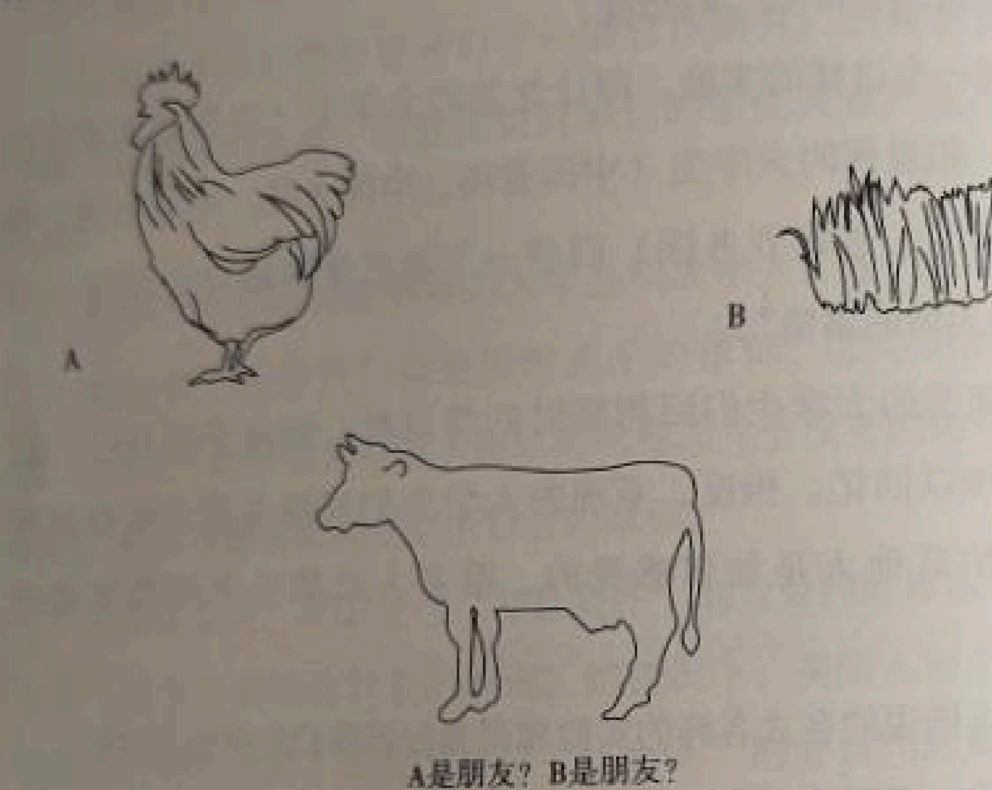
最后，美国人与亚洲人之间的差异从儿童时期（4岁）起就鲜明地显现出来了。

关系与分类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E·尼斯贝特曾就“东方”和“西

方"的差异作过深入的研究，他提出这样一个假说，即西方人将世界当作名词的集合加以思考，而东方人则将世界当作动词来把握。这个观点十分有趣，具体介绍如下。①

首先，请看图8。假如你给牛组成一对的话，会选择A还是选择B呢？



A是朋友？B是朋友？

图8　牛的朋友是哪个？

分别向美国和中国的孩子提出这个问题，美国的孩子大多选择鸡与牛组成一对，而中国的孩子则大多选择牛和草组成一对。

牛与鸡组成一对的话，从分类学的角度说，它们都是动物；而牛与草的组合是因为牛吃草，而鸡不吃草的缘故。也就是说，后者更加重视两者的"关系"，而不是"分类"。

---

① 尼斯贝特，前引书。

或许与西方人一样，有的读者选择牛与鸡作为一对组合（我就是这样选择的）。但下面的实验肯定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出东方人与西方人的差异。

尼斯贝特的研究小组分别让参加实验的韩国人、欧洲系的美国人以及亚洲系的美国人观看图9，向他们提问：目标图（左边的图）更加接近哪个图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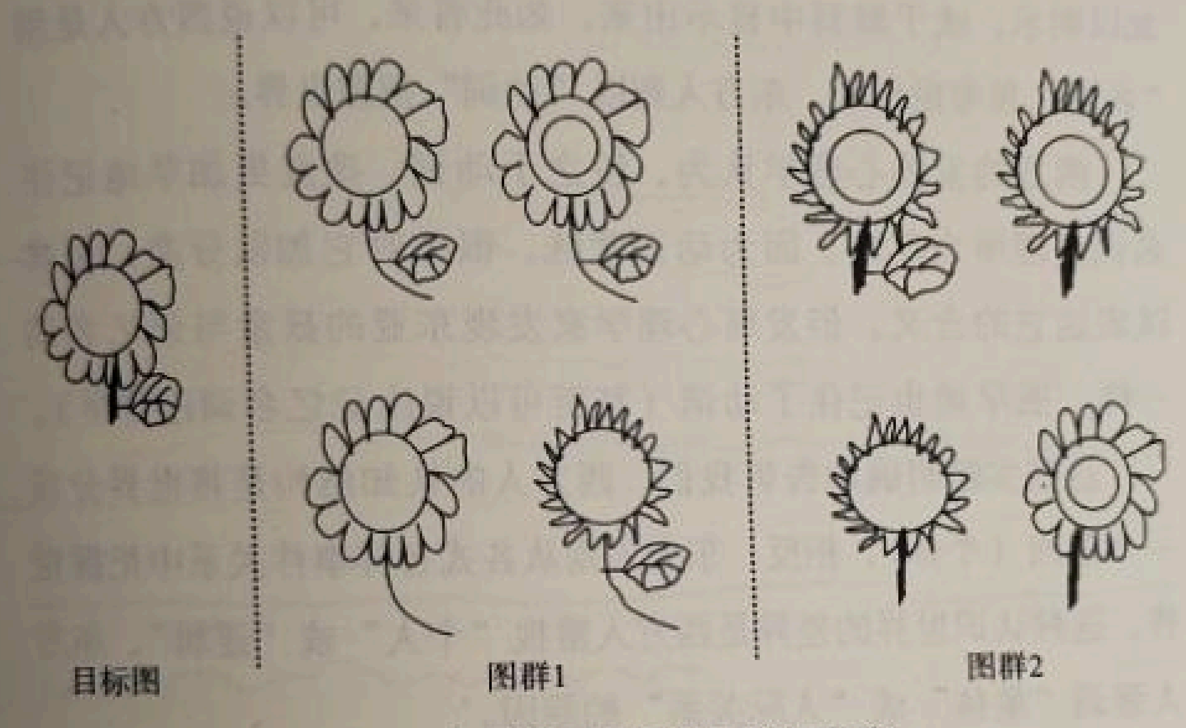


图9　与目标图相近的是哪个图群？

绝大多数韩国人的回答是：目标图更接近图群1（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大多数欧洲系的美国人则选择了图群2。亚洲裔的美国人处于两者之间。

图群1描绘的是与目标图具有“家族关系式的类似性”的图像，它们与目标图似乎非常像，但所有的图之间没有共通的规律性。

图群2中存在着与目标图极不相似的图，但有一处具有明显的

规律性，即都有“粗大的茎”。

尼斯贝特通过其他的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即西方人具有很快就能够发现“分类学规则”的倾向。与此相反，东方人不擅于运用规则将事物归于某个范畴，而对发生变化的部分以及整体关系或意义的共通性抱有浓厚的兴趣。

范畴是由名词加以表示的，而人或物之间的关系则通过动词加以明示，或于默契中显示出来。如此看来，可以说西方人是用“名词”思考世界的，东方人则以“动词”把握世界。

西方的发展心理学认为，较之于动词，孩童更加早地记住名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动词暧昧，很难对它加以分类，也难以表达它的含义。但发展心理学家发现东亚的孩童与记忆名词一样，很早地也记住了动词（甚至可以说比记忆名词还要早）。

这些实验明确地告诉我们，西方人的认知结构是将世界分成一个东西（个体），相反，东方人则从各式各样事件关系中把握世界。这种认识世界的差异是西方人重视“个人”或“逻辑”、东方人强调“集体”或“人际关系”的原因。*

*尼斯贝特所说的“东方”是指东亚、东南亚地区，并不包含印度和中东地区。从某些方面来说，印度人比西方人更加具有逻辑性，如果让他们参与同样的实验的话，或许会得出与“东方”人不同的结果。

读到这里，人们肯定会提出疑问，上述差异是不是与生俱来（遗传）的呢？对此，尼斯贝特的回答十分简洁明快。

在大多数调查中，亚洲裔的美国人（在美国出生成长的亚洲裔的人们）的回答多数情况下处于东方与西方之间，在一部分调

查中，他们与欧洲裔的美国人几乎相同。日本人似乎更加容易受到影响，在某个调查中，人们发现，仅在美国居住了二三年，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就与纯粹的美国人几乎没有区别了。

西方人与东方人明显不同，但这个不同是由文化决定的。

小结（3）

- 农耕文明特有的行为准则的形成

  对土地（领地）的执着→封闭性

  全体一致进行表决→妥协

  安分守己地生存→身份制

  循环往复的世界观→非历史性

- 东方与西方的行为准则的差异

  美国人的默认策略▶让自己惹人注目

  日本人的默认策略▶采取与他人相同的行为

- 把握世界的方法

  西方人▶分类→重视个体与逻辑

  东方人▶关系→重视集体与人际关系

7 空气与水

1945年9月27日，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美国驻日大使馆官邸会见了战败国日本的领导人昭和天皇。第二天，会见的照片刊登在各个报纸上。这是一幅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昭和天皇身穿燕尾服站在那里，麦克阿瑟虽然没有戴着其形象标识的墨镜，但没有打领带，神情自若地手插在腰间。看到这幅照片，所有的日本人都明白谁是日本的统治者了。

敬启者，麦克阿瑟将军

麦克阿瑟将军与昭和天皇会见的消息见报后，写有“敬启者，麦克阿瑟将军”的信件接连不断地寄往GHQ（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数量达50万封之多。[①] 写信的人各式各样，有政治家、医生等精英阶层，也有农民、主妇等普通民众，甚至还有小学生。

---

① 袖井林二郎，《敬启者，麦克阿瑟将军——占领下的日本人的信件》（中公文库）。

信件的内容大多是赞美麦克阿瑟的——说他是“世界的主人”、“我等伟大的解放者”，或者是对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的琐事发泄不满的。

其中有一封信是妻子写给丈夫的，希望麦克阿瑟转交。丈夫（马尼拉宪兵分队准尉）作为战犯，被判处死刑，被关押在菲律宾吕宋岛的收容所里。妻子在信中写道：丈夫在战场上打仗时，我平安地生下一个男孩，并给他起名叫“宪雄”。她想让这封信作为与丈夫死别的礼物。这是一封令人心酸的信。另外还有一封13岁少女的信，表达了她发自内心的强烈愿望：为了让日本重新变成一个和平之国和文化之国，请允许我前往美国留学。

除此之外，有的信件或表达了对GHQ绝对权威的憧憬，或希望加入美国的军队，还有一个寡妇写信期望成为美国的间谍。

美国堪萨斯大学的一名历史学教授曾供职于占领时期的GII（情报部）的翻译部队，他曾经翻译过数百封的日本女子写的信，据他说，那些信中表达了想与麦克阿瑟结成“父女关系”。其中还有许多信件明确写道：“想与你生个孩子。”

下面我介绍一封由静冈县某个农村寄出的12人联合署名的信件，它表达了战败后日本普通百姓的心情。

这是一封写给麦克阿瑟的请愿信，信中说：他们村庄的神社里有许多大树，这些树的树枝给农作物的生长带来危害，于是，在获得县政府许可的情况下，他们砍伐了这些树木。但是，村长以及族人首领对砍伐树木提出异议，认为他们向县政府提出的砍伐申请书不完善，决定用村里的公共费用提起诉讼。

请愿者认为，这是村长以及拥护村长的那一派利用公职企图

隐瞒贪污神社 3 400 日元经费的一个阴谋，由此可以想象，除此以外村长及其他人还有着其他的犯罪行为，这对他们村庄的“文化发展建设”毫无益处。于是，他们在请愿书中写道：“此实乃可怕之事，请以此为机罢免其公职公务。”他们向 GHQ 总司令情愿，希望将军罢免村里政敌的公职。

将日本纳入美国的领属

支持军国主义日本的人们希望麦克阿瑟做些什么呢？

一个曾在东京某制药公司工作过，现在疏散到滋贺县修建机场的知识分子（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毕业）对麦克阿瑟这样赞美道：

> 阁下（麦克阿瑟将军）领导如神，您的眼光看遍日本社会的角角落落，您所有的指示都一一命中目标，我们衷心地感谢您的人道主义的领导，而这些均为日本政治家绝对无法企及的善政。

紧接着，反过来他全面地否定了日本及日本人。

> 非常惭愧的是，现如今我才打心底里感到日本国民在任何方面都远远不及贵国。事到今天，日本国民通过贵国驻扎的军队才第一次知道贵国取得了胜利，才从内心感到后悔，为什么我们要与这样伟大的贵国进行一场轻率的战争呢？由此，我们对贵国的尊敬之情益发高涨，我们确信，将来能够真正信赖并将日本寄托的国家只有贵国，如同对天皇的尊崇之情一样，对阁下的尊崇之情也并非形式上的，我们的确发

自内心地怀着敬服、尊崇之情。

最后，他这样写道：

因而，这种尊敬之情愈发成倍地高涨，能够将挣扎在深渊里的日本拯救出来的除了贵国没有其他国家了。日本国民十分信赖贵国，我们将整个日本都托付给贵国，按照您的指示行事。我们对贵国的信赖程度与日俱增，认为将整个日本都托付给你们，以贵国的慈悲心怀使日本得以复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在寄给 GHQ 的信件里，与此旨趣大致相同的信件有许多。例如，战争刚刚结束 6 个月，冈山市的一位 62 岁的男子——其任军医少尉的长子在缅甸战役中下落不明——就这样写道：

为日本之将来及子孙考虑，祈愿美国将日本纳入其国家领属。

寄给麦克阿瑟的这些信件，告诉我们以前从来不知道的“日本人的本性”。

“水”的秘密

许多人并不知道山本七平[①]的《“水＝日常性”的研究》和《关于日本的原旨主义》与《“空气”的研究》是三部曲。这是由

① 山本七平（1921～1991），日本山本书店店主、评论家。著有大量的有关“日本人论”著作，如《日本人的人生观》《日本人的思维与政治文化》《日本式领导的条件》等。——译者注

于在第一部《“空气”的研究》中作者对“空气”的考察过于出名的缘故。

在《“空气”的研究》一书中，山本引用了小泽治三郎[1]中将于战后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刊登在《文艺春秋》杂志战舰“大和”号特辑（吉田满监修、组稿）中。

> 根据整个“空气”（氛围）来看，我以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战舰“大和”号的特殊攻击都是理所应当的。

在作战会议上，有人批判“大和”号的出击是非常鲁莽的，他们拥有详尽的数据和确凿的证据。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站在“大和”号的出击是“理所应当”的立场上人没有丝毫的根据，支撑他们所认为的“正当性”只是“空气”（氛围）。最终出击的结果就是，包括学生士兵——他们中途辍学，被征兵——在内，共有2 740名（如果将护卫舰的人包含其中的话，数字就达到3 721名）年轻人葬身海底。

山本所说的“空气的统治”的情况现在仍随处可见。不过，我这里所说的主题并非后来成为流行词的KY（不会察言观色）的“空气”（氛围），而是现在几乎无人涉及的“水”的研究。

重新阅读山本的《“水＝日常性”的研究》一书，我明白了为什么“水”被人遗忘的原因了。

山本认为，与“空气”相比较，“水”更加让人感到含糊。他

---

① 小泽治三郎（1886～1966），日本海军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任第三十一任联合舰队总司令。——译者注

举了一个“泼冷水”的例子加以说明：

> 我年轻的时候，出版社的编辑们聚到一起就谈论道：如果独立的话，我就出版自己中意的书。由于大家都是干这一行的，因此，说着说着话题就深入下去，人们的眼前似乎就出现了一本成形的书。尽管大家对这本谁也没有见到的书进行严厉的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自己都认为这肯定是一本畅销的书。
>
> 于是，现场的“空气”逐渐发生变化：老这么干下去太没劲了，我们独立出来一起干吧？这个话题逐步升级并“具体化”。对此，我有过好几次的体验，不，有过几十次的体验。人们的眼前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玫瑰色。话题终于落到“那就干吧”的时候，有人说了句：“前途一片黯淡啊。”刹那间，现场的“空气”分崩离析。①

山本认为，“水”具有破坏“空气”的作用，是一种像促进“消化”的“酶”一样的物质。在“水”所起的“酶”的作用下，高涨的“空气”重新回到通常情况下，即日常性中。

不过，叙述由此“逸出”正轨。

山本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兵虐待俘虏的例子，将这个例子视为是因为“随大溜”而造成的。战后，这些日本兵因虐待俘虏被问罪，他们辩解道：“在当时的情况下，自己采取了正确的行为。如果这种行为被称作犯罪的话，那么，应该问罪的是

---

① 山本七平，《“空气”的研究》（文春文库）。

造成这种情况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提出“自我行为正当化”的逻辑就是出于“空气”与“水”的区别。

然而，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地考虑的话，日本兵之所以虐待俘虏，是因为包括其他士官在内的日本兵都在虐待俘虏，如果自己一个人采取与其他人不同的行为恐怕会特别显眼。这个逻辑与学校里“欺负人”的逻辑相同，是典型的“空气”统治的例子。

由此，山本虽然察觉到日本社会中除了“空气”之外，还有“水”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他并没有从中总结出道理来。

在这里，我想从与山本截然不同的角度直击“水”的秘密。

世界范围的价值观调查

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曾在世界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意调查，由此对各个国家人们的不同价值观进行了对比研究。*

*下面我将以社会学家桥本努的《经济伦理：你是什么主义?》（讲谈社选书）一书为依据，介绍英格尔哈特的极为有趣的深入研究。

英格尔哈特认为文化价值观（上层结构）是受到社会、经济因素（下层结构）的影响的，因此，要对此进行调查的话，就需要设立这样两个文化对立轴。（图10）

①“传统的价值（前近代社会的价值观）”与“世俗的、合理的价值（近代社会的价值观）”

②“生存价值（产业社会的价值观）”与“自我表现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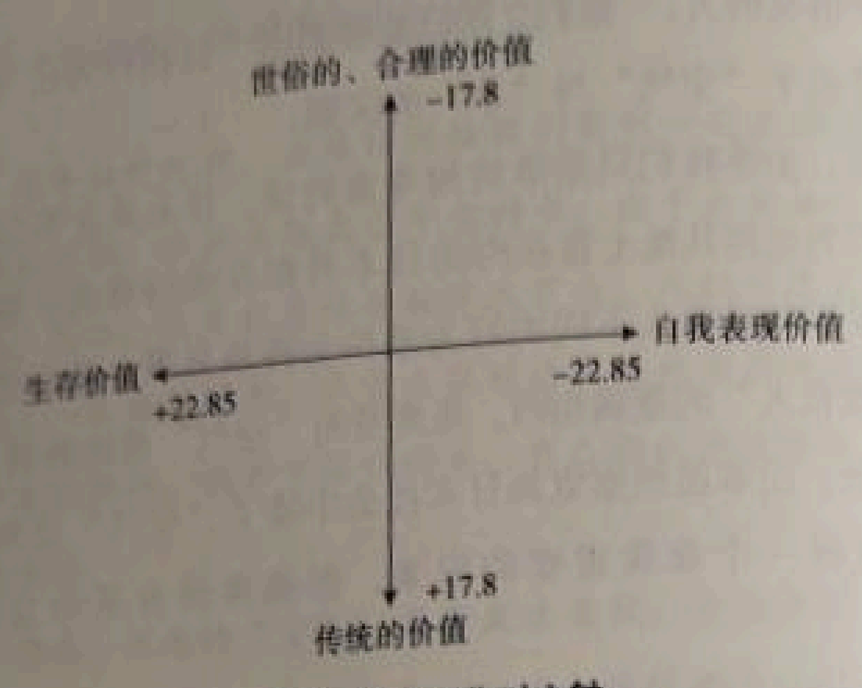


图10 两个文化对立轴

（后产业社会的价值观）”

对立轴①是由以下一些问题进行测算的，如“在人生中，宗教是非常重要的”、“决不能让安乐死正当化”等。在这里，封建的宗教世界与合理的、理性的世俗世界相对。

对立轴②是由以下一些问题进行调查的，如“为了使人生完满，女性必须生小孩”、“应该更加强调技术的发展”等。这个对立轴调查了人们的想法：是否认为产业社会（工业社会）的价值观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比起物质上的丰富来，是否社会正在向追求“自我表现价值（自我性）”的后产业社会（服务产业社会）转型？

图11显示了各国的平均值，纵轴显示的是“大众的价值观”（与“传统的价值”和“世俗的、合理的价值”相关的数值），而横轴显示的则是“近代化产业阶段”（从从事工业人口的比例中减去从事农业人口的比例后的数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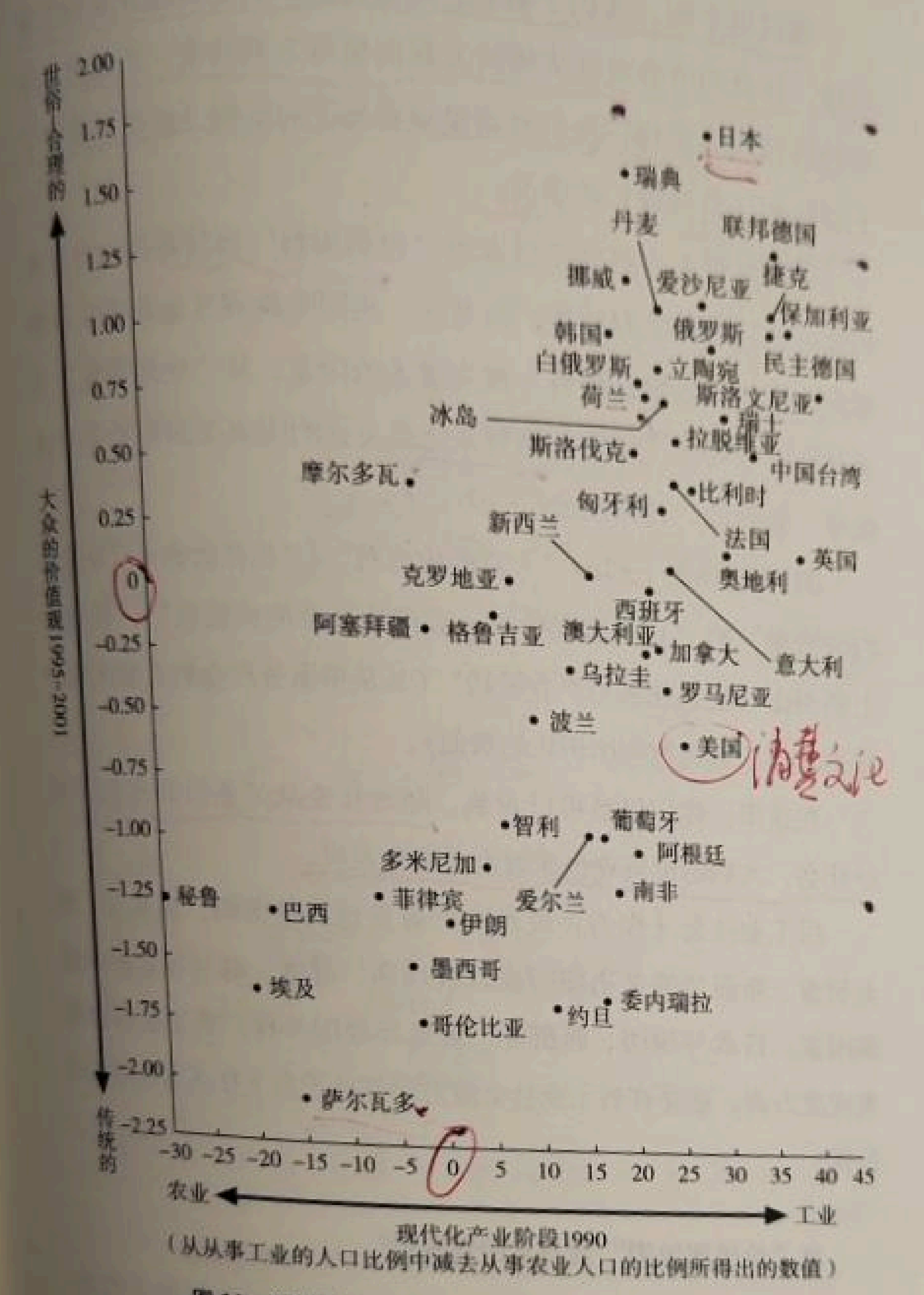


图11　传统的/世俗的、合理的价值对产业的影响

阶段，社会的价值观也从传统方面向世俗方面转变。正如英格尔哈特所预测的那样，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下层结构（经济）决定了上层结构（价值观）的情况。

该图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的“世俗指数”极其得高。与日本相接近的只有北欧的瑞典，而英国、法国等欧洲其他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其“世俗指数”几乎都处于平均值。世界上消费文化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则处于“世俗度”较低的“传统社会”一方。

图12在纵轴上列出“大众的价值观”（“生存价值＝产业社会的价值观”和“自我表现价值＝后产业社会的价值观”），在横轴上则列出“近代化的后产业阶段”（从从事服务产业的人数比例中减去从事工业人数的比例后的数值）。

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随着社会从工业阶段转向后工业社会，人们的价值观也逐渐走向自我表现。

后工业社会（作为表现趋向）最发达的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语圈国家以及瑞典、挪威、荷兰等北欧新教圈国家。日本与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一样，无论是在自我表现度方面，还是在后工业社会度方面都处于自上往下1/3左右的位置。

由“价值观地图”看日本的特殊性

接着，英格尔哈特将以上两个图组合起来，在纵轴上列出“传统的价值”与“世俗的、合理的价值”的对立，在横轴上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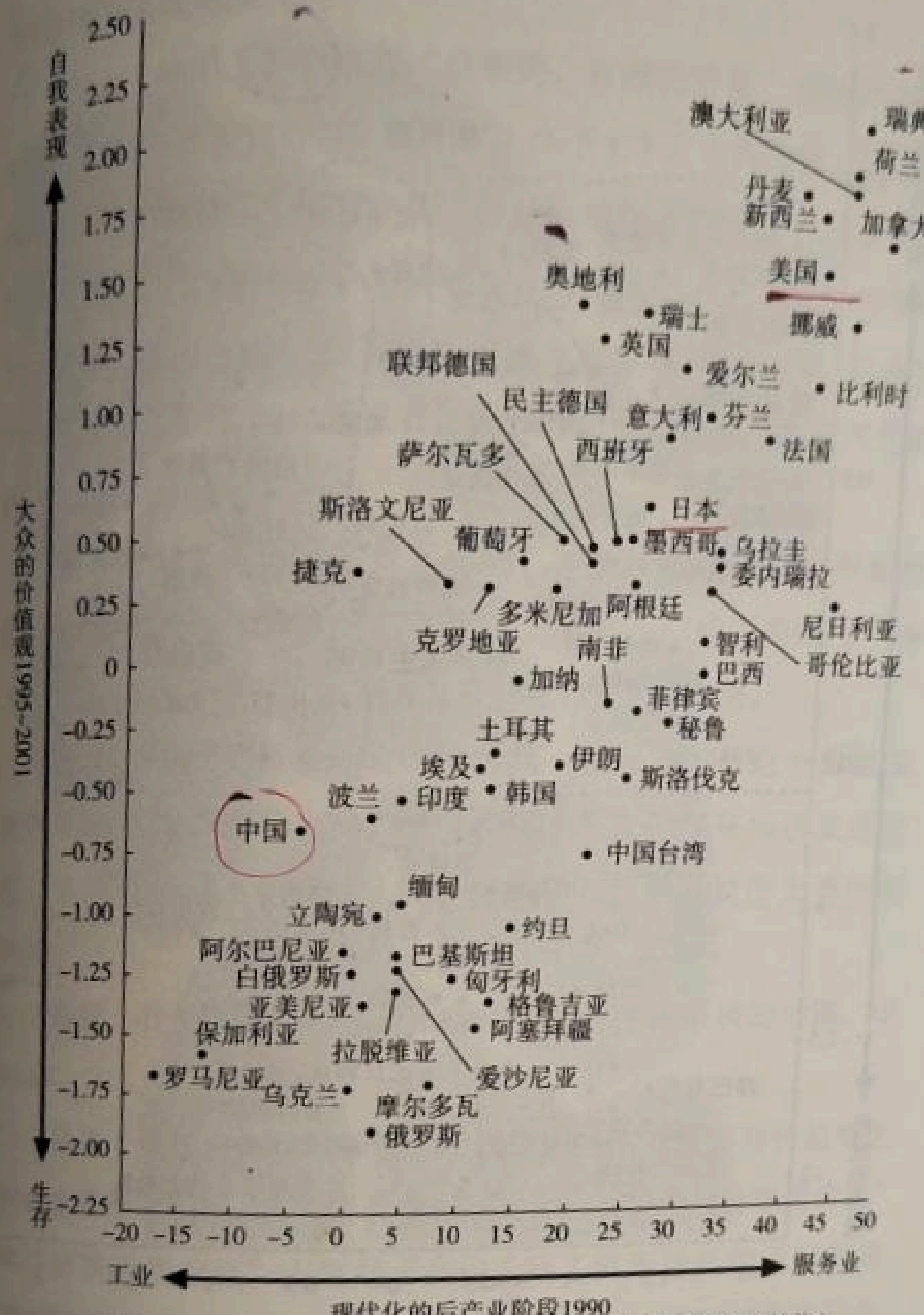


图12 生存/自我表现价值对后工业社会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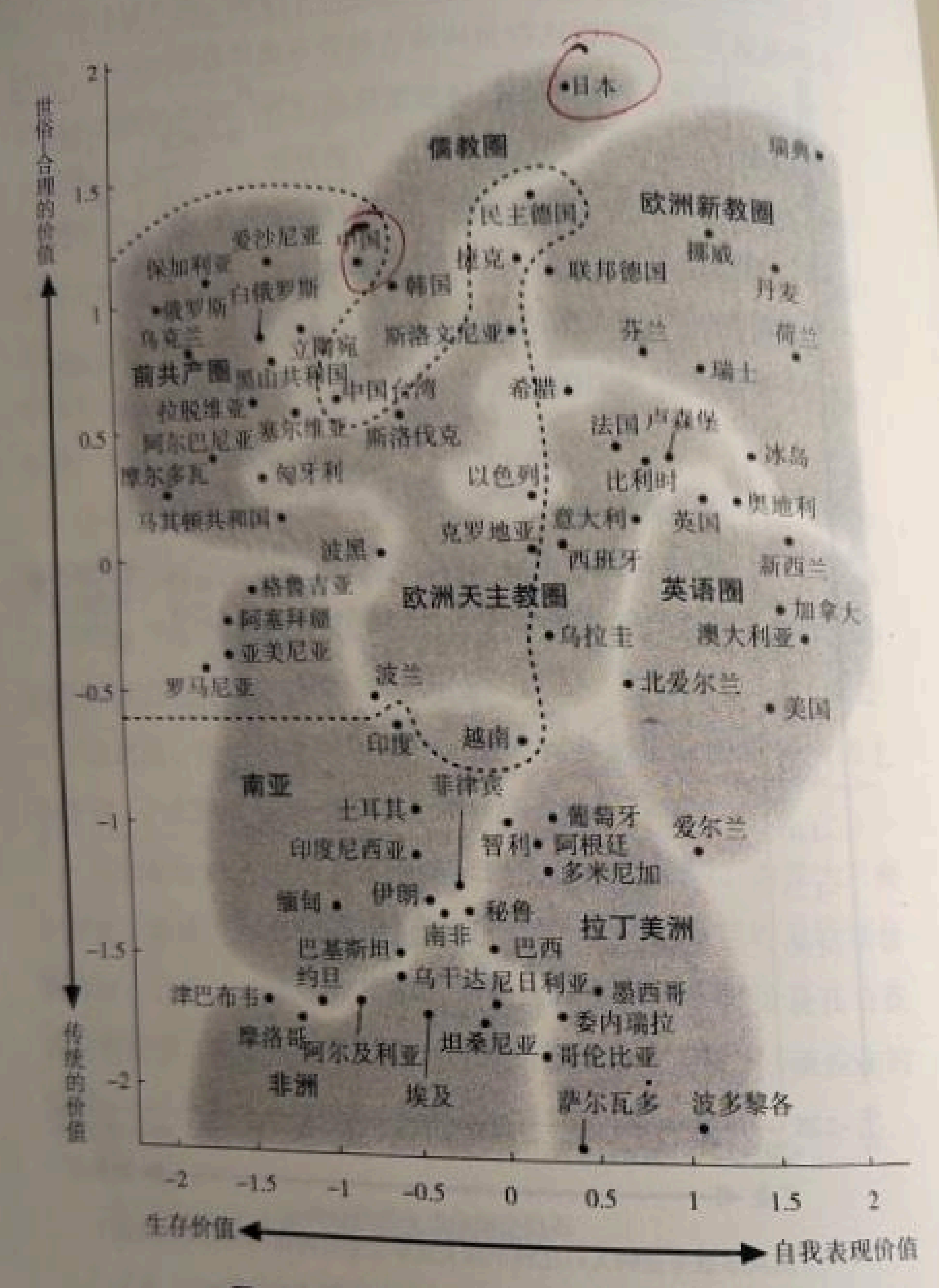


图 13　英格尔哈特价值观地图（2000 年）

“生存价值”与“自我表现价值”的对立。图13就被称作“英格尔哈特价值观地图”。

在这个地图上，日本的“世俗的、合理的价值”所处的位置特别高，“自我表现价值”处于自上往下1/3左右的位置，可以看出日本占据着非常独特的地位，但从价值观方面来看，日本则与前民主德国、瑞典接近。与此相反，中国、韩国、中国台湾等地的人们在世俗的价值、自我表现价值方面都比日本要低，但通过同属于儒教圈国家的位置来看，日本所处地区中并不包含其他的国家。

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其他文化圈，如图所示，与“欧洲新教圈”、“欧洲天主教圈”、“英语圈”、“南亚”、“拉丁美洲”、“非洲”等圈（群）不同，日本也与它们有着显著的区别。

当然，这种显而易见的区别并非一直奏效。但这个价值观地图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的价值观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发展阶段，它还是由语言、宗教、地理政治学的位置以及历史等所制约的。

最后，我们看一下以工资所得划分的同一价值观的地图，即图14。

从这个地图我们可以知道，不同国家的工资所得与价值观之间有着明晰的关联。工资所得高的国家在“世俗的、合理的价值”和“自我表现价值”方面处于高位，而工资所得低的国家则在“传统的价值”和“生存价值”方面处于高位。当然，这也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即与因果关系截然相反，随着工资所得增高，人们就走向世俗的一面，而追求自我表现（自我性），而工资所得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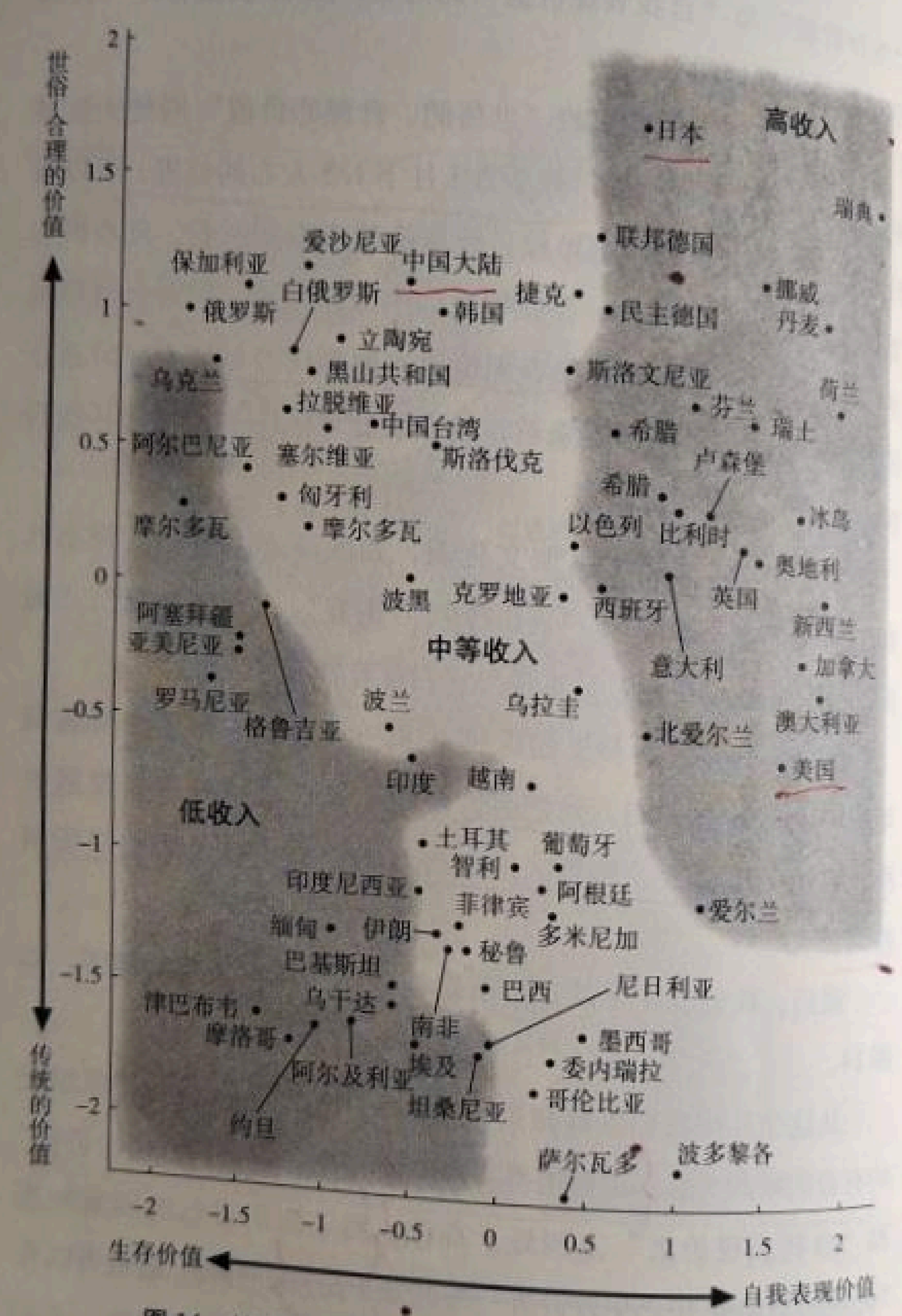


图 14　按经济水平划分的英格尔哈特的价值观地图

低，则为传统的价值观所束缚，为了活下去（生存价值）而拼命工作。也就是说，从某种程度看，文化性的价值观依赖于工资所得水平的高低。

另一方面，通过这个地图，我们了解到，即便在高工资所得的国家中既有像日本这样的在“世俗的、合理的价值”方面极其高的情况下，而“自我表现价值”却相对比较低的国家，也有像北美、大洋洲、北欧那样一方面极其尊重“自我表现价值”，另一方面又十分尊重“传统价值”的国家。

我们常常认为日本是一个“农村社会”，非洲、南亚、拉丁美洲的国家自不待言，即便与欧洲各国以及中国、韩国相比，日本人也不重视传统的价值观，因此日本的“农村社会性”并不高。相反，在英格尔哈特的调查中，日本人的世俗指数之高尤其突出。

有自己活法的日本人

在这里，我想让大家回忆起我在“写在前面”中提及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这是以英格尔哈特为中心进行的世界性规模的民意调查，在这个调查中，日本人的特征被描述为：①不愿意为国家而战；②不以身为日本人而骄傲；③厌恶权力或权威。这或许受到了战争以及“自虐史观”的影响，但通过英格尔哈特的价值观地图，我们发现这个结果反映出日本人的极端世俗性和整合性。

从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我们再列举一个证明这一点的例子。这就是关于“人生的目标”的提问。①

① 电通总研、日本调查中心编，前引书。

这个提问有以下4个选择提供给被调查者（可以选择多项）：

A 父母（曾）将以我为骄傲当作是人生的目标之一。

B 想活得更像自己，而不是去迎合他人。

C 为不辜负朋友的期待而努力。

D 自己的人生目标由自己决定。

日本、韩国、中国和美国4个国家的调查结果如图15所示。

由图15我们知道，韩国人和中国人不仅仅将“自我实现”作为人生的重要目标，而且认为“父母的骄傲”和“不辜负朋友的期待”也是人生的重要目标。他们对家庭和社会有一种强烈的意识。

美国人并不关注朋友的期待（社会），却想让家庭成员以自己为骄傲。

与此相反，日本人认为，即便有悖于家庭和朋友们的期待，但自己的人生目标是由自己决定的，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要活得更像自己。至少在这4个国家中，最具“个人主义”生活方式色彩的是日本人。

战争的得失计算

看到这样的“日本人的本性”，保守派的人们一定会勃然大怒地说：“这是因为战后日本的民主教育之错。”然而，我们在战后真的就失去了“日本人的骄傲”，而变成个人主义了吗？

我们只要看一看自明治到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战争历史，就会发现，很显然我们不能说“日本人是爱好和平的国民”。到了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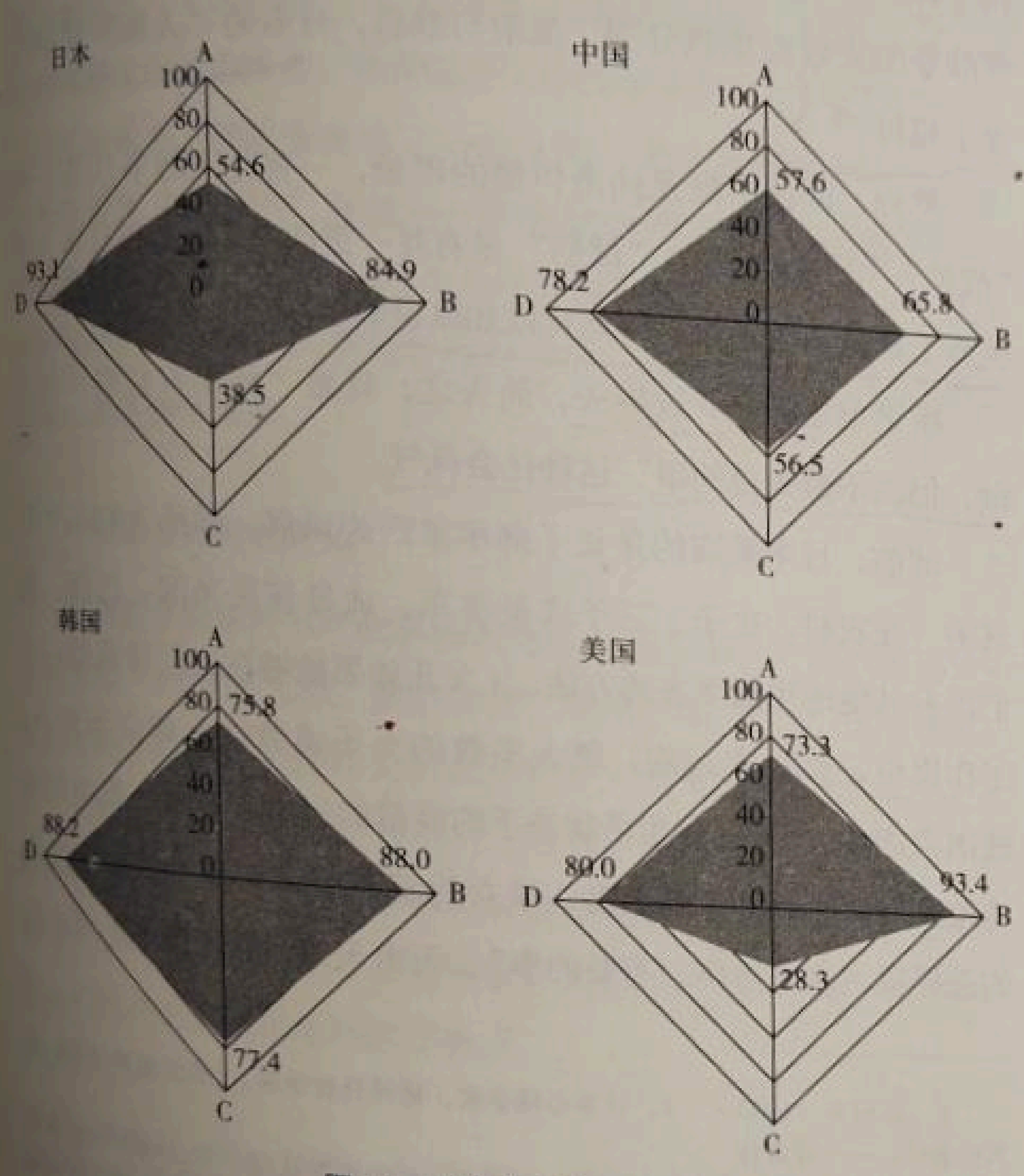

A 父母以我为傲是目标
B 想活得更像自己
C 不辜负朋友的期待
D 自己的人生自己决定
日本
A
100
80
60
54.6
40
20
0
93.1
D
84.9
B
38.5
C
中国
A
100
80
60
57.6
40
20
0
78.2
D
65.8
B
56.5
C
韩国
A
100
80
75.8
60
40
20
0
88.2
D
88.0
B
77.4
C
美国
A
100
80
73.3
60
40
20
0
80.0
D
93.4
B
28.3
C

图 15　何谓人生的目标?

后，人们突然变得"厌战"了，因此，战前与战后之间肯定有着决定性的"鸿沟"——精神分析学家岸田秀[1]在其《懒汉精神分析》等著作中阐述的这种论调为人们所熟知。

根据岸田的阐述，所谓"国家"是一种人格，日本的"自我"由于佩里来航[2]（与西方的接触）的冲击而遭到破坏，再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失败而彻底分裂。战前与战后，日本的"人格"完全改变了模样。[3]

然而，即使不提及弗洛伊德的理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下的"战前"和爱好和平的"战后"是有其一贯性的，这通过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世俗的民族这一点可以加以说明。

所谓世俗就是计较得失，简言之，就是"如果有益的话就去做，但决不做无益的事"这种社会风气。

战前，日本采取的是长子继承家产的风俗，那是人们还十分贫穷，在农村，次子、三子或是参军，或是移民美国、巴西，他们没有其他的生活下去的方法。（女儿如果能够在工厂里获得一个工作岗位，算是幸运的，绝大多数的女子或前往大都会当仆人，或出卖肉体。）对这种生活状态下的战前的日本人来说，将中国台湾殖民地化、吞并朝鲜半岛、建立伪满洲国等都是为了增加生存的选择项，这被当作"有益的事"。正由于他们极其世俗，因此狂

---

① 岸田秀（1933～ ），日本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懒汉精神分析》是其代表作。——译者注

② 佩里（1794～1858），美国海军军官，东印度舰队司令员，1853年曾率领舰队（黑船）到达日本，要求日本开国，后缔结"日美和亲条约"，著有《日本远征记》。——译者注

③ 岸田秀，《懒汉精神分析》（中公文库）。

热地支持日本"进出"亚洲。

然而，其结果是非常悲惨的。在大东亚战争（自侵华战争到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人的死亡数字达到300万，广岛、长崎受到原子弹的袭击，整个日本的城市都被夷为废墟。

看到这种情况，日本人一定会注意到他们犯下了极大的错误。战争是极其"无益的事"。我们再看一看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很多的美国士兵殒命阵前，美国似乎从中没有得到半点儿益处。

如此看来，战前变身为"一亿火球"走向战争的日本人成了一个最爱好"和平的"民族——即便受到其他国家的侵略，他们也不会拿起武器。日本人的"人格"并非像岸田秀所说的那样，战前与战后（或江户与明治）是分裂的，我们的世俗性的人格其实是一直连贯下来的。

一切从万叶时代开始

佛教哲学家中村元[①]能够流利地说一口梵语、巴利语和汉语，是罕见的一代学问大师。他在印度、中国、韩国以及日本本土查阅大量的文献，从文化接受的角度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的认识（思维）结构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调查。根据中村元的看法，佛教起源于印度，在中国汉译佛经时发生变化，传入日本时又一次发生改变。这是因为在各自的国家，人们只接受符合于那个国家的人们所具有的认识结构的思想。[②]

---

① 中村元（1912～1999），日本哲学家、佛教学家。著有《印度人的思维方法》《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日本人的思维方法》等大量的著作。——译者注

② 中村元，《东洋人的思维方法 III 日本人的思维方法（决定版 中村元选集第3卷）》（春秋社）。

那么，佛教刚刚传入日本时是如何被“加工”了的呢？

中村指出，最澄[1]、空海[2]等平安时代初期的留学僧们一开始是完全不会讲汉语的。从日本到中国的留学僧们在留学前没有机会学习语言，加之留学时间又短，因此只能通过笔谈达到交流思想的目的。

这种语言上的束缚迫使他们只能通过对汉语的翻译来理解佛教的思想。而翻译者（僧侣）们并非将汉语按照原文进行翻译，而是根据自己的方便程度（即如何让民众易懂）进行意译，当时，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做法。由于汉语没有文法，只要改变断句并加上“返点”[3] 等，原文的意思就有可能完全被改变。

例如禅宗（曹洞宗）之祖道元[4]将比较单纯的“有时高高峰顶立，有时深深海底行”中的“有时”当作一个名词，即概念，将它解释为：“时已是有，有皆为时”，由此衍生出其独特的“时间哲学”。除此之外还可以举出一些这样的例子，总之，日本的佛教学者将汉语当作一种密码，对它进行任意的“解读”，由此生发出其思想。

中村说，日本的佛教是将印度佛教（原始的）彻底世俗化的一种宗教。

印度的思想以其严酷的自然为背景，认为此世乃秽土（污秽

---

① 最澄（767－822），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人。公元 804 年曾与空海一道来我国学习佛法。——译者注

② 空海（774－835），日本真言宗的创始人。——译者注

③ 日本人阅读汉语文章（诗歌）时，在汉字的左下角标记上阅读符号，以表示颠倒顺序阅读，这种符号称作“返点”。——译者注

④ 道元（1200－1253），日本曹洞宗的创始人，曾于 1223 年来我国学习禅宗。——译者注

的土地），将来世看作极乐净土，通过在极乐净土的修行而达到佛的境地。

但是，对喜爱风光明媚的自然风景的日本人来说，他们是完全不可能理解这个世界是秽土的思想的。于是，日本的佛教学者省略掉一步通往佛的步骤，将现世升格为极乐净土，人死后不仅马上（不需要修行）可以成佛，而且还“创造”了一种“即身成佛”的思想，即活着的肉身也可以获得最终的觉悟。当时，日本人只对灵验的神感兴趣，因为他们想不费辛苦就寻求到灵验的速成的宗教。

这种极端的世俗性就是“日本人的本性”，为了说明这一点，中村元从《万叶集》① 中引用大伴家持②的和歌：

此世若快活，来世变虫鸟，我也不在乎。

只要现在快乐，来世再怎么样都没有关系。从万叶时代起，日本人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了。江户时代的封建制在进入明治时代后发生变化，战前的天皇制到了战后转变成为民主制，但日本人的价值观一直没有改变。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回答前面提到的山本七平的疑问了。

在日本，除了“空气＝社会”外，还有另外一种“水＝世俗”的原理。所谓的“泼冷水”即以世俗的原理针对“空气的统治”。当有人说“那么干你只能受到损失”时，此前的兴高采烈的谈论

---

① 《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大约收录4500首和歌。——译者注

② 大伴家持（718？～785），日本奈良时代的诗人，《万叶集》的编者之一。——译者注

就被泼上冷水，拉回到现实（世俗）之中。

日本社会是在“空气”和“水”这两个相反的原理中运行的，当然这种说法适用于任何一个社会，不过，如果要让我们举一个“日本人的特征”的例子的话，通过各式各样的价值观调查我们可以知道，世俗性就是其最明显的特征。

这种情况与日本社会中存在的“空气的统治”并不矛盾。“社会”的约束性之所以很强，那是因为日本人具有很强的“个人主义的”色彩，他们如果不那么做的话，就不会被融入进同一个共同体中。

从远古时代起，日本人就非常讨厌“社会”。因此，他们对“上”口是心非，对压抑个人欲望的“权威”极其厌恶。

从刚刚战败起，日本人就开始写“敬启者，麦克阿瑟将军”，恳求美国将日本纳入其所属，这并不是因为日本人的“自我”开始分裂，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可以带来“益处”。日本人只认可灵验的神和给自己带来好处的权威。人们的价值观不会随着统治者的变更而发生变化，更何况教育等都不会带来任何的改变。

有史以来，日本人虽为人情所羁绊，但他们认为快乐地度过现世就是一切。

8 从“水”看日本论

与现行的常识相反，日本人的特征不是“农村社会＝空气的统治”，而是“世俗性＝水”，这在全世界都很突出。

从这种新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解开诸多日本社会之谜的钥匙。在这里，我将以“水”为中心，尝试着描述“另一种（替代性的）日本论”。

公务员为什么不接受贿赂？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成功地走向现代化（资本主义化），这是非西方国家中唯一的一个例子，被称之为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谜团。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资本主义的成立背后一定隐藏着新教的禁欲的伦理。当然，日本并非基督教社会，因此，学者们试图在日本历史中探索取代新教的东西。

由此而被“发现”的是江户时代的禅僧铃木正三。

有一天，一个信仰深厚的农夫向铃木正三说道："农活太忙了，没有时间学习佛教。如果因这样一件无益的事而在来世受到惩罚，那就太遗憾了。"铃木回答道："农业则（即）佛行也。"山本七平和小室直树都认为，在日本，这种全心全意地工作本身就是成佛之道的"勤劳哲学"诞生了资本主义的劳动伦理。①

与以上看法不同，在这里我想将极端的世俗性和个人主义放置于日本"现代化"的内部深层进行思索。

人们认为，在日本社会里，"血缘"和"地缘"尤其受到重视，实际上这是亚洲型农耕社会中随处可见的现象。与此相反，日本人的特殊性在于：日本虽然是亚洲型农耕社会，但它受到血缘和地缘的束缚极其宽松。

妨碍现代化进展的最大的障碍是任人唯亲（nepotism）和收受贿赂。不仅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而且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欧国家，政治和行政受到地缘和血缘关系的羁绊，通过贿赂来行使影响力的情况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但在日本，即便是在明治时代，权力的腐败虽然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应是极其罕见的现象。

在血缘纽带很强的社会里，只要一人出人头地，其家族的成员就会寻求权力，聚集到一起。但日本社会重视"家"（社会、政府）胜于重视血缘关系，这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因此，露骨的关系主义普遍受到唾弃（即使你利用关系获得工作，但进入公司后的地位会很低）。这种对血缘关系的淡漠现象加强了某个组织的

① 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的精神》（商务社）；小室直树，《小室直树的资本主义原论》（东洋经济新报社）。

统治力。进入明治时代后，这也成为日本立刻就组建了一个现代的、合理的官僚体系（或接近于官僚体系）的原动力。

有人认为，日本公务员不接受贿赂是由于日本人的洁癖所致，其实这可以从世俗性的角度加以说明。

日本社会在血缘关系、结社等方面是没有社会保障的。如果一个人为作为“家”的社会、政府所排斥的话，那么这个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而且，日本的人事制度规定，公务员只有在获得满额的退职金后才正当地获得了与劳动相对等的价值，因此，公务员要做出中途可能被解雇的行为会冒很高的风险。公务员接受贿赂可以招来灾祸，如此一来，就很不划算。

当然，没有一个人是出于这种考虑而拒绝贿赂的。但在收受贿赂可以带来损失的社会里，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所谓的洁癖的文化，人们就会在无意识之中回避做出贿赂的行为。从本性上讲，日本人并非讨厌贿赂，这只要看一下人们给医生的红包以及政治家屡犯的收受贿赂的事件就可以明白。在没有文化束缚的地方，日本照样发生着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国家相同的事件。*

*在日本，对“上”的贿赂被当作实施一种报答、接待的习惯。公务员之所以不接受现金就是因为这种“合法的收受贿赂”得以制度化了的缘故。

“家”是社会的最小单位

共同体本来的功能是安全保障体系，社会越不安定，如果没有私人的互助制度的话，人们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众所周知，中国人创建了一种叫“帮会”的同乡组织（秘密结社），这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我们只要翻阅一下中国的历史，就会对他们需要这种安全保障体系的原因了解得一清二楚。在受到游牧民族的侵略、内乱以及战争影响的情况下，人们的土地被掠夺，动不动就会流落他乡，在这样的社会里，最值得信赖的只有人际关系。

中国、韩国的家庭制度是极其强大顽固的父系共同体，姓氏、祖籍（祖先）相同的人之间是不能够结婚的。（从法律上讲，现在已经没有了这样的限制，但作为某种禁忌还顽固地残存着。）结婚后，妻子不会改为丈夫的姓，单一的（父系）血统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与此相反，在日本，人们一旦结婚，就要改姓，或改为丈夫的，或改为妻子的，从而组成一个“家”。一般情况下，女儿会嫁到其他人家，但有时丈夫会继承妻子娘家的财产（倒插门），仅从姓氏来看，是无法判别谁与谁有血缘关系的。

人们一般认为，日本社会中最重要的是“家”的延续，血缘关系是其次的。在中国和韩国，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子继承家产是难以想象的，但在日本，将无能的长子赶出家门而接受养子（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进入家庭）的现象毫不罕见。

如上所述，在日本，“血”的意识本来就很淡薄，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提高，过去的大家族制（血缘集体）很快解体，社会发展成为最小单位的“家”的结合体，即由夫妻与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亲戚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现在有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叔叔、姑姑或堂兄弟。

如果血缘关系并不重要的话，那么地缘关系就显得更加无关紧要了。日本人之所以非常重视地缘关系，是由于他们无法从出生于贫穷的农村社会里摆脱出来的缘故。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他们能够进入工厂劳动时，他们离开农村，移居到城市里，故乡被他们抛之脑后。

现在，大多数日本人生活在城市里，对他们而言，所谓的“故乡”只是他们的祖父母或父母生活的地方，他们基本上再不由此往前追溯，很少有“祖先”的意识。现在的亚洲绝大多数地区的人们认为家庭和故乡是人生的全部，但在日本，祭祀祖先的习惯已完全荒废，被形式化了。在农耕社会，人们为土地所束缚，因而就自然地产生了地缘和血缘关系。但对日本人来说，这种关系只是社会的羁绊（不必要的恶习），而不认为这是“能够生存下去的信赖网”。

我们的话题还没有结束。

一人一个家庭的奇妙社会

“单身赴任”是日本特有的现象，对此，外国人无法理解，因为，他们认为家庭是“无法分割的”。

但日本家庭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丈夫是一个家庭，妻子和孩子是一个家庭的“两个家庭生活”是一种实际的状态。因此，丈夫的“家庭”移居到其他地方，基本上是不会影响到妻子和孩子的“家庭”的。

当孩子成长进入青春期后，另一个新的家庭就会出现，形成“三家同堂”的情况。此前，媒体上介绍了一个家庭的情况：丈

夫、妻子和孩子分别在便利店买来盒饭，大家围着饭桌共同用餐。这引起轰动，但从日本的家庭是由每个个体独立构成的"家庭"的情况来看，这种现象的出现十分自然，而且大家还围坐在一起共餐，"家庭的纽带"依然存在。（许多家庭里的人连用餐时间都各不相同、家人之间互不打照面。）

日本人认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因此基本上对此视而不见。但"一居室公寓"却是日本独特的居住形式，在国外几乎见不到这种情形。

20 年前，我发现了这种情况，因为一个香港的朋友一本正经地向我打听："为什么日本人会一个人生活呢？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啊。"当时，连居住在香港这样高度都市化城市里的人们都无法想象"一个人生活"的情形。

香港人（中国人）认为，成人以后，与家庭其他成员（亲人）共同居住是理所应当的，对他们来说，"一个人"就意味着孤独和被疏远。王家卫在电影《重庆森林》（1994 年）中描写了单身生活的年轻人们，获得好评，那是因为在当时的香港，人们无法在现实世界里看到那样的生活，那是一则"童话故事"。（最近，描写"单身生活"的年轻人的电影终于出现了。）

这种情况在欧美各国也一样，例如，欧美国家的大学宿舍现在仍然是两人同住一屋，即便是在学校外面租房住，一般情况下也都是与他人合租。**日本的大学生们恐怕很难想象与陌生人共同生活。

** 我们看一看描写脸谱网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电影《社交网络》就可以知道哈佛大学学生宿舍合住的情况。

像菲利普·马洛那样的硬汉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单身生活，但他们的“单身”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美国几乎没有像单身公寓（小公寓住宅，studio apartment）那样的住所，因此他们长期借住在宾馆里。这是“自由”与“独立”的象征，同时又是耐得住“孤独”的体现。但在日本，人们平常都是一个人生活，基本上体会不到这种“一个人的寂寞”。

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就形成了“一人一个房间”的“超未来社会”，这是纽约、伦敦所没有的，中国香港、新加坡就更不用说了。（我进入大学学习时，“学生共同生活”的状态就已经不复存在了。）日本人本来就喜欢一个人，谁也不想受到来自他人的约束。***

*** 最近，日本出现了一些“坟墓大楼”，这是将城市中心的大楼改建成安放骨灰的地方。购买这种简易墓地的人大多数是老年女性，据说，她们不愿意将骨灰安放在丈夫家的墓地里。日本人连死后都是“一人一个家庭”。

公司交际

那么，为人们所熟知的日本人的共同体意识（农村社会）究竟是什么状态？

说起来这非常简单，如果我们将血缘和地缘这种先天的契机完全摒弃的话，那么，偶然聚合在一起的人们就形成了一个共同体。

近代之后的日本共同体都是一些诸如学校、部队、工厂这样的由陌生人聚集而形成的，而且日本人很快便将这种与他人的联

系转化成一个稳固的组织（“家”）。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一人一个家庭”的日本人没有将复杂的关系带入这个组织内。

战后，日本废止了征兵制度，日本正式的“共同体”便只剩下学校、公司了。

在日本，所谓的“朋友”是指偶然进入同一个学校的同一个班级而成为伙伴的同学。如果年级不同，同学则无法成为“朋友”（人们以“前辈”、“后辈”相称呼，以示区别），不同共同体（如中学和高中）的朋友也不会相厮混。

从学校毕业后，偶然于同一年进入同一个公司的朋友被称为“同期”，他们形成一个“横向”的共同体。与此同时，偶然进入同一个科室或部门（在这里有年龄上的差异）的朋友之间形成一个“纵向”的共同体，这里是有等级划分的。这样的人际关系依存于某个“场”，因此，如果因人事变动或跳槽而改变了环境的话，那么，他就会与以前的朋友疏远，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朋友关系。

进入20世纪80年代，“文明的‘家’社会”论曾风靡一时，这种论调认为，日本社会的集团原理是“超血缘”的，（从契约的角度看）人们可以选择（让养子继承“家”）的加入形式，但一旦加入后，（从血缘关系的角度说）就不允许退出了，人们便毫无限制地，且毫无期限地为这个集团尽职尽责。① 这种结合原理超越了地缘和血缘关系，是一种“社缘”关系，这种关系通过“会社”（公司）以年功序列和终身雇佣制加以实现。在日本，现代资本主

---

① 村上泰亮、公文俊平、佐藤诚三郎，《文明的“家”社会》（中央公论社）。

义就被"'家'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人的身份认同不是由工作决定的，而是由会社（公司）决定的。****

**** 当你向日本人询问职业时，他会回答公司的名字，而外国人则回答职业的种类，诸如做营业、当经理、搞研究开发等。所谓商务上的身份具有某种专业性（profession），公司只不过是以金钱的形式与此相交换的场所而已。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日本社会忌讳且厌恶能力主义的原因。

欧美国家的冷冰冰的人事制度只是将公司转变为获得收入的工具，并非将它当作"家"。对中国人来说，这种变化也许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说，与人的生存紧密相关的共同体是血缘亲属，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的公司在人的价值观方面并不占据很大的比重。

但对摒弃了地缘和血缘关系的日本人来说，一旦作为"家"的公司不存在的话，那么他所属的共同体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对社会性的动物——人——来说是极其恐怖的一件事。

日本人一般不会放弃公司这个"家"，除非外部的力量强行将他们分开。"公司"于日本人极为重要，人们拼命地想依靠这个共同体，以至于日本式的雇佣制度濒临危机。

作为"家"的公司是抛弃了一切"缘分"的日本男人们的最后一个安身之处。

妈妈党的交际圈

那么，对不拥有"公司"这种共同体的家庭主妇们来说，她们是如何创建寄身之所的呢？

日本人的人际关系依赖于“场”，因此，女性结婚建立家庭后，就切断了此前的所有的人际关系。日本现在结婚后仍在工作的女性不断增加的原因在于专职家庭主妇太孤独了。

然而，当小孩出生后，她们的生活就会发生巨大变化。从“现身公园”后，以孩子为中心的母亲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交际圈，这就是所谓的“妈妈党”。直至她们的孩子中学毕业，她们的交际一直延续着并成为她们生活的中心。

有人认为，在日本，有孩子的主妇就业率低的原因在于，有一种不工作而能够获得利益的制度，即免除国民年金保险费的第三号被保险者制度等。当然，这种制度极大地影响着主妇们的就业意愿，但如果她们作为正式职员全职工作的话，就会比从事临时工收入更多，即最多可以获得“不需要负担社会保险金的130万日元”，其家庭生活会富裕许多。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专职主妇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但现在美国已经完全转变为以夫妇共同工作为前提的社会了。两个人工作比一个人挣钱的生活要轻松许多，因此，从经济合理性的角度考量，这个变化非常自然。然而，在日本，尽管幼儿保育设施等环境已得到了很大改善，有孩子的女性却很少想出去工作。

这可能是因为一个人不能够同时属于两个共同体的缘故。她们已经成为“家”——妈妈党交际圈——中的一员，全职工作意味着她们抛弃这个“家”而转入公司这个新“家”。

不过，对大多数的母亲们来说，这并非是极具诱惑力的选择。因为公司这个“家”是将孩子排除在外的，这样的话，即使家庭生活略有拮据，但可以与孩子一道进行交流，当然，她们认为这

种生活更加舒适惬意。

由此，丈夫隶属于公司的交际圈，妻子和孩子则隶属于妈妈竞的交际圈，日本式的两个家庭同居的状态就形成了。这两个交际圈不会混合，在日本绝大多数的工薪家庭中，丈夫和妻子（孩子）各自走着毫不相干的人生道路。

日本人的命运

马尼拉郊外的克拉克美国空军基地附近有一条叫作“天使”的娱乐街，这里的“歌歌吧”（妓院）一家挨着一家。因此，这里给人以“红灯区”的印象，其实过去这里是军官宿舍，经过重新开发，这里成为菲律宾屈指可数的高级住宅区。

富人们之所以钟情于这个地区，是因为这里距离克拉克国际机场近，可以避开马尼拉严重的交通拥堵。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马来西亚等地的飞机直接可以飞到这里，从马尼拉机场也可以乘坐直升飞机抵达克拉克。

2010 年夏天，我曾采访过移居菲律宾的上了年纪的人。其中有一对叫作滨田的夫妻俩居住在天使街，半年前左右，他们搬到这里，与儿子们一道生活。这对夫妇年近八旬，他们将日本的不动产全部处理掉，打算就此埋骨于菲律宾。

在菲律宾生活的日本人大都拥有复杂的过去，至少滨田就是战后日本典型的成功人士。他曾就职于一家著名汽车制造厂，担任过关东北部地区的经销商总经理，退休以后，自己创业，获得大量的资产和年金，足够夫妇俩度过晚年。

滨田家的长子曾结过一次婚，离婚后又与一位菲律宾女子结

婚，现在在马尼拉从事不动产等商业活动。他的两个儿子曾一度寄居在日本的父母家，会说日语，且与爷爷奶奶很亲。即便如此，滨田夫妇俩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到国外去生活。

促使夫妇俩改变想法的动因是老爷子心脏病发作，卧床不起。急剧变化的气温会加大心脏的负担，经过心脏搭桥手术后，夫妇俩移居菲律宾。一年之中，这里温差很小，许多人都移居这里。

当他们开始认真考虑“抛弃”日本时，滨田意识到：“其实在哪里居住都是一样的。”

滨田说：“我还是上班族的时候，也有几个朋友，我们每天都要在外面喝上一杯，星期天则去打高尔夫球，我们相约道：‘我们一生都做朋友吧。’但我从公司辞职 10 年后，大家变成了只是每年寄封贺年卡而已的关系。话虽然这么说，到了我这个年纪，哪里还能够交上新朋友呢。”

滨田不再工作以后，在房总半岛建了个新居，还租借了一块田地。这里是别墅区，周边居住的都是与滨田一样上了年纪的夫妇，他们要在这里度过富裕的第二春。不过，他们之间只是表面上的往来。滨田的邻居是一个单身男性，性格有点儿孤僻，滨田也只是与这位老人能够推心置腹地交谈。但在滨田心脏病发作病倒之前，有人发现他死于家中。

于是，滨田就没有一个能够称得上是“朋友”的人了。因此，他认为“无论哪里都一样”。

滨田夫妇俩现在居住在一个豪宅里，有 5 间卧室，家里住着 3 个佣人，儿子、儿媳和孙子都生活在一起。他的心脏病完全治愈，从日本带来的大量的药物也不需要服用了。

从滨田的角度看，菲律宾社会充满了令人焦虑的事情。这里的自然景色美丽，人们的性格温顺，如果政治能够更像样的话，菲律宾的社会会更加富裕。滨田想：在我有生之年要为这个国家做出点儿贡献。对滨田来说，日本已成为遥远的异国他乡。

在日本，人际关系源于“场”，如果失去“场”的话，人们只能够回到孤独。

从本质上说，日本是一个“无缘的社会”，“孤独死”的增加是由于社会不断老龄化。最近，“社会的无缘化”倾向不断加剧，这并非由全球资本主义和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的经济不景气引起的。

这就是日本人的命运，说不清是好还是坏。

小结（4）

- 英格尔哈特的价值地图

  日本人的“世俗指数”非常高

- 世界价值观调查

  日本人：即便辜负了家人和朋友的期望也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 日本人从万叶时代开始就只认可世俗的价值

  ▼

- 日本的社会是由“空气”（社会）和“水”（世俗）构成的

- 摈弃地缘、血缘关系的日本人

  “一人一个家庭”的特殊文化（单身赴任、一居室公寓）

- 在偶然相遇的地方构建共同体（“家”）▶学校、公司、妈妈党

  “无缘社会”是日本人的命运

PART 2

GLOBAL

9　全球主义是乌托邦思想

历史社会学家小熊英二①在《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一书中介绍了明治时代初期展开的"内地杂居论争"。这场论争涉及明治政府发誓要修改的不平等条约，所谓"内地杂居"是指取消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在横滨等地的居住地，外国人可以自由地在国内居住、获得土地，这是一种"开国"政策。

西方各国采取的立场是："修改条约应以取消居住地为前提。"对此，保守派认为："自由化会毁灭日本的民族资本，日本人将成为欧美企业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强硬地表示反对"开国"。

日本人是"劣等人种"

小熊将"开国"与"锁国"之间的论争比喻成田口卯吉②和

① 小熊英二（1962～　），日本社会学家，著有《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的自画像的谱系》《"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民族主义与公共性》等。——译者注

② 田口卯吉（1855～1905），日本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著有《日本开化小史》《日本开化之性质》等。——译者注

井上哲次郎[1]这两个人物。

田口从大藏省离职后，曾主持《东京经济杂志》，是一位年少气盛的知识分子。他提倡英国式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当时，曾与福泽谕吉齐名，获得极高的评价。另一位人物井上哲次郎从东京大学哲学科毕业后，于27岁上成为东京大学哲学科的副教授，德国留学回国后，升任教授，是一位超级精英。

田口写于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的论文中曾认为日本将成为像美国那样的自由主义经济国家，他写道：

> 吾辈希望外国人民自由地杂居于我国内地，希望我国人口增加，物产丰盛，犹如美利坚合众国那样，对此绝不感到恐惧。只是吾辈应对以下之事感到忧患，即随着贸易额的增加，外国人居住地会扩张，逐渐蚕食我国内地，其人民团结在一起，最终会觊觎我国之政权，犹如东印度那样。[2]

我们并不惧怕外国人在日本国内自由生活以及从事买卖活动，我们只是担心外国人居住地的扩大，以及他们会团结起来使得日本的政治出现不安定因素……

田口在正确地理解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上论述了只有自由市场经济才能够使国家富强起来，将外国人隔离起来的做法只会走向殖民地化的道路。我们必须说，这在当时是颇具慧眼的看法，令人诧异。

---

① 井上哲次郎（1856－1944），日本哲学家，著有《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等。——译者注

② 转引自小熊英二，《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自画像的谱系》（新曜社）。以下的叙述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井上则援引当时欧洲最前沿的思想——社会进化论——对内地杂居（开国）的危险性加以阐述。（社会进化论是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扩展到社会学领域，认为国家、人种在进行着优胜劣败的“进化竞争”。）

井上是保守派的爱国者（国家主义者），他认为：“日本人无论是在智识方面、金钱方面、体格方面，抑或是在其他诸般的方面，大多劣于西方人，因此，在竞争上常常败北，这是必然的趋势”。他指出：内地杂居（开国）犹如让“羸弱之童子”与“壮士格斗”。井上是日本人乃“劣等人种”论者，因此，他对日本人不加以保护就会灭绝的情况感到忧虑。

对此论调，田口反驳道：在日本历史上，中国、朝鲜半岛的许多人来到日本，这些渡来人（外国人）都被同化了，因此，没有必要对内地杂居一事感到恐惧。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我日本人种无论在技艺方面、学术方面，还是在工业、农业方面绝没有惧怕雅利安人的理由”。他举大英帝国为例，高声讴歌道：“我日本人种最宜采用之策略乃在于积极进取地使我人种蔓延全世界”，作为“优等人种”的日本人应通过开国向海外进发。

像这样，围绕着“开国”，两人展开了论争。如果从现代的立场来看，田口的先见性十分显著。

然而，这场论争的发展令人惊诧。

与将日本人看作“劣等人种”的井上的预料相反，日本的国力急剧高涨，日清战争①、日俄战争的胜利使得日本占据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一席位置，日本将台湾殖民地化，最终吞并了朝鲜。

① 即中日甲午战争。——译者注

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转折点上，作为国家主义者的井上开始"转向"于"日鲜同祖论"，他认为，日本人与朝鲜人原本就是同一个民族，因此日本吞并朝鲜等同于回归故乡。（正如小熊指出的那样，在当时，这是保守派普遍的看法。）这个观点反映了一种典型的人的心理，即从自虐（劣等人种）向极端的自尊（优等人种）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观点十分通俗易懂。

那么，当初提倡向海外进发的井上的论敌田口在自己"预言"言中的情况下又是如何提出自己的观点的呢？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明治维新刚刚过去十余年，很好地理解了现代经济学真髓的超级精英们竟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日本人的祖先是白人。"

田口了解到当时在欧美甚嚣尘上的黄祸论，与此同时，他提出这样的观点："天孙[①]人种（日本人的祖先）"是白色人种，他们与（日本列岛的原住民）虾夷人和隼人混血后变成了黄色，因此，"应对黄种人的恶言恶语加以排斥"。进而，他在一个题为"日本人种之研究"的演讲中甚至这样说道："日本人没有必要承认自己是黄色人种。……我以为，最好是这样加以说明，即日本人实际上是高贵之人的私生子。"

这种令人瞠目的观点将这样一种苦涩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即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纠结于对西方的深深的劣等意识之中。

因无能为力而变得富裕

从明治维新直至今天，日本人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与未知的

① 天照大神的孙子琼琼杵尊。——译者注

"全球化"的遭逢。"外国"常常是侵蚀日本社会中最重要东西（文化、传统）的威胁，同时，它又是将人们从社会的羁绊（社会闭塞感）中解放出来的福音。"全球主义"有时会被当作"帝国主义"、"市场原理主义"而遭到回避，有时它又作为"自由"、"进步"的象征受到崇拜。

全球主义中大致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上的全球主义（自由贸易），一个是政治上的全球主义（美国主义）。在这里我主要想就后一个全球主义进行探讨，在此之前我想确认一下这样一个大原则，即"自由贸易可以使整个社会变得富裕起来"。这个问题本来十分简单，但最近提倡"自由贸易会毁灭世界"的人逐渐增多。

所谓贸易是指国与国之间的交易，而交易则是指物与物（或货币）的交换，而交换则是分工。我们的话题先从这里开始。

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富裕起来，是因为我们构筑了一个高度的分工体系。在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里生活的人们与在欧美、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生活的人们在能力方面几乎没有差异，然而，在生活的富裕程度方面却有着天壤之别。这是因为现代人的分工越来越细，达到单独一个人什么也做不了的地步。

我们居住在舒适的家中，根据季节换服装，品尝山珍海味，在这里面，我们独自能够获得的东西屈指可数。在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里，人因无能为力而变得富裕起来。

如果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人与现代人相遇的话，他们一定会嘲笑我们的无能（甚至连引火的方法都不知晓）。同时，也会对我们拥有汽车、飞机等工具而感到不可思议。

我们之所以一无所能，是因为我们生活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依赖于他人的。而正由于此，文明有了极大的进步。尽管如此，并非说人类的祖先的所作所为就很复杂。我们将不擅长的事情交给别人，自己只把精力放在擅长的领域，不足的地方就需要交换。

居住在山里的猎人如果想要吃到烤肉和生鱼片，他必须花上一天的时间步行到海边，然后造船，钓鱼。不过，一般情况下，他不必那么麻烦，他可以先找到住在海边的人，拿自己手里的野猪肉与他交换新鲜的鱼。“捕获野猪”与“钓鱼”这两件事分别由各自擅长的人来做，通过物品的交换，他就能够实现过上富裕生活的愿望，这较之于自给自足的生活要快捷得多。

亚当·斯密最伟大的发现就是：“富裕的秘密在于分工”。野猪与鱼的交换可以扩展到除此之外的更多方面，因而，人类不仅可以向月球发射火箭，而且还可以用互联网将整个地球覆盖起来。*

*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说明分工所带来的负面问题。

分工越发展，经济越发达，人们就越不安，社会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不稳定。每个个人一无所能是社会走向富裕的条件，如果这么思考的话，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安定与成长是无法共存的。

我们之所以为自然风光以及田园生活所吸引，是因为我们想通过自己的手获取一切，而这些是我们得以“生存下去的必需品（如粮食的生产等）”。这在心理上给我们以极大的安心，然而，现实情况是，“环保的生活”是以高度的市场经济为前提得以形成的。任何人如果想要取消分工，那人类只能回到狩猎采集的旧石器时代了。

绝对优势与相对优势

在市场经济中，作为劳动的价值，我们获得工资报酬。如果我们将它视为一种投资的话，那么，我们就将劳动力这种“人力资本”投入到劳动市场中去，由此而获得生活的补助。

在自给自足的生活里，能够动用的人的资本只限于自己“资本金”的范围。而在市场经济中，人们通过分工（交换）而可以获得比人的资本多若干倍的财富（物品）。也就是说，分工是插入人力资本的一个杠杆（杠杆原理）。（相对优势）

整个社会的分工越细致以及插入人力资本的杠杆的力量越大，人们的生活就越富裕。这样一来，人类为了过得更加富裕，就越需要将分工细化。这是经济学的根本原理。

这个话题其实并不复杂。我们极其自然地享受着分工带来的好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人们之所以要在公司或工厂劳动，是因为我们可以将更大的杠杆力放入人力资本中。在私人经营者那里，从原材料的采购、商品的出售一直到年终决算、纳税等所有的事务都必须由自己一人来承担。与此相反，工薪族可以将自己承担工作之外的事务委托给其他部门（分工），就可以提高效率，较之于私人经营者，他们还可以获得较高的报酬。

于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国际化，而工薪族的工作也越来越细化。**

** 不过，这并非说工薪族永远都比私人经营者有利。日本企业最典型的问题在于，企业的巨大化，使得分工无法很好地

细化，效率低下。另一方面，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即便某个个人不属于一个企业，却也可以给人力资本提供较大的杠杆力。

我们将分工高度细化的程度称作“生产率”。由于传统社会里的分工不发达，生产率低下，因而人们只能在某个单独的人力资本的范围内生活。而在分工高度细化的社会里，由于生产率高，通过加大人力资本的杠杆力，就可以实现生活的富裕。由此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想消除世界上的贫困，必须提高社会的生产率（即分工更加细化），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有效的方法。

对分工的本质加以阐明的是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他将这个本质定义为“相对优势的交换”。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多次写到过，这不仅仅是经济学上的发现，也是人类发现的最重要的原理之一。因而，我再一次对此加以阐述。

人的能力中有绝对优势（绝对劣势）和相对优势（相对劣势）之分。

“天才君”从孩提时代起就被称作神童，后来他成为镇里最好的律师，同时又是最好的打字员。“阿静”梦想有一天能成为歌手，但后来她放弃了这个梦想，开始学习打字。***

*** 采自拙著《在残酷的世界里生存下来的唯一方法》。我在阐述相对优势时常常会提及“天才君”和“阿静”，这是因为我想不出更加通俗易懂的例子来。已经读过这本书的人可以跳过这一部分。

无论在法律方面，还是在打字方面，“天才君”都绝对超过“阿静”（处于绝对优势），但他雇用了“阿静”当他的秘书。关

于其理由，李嘉图作了以下的说明。

如果从法律的层面比较两人的能力的话，“天才君”比“阿静”要高出一百倍。但从打字的层面说，“天才君”只比“阿静”快两倍而已。此时，对“天才君”来说，法律上的事务处于“相对优势”，而打字的工作则处于“相对劣势”。

另一方面，不管在法律知识方面，还是在打字的技巧方面，“阿静”都比“天才君”差（处于绝对劣势），在法律方面，“阿静”虽然连“天才君”的1%的水平都达不到，但在打字方面，她却能够达到“天才君”的50%的水平。对“阿静”来说，法律方面的工作处于“相对劣势”，而在打字方面则处于“相对优势”。

此时，“天才君”与其一个人既要做诉讼工作，又要做打字工作，还不如将处于相对劣势的打字工作让“阿静”做，自己则集中精力去做处于相对优势的法律工作，这样能够提高利益。“天才君”将工作细分，即便“阿静”在各个方面都不如“天才君”，但她可以以处于相对优势的打字工作赚取生活费。

由此，李嘉图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便不是最好（绝对优势），但通过交换相对优势，任何人在市场经济中都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

自由贸易的乌托邦

所谓分工就是交换相对优势，由此，人力资本受到杠杆力的作用，社会的生产率得以提高。因此，分工比不分要好，通过以上的说明，大多数人或许会同意这一点。

所谓贸易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分工（国际分工）。如果分工是一

件好事的话，毫无疑问，贸易也一定是好事。然而，不仅在日本，世界各地有许多人对这个极其简单的理论却加以否定。

拒绝自由贸易的人认为，应通过高关税保护国内的产业（就像农业那样）。但是，如果高关税是一件有利的做法的话，那么，（例如）静冈县为了保护本县的橘子产业就应该对和歌山县生产的橘子课以高关税。

这并非玩笑话，在日本，直至江户时代，在关所[1]管理商品的流通，各藩对这些商品课以关税。进入明治时代之后，在各藩的交界处课税的情况才被废止，国内市场才完全自由化了。

如果否定自由贸易的人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不仅仅在国与国之间，而且在都道府县以及市区町村之间课以关税，肯定会使我们的生活比现在富裕得多。当然，我估计没有人会郑重其事地提出这样的谬论。这是因为所有的日本人都实际感受到国内市场自由化所带来的恩惠，他们知道，如果对此加以限制的话，就会给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内的分工比江户时代要容易得多。人们的移动也变得自由起来，东京、大阪一旦建立了工厂，劳动者就会从各地蜂拥而至。如果没有这样的“市场开放”的话，现代化、经济成长都是画饼充饥。

从分工的性质上说，分工的规模越大效率越高。较之于村与村之间的小小的交易，在国内市场中，所有商品都可以流通，我们的生活变得无比地富裕。将这种自由化扩展到世界范围，那么

---

① 设置在两国边境处的关卡，对通过此处的人、物等进行检查。江户时代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的目的而设置的。——译者注

世界上就不会再有贫困了。

经济学为我们人类揭示了一个理想社会。这不仅仅局限于商品、服务层面，而是所有的人可以自由地移居到任何地方，可以在世界各地生活的一个社会。只有这种“全球化”的市场形成了，分工的威力才能够高度发挥，我们的人力资本才会扩大到极限，人类社会才能够达到富裕的顶峰。

全球主义其实是一种乌托邦思想。

看守与囚犯

倘若自由贸易是通向乌托邦的道路，那么，对此加以否定的“锁国”论就是完全错误的。从理论上讲，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但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这里所说的“自由贸易”与乌托邦思想中的自由贸易似是而非。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产生的原因在于现代世界是由各个主权国家构成的。

成吉思汗征服世界之后，如果资本主义与自由经济兴起的话，人类也许会从世界政府开始书写近代史。但现实情况是，具有“主权”这种神圣权力的国家管理着国土与国民，它是排他性的，近代就是在这样的约定俗成中形成的。而且直至现在，我们都无法从这个框架（范式）中解脱出来。

单一的世界政府出现，国家成为地方自治体，不只是金钱与物品，人也可以跨越国境自由地移动，只有这样，本来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才成为可能。在这种“高效率的市场”里，亚洲、中南美洲、东欧以及非洲的穷人们通过寻找工作，开始向富裕的国家移动，因此绝对的贫困、饥饿就不会集中在某个特定的地域。

为什么像这样的全球化市场不会出现呢？无须赘言，这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富裕的国家紧闭大门，严格限制移民的缘故。发达国家不接受来自贫穷国家的人理由可以举出许多，如维持治安、保证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稳定等，但发达国家最害怕的是，其福利社会会遭到破坏。

倘若世界上有平均工资水平以下的国民获得丰厚的生活保障这样的国家的话，那么这个国家也绝不会允许毫无限制地移民以及自由地获得公民权。如果允许的话，世界上的贫民可能会立刻蜂拥而至，而这个国家的财政会走向破产。当然，具有既得利益的国民会向政府提出排斥移民的要求，就像组成极右政党的新纳粹分子那样。这也是欧洲各国——它们是“福利国家”的典范——为极右势力抬头感到头疼的原因，而对福利不大关心的美国就不会出现极右的政党。所谓的福利国家其实就是国家歧视的别名。

如此看来，富裕的国家希望将贫穷国家的人们监禁在贫穷的领地里。

贫穷国家之所以多是独裁国家，是因为富裕国家的政府和国民不希望贫穷的人们越过国境进入他们的领土，他们认为这些贫穷国家必须有一个强权的政府，而这个政府可以强行地阻止人们的流动。对贫穷国家的经济援助的绝大部分都作为贿赂进入了有权势的人的腰包，如果将这比喻成是发放给监狱看守者的报酬的话，那么发达国家的资金原本就根本不可能分配给“囚犯”。

在严格限制人员流动国家中进行的国际贸易表现为对第三世界国家（过去一度曾称为“落后国家”）的掠夺，从这个意义上

说，“自由贸易是对发达国家一方有利的歧视性体系”这种批评是正确的。（尽管如此，几乎没有人提倡应该对移民开放国境，让似是而非的自由贸易转变成为真正的自由贸易。）

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市场的全球化使得在南北问题上显得比较僵硬的结构开始慢慢发生变化。因为世界上出现了这样的企业，即通过将在人工费廉价的国家制造出的商品销售到物价高的国家的形式而获取利益，正如迅销公司（优衣库）所做的那样。

只要世界上存在价格差，利用这种差异获取利益的企业家就会出现。虽然人员的流动受到限制，但贸易却走向“自由化”。

当然，这并非说现在的市场体系就非常完善了，没有任何瑕疵。世界是由不同的主权国家分别治理的，无论哪个国家都会以本国的利益为重而从事贸易活动。因此，毫无限制地使市场自由化只会引起社会性动乱——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根据。

自由贸易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的原因在于“歪曲了的全球主义”，它被国家这个框架束缚住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停止似是而非的自由贸易，返回到保护主义就可以了。

人类的历史发展到现在并没有实现无国境的“全面的自由贸易”。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富裕，是因为片面的自由贸易也充分发挥了其功能。（其实，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就是以国家为前提的。）

所谓保护主义就是降低分工的程度，锁国只能形成贫穷的社会，如朝鲜那样。因此，在有限的条件中尽可能地发挥似是而非的自由贸易的功能这种努力绝非徒劳。

市场原理主义与美国主义

自幕末[1]以来，日本对究竟是“锁国”还是“开国”一直争论不休。进入明治时代，爱国主义的“锁国派”的观点认为：日本人是劣等人种，轻易地打开国门的话就会成为欧美人的奴隶。TPP[2]（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是现代版的“内地杂居论争”，“锁国派”极力主张“日本的农业是‘劣等产业’，加入TPP的话，就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所谓“没有竞争力”是“劣等产业”的另一种说法，从“政治上讲是正确的说法”。）

“锁国派”的一大特色是爱国的政治宣传：“这些家伙是来扰乱我们领地的”。例如下面一些观点：

> 离岛的甘蔗田会消失，人们也无法居住了。为了保卫领土，请不要加入TPP。（JA冲绳中央会）
>
> 一旦加入TPP，水产省承担的监视国土地域的功能就会衰退。（全国渔业协同工会联合会）

为保卫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以“爱国”为工具，将TPP的经济政策问题转化为情感性的论战。利用“领地”感情是一种强有力的宣传，不仅仅在日本，在世界各地（美国、欧洲也是如此）不管哪个时代都在这么做。

不过，我们看一下近代史就可以明白，“锁国派”常常处于劣

---

① 即江户时代末期，一般指1853年佩里率领黑船抵达日本后的一段时间。——译者注

② 即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缩写。——译者注

劳。这是[illegible]的富裕，有可能的话希望生活得更富裕一些。不管出于哪种政治上的考量，也不管在道德上是善是恶，我们的这种欲望需要超越国境的交易，加速了全球化的程度。

自由贸易扩大了市场，增加了财富的总量，只要给被夺走既得利益的人们分一杯羹就可以了，这是经济学上的最佳解决方案，但“锁国派”对这种效率性的观点置若罔闻。

自由贸易之所以能够引起情感上的对立，是因为人们将它当作“正义”的问题——即全球性的正义与地方性的正义之间的冲突。一般情况下，这种全球性的正义被称作“美国主义”（Americanism）。以上所说围绕自由贸易的论争最终变成了无休止的“亲美”和“反美”的对骂。

经济上的全球主义是关于全球化这个现实的理论。我们可以否定意识形态（某个主义），但我们无法否定现实。

据说波尔布特时代，柬埔寨有150万人失去生命，占柬埔寨人口的20%；独裁者高举远大理想的大旗，压制“想富裕起来”的人们的欲望，意欲从“道德上”矫正国民，这种残酷和恐怖被写入人类的历史。现在由于全球化而被夺去既得利益的人们也只是训诫“市场原理”的过剩，而无法否定市场经济本身。（当然，如果他们有一丁点儿智慧的话。）

因此，对经济上的全球主义（市场原理主义）的批判试图与对政治上的全球主义（美国主义）批判联系起来延续下去。

“美国想要侵犯我们的领地。”

反对TPP的“锁国派”的观点可以用这一句话加以总结。

话说回来，"美国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

探寻它的旅程要从古希腊、远东开始。美国这个奇特的国家所信奉的奇妙的思想就是从那里诞生的。****

****"全球主义"（globalism）原本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宇宙飞船地球号），它是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从国家的范围看世界。"全球主义者"（globalist）是指十分热衷于保护地球环境以及消除南北问题的自由派。此外，全球化是指世界市场网络化的"现实"。

日本论坛常常出现的"全球主义"是将全球化的现实意识形态化了，它是日本人创造的英语，这个词语中包含有这样一种信条："全球化的背后一定蕴含着某种阴谋。"毫无疑问，在欧美也有这样的对全球化的批判，但一般情况下，他们使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原理主义"的说法。

10 公元前的全球主义

地中海是由5个半岛（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安纳托利亚半岛、北非以及伊比利亚半岛）包围着的“海的复合体”。

古代文明的中心是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以及爱琴海中的众多岛屿。从爱琴海往东，经博斯普鲁斯海峡可以抵达黑海及安纳托利亚半岛（今天的土耳其）北岸，往西可以到达被亚平宁半岛南部的爱奥尼亚海、西西里岛以及撒丁岛围起来的第勒尼安海。往南是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北非沿岸，在古代，这些地区的文明发达，现在许多遗迹被发掘出来。

地中海沿岸的夏天降雨量极少，适合种植的作物只有橄榄、葡萄等。粮食必须依靠从其他地区“进口”，因此，这些地区很早就频繁地进行交易。[1]

在爱琴海一带以及波斯和埃及之间的地中海东岸（美索不达

---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1：环境的作用》（藤原书店）。

米亚）是一片被分割了的地区，地形比较复杂，这里熙熙攘攘地生活着从事农耕、游牧以及交易的各种民族的人们，犹如电影《星球大战》（*Star Wars*）中出现的宇宙尽头的酒馆一般，他们信奉不同的神，诸多民族共同生活在这里，语言、习俗各不相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全球空间”。

《星球大战》里的酒馆是有规章的，在这个“全球空间”里也有最低限度的规定，语言、宗教、肤色各不相同（当然他们的利害关系也各不一样）的人们必须遵守这个规定。这就是“全球性标准”。

在全球空间里为什么必须有一个标准（基准）呢？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标准的话，他们只能互相残杀。无疑，任何民族只要有机可乘，一定会谋划侵略对方的土地，把他们的“敌人”统统杀光。然而，鲁莽的战争肯定会增加弱化自身、反被其他“敌人”侵略的危险性。因此，少数民族之间不会轻易地发动战争。

在这个全球空间里诞生了两个改变人类历史的“革新”。

一个是古希腊的逻辑（逻各斯），另一个是公元前后在巴勒斯坦诞生的基督教。

古希腊的民主政治

古希腊以巴尔干半岛南部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为中心，从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北非一直到黑海沿岸，形成了一个广阔的海洋文明。但是，由于这里的地形复杂，并没有产生统一整个希腊的大国。各个地区形成叫作城邦的小国家，互相争夺霸权。

公元前5世纪，雅典在希波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时候，一种独立

的政治制度——由自由民组成的民主政治——得以形成。* 所谓自由民是指拥有奴隶的特权阶层的男性，他们在获得参政权的同时还承担着服兵役的义务，民主政治也是小国为与大国作战而形成的"全民皆兵"的一种结构。

* 民主政治（democracy）不是"主义"（ism），而是与神权政治（theocracy）、贵族政治（aristocracy）相同的政治制度的名称，因此"民主主义"是一种误译。最近，在日本的政治学、历史学界，人们把它译作"民主政治"、"民主制"，一般情况下用片假名来书写，但教材、媒体现在仍然广泛地使用着误译。

政治家在公众面前展开论战，通过投票，以多数票来决定政治上的判断，这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这种以辩论（逻辑）和多数票来决定政治判断的方法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政治"行为，这在古希腊以外的任何古代文明中都找不到。

如前所述，统治农耕社会的原理是"全体一致"，在受到土地约束、人们无从摆脱土地的社会里，除了这种决定政治判断的方法之外，别无他法。

相反，古希腊是全球性的交易社会，人们并不仅仅依赖于农业而生存，如果有人对多数票所作的决定感到不服的话，可以离开城邦，这个自由是得到保障的。

柏拉图在《克力同》（*Crito*）一书中对雅典法作过以下的阐述：

他（自由民的孩子）成为一个市民，当他观察国情以及我们的法律的时候，万一有不合他意愿的地方，这时，他可

以带上他的全部财产去他想去的地方，这是被允许的。①

《克力同》叙述了苏格拉底的好友克力同拜访马上就要被执行死刑的苏格拉底，想说服他越狱逃离雅典的故事。苏格拉底拒绝了克力同的建议，饮下毒酒。苏格拉底如果想逃跑的话，是随时可以免除死刑的，这个故事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叙述的。

苏格拉底被认为是诡辩家，受到不信神、迷惑青年人的谴责，他在公众面前接受裁判。正如他在著名的“辩解”中所说的那样：雅典的法官们（用抓阄的方式选出的自由民）一开始是想将他流放异邦的。但苏格拉底被判有罪后，仍不认罪，而且他还愚弄法官们，因此被判死刑。

尽管如此，就像克力同所恳求的那样，狱中的苏格拉底是有多种活下去的方法的。克力同买通看守，得以见到苏格拉底。克力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用钱将好友从狱中解救出来，并让他逃往其他城邦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如果自己不那么去做的话，雅典的人们肯定会嘲笑自己十分“卑劣”、“胆怯”，克力同对此感到很害怕。

克力同试图说服好友，说许多城邦十分欢迎苏格拉底的“流亡”，他甚至跟苏格拉底说，你如果去塞萨利亚的话，那里有我的朋友，“那里不会有任何人让你产生不愉快的想法”。（即便被判死刑，谁也不会认为苏格拉底会真的死去，这在当时是个共识。尽管如此，苏格拉底还是将毒酒一饮而尽，他就是想让人们大吃一惊，自己名垂千古。）

---

①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岩波文库）。

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是一种政治、军事制度，它的目的是要"富国强兵"，在参加和退出都很自由的开放的社会里，共同体的成员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国家和神祇表忠诚。这种社会结构只有在地中海这个特殊的地区才能够产生，在不可能退出的农耕社会里未能出现民主政治和雄辩术是理所应当的。

犹太人发明的绝对神

古代的中东地区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我们读一下《圣经·旧约》里描写的犹太民族的历史就会明白了。

犹太民族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被迫离开故乡，流浪到迦南地区（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他们最早是以流浪者的身份出现在历史上的。此后，他们在埃及做法老的奴隶。公元前13世纪左右，在摩西的率领下，逃出埃及，重返迦南的土地。大卫王和所罗门王时代（公元前900年前后），犹太民族达到鼎盛时期，然而，不久，这个与神签订了契约的王国为新巴比伦所灭，许多人沦为巴比伦之囚。

"巴比伦之囚"持续了大约60年的时间，公元前539年，波斯王朝灭掉新巴比伦，将犹太人从奴隶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此间，犹太人创建了一个崭新的、奇特的宗教。

犹太民族的历史充满了苦难，在古代中东地区，这种情况并不罕见。除了犹太人之外，其他诸多的民族都曾居住在这里，它们的命运都一样，极具悲剧色彩。这些民族的历史之所以没有流传下来，是由于几乎所有的民族被大国征服后，或者被斩尽杀绝，或者被其他民族同化，彻底消失。

在这些民族当中，只有犹太民族始终守护着自己的神灵，将他们的历史用文字记录了下来。这是因为他们发明了一个"绝对神"。

古代的神灵是祖先的灵魂与万物有灵论相结合的产物，不同的民族都具有各自固定的神和神话。（拥有共同的神与神话的集团就是民族。）信奉不同神的民族之间会发生争执，神与神之间也不会相互交融。

然而，在"神与神之间的争斗"中，少数民族犹太人的神是无法与埃及、巴比伦、波斯等大国的神相抗衡的。于是，犹太人创造出（发现了出现在犹太民族面前的）一个超越所有地方神的绝对神。

绝对神既然选择了犹太民族，那么作为"选民"的他们就绝不会被其他民族、宗教所"同化"。这也就是流浪的少数民族犹太人要保护自己的神与文化的原因所在。

犹太教的神既是绝对神，同时又是犹太民族的保护神，因为只有犹太民族与神签订了契约，如此看来，犹太民族的神也是地方神。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树立神的权威，经典的教义被改写，于是出现了耶稣基督。这个革新使得全球性的宗教诞生，这个新宗教信仰的是"（超越民族的）天下所有人的神"。①

基督教经历了无数次的排斥与压迫，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不过，当我们了解到罗马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话，应该说基督教成为其国教是历史的必然。

① 桥爪大三郎、大泽真幸，《不可思议的基督教》（讲谈社现代新书）。

神灵是一个民族固有的，是在与其他的神相互厮杀中被确定下来的，因此如果在统治地区里强行地让人们信奉自己的地方神，只会引起社会的动荡。统治诸多民族的罗马的神必须是一个超越了民族的全球性的神。当时，信奉这种神灵的只有基督教徒。

直至今天，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的宗教只有两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穆罕默德获得新的预言后对《圣经》重新加以解释形成的。佛教曾想通过"法治"、儒教曾想通过"人治"超越身份和民族的壁垒，但它们并非以"神"来统治世界。（它们都与地方神合为一体，在各地被"宗教化"了。）

地中海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全球化空间），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里，这里诞生了两次改革，史无前例地给人类的历史带来"逻辑"和"绝对神"这两个"全球性标准"。

此后大约又过了1600年左右，在绝对王政末期的欧洲，以希腊文明（希腊精神）与基督教（希伯来精神）为支柱，又发生了一次巨大的改革。这就是近代的起源。

近代的改革

由于大航海时代新大陆的发现，地球成为一体。首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紧接着是英国和法国，这些国家的人将非洲的黑人运往加勒比的岛屿上做奴隶。加勒比种植园里生产出来的砂糖、烟草、棉花被出口到欧洲，而欧洲生产的枪支、棉织品则由非洲的奴隶们购买，这种三角贸易由此大规模地展开。由于世界市场的网络化（全球化），在欧洲各国，通过交易积聚了力量的贵族和

工商业者开始与绝对君王（主权拥有者）——国王——的权力相对立。①

中世纪的身份制度和行会制度［基尔特（Guild）］是对正在兴起的富裕阶层（商人）的一种束缚。他们认为有必要实行新的社会秩序并使其正当化，于是启蒙思想就应运而生了。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近代，可以说是这是一个将理性（逻辑）置于绝对神所处位置上的时代（理神论）。不过，理神论并不否定神的存在（无神论）。

近代物理学之父艾萨克·牛顿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非常热衷于炼金术，这为人们所熟知。对他来说，古典力学的各种原理与基督教教义并不矛盾，而是显示了神的伟大。在牛顿那里（在许多的启蒙思想家那里也一样），所谓神，是至高无上的理性，因此，世界是由简单且美好的逻辑（诸如力学原理）构成的，发现这个原理实际上就是向神的教义更接近了一步。

毫无疑问，当时，他们认为这种"神的原理"也贯彻于人类社会之中。因此，他们有了"发现"。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发现"了"平等"，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则"发现"了"私人所有权"，即"自由"。"

** 为什么私人所有权会与"自由"联系在一起，或许要略加说明。近代之前，所有权的概念十分模糊，处于劣势的人，其家畜等资产被没收，其土地被强行收去，却无处哭诉。然而，洛克所说的近代意义上的私人所有权则是"神的规定"，即使国王也无权将

① 川北稔，《砂糖的世界史》（岩波少年新书）。

人民的一寸土地化为私有。由此，人们可以按照喜好处理自己的所有财产，或借与他人，或出售，于是便产生了“自由”。

为了与绝对君王——其绝对的权力（主权）是由神赋予的——相对抗，贵族、商人提出了由议会构成的民主制，这是他们从古希腊的政治制度中援引过来的。

在英国首先出现了国王与贵族院（上院）之间围绕课税问题的对立。在与殖民地的交易中形成的中产阶级——他们被称作乡绅（gentry）——势力增强后，政治权力开始从贵族统治的上院向由中产阶级组成的下院转移；最终王权成为一种仪礼，君主立宪制开始出现。法国大革命更加过激，国王不仅被送上断头台，而且体现了自由、平等的市民成为主权拥有者，“国民国家”——这是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按照所有人的意愿）创建的一种政治上的共同体——也因此诞生。

国民国家将“自由”、“平等”作为神的规定，其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其狂热的传道者（传达福音的人）就是拿破仑将军。他征用血气方刚的法国男子入伍，组成国民军（常备军），高举“自由、平等、友爱”的三色旗，为传播“神”的福音，消灭了绝对王政统治下的各国。

国王的军队仍然是中世纪时的编制，雇佣兵是其主体，在拿破仑的近代化的军队面前他们无计可施，一败涂地。欧洲各国分崩离析，逐渐向国民国家转变。因为，只有国民国家才是最强大的军事国家，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保卫自己“国家”的方法。①

---

① 小室直树，《为日本人书写的宪法原论》（集英社国际部）。

就这样，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仅仅过去数十年的时间，欧洲的主要国家都变身为国民国家了。

与此同时，在这些国家里也出现了追求“合理性”的近代化的官僚机构。随着资本的聚集和分工的发展，社会生产性得以极大的提高。这又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革命的爆发。技术产生财富，财富寻求新的技术，当这种循环出现时，欧洲人终于掌握了一种“强大的技术”——蒸汽机。由此，“西方”的优势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为分割、占领地球上其余的地区，他们推行殖民地化政策。

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产生了资本主义，世界财富聚集于欧洲一隅，这又引发了近代改革的导火索。[①] 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更加加快了全球化的步伐，近代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犹如巨大的波浪一般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

“全球性标准”是一种近代的结构（范式），而不是西欧地方性的规则。像英国、法国等殖民国家打着自由、平等的旗号将世界殖民地化，而殖民地的人们则在自由、平等的旗帜下寻求独立。世界各地的人们之所以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接受近代的理念，是由于这个理念将超越了民族、宗教和文化的普遍价值具体化了的缘故。

① I·沃勒斯坦，《（新版）作为历史体系的资本主义》（岩波书店）。

小结（5）

- 经济上的全球化▶自由贸易（市场原理主义）
- 政治上的全球化▶自由民主政治（美国主义）
- 所谓贸易是指国际分工▶通过自由贸易，世界走向富裕

▼

- 全球化（自由贸易）是一种乌托邦思想

何谓全球性标准？

▼

- 古希腊是一种自由出入的全球化空间→演讲术（逻辑）与民主政治
- 基督教的绝对神尽量避免“神与神之间的争斗”→全球性宗教
- 希腊文明（希腊精神）与基督教（希伯来精神）的结合▶近代的起源

- 与绝对王政相对抗的思想▶自由、平等、民主
- 国民国家▶启蒙人类的军事国家→帝国主义→加快全球化的进程

11 关于“正义”的哲学

以“哈佛最受欢迎课堂”而闻名的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在《谈谈今后的“正义”》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电车司机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具体情况是这样的：[①]

你正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开着电车，前方的路轨上有5位工人正在作业，他们并没有发觉电车正向他们急速驶来。你连忙刹车，然而刹车失灵，电车根本停不下来。

这时，你看见右侧有一条可规避的轨道，这里也有工人作业，不过只有一位工人。如果你将电车开往这个轨道的话，这个工人将失去生命，但其他5个工人的性命就会得救。你该怎么做呢？

当然，这个问题并没有正确答案。桑德尔说，在某种极端条件下，不存在一个任何人都首肯的绝对的正义，我们常常会遭逢这种困难的情况。

---

① 迈克尔·桑德尔，《谈谈今后的“正义”：能够生存于当下的哲学》（早川书房）

这并非虚构的故事。现如今，由于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事故，所有日本人都受到“正义”这个沉重问题的拷问。

从道德上讲，涨价对吗？

东日本大地震之后，当灾区的第一家超市开始营业的时候，一棵圆白菜的标价为500日元。即便如此，灾区的人们还排着长队等待超市开门。买完圆白菜后，他们纷纷说着“谢谢”、“真是帮大忙了”，表示感谢。从道德上讲，这家超市店主的做法对吗？

当我们看到这个报道后，马上就会条件反射地对这种做法加以批评：从灾民手里牟取暴利是不可容忍的。我们并不是说要让店主将超市里的东西免费发放给大家（实际上也有店主这么做了），但商品的价格应该与地震前持平，或稍微涨一点儿也行。

然而，仔细想一想，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超市以高得离谱的价格出售圆白菜，可以用获得的利润进行商品的采购。批发商的想法是，由于商品能够在灾区高价出售，因此，即使多付出一些运费也足以保本。高价格可以增加商品的供给，让市场尽快地走向正常化。灾区的人们一开始或许不得不花高价买圆白菜，但从结果来讲，由此他们也获得好处。

但是，如果出于好心，超市的店主免费赠送商品的话，因他完全不能够获利，所以无法进货。这样一来，商品的供给就会停滞，圆白菜的价格或许因此而变得更贵。

让我们用另外的例子来考虑同样的问题。

东日本大地震后，紧接着发生了福岛核电站事故，东京等大城市的超市里，商品眨眼之间就被抢购一空。生产厂家增加生产

了矿泉水、杯面等，但商品的供给仍赶不上趟。食品断货的情况在电视上反复播出，整个日本都处于恐慌性抢购的现实之中。

此时，超市尽管对个人所买商品数量作了限制，但商品的价格几乎没有变动。这种应对方式对吗？

人们之所以能够疯狂抢购，是因为食品的价格与地震前一样，非常便宜。估计像面包这样的保质期短的食品几乎吃不完就被扔掉了，即便如此，为了获得一时的放心，能够在一大早就在超市门口排队的人们还是将货架上的食品一扫而光。

于是，诸如只能在晚上下班后才能够购物的双职工家庭就无法买到必要的食品了。更为严重的是，在首都圈，由于人们大量采购水和汽油，对关键性的灾区的商品供给中断了。

如果这样的话，此时，超市应该做的事情或许就是涨价。这样一来，一时冲动杀到超市的人就不会购买必需品之外的东西了，于是，商品就会流入即使高价也要购买的人的手里。

从道德上来讲，违背需求和供给的原理维持商品的价格不动或许是正确的，但反过来有时这会诱发人们疯狂抢购的行为，加大社会的混乱。*

*据调查，在看不见卖家身影的网络拍卖中，矿泉水等商品的价格有着大幅度的提高。超市之所以保持价格不变，是害怕受到媒体等的批判——说他们是“趁机涨价”，事后会遭到消费者的“报复”。在看不见卖家身影的网络世界里，市场原理发挥了作用。

双重房贷能够使人得到救济吗？

在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处理以及灾区的振兴方面，较之于暂时

性的“趁机涨价”的事情来，更加复杂的“正义”的问题堆积如山。

日本政府承诺给因核电站事故而不得不避难的人们以损害赔偿。然而，在避难所生活的人们当中情况各不相同：距核电站20公里半径圈的人们得到“避难指示”；30公里半径圈的人们为“自主避难”；而在30公里半径圈以外，由于生活物资无法保障等原因，很多人是“随意”避难的。

今后，对核电站事故的受害者的损害赔偿将正式启动，那时，政府是否根据得到“避难指示”、“自主避难”和30公里半径圈以外的“随意避难”的情况，在赔偿金额方面有所不同呢？没有得到政府的指示就根据自己的意愿避难的人们能够获得赔偿金的数额是多少呢？

农业和渔业的赔偿问题也具有同样的难度。

有政府上市规定的蔬菜可以获得补偿，但上市规定之外的农作物因受到谣传的影响，现实情况下根本卖不出去，如果他们得不到任何金钱上的赔偿的话，东北地区和关东北部地区的农户将彻底破产。然而，将来所有农户的生活不可能永远都得到保障，那必须划出一个时间界限。

除此之外还有更加复杂的问题亟待解决。

地震和海啸使得许多人失去了房屋、汽车、船只等私有财产，这些东西与水、电、气等日常生活设施不同，其损失是得不到政府的赔偿的。房屋的赔偿根据损害情况的不同，最高可以获得300万日元的援款，此外，由于此次的灾害非常严重，清理废墟的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尽管如此，在重建房屋时，可能绝大多数的

受害者都会感到资金的短缺。

房贷、车贷等债务（借款）并不因资产的失去而得以免除，为重新生活，他们即便背上新的债务，也必须分几年（几十年）继续偿还房贷、车贷，尽管那些房屋、汽车已经被海啸吞没了。这就是地震受害者的双重贷款问题，虽然法律上有自我破产的特例，但是如果他们能够轻易地免责的话，那么，贷出者——当地的金融机构——的损失会扩大；如果动用专门用于救济的公用资金的话，那么，与阪神大地震等其他受害者之间的公平又会受到质疑。

对这些道德上的疑问，没有人给出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又能让所有的人首肯。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只是喋喋不休地议论着，而赔偿、重建等毫无进展。政治上的对立必须以某种形式拿出结论。

对因东日本大地震而摆到我们眼前的有关"正义"的诸多问题，我们究竟如何作答呢？

对此加以阐述的是"政治哲学"。

猩猩的"正义"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举出3个猩猩——它拥有99%与人相同的染色体——的特殊行为的例子：

> ①社会性的动物猩猩有阶层（等级）之分，其群体由"雄首"（位于最高位的雄性）统领。但当我们向群体内部处于最弱势的猩猩分发水果等食物时，等级高的猩猩就会跑过来，伸出手掌心，这是向对方乞求分食物的姿势。

所有权

②在房间里放入两只猩猩，这个房间的正中间用玻璃窗隔开。我们分别给这两只猩猩黄瓜吃，它们吃得很开心。但当我们给其中的一只猩猩换成香蕉时，此前一直吃黄瓜吃得很香的另一只猩猩突然将手里的黄瓜扔掉，开始发怒。

③让第一次见面的两只猩猩坐在一个四方桌前，在它们的上肢能够触及到的地方放上一只苹果，它们就互相争夺。但当这个相同的动作重复若干次以后，其中的一只猩猩就不去争抢苹果了。从身体的强壮程度等各种特征进行判断，两只猩猩之间自然而然地形成排序，一旦等级决定了，那么处于下级的猩猩就会将苹果让给上级的猩猩。

从这些猩猩的行为当中，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①告诉我们：在猩猩的群体里有“所有权”（自由）的概念。不管阶层高低，第一个拿到的食物就归这个猩猩“所有”，即使处于最高层的“雄首”要想从最低层的猩猩那里分到食物，也必须向对方示好。

猩猩之所以互相尊重“所有权”，是基于“领地意识”。不仅限于猩猩，所有的社会性动物一旦从群体（社会）里被排挤，那么它就无法留下子孙后代。（在繁衍后代之前，它甚至无法生存下去。）对所有权（领地）的尊重，是维持群体和谐的绝对的约定，这样的遗传因子的程序事前已经植入于它们的意识之中了。

同样，②告诉我们：猩猩拥有“公平”（平等）的概念。

进入由玻璃隔开的房间后，自己和对方只不过是偶然地聚在了一起而已，从原理上讲，二者是平等的。尽管如此，自己吃的是黄瓜，而对方则吃的是香蕉，这是违背平等的原则的。为对这

种“歧视”表示抗议，这只吃黄瓜的猩猩将黄瓜扔到地上，火冒三丈。

这个行为告诉我们，人们为什么会冒着生命危险反抗人种歧视。“平等”也是被植入的一种遗传因子的程序。

③告诉我们：猩猩之间的“阶层”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这在雄性猩猩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明确上下级的关系，群体的秩序得以维护。（雌性的阶层并不像雄性那么明显，但也由叫作“雌首”的最高层的雌性统领雌性群体。）这样一种秩序化的群体就是猩猩的“共同体”。

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友爱”的三色旗表示近代的理想。友爱并非仅仅指友情，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共同战斗的人们之间形成的纽带，因此，它说的也是一种“共同体”。

动物行为学家的观点是，人类社会形成的近代三原理（自由、平等、共同体），在猩猩的社会里也能够找到。①

善恶二元论与规则原理主义

超越历史、文化、宗教、民族、人种，人们都具有一种共同的情感，即“正义感”。在传统社会里，“正义”的概念无处不在，但它与“近代的正义”有着巨大的差别。

传统的正义就像是历史剧中的劝善惩恶。在这里，世界被划分为“善”与“恶”两个极端，“我们”为善，“那些家伙”为恶，“我们”打倒“那些家伙”，世界就会恢复“正义”。

---

① 弗朗斯·德·瓦尔，《你身上的猿性：灵长类学者揭示“人类”的起源》（早川书房）；藤井直敬，《相通的大脑》（NTT 出版）。

这种善恶二元论的故事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里，因为它是以进化论为基础形成的。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这种情感具有强大的力量，在人的无意识（前意识）阶段，它就决定了人们的行为。

传统的正义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这就是随机应变（相对性的）。在日本历史上的战国时代，忠君是武士们的规则，但通过“下克上”而背叛君主、获得权力的情况并没有被看作是恶。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正义往往是复数的，根据情形，对“我们”最有利的东西被认为是“真正的正义”。

现在我们依然生活在随机应变的善恶二元论的世界里。好莱坞电影反反复复地为我讲述着这样的故事：这个世界被“恶”所统治（阴谋史观），我们拥有打倒“恶”的使命（圣战史观）。在这样的电影里，英雄与其伙伴有时是罪犯或恐怖分子，但电影还是以他们（对观众来说就是“我们”）为中心讲述正义的故事。

传统的正义就是“我们”的正义，因此从本质上讲，它是地方性的。在人与人相遇的全球化的空间里，如果有人提倡传统的正义的话，那么人与人之间只能是互相残杀。现代性的全球化世界的形成，有必要创建新的正义的概念。

现代化正义的特点在于“原理主义”。它不随机应变，绝不会发生变化，不受时间、场合以及对象的影响。这种正义的普遍性在利害关系各不相同的人们自发地规定必须遵守的规则时是不可或缺的。

原理主义的正义要求契约（法）的绝对性。一旦与对方签订契约，不管是国王变更，还是政权更迭，其内容都不会被改变，其约定都不会被废止。

这种现代化的正义不是"我们"，而是"我"的正义。个人与个人如果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契约，那么，将这个世界划分为"我们"和"那些家伙"就没有任何意义，社会即成为自由的"我"的集合体。

当然，这是虚构，这个世界里根本没有绝对的正义。话虽如此，但是如果我们不炒作"自由"、"平等"这些"虚构"的话，现代社会的秩序就无法形成。

政治哲学的四种正义

迈克尔·桑德尔在《谈谈今后的"正义"》一书中指出："正义"有四种不同的立场。这就是自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社群主义（共同体主义）和功利主义。

自由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都是以"自由"（Liberty）为原理的思想，人生来就具有平等的"人权"，人应以自己的意志度过"自由"的人生。但两者在关于"平等"的思考方面尖锐对立。

自由主义是一种"自由原理主义"，这种思想认为，人不能以人种、性别、民族、宗教来歧视人，但如果竞争的机会是平等的话，那么，结果不平等也不违背"正义"。自由意志主义者们坚决否定国家以再分配财富为理由，行使权力侵害公民的私人所有权。从政治上看，这属于支持"小政府"的立场。

而自由主义尽管承认私人的所有权具有重要的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们认为，这并不能将富人与穷人之间巨大的差距正当化，为矫正不平等，国家征税，以维持生活等社会保障的形式分配给穷人，这就是正义。

使自由主义在现代重放光芒的是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他认为，社会应设计成“给处于最弱势的人以最大的利益”，这是认可“大政府”介入市场的立场。

自由意志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相互对立，似乎不共戴天，但两者都以市民社会为前提，而这个市民社会是由自立、自由的个人组成的。

与此相反，社群主义认为人只能在共同体中生存下去，因此，正义的源泉并非近代的“个人”（人权），而只能产生于共同体的历史和传统中。这在政治上是保守主义，表面上看，它否定了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的所依据的“近代”。（关于这一点后面再说。）

如前所述，自由意志主义、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正义”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而且也存在于猩猩的世界里。这些正义（与大猩猩一样）原本都是预装进我们的遗传因子中的，因此，近代的启蒙思想将这种模糊的正义感作为“自由”、“平等”、“共同体”的原理抽象出来，赋予它绝对的价值。

近代的价值观一瞬间便席卷整个世界，并非因为它是科学的、合理的，而是由于它与人们的正义感十分吻合的缘故。我们在理性意识之前首先为情感所支配，把不符合正义感的东西都不当作“正义”。

桑德尔所举四种“正义”之中，只有功利主义不符合这个定义。

功利主义是18世纪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提倡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认为，通过理性使整个社会的效用（幸福）最大

化，这从道德上讲是最正确的。这个思想是随着货币经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的，与生物进化毫无关联。

尽管我们从道理上承认功利主义是正确的，但从这里我们得不到正义感。这也就是世界各地极其厌恶功利主义的原因。（最近，这个立场被称为"新自由主义"）。

"自由"、"平等"、"共同体"以及"效用的最大化（功利主义）"都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价值，但它们在不同的场合下是对立的，世界上并不存在能够同时满足一切的理想化的观点。因此，我们根据政治哲学的理论必须做出抉择：选择哪一个？抛弃哪一个？

关于"原理"的斗争

我们将"正义"的4种立场用图16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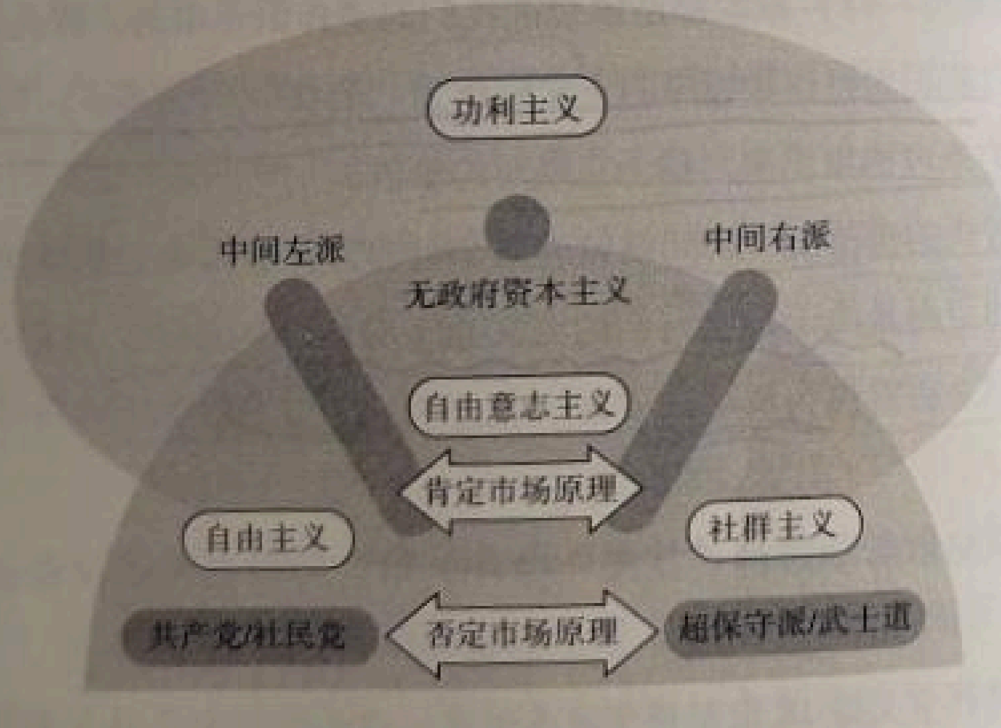


图16　关于正义的4种立场

图中下半部的半圆里显示的3种“正义”都是基于进化论的“正义”。这3种立场是平等的，为方便起见，我们将自由意志主义放在了中间。（实际上，将自由主义或社群主义放在中间也未尝不可。）

我们之所以将功利主义置于半圆之外的地方，是由于它没有进化论的基础。但功利主义的思维方法与重视私人所有权（自由市场）的自由意志主义极其有缘，因此，我们让这个部分占据了较大的位置。另一方面，功利主义是彻底否定极端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

在日本，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政治上的“保守”与“革新”是互相对立的。保守派（右派）高举“亲美”、“自由主义经济”和“传统”的大旗，而革新派（左派）则高调提倡“反美”、“社会主义经济”和“进步”。但由于冷战的结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形成的价值观的对立就显得毫无意义了。

当我们将政治哲学分为“自由”、“平等”、“共同体”和“功利主义”时，就可以清晰地说明后冷战时期的政治状态。

在自由主义中，最与功利主义无缘的是“自由主义左派”，在日本，即共产党和社民党的立场，他们大力提倡：通过对大企业以及富裕阶层课税，加大社会福祉程度，以建立平等的社会。

在社群主义中，最与功利主义无缘的则是“社群主义者右派”，他们重视传统，排斥市场经济原理，是一种超保守主义。他们断言，功利主义是一种“堕落”（@石原慎太郎[1]），极力赞美

[1] 石原慎太郎（1932～ ），日本政治家，曾长期任东京都知事（1999～2012），政治上呈现出极端右翼的思想。——译者注

武士道等日本人的美德。(看上去，极右与极左的关系似乎是不共戴天，但通过图16我们了解到，在否定市场经济原理方面，两者的思想是共通的。)

社群主义与功利主义都反对国家对市场的过度限制，主张自由的市场和有效率的资本主义能够公正地创建一个富裕的社会。原理主义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则将废除国家的无政府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理想。

针对这种“极端的论调”，政治上的主流派则处于自由意志主义者右派（社群主义者左派）和自由意志主义者左派（自由主义右派）的“中间”位置。

中间右派在重视传统的同时，也尊重自由的经济活动，在美国则相当于以“小政府”为目标的共和党（稳健派）。中间左派虽然追求社会保障的提高以及经济差距的改善，但在个人的自由方面采取了最大限度的认可的态度，这就是民主党的立场，在政治上，他们是承认“大政府”的。**

** 针对这种旧保守派、旧自由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起，称作“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势力高涨，关于这一点我会在本书第三部分中将它与“桥主义”的潮流放在一起加以阐述。

当然，这是一种大致的分类，现实中的政治更加复杂。雷曼兄弟事件后，针对金融机构的救济，功利主义者（华盛顿的官僚和经济学家）认为：“应保护金融市场。”而自由意志主义者则反对道：“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则，就让它破产。”

自由主义者与自由意志主义者之间的意见基本上都不统一。

但在流产问题上，他们出于保护女性（母亲）权利的考虑，联合斗争，与基督教原理主义（社群主义者右派）针锋相对。（但茶党派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则反对流产。）

人们认为，在美国，政治家及政党应按照“正义”的原则行事，因此他们的政治主张都很简洁明快。这个原则贯彻于（对政治关心的）普通市民之中，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支持者面对面地针锋相对。茶党（社群主义者右派）以及对“占领华尔街”（自由主义左派）的政治运动具有强大向心力的人们都是基于这个原则参加运动的。

而在日本，至今“正义”还是随机应变式的，政治家根据时间、情形改变观点的情况被视为理所当然。尽管出现了两大政党——自民党与民主党，但政治家的所属是根据选举区的情况有所变化的，人们几乎毫不在意其政治哲学上的区别。

日本的政治家谈不了“正义”，因为他们只拥有情绪化的道德，诸如“爱国”、“重视家庭”等。在没有政治哲学，只有政治评论的日本，有关“正义”的探讨原本就是不成立的。

“农村社会”的极限

随着社会不断地复杂化，几乎所有的问题都需要权衡。所谓“权衡”，是指“一方得到支持，另一方就得到反对”的情况，如想得到一些，那就会失去另一些。冰淇淋很好吃，但吃多了会发胖，这是典型的权衡。

个人的权衡可以由个人的意志加以判断，但比较复杂的是社会的权衡，此时，如果有人获得一些利益，那么另外的人就会失

去一些利益。典型的事例就是冲绳普天间基地的迁移问题，所有的日本人都从日美安保体制中获得利益，但“带来麻烦的设施”——美军基地，却集中在冲绳。

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后，在清除核污染的作业中，关于废弃物回收清理设施就发生了权衡的问题。所有的人都知道，清除污染一事须尽快进行，但被污染了的泥土必须集中在某个地方进行处理。如果没有人愿意承担这种倒霉事的话，这个作业就无法进行。

对于这样的问题，像水户黄门和桃太郎①武士那样的快刀斩乱麻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到目前为止，日本社会里一旦发生了需要权衡的问题时，都会给抽到下下签的人们以金钱的补助，以获得全体成员一致的同意。在“农村社会”型的决定问题方式上，一致同意是一个大前提，此间有两个理由。

日本人十分讨厌讨论，因为这会煽动起有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对立，从而很难取得一致的同意。有能力的政治家，不是高谈阔论正义和理念，而是通过私下的沟通，或者威胁对方，或者诓骗对方，以取得一致性的同意。

然而，现代化的政治制度首先规定好全体成员必须遵守的规则，然后根据这个规则进行政治上的决定，对抽到下下签的人们事先规定好范围，然后进行补偿。这时，对利害关系人来说，规则的规定意味着生死存亡，因此，人们会对此进行激烈的论争。

---

① 桃太郎是日本传统童话故事中的人物，曾打败鬼怪，为民除害。——译者注

我们看一下美国政治的混乱情况就可以明白，没有一个事事顺利的、毫无缺陷的制度。从原则上讲，民主制是以“自由退出”为前提的制度，像茶党和侵占党（占据华尔街）这些从不打算退出的人们，在决定规则阶段就面对面地针锋相对，难以控制。

不过，在普天间基地迁移和福岛核电站事故问题上，我们清楚地看到，此前一直采用的“农村社会”型全体成员一致同意的方式根本决定不了任何重大的问题。如果这种体制必须加以改变的话，那么从原理上讲，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

这就是，在规则优先的情况下加以决定，或者以与此截然不同的“独裁”的方式加以决定。

12 何谓美国主义？

若干年前，我参加了邮轮旅游，从新加坡沿马来半岛穿过马六甲海峡，一直往北走。这艘邮轮非常豪华，有游泳池、剧院等，乘客们大多是欧美人。

邮轮旅游的活动中有这样一个安排，大家换乘小船，游览普吉岛周边的各个岛屿。乘客们被分成几个组。我所在的这个组有一对在印度工作的法国夫妇以及从俄克拉何马州来的一对美国夫妇，我则是离职后第一次去海外旅行。

那不是侮辱吗？

在进行自我介绍后，法国丈夫问我："你见过小泉[①]吗？"我不明所以，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他告诉我说：他在日本政府的ODA[②]成立的一个水道开发公司担任总经理。

---

① 指日本第87－89任首相小泉纯一郎（1942－　）。——译者注

② ODA即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政府开发援助）的缩写。——译者注

他说道："实际上这个职位应该是由日本人担任的，但是印度人只听从白人的指令，于是我就当上了总经理。这都是托小泉的福。"

我心想，这家伙可真讨厌。这时，他的妻子又开始满腹牢骚地说："行李搬运工弄错我们的行李箱，把我们害得不轻。"我想，这个法国男人让人不愉快，他的妻子也是同样货色，就没有把他们的话当回事儿。但就在这时，突然间一个美国人以愤慨的语气插进来说："那不是侮辱吗？"他用的是"insult"（侮辱、失礼）这个词，当面对对方使用这个词很不妥当。

当时，空气一下子凝固了。

美国人夫妇脸上露出一副谁都会那么反驳的神情。

法国总经理的夫人则吞吞吐吐地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丈夫则赶忙打圆场："最终行李箱回到我们的手里，不是挺好的嘛。"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就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另外的美国人则拉起了家常。）

虽然这是区区一桩小事，但我对此却一直难以释怀，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当时，在那种情况下（可能）发生了这样的事：

法国总经理夫人为了引起一个话题，就讲了新加坡的搬运工失责的事情。在场的如果只有美国人的话，这个话可能权当是旅行中的一个小插曲，不会引起任何的风波。然而，由于我（日本人）的在场，情况完全不同了。

只是法国人与美国人的话，那是一个白人之间的地方性共同体，一旦日本人（亚洲人）加入进来的话，就变成了一个不同的

种族共同处于同一个地方的“全球化空间”。

对美国人来说，他们可能感觉到，在我面前指责新加坡的搬运工，与在有黑人参加的聚会上发牢骚讲黑人保姆如何无能是一样的。因此，他们无法忍受这种言辞，突然间发起怒来。

在“全球化空间”需要一种绝对的规则。在这种规则下，有关种族歧视的言辞是决不能容忍的。

当然，这对法国夫妇是肯定了解这个规则的。但在印度与日本人一道工作的他们知道，作为日本人的我是不会在意他们指责新加坡人的。（我脑子里的确闪过“这个法国女人说话真不中听”的念头，但并没有感觉到这是对我的一种歧视。）

但从俄克拉何马州来的美国人区别不了新加坡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差异，因此，他对法国总经理夫人反驳道：“你这不是在侮辱这个亚洲人吗？”

通过这个体验，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全球性标准”内在化的情况。

绝对的权力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我并非“全球主义”的礼赞者。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在全球化空间里，‘全球性标准’起到了一种权力的作用”。更加直截了当地说，就是：

“在全球化空间里，地方性规则无法与全球性标准相抗衡。”

假设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以及阿拉伯人围坐在桌前，这时，日本人拿出武士道、中国人拿出儒教、印度人拿出印度教、阿拉伯人拿出《古兰经》的教义，他们之间不仅无法取得统一的

意见，甚至连对话都不可能。由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了解到，在全球化空间里，必须设定一个与这个空间相适应的新规则。这就是全球性标准（全球化空间的基准）。

在这里，地方性规则与全球性标准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说法是不存在的。如果这就是全球化空间的话，那么无论你喜欢与否，所有的人只能遵守这个全球性标准。

美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也是如此）非常自然地将这个标准铭刻在心，因为他们的国家是由移民构成的人工型社会，亦即一个全球化空间的试验场。

全球性标准并非如一般人所说的那样，“这是于美国人有利的规则”。对美国的主流派 **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①] 来说，之所以说自己比其他种族更加受到厚待，就是由于被赋予了最优秀的规则。对此，首先提出强烈抗议的是爱尔兰和犹太民族的移民，然后是黑人和拉美裔美国人，有时还经过流血的斗争，这才制定了一种在种族、性别、宗教方面不歧视国民的公平的规则，这就是全球性标准。

美国人很自然地将自己的地方性空间与不同种族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全球化空间区别开来。在地方性空间（内部）里，他们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种族歧视的玩笑，一旦那个谈论的场所变成了全球化空间，那么他们就会相应地改变自己的态度，对他们来说，这是理所应当的礼节。

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白人们，在政治上既不是自由主义者，

---

① WASP 即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缩写。——译者注

也不承认非法移民的合法化和同性之间的婚姻。然而，在全球化社会的试验场上成长起来的他们是不允许发生在亚洲人（日本人）面前批判亚洲人（新加坡人）这种不礼貌的做法的。

人们一旦被指责违背了全球性标准，那么一切反驳都是不被允许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性标准是全球化空间里绝对的权力。

从道德上讲，能力主义是正确的

美国企业的能力主义并非是使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制度。它是一种全球化空间的规则，即“在能力之外你决不能歧视劳动者”，但几乎所有的日本人对此都误解了。

在美国，以种族、宗教、性别和年龄对公司职员加以歧视是绝不容许的。因此，在美国没有退休一说，履历书中既没有出生年月日一栏，也没有贴照片的地方（因为一看照片，性别、种族一目了然）。当然，也不是说在美国就不存在歧视（具有伊斯兰教色彩的名字的人，在工作方面的录取率很低），但如果在法庭上企业被认定存在歧视的话，那么这个企业就必须付出巨额的赔偿金。

但这也给社会带来巨大的难题。尽管禁止一切歧视，但在录用和晋升时，企业必须以某种方法对劳动者进行分级。那么，唯一能够加以选择的只剩下依据“能力”的评价了。

因为能力并非如种族、性别那样是与生俱来的（无从选择的），它可以通过本人的努力加以“开发”。当然，这只是一种神话。人的（部分）能力毫无疑问是天生的，但是如果对它也以歧视的名义加以否定的话，那么所有的评价都将成为不可能，除非

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等人事制度是一种以年龄和性别对公司职员进行分级的机制。这种“歧视性”雇佣惯例在日本这个地方性空间里或许是可以维持下去的，但企业在海外投资，雇佣国外的职员时，立刻矛盾毕现，因为他们无法回答外国人职员从道德上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与日本职员的待遇不同。”

近年来，在日本以风险投资企业为中心也引进了能力主义的做法，这并非说他们受到了“利益至上主义”的毒害。迅销公司（优衣库）的总经理的“我们只录用全球性人才”的说法并没有否定日本社会的美好风尚，而是说既然公司在海外进行大规模发展，已走上“全球化”的轨道，那么，就不可能以地方性规则来雇佣日本职员。

“股东资本主义”也是不同种族和国籍的股东聚集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下的一种标准。

日本企业的股票拥有者与经营者形成一种默契：经营者创造一个地方性空间，只要分红，大家都不对彼此的经营方针说三道四。然而，一旦股票的持有情况发生变化，外国投资者的股票持有率急剧增加时，这种地方性标准（共谋）就可能得不到股东的认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在以股东为主权拥有者的公司统治（corporate governors）之外，是没有其他标准的。

当然，以安然公司事件为契机，在美国也出现了重新认识股东资本主义的观点。尽管如此，也并非说要转变为日本式的股票持有方式（地方性规则）。担当起对股东们阐明业绩的责任是上市

业（公共企业）的绝对条件。

因此，在美国社会里，所有的制度（从理念上讲）都是在全性标准的基础上制定的。将它扩大到世界范围并非美国的阴谋，是世界全球化必然的结果。

两个共同体

《海贼王》（*One Piece*）被称作是现在"21世纪日本诞生的《圣经》"，它讲述了"海贼"路飞为寻求"大秘宝"（One Piece）在大海上航行的冒险故事。在这里，我无法用一两句话说明其庞大的神话世界，但这个故事的核心无疑是"伙伴"。

这个伙伴到底是什么东西？

法国大革命中起义的民众为打倒王政（旧制度）而高举"自由"、"平等"、"友爱"的大旗，在这个作为近代"原理"非常著名的三大概念中，人们很容易理解自由、平等的意思，但对友爱（fraternity）一词的意思人们并不清楚。在日本，fraternity 被译作"慈善"或"博爱"①，这与革命具有怎样的关系呢？

Fraternity 本来是指中世纪在英格兰流行的一个民间宗教团体（结社），随着都市的成立和人口的流动，在基督教社会里，与教区不同，宗教信仰者们中间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互助会。他们除了从经济上帮助贫困的人外，做买卖的人们还联合起来，有时会与基尔特（同业公会）合为一体。

在法国大革命中，这种 fraternity 失去其宗教性，其含义改变

① 在我国也译作"博爱"，但在本书中，我则使用了"友爱"一词。——译者注

成为具有相同目的的人们之间的"连带"关系。所谓"友爱"就是指为了自由和平等一同作战的"伙伴"。（此外，共济会是一种理神论，即自由思想的结社，它不支持某个特定的宗教，法国大革命的许多领导人都是这个结社的成员。）

这里所说的"伙伴"并非指由血缘和地缘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农村社会的共同体。近代意义上的友爱是指独立的个人为了共同的目的聚集在一起，齐心合力实现共同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飞与其伙伴的冒险是一个友情——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正统的友爱——故事。

如果说路飞与其伙伴（近代意义上的共同体）与农村社会传统的共同体是截然不同的话，那么，桑德尔所说的社群主义者们的"共同体"的思想基础究竟在何处呢？

桑德尔认为家庭间深厚的感情、伙伴之间的连带关系以及忠诚于共同体的行为都是"善"，将这些"善"当作超越个人的义务。桑德尔告诉我们一个美好的情景：大家都是"故事中的存在"，并非抽象、空洞的"近代的自我"，我们作为历史、共同体等"大故事"中的一部分，在上演着一场人生的故事。

如果我们将社群主义者的立场看作是"否定近代的自我"的话，那么，他所依据的就是传统的共同体。然而，由此我们就避不开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否所有的传统中的价值都是平等的呢？"

对此加以肯定回答的是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立场。他们提倡，在价值上，残存于现代的狩猎采集社会的传统与西欧各国的文化应该是相等的。

但是，这种（具有一定说服力的）思想至少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美国完全消失了。因为这个思想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从文化上讲，伊斯兰原旨主义的恐怖主义者值得尊重吗。"

自由民主主义的正义

美国人桑德尔认为，作为一个社群主义者，应该尊重"古老且美好的美国"文化和传统。如果这样的话，日本的社群主义者是否就会将天皇制、中国的社群主义者是否会将儒教、伊斯兰的社群主义者是否会将《古兰经》的教义当作正义加以提倡呢？

桑德尔是否定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他指出，共同体的传统中既有值得尊重的东西，也有应该否定的东西。

"9·11事件"以后，任何人都无法回避"传统社会"的负面部分。没有一种政治哲学会将这样一些传统——如切除年幼女孩的性器官①、丈夫把妻子当作奴隶使唤，以及将杀害美国人当作是神的旨意等——作为"正义"的。

与此同时，桑德尔并不认为白人（欧洲）中心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正义的原理。因为，种族歧视很显然就是违背正义的。

桑德尔所说的"美好的"传统是指美国的建国理念。托马斯·杰斐逊等美国国家的创始人们，以卢梭、洛克的启蒙思想为依据，起草了《独立宣言》以及《合众国宪法》，试图在"神赐予的土地上"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理想社会"。那么，美国政治哲学中所说的"共同体"就只能是建立在自由民主主义基础之上的

---

① 应指非洲许多国家实行的割礼（成年礼），女子的部分或全部阴蒂和小阴唇被割除，甚至部分阴道口被缝合。——译者注

近代的共同体。*

*自由民主主义中的自由是 liberty，与政治上的自由（liberal）不同。社群主义者是 liberty 的原理主义者，因此他们是极力支持自由民主主义的。

回顾法国大革命前的历史，所谓的自由（liberal）是追求商业上自由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而民主主义则是要求从贫困中解脱出来（经济上的平等）的民众（大部分是农民）的呼声。从这个意义上说，追求贯彻市场原理的自由派就是社群主义者，以消除经济上的差别的现在的自由派就是“民主主义者”了。

美国是由移民构建起来的人工国家，不具有前近代的历史，建国的理念就原封不动地成为这个国家的传统了。美国的保守派（传统主义者）是指近代主义者（modernist），他们之所以将希腊精神（希腊思想）和希伯来主义（基督教）奉为自己的“传统”，是因为那是近代的起源。

桑德尔认为，应平等地尊重美国之外的各个国家的“传统”，但那也只是在与自由民主主义不相抵触的范围内进行的。敬重天皇的日本传统是共同体的非常重要的价值。但如果像战前那样，将天皇当作现人神①看待的话，那这个“传统”则是个邪教（cult），应加以彻底的否定。

同样，儒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的传统只能在自由民主主义的范围内存在。伊朗的神权（伊斯兰原理主义）政治和印度社会

① 借助人的形[illegible]现人神。——译者注

的种姓制度等都是前近代的“遗存”，应加以全面地摈弃。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哲学层面上的社群主义并非“尊重共同体传统的思想”，它与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一样，是一种“近代的思想”，其区别在于：一个是将社会看作是“个人”集合体的观点，一个是以“共同体”为中心的观点。

美国的政治哲学相互之间极其对立，同时又将自由民主主义作为它们共通的基础。因为这是全球性社会中唯一一个正义的标准。

善意与傲慢

最常来用于表现美国人特征的一个词是 arrogance（傲慢）。这不仅仅是我们的感觉，连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和加拿大人也用这个词来揶揄他们，因此，这种看法应该是全世界共同的吧。我的一个澳大利亚朋友曾正儿八经地对我说：“你去美国那样 arrogant 的国家旅行真的没关系吗？”

我们感到美国人傲慢的理由是，他们对自己的标准具有一种宗教性的自信。这个标准就是美国建国的理念——自由民主主义。

自由民主主义是以以下 3 个前提设立社会制度的：

①所有的人与生俱来都平等地拥有人权；

②所有的人只要他遵从法律，以自我负责为条件，那他就获得自由生存权利（自我决定权）的保障；

③国家权力不是用来管理国民的，而公民（主权拥有者）则根据宪法控制国家权力。

那么，美国人的这种自由民主主义的自信究竟来自何方？

毫无疑问，第一个是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当时，美国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美国人提出“无代表就不纳税”，要求平等地与英国交往，这个要求被拒绝后，他们拿起武器，以自己的力量实现了“正义”。

第二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美国将这次战争定位于“自由民主主义（善）与法西斯主义（恶）的决战”，他们拯救了落于恶之手中的世界，完美地将“圣战”引向胜利。通过这场战争，世界霸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守护神”。

第三个是1991年冷战的结束。1981年出现的里根政府将苏联认定为“恶之帝国”，摈弃基辛格一派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采取了基于善恶二元论的交锋态势。自由（liberal）的知识分子嘲笑这种姿态为“牛仔外交”，担心“世界会就此走向灭亡”。柏林墙被推翻的同时，东欧各国接二连三兵不血刃就成功地实现了民主革命，最终苏联解体，里根的“预言”全部得以实现。

将这个“奇迹”看在眼里的美国人中，在政治思想上有一个叫作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e）的派别，他们认为，由于在与共产主义的战斗中取得胜利，因此历史证明了美国道德的正确性。新保守主义在布什政府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他们认为将美国之“福音”扩散到没有受到自由民主主义恩惠的“落后”国家是神赋予美国人的使命，提倡“出于善意的霸权”。[①]

这种自以为是的外交姿态极易被批判成美国的单边主义（uni-

① 弗兰西斯·福山，《美国的终焉》（讲谈社）。

lateralism)。毫无疑问，像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样“美国的正义”肆意泛滥的例子俯拾皆是。

但是，我们决不能忘记的是，尽管如此，美国道德优势性的主张还是有其根据的。美国历史上的3个“奇迹”是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成果，这是无疑的。它与独特的选民思想（从恶之手中拯救世界，神赋予了他们“应许之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美国文化所特有的“善意与傲慢”。

美国主义侵蚀着美国

与“9·11”同时，美国发生了多起恐怖主义事件，美国人受到强烈的冲击，体验到“有史以来，美国本土第一次受到敌人的攻击”。布什政府获得国民的压倒多数的支持，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起了军事行动。

现在回顾起来，这在政治上是个失败，美国陷入无休无止的战争和混乱的泥沼。但在战争初期，美国国内的论调一直非常乐观。

美国人相信：“自由民主主义与自由经济会使人幸福。”他们曾一度郑重地认为将阿富汗从邪教组织塔利班手里、将伊拉克从独裁者侯赛因手里“解放”出来——就像将德国和日本的民众从法西斯手里“解放”出来一样，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府就会立刻诞生，市场经济会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富裕起来，而全世界都会因此感谢美国。

伊拉克战争被认为是争夺石油利益的美国的阴谋，这种批判根深蒂固。当然，如果出现了赚钱的机会，任何人都会趋之若鹜，因此，出现了这方面的行为是无可挑剔的。但是，其本质却在于对自由民主主义的一神教的信仰和极其幼稚的正义感，或许这并

不为人们所相信。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的理念本身并没有错，这只要看一下2010年年底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就可以明白。反对“美国主义”最激烈的阿拉伯民众的诉求是自由民主主义。

因此，这并非美国主义“侵略”世界，而是通过自由民主主义，世界被美国所“侵蚀”的结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成为“正义的救世主”。为了理想与美国共同作战的黑人要求美国行使道德上的正义——废除种族歧视。在公民权运动的全球性标准面前，美国不得不放弃优待白人的地方性规则。20世纪60年代，追求“男女平等”的妇女解放运动兴起，70年代，同性恋等性取向上的少数派提出同性结婚权利的要求，这每一次运动，社会都受到极大的冲击。

这种自由民主主义的侵蚀也波及了外交政策。

美国打着自由的旗帜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它不得不承认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自决权”。尽管出现了为“阻止印度支那共产化”而介入越南的肮脏行径，但如果没有霸权国家美国的意图，英国放弃在亚洲的所有的殖民地（有租借契约的香港、澳门除外）、印度尼西亚从荷兰的统治下独立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在现代史上，美国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政策划上休止符的行为其意义非常重大。美国之所以与阿拉伯各国之间的外交十分艰难，是由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是无法否定的，即以色列没有经过巴勒斯坦人的同意就夺取他们的土地建立起国家。以色列打着“自卫”的旗号，武力统治了巴勒斯坦地区的事实十分明确，因此受到阿拉伯各国的强烈抗议，认为以色列“侵害了巴勒斯坦人的人权”。

仅从道德正义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阿拉伯国家一方的观点是正确的。美国虽然主张以现实政治的逻辑来看，除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共存”之外，没有其他的现实的解决方案，但是，在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问题上又不得不站在否定自由民主主义正义的立场上，陷入困境。

因此，美国国家利益（地方性规则）与自由民主主义并非常常一致。即便如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地方性规则与全球性标准发生冲突时，美国的确是将全球性标准放在首位的。

全球化空间的规则

世界历史上出现了好几个将不同种族和民族联合在一起的“帝国”。

16世纪时，称作帝国的是东亚的明朝、南亚的莫卧儿王朝、西亚的奥斯曼帝国、欧亚大陆北部的莫斯科大公国（沙皇俄国）；在西欧，则由失去成为“帝国”机会的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各国割据称雄。①

继承俄罗斯帝国的苏联解体后，现在唯一遗留下来的16世纪型的帝国是中国，进入21世纪，人们深信，能够与美国霸权相对抗的就是中国。也有人认为，虽然奥斯曼帝国、莫卧儿王朝消失了，但穆斯林（伊斯兰教教徒）的宗教共同体形成了全球化的网络，成为一个不具有政治中心的21世纪型的“帝国”。

但是，“中华”思想是一种中国乃世界中心的思想，其价值观不会扩展到周边国家，形成全球性的思想。原旨主义的伊斯兰教

---

① 山下范久，《现代帝国论：人类历史上的全球化》（NHK丛书）。

虽然与美国的价值观针锋相对，但“阿拉伯之春”却在追求民主主义的目的下使得国家的独裁体制分崩离析。

如此看来，很显然，人类至今仍未拥有取代自由民主主义的普遍的价值观。

在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呈衰势的情况下，美国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全球化。因此，美国受到许多人的批判，认为这是美国的“阴谋”和“战略”，但美国并没有产生全球化。

每个个人的经济行为——即想要变得富裕——的聚集使得全球性的货币空间自我增值。与此同时，由于追求“正义”和“公正”的人们的抵抗，自由民主主义不断扩张。如果说美国有一个“世界性战略”的话，那么这就是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运动。

所谓全球化是一种永久性的运动，即由于人们的欲望和正义感，全球性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逐渐覆盖整个世界的运动。

由于全球化的推进，世界各地发生了全球性标准与地方性规则之间的冲突，这时，美国站在全球性标准的立场上，常常能够压倒对方。这是因为美国国家的本质就是“全球化”。

在全球化世界里，能够与美国宣扬的“道德上的权威”相抗衡的只有全球化的正义。

无论对个人来说，还是对国家来说，如果这是一个全球化空间的话，那么，不论你如何提倡地方性的正义，都毫无胜算。如果想要维护自身利益的话，必须在自由民主主义的基础上与对方平等地进行讨论。

这就是全球化空间里世界的绝对规则。

小结（6）

- 政治哲学的四种正义

▼

①自由意志主义 = 自由

②自由主义 = 平等

③社群主义 = 共同体

④功利主义 = 不具进化论依据的正义

- 决定意志的三种方法

▼

①全体一致地妥协

②规则原理主义

③独裁

- 全球性标准（自由民主主义）▶全球化空间里的绝对的权力
- 美国社会本身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空间的世界里的唯一的正义

13 核电站事故与暗杀皇太子事件

1945年9月11日，在东京世田谷的一栋房子里发出一声枪响，这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担任首相的东条英机[1]的住宅，当他得知占领军前来逮捕他后，用手枪对准胸口扣动了扳机。

当美军走进东条英机的屋子时，东条倒在客厅的椅子上，奄奄一息。子弹穿过胸膛，但没有击中要害。

东条英机曾亲自颁发"战场训谕"："生不受俘虏之侮辱，死勿留罪恶之污名"。这个"军人之榜样"自杀未遂，成为敌人的阶下囚，整个日本为之愕然。

日本的战后就是从这个有关"战争责任"的极端的道德风险开始的。

"责任"究竟是什么？在这里，我想就地方性社会与全球化社

---

① 东条英机（1884－1948），日本陆军大将、政治家，曾任日本第40任首相（1941－194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死刑。——译者注

会的有关责任在理解上的不同加以阐述。

昭和天皇退位论

日本战败后，联合国军队占领并统治了日本，最初，在政治上引发争议的是“战争责任究竟由谁来承担”的问题，这是必然的。在东京审判中，曾经的政治首领和军官都异口同声地否认自己的“责任”，在当时，这成为日本人最为关心的话题。关于“战争责任”，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性的观点并存。

一是“一亿人总忏悔”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国民无论大小，每一个个人都负有战争的责任，因此，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人们应该为建设新日本团结一致。

另一种是“天皇有责”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战前的宪法规定天皇拥有绝对的统帅权（对军队具有指挥权），因此，在法律上，天皇是无法逃避战争责任的。

然而，这两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观点很快便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一亿人总忏悔”的观点被认为是符合当政者利益的理论而遭到彻底的批判。即使在战争期间，道德沦丧，日本军队的野蛮行径和残暴行为是事实，但很显然，每一个个人的责任有大有小，以“总忏悔”的一般性观点是无法反驳“特攻队员也有战争责任”的诘问的。

此外，“天皇有责”的观点则不仅仅是反对天皇制的政治派别的观点，而且也受到旧日本军军人和保守派的赞同。在大东亚战争中，包括军人和平民在内，日本人的死亡人数达300万人，他们

绝大多数都是在天皇的名义下赔上自己的生命的，因此，当迎来战争最糟糕的结果——即战败——时，天皇是难以免除道义上的责任的，这是当时的常识。

例如，天皇最贴身的亲信木户幸一[①]——在东京审判中，他被判终身监禁——在狱中曾留下这样的话：

> 如果这次战争的失败一定要让陛下承担责任的话，那么在彻底履行《波茨坦宣言》的时候，换言之，即在媾和条约成立的时候，应面对皇宗皇祖以及国民承担责任，并退位，我以为这是最为妥当的。（省略）如若不这样做的话，恐怕最终会发生只有皇室不承担责任的情况，留下一些令人遗憾的结局，很难说不留下永久的祸根。[②]

回顾一下日本的历史，天皇生前退位而成为太上皇的例子数不胜数，因此为了保护天皇制（国体），昭和天皇承担战争责任而退位的观点的出现极其自然。

但是，美国政府（尤其是GHQ总司令麦克阿瑟）认定，战后日本的统治少不了昭和天皇的协助，因此让天皇承担战争责任一事就变得很难实现，不久，这个话题就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

由此，“单纯的民众受到为政者的欺骗被驱赶到愚蠢的战场”、“昭和天皇也只是军队的傀儡，没有责任”的“战争史观”就成为新生日本的官方见解了。所有的“罪恶”都推在甲级战犯身上，

---

① 木户幸一（1889 - 1977），日本政治家，昭和天皇的亲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1977年病逝。——译者注

② 引自高桥弘《天皇象征》（岩波新书）。

这也是一种十分有益于美国占领政策的逻辑。

然而，此后保守派发出批判的声音——“东京审判是一场胜者审判败者的政治秀”，这个声音广泛地传播到国民之间。其结果就是，甲级战犯被“免责”，大东亚战争中死去的300万日本人以及2 000万亚洲人，没有一个人为此负责。

乱发脾气的大臣

作家麻生几[①]在《无名战士们的记录》中描写了自卫队和东京消防厅机动救援队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注水的内幕。[②]

自卫队的注水工作以中央特殊武器防护队（“中特防”）为中心展开。“中特防”是为应对核化学生物武器的恐怖和攻击而设置的，它接受中央即时应对集团（CRF）司令官的指示和命令，由防卫大臣直接管辖。

但根据麻生的说法，随着核电站事故越来越紧迫，自卫队的指挥权转给了设立在东京电力公司本部的政府核电站事故对策统合联络本部（“对策本部”）。“对策本部”的“实际上的指挥官”是经产大臣海江田万里[③]。

麻生几这样写道：

> 给核反应堆注入海水以及由水罐车给核反应堆炉外面的

---

① 麻生几（1960～ ），日本报告文学作家，著有《宣战布告》《战栗：昭和、平成背后的历史光芒》等。——译者注

② 麻生几，《无名战士们的记录》（《文艺春秋》2011年五月号）、《向前！东日本大地震中抗震救灾的无名战士们的记录》（新潮社）。

③ 海江田万里（1949～ ），日本政治家。2010年在菅直人内阁担任经济产业大臣。——译者注

废弃核燃料的池里放水，从一号炉到六号炉，究竟首先处理哪一个核反应堆炉？是先向核反应堆注水呢？还是先从废弃燃料的池中放水呢？关于这项工作的顺序和对策，以及具体的水量、放水或注水的时间、工作方法等事无巨细，海江田大臣都亲自不断地向自卫队的现场部队下命令，命令中夹杂着骂声。

海江田大臣不仅对自卫队，对消防厅也像对待自己属下的部队一般下发指令。3 月 18 日，由于核反应堆炉爆炸，现场需要处理，被媒体大肆报道为“拯救日本的最后一张牌”的机动救援队的放水工作被大大推迟，这时，海江田大臣向聚集在“对策本部”的消防厅干部怒气冲天地喊道：

“快！再磨磨蹭蹭的，就给（消防队员们）以处分了！”

这件事后来因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曾直接向菅直人[①]首相抗议、首相出来赔礼道歉而为人所知。

正如麻生所说的那样，在《核能对策特别措置法》中根本没有经产大臣可以指挥防卫省自卫队以及消防厅的说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江田大臣为人们所指责——“不负责任地一个劲儿地下达让人舍命的命令”，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我想说的并非是一个政治家的资质和人性。即使首相不到东京电力公司本部乱发一通脾气，或者经产大臣不对在现场拼着性命工作的自卫队队员和消防队员们大声责骂，所有的组织都能

---

① 菅直人（1946～ ），日本政治家，曾任第 94 任日本首相（2010～2011）。——译者注

够顺利地发挥效能并防止核电站事故灾难的扩大吗？我绝不那么认为。

日本国的法律制度规定，当核能发生重大灾害时，核能安全委员会以及核能安全保安院的专家们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确定对策，根据对策，防卫大臣向自卫队统合幕僚监部及陆上幕僚长发出指令。但这次事故，专家们早早地就放弃了责任，在极度混乱之中，原来的统治结构崩溃殆尽。

这样一来，此后的工作就只能按照人的本能的命令来指挥组织运行。令人感到恐惧的是，在日本，既没有遇到恐慌时不乱发脾气的政治家，也没有能够处理诸如核电站事故这样的前所未有的灾害的人。

消失了的核电站事故责任

《核能损害赔偿法》（《核赔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由开发公司承担核能损害的无过失（无限）责任，但在补充条款中写有这样一条免责条件："其损害如果是由异常巨大的自然灾害或社会性动乱引起的话，不受此条款的限制。"东京电力公司一开始希望根据《核赔法》能够免责，因为东日本大地震中海啸的规模超过了安全标准。

对此，日本政府并不认可他们的免责说法，一直认为事故的责任在东京电力公司一方。但另一方面，又对其责任究竟是如何认定的三缄其口。

最终，东京电力公司以从政府那里获得援助资金为交换，放弃了免责的主张，因此，从法律上讲，毫无疑问，东京电力公司

对福岛核电站的事故应负起“无限的责任”。然而，究竟什么是核电站事故的“无限责任”？

按《公司法》的规定，股份公司的所有者是股东，他们要先于其他有利益关系的人负有限的责任，其上限在其出资额之内。根据《公司更生法》和《民事再生法》的规定，股票失去价值后，如果仍遗留下损失和债务，那么融资银行、购买公司债（电力公司债）的投资者们要负有限的责任，其上限仍在其出资的范围内。如此看来，这些法律只规定了有限责任。

此后，日本政府根据《核能损害赔偿支援机构法》（《赔偿法》）提出，为了不使东京电力公司的债务过重，应无限制地提供资金援助。因而，电力公司债和融资得到百分之百的保护，而债权者的责任则消失殆尽。此外为维持上市，股价虽然回落，但东京电力公司的法律上的所有者——即股东们——不用负任何的责任。

如此一来，在核电站事故中，东京电力公司虽然负起“无限的”责任，但其法律上的所有者——即股东们——以及应承担责任的债权者们连“有限”的责任都被“免除”掉了。那么，谁来负这个“责任”呢？

核能发电是作为一项日本的国策实施的，因此，我们不能将事故的责任一股脑地都加在电力公司的身上。因而，在审议《赔偿法》时，这个法律被修订为：“到目前为止，国家一直在推行核能政策，同时也担负由此而产生的社会责任。”但是，推动核能发电的是历届的自民党政府，民主党本来就缺乏这种责任意识。

不仅如此，事故发生时，最应承担责任的首相不知何时摇身

一变，成为"去核电化的斗士"，一个劲地批判这是"经产省和东京电力公司的阴谋"。经过难以摆到桌面上的党内斗争，新内阁诞生，在审议方面为了得到参议院的协助，在追究在野党——自民党——的"核电站事故责任"问题上，民主党变得噤若寒蝉。

不仅仅是股东责任和债权者责任，就连政治责任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在日本就不得不出现由行政承担责任的形式，经产省事务次官、核能安全保安院院长以及资源能源厅长官引咎辞职。但据说这并不是处分，而是一种劝退，根据提前退职的规定，他们的退职金比在职时高出20%左右。

最终，前所未有的悲惨事故的责任主体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当然，我们批判政治家、官僚以及东京电力公司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但这种"无责任"的结构里隐藏着更加深刻的问题。

无限责任与无责任

1923年12月27日，皇太子（即后来的昭和天皇）在前往帝国议会成立大会途中，一名25岁的恐怖分子袭击了皇太子乘坐的车辆。

袭击者叫难波大助[①]，出生于山口县的一个名门之家，其父亲是众议院议员。难波大助从第一早稻田高等学院退学后，在东京打日工时，受到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极大影响，计划向皇室成员实施暗杀行为。难波的计划是混入群众之中，用改装成手杖

---

① 难波大助（1899－1924），1924年因暗杀天皇事件被判处死刑。——译者注

的霰弹枪向前往议会成立大会的皇太子乘坐的车辆射击。子弹虽然穿透车辆的窗户，但只是随车的侍卫长受了点儿轻伤，皇太子安然无恙。

政治学家丸山真男[①]曾举这个发生于“大正民主主义”时代的暗杀事件为例，对日本社会的“责任”结构进行了分析。[②]

暗杀事件发生后，首相山本权兵卫[③]立即提出辞呈，同时内阁总辞职。而且，警视总监和警视厅警务部长因当天的警卫责任而被处以惩戒免职的处分，不仅如此，在道路两旁担任警卫的（其实他们根本无法阻止事件的发生）普通警察也被免职。

难波的出生地山口县的知事以及京都府的知事被处以申饬的处分——据说难波在前往东京途中曾在京都逗留过，而难波老家农村的正月里的活动也被取消，人们都要服“丧”。难波毕业小学的校长以及班主任辞职，担任众议院议员的难波的父亲在自家门前结青竹、关禁闭，半年后饿死家中。

人们的大脑里预装了因果论的思维，因此，当我们身上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时，就认为一定会有某种“原因”。于是，带来这个原因的人就必须承担“责任”。

在古代巫术的世界里，王与其说是民众的统治者，不如说被当作能够与神进行交流的灵媒。其作用是获得丰产之神的恩宠，

---

① 丸山真男（1914～1996），日本政治学家、思想史学家，其学术研究被后人称作“丸山政治学”或“丸山思想史学”，著有《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等。——译者注

②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岩波新书）。

③ 山本权兵卫（1852～1933），日本政治家，曾任日本第16任首相（1913～1914），第22任首相（1923～1924）。——译者注

因此，一旦持续干旱，人们就杀掉王，把他当作神的牺牲品。旱灾、洪水、地震等天地的异变被认为是激怒神的王的“责任”。

这种“巫术性的责任”也是一种范围不确定的“无限责任”。与暗杀皇太子事件相关的所有的人都要受到某种“耻辱”。从饿死到申饬处分，如果他们不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话，整个社会的“耻辱”就不会被抹去。

丸山真男认为，这种极其严酷的“无限责任”使日本变成了一个“无责任社会”。

在日本，一旦某人承担了“责任”，被当作替罪羊时，其损害极其严重，因此人们都想方设法逃避责任。其结果就是，权限与责任相分离，从外面根本认识不清哪里是权力的中心。于是，在日本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奇妙的无责任的社会，即在这个社会里，天皇是“空的中心”，没有一个人会承担“责任”。

14 福岛的中心是空的

我们认为“自己为自己所做的事承担责任”是理所应当的，但这种“自我责任”在近代之前是不存在的。

自从网野善彦[1]出现以来，日本历史学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人们关注的焦点从权力社会向民众社会转变。近几年来，由于日本各地的古文书等调查和解读工作的展开，人们了解到日本中世农村的运营状况。

战国时代的会战是公共事业

在战国时代的农村，旱灾、饥馑频繁发生，仅依靠农业是无法养活村里人的，因此，当冬季至春季积蓄被吃光时，就出现大量的因饥饿而死去的人。在这种极限状态下，战国初期的农村是赤裸裸的暴力世界。

---

[1] 网野善彦（1928～2004），日本历史学家，著有《日本中世的民众像：平民与工匠》《日本中世的非农业民与天皇》《何谓“日本”》等。——译者注

战国时代重要的会战大多发生在冬春的农闲季节。这是因为大名、领主将农民当作杂兵[1]带到战场，试图让他们生存下来，如果放任不管他们的话，他们会饿死的。[2]

尽管如此，战国的大名们并没有付给参加会战的百姓们薪金。他们不是从事劳作，而是为武士们打仗，在成为战场的村庄里，他们可以胡作非为。战国时代的战争是一种公共事业，大名们进攻邻国，不是为了统一天下，而是为了给村里的人们提供一个“职业”。

战场上的掠夺十分彻底，储备的食粮、衣服等可以换钱的东西都被一扫而光，而且他们还掠夺女人和孩子，将他们到处贩卖，这是常见的现象。战国时代价值最高的“商品”是奴隶，会战一结束，镇子里就会形成一个人贩子市场，如果国内没有人买的话，那么他们会将奴隶从长崎、平户装上葡萄牙商船，经由澳门，贩卖到东南亚。

这种暴力行为渗透于农村内部，一部分长老们联合起来，以微不足道的瑕疵为理由，将村里人的财产没收，或将其全家从村子里驱逐出去，有时还将他们斩尽杀绝。农耕社会是一种以土地为中心无法退出的世界，因此，一切事务都由全体一致同意的形式决定。于是，当有人不同意时，那就只能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这种中世初期的农村就是由严酷暴力的规则运营的。

但进入中世中期后，一种秩序自然而然地产生。这就是“连

---

① 身份低下的士兵。——译者注

② 下面的论述依据了藤木久志的《杂兵们的战场：中世的佣兵和猎奴隶者》（朝日选书）、《中世民众的世界：农村的生活与规则》（岩波新书）。

带责任”。

当时，对农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出走和逃散，即欠了一屁股债的村民放弃土地离开村子。尤其是丰臣秀吉[1]统一天下，接二连三地修筑伏见城、聚乐第等大型建筑物时，亟须大量的人手，没有生路的百姓们便流入京都，其近郊的农村深深地陷入人口稀疏化的苦恼之中。

农村人口虽然有所减少，但领主并不减免他们的年租，因此，农村越贫穷，逃散的人就越多，所以这对领主来说，对村民来说都是极其严重的问题。在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上，领主不是将不喜欢的村民从村子里赶走以增加自己土地的拥有量，而是想方设法让他们留在村子里。

于是，以“家”为单位的土地管理制度以及“五人组”的连带责任制度开始出现。

在中世的农村社会里，原则上土地是不能分割或买卖的，它与“家”一道由家族的长子继承。即使土地因家人的逃散等而被放弃，也不会为村里的其他人所分配，而是作为公有用地，大家一起耕种。当土地继承人成人后或当事人（即真正的土地所有权者）回来后，土地返还给这家人，这是当时的习惯。

由此，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这样一种制度，即在确定了土地所有权之后，邻居们互相帮助，互相监视，维持着村庄的秩序。这就是“五人组”。后来，这种制度被丰臣秀吉用于京都的管理上，也为江户幕府所继承，一直延续下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前臭名昭彰的“邻组”就是这种制度。

---

① 丰臣秀吉（1537－1598），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将。——译者注

在历史教材里，“五人组”被解释为权力机构为管理农村而强制推行的制度，但在最近的中世史研究领域，观点发生了变化，人们认为这是领主对农村原有制度的继承。中世农村的人们都是农业个体经营者，对领主来说，他们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如果他们对领主有所不满的话，有时会打破这种主从关系。位于两村交界处的村庄分别向两个村子的大名平分纳贡的数量，以获得安全上的保障。

因此，领主与村民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战国时期的大名们对村民放弃土地的耕种是毫无办法的。因为权力机构无法单方面地强制推行民众们不喜欢的制度，所以他们对村民的弃地无能为力。

穷人的银行连带责任

孟加拉国的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创立了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以小额信贷（microcredit）的模式改善贫困，取得极大的成果，因此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当这种活用“市场原理”的小额融资制度出现时，最感到困惑的不是政府和现有的金融机构，而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善意”的人们。因为格莱珉银行不仅从穷人那里获取高额的利息（年利息10～20%），而且还让贷款者负“连带责任”。

小额信贷是向日均生活费在一美元以下的最贫困的群体（主要是女性）发放的无担保融资，但在发放融资时，格莱珉银行开出一个条件，即以地缘为中心的5人组成一个小组。

孟加拉国的农村是传统的男尊女卑的社会，毫无疑问，妇女

们此前从未从银行获得过融资，甚至连钱碰都没碰过。她们以借得的极少的融资为本钱，或养牛，或购置编织竹笼的材料，用获得的利润偿还贷款。

小组中只要有一人无法偿还，其他人就代为支付。当整个小组都无法偿还时，就会发生拖欠债务的情况，但格莱珉银行不会为追讨债务而采取司法诉讼的手段。此外，当由于自然灾害等无法预料的情况发生，延误偿还贷款的时间时，他们的债务期限也不会被延长，而是获得为改变现状所需要的追加融资。此次的融资将签订更加长期的偿还合同。

小额信贷的方法彻底违反了此前金融界的常识。但格莱珉银行的融资偿还率非常高，达98%，作为一种商业活动，银行在获得利益的同时，又改善了贫困。从事福祉和援助事业的人们背地里批判道：格莱珉银行的违约率之所以低，是因为如果借贷人不偿还资金的话，那么，在地域社会里，他们会很丢面子。

然而，尤努斯对这种观点提出反驳，非常简洁地阐明了小额信贷之所以发挥作用的原因。①

向穷人施以恩惠是夺取他们的尊严、让他们失去获得收入热情的最坏的方法。

格莱珉银行的顾客们此前曾无计可施，只能从高利贷那里以"周息"10%（或"日息"10%）的高额利息借钱。但自从由于能够从格莱珉银行那里以低息获得融资后，他们可以用劳动挣来的钱偿还贷款。对极其贫困状态中被剥夺了人权的妇女们来说，

---

① 穆罕默德·尤努斯、艾伦·乔利斯，《穆罕默德·尤努斯自传：努力消除贫困的银行家》（早川书房）。

"偿还借来的钱"使她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到自尊。

格莱珉银行以连带责任为条件的理由在于，她们越是对"自己负责"，就会变得越坚强。

她们拖欠贷款的最大原因是，她们的丈夫将钱占为己有。在孟加拉国的文化中，妻子的钱是属于丈夫的，在家庭内部，没有一个人会站在她的一边。

但这对负有连带责任的"五人组"却是个大问题。如果其中一人无法偿还贷款，其余4人就要接手她的债务，因此，毫无疑问，她们会强烈地抗议丈夫们的行为。在"自我负责"的情况下无法实现的事情，在"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却出现了实现的可能性。

小额信贷的实验告诉我们，连带责任不仅仅是相互监视，而且还是相互帮助的一种原理。孟加拉国的妇女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在传统的女性社会中，她们是孤立无援的。于是，以"融资"为契机产生了连带责任的社群，以自由经济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秩序逐渐开始成长。

法律的绝对性和自我责任

近代社会试图建立一个与日本中世农村社会以及孟加拉国连带责任截然不同的"责任"社会秩序。这就是"法律的绝对性"和"自我责任"。近代社会之前也有法律和规定，但那是源自统治者个人的权力的东西，法律的解释和运用都是恣意妄为的。与此相反，近代社会中，一旦经由正当的程序确定下法律，即使是国王也必须遵从。

在基督教中，《圣经》中记载的神的法律（与神签订的契约）是绝对的。这种思维也适用于世俗社会，通过将法律置于权力者之上，法治社会便形成了。

在由法律统治的社会里，怎样是合法的，怎样是违法的，这事先都已向社会所有的成员明示，违法行为的责任也一一设置了上限。人们因此得以放心地生活、从事商业活动。

人治社会的可预测性很低，当统治者发生变化时，有的人或被剥夺所有权，有的人或被流放，最坏的时候，有人可能还会被斩首。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是无法信任其他人的，物质和金钱的往来只限于亲属间，无法扩展到共同体之外。“法治”是自由市场不可或缺的基础。

随着社会不断走向富裕，从“无限责任（=无责任）”到“连带责任”再到“自我责任”，这种责任的变化不断地“进步”着。但在日本，人们并未彻底理解契约的绝对性，因此，法律只是一种暂时性的互通有无（努力目标）。

20世纪80年代，在“日美框架协议”中，美国激烈批评的是，日本虽然有《垄断禁止法》，但在通产省的主持下，日本企业团体结成卡特尔（cartel）。中央机关率先做出有悖法律的行为，这在法治国家中是不可想象的，但官僚们丝毫不明白为什么这会成为批评的对象。行政上的事务是做有利于“大家”的事情，因此，“大家”即便都不去遵守于己无利的法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毫无疑问，这个“大家”里面并不包含消费者和外国人。）

然而，看上去非常好的做法中蕴含着一个重大的问题，这就是如果没有法律的绝对性的话，那么人们就无法负起自己的责任。

在近代社会，自由与自我责任是互为表里的，没有自我责任就意味着没有自由（是某人的奴隶）。你要想自由地生存下去，就必须积极地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如果说这是“近代人”的常识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想象竟然还会有人否定自我责任。

但是，在巫术式的无限责任的国家，自我责任与“没有规则，只是单方面地把责任强加于一方”是一样的。针对厚生劳动省女局长的“国策调查”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个国家的司法机关不仅歪曲法律，而且还捏造证据，让无辜的人担负“责任”，这种组织实在是让人厌恶至极。这样一来，人们极力避免谈论自我责任就是十分正常的。

但是，无法担负起自我责任的社会里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因为在这个组织内部是无法组建治理（governance）结构的。

股东拥有主权是“谎言”

在近代社会里，权限与责任是一一对应的。组织的末端只有小小的权限和小小的责任，拥有较大权限的组织的中心承担着较大的责任。但在日本的组织里，权限和责任是相分离的，从外部来看，人们无从知道权力中心在什么地方。

当然，这并非日本社会特有的病理现象。在封闭的农村社会里，一步棋走错，就会被追究无限的责任，因此日本的组织采取这种自我防卫的策略是极其自然的。在任何人都不愿意承担责任的社会里，政策都是由全体成员一致同意的方式决定的，不需要任何人来承担责任的组织就此形成。

然而，一旦无法免除“责任”的重大事件发生时，这样的组

织就会停止运行。重大事件一出现，就必须有人对此承担"无限的"责任，因此这个组织只能选择将该事件秘而不宣，不让外部人员知晓，秘密地处理这个事件。奥林巴斯公司的所作所为就是这种典型，同样缺少治理的日本企业除了奥林巴斯之外，还有许多。

奥林巴斯公司的董事会和审计人员虽然对公司经营人员在20年的时间里隐瞒巨额亏损的情况有所察觉，但视而不见，只是想将问题一拖再拖。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公司的丑态被曝光了的话，就像未能保护住"农村规则"的英国人总经理那样，他们立刻就会被驱逐出公司（共同体）。

这是日本企业结构的问题，即使让董事会里的人拥有改革意识，或增加公司外部董事的数量，也几乎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社会顽固地拒绝"股东拥有主权"。

"股东拥有主权"只是一个让公司发挥管理功能的谎话。公司之所以需要注意一个"谎言"，是由于在决定组织中的权限和责任时，需要一个"公司的所有者是谁"的基本设置。

要想组建一个权力结构，必须有一个权力的源泉。在民主政治国家中，这个源泉就是"国民是主权拥有者"的"虚构"；在公司里，这个源泉就是"股东拥有主权"。所谓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指该公司努力做到将"拥有主权的"股东置于权力的中心位置，并对外明示公司的权力结构。

然而，在日本，这种方式几乎不为人们所理解，人们一直批判"股东资本主义"是有悖于日本的善良风俗的。公司是职员、交易对方以及消费者等人所"共有的东西"，不允许股东将它私

有化。

当然，公司是市场中的一个玩家，因此，它与构成市场的诸多人具有某种利害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不能将公司职员（被雇佣者）、交易对方以及顾客当作权力的源泉来建构公司的治理。“公司是大家的”这种说法，无非表明“公司里无人承担责任”而已。

奥林巴斯公司就继承了没有治理的日本的“优秀传统”。与将日本带入毁灭境地的陆军、海军的无责任体制一样，这个传统原封不动地为战后的官僚制度以及政治制度所继承。

巫术式的无限责任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责任问题落不到实处是因为日本社会里缺乏近代性的责任。

《核能损害赔偿法》规定：公司承担核电站事故的“无限责任”。但所谓近代性的责任是指有限责任，因此，从根本上来说，这个法律是违背近代理念的。

上市公司的所有者是股东，但他们只承担出资范围里的责任。债权人只要其投资额全部损失掉，就不会被追究责任。

股东和债权人承担的是有限责任，因此，公司的责任也只能是有限的。只有这样考虑问题，那么人们就可以事先决定，当发生重大事故时，如何处理公司无法承担的损害赔偿。

然而，日本政府对“重大灾害的责任”难题避而不谈，只是以“核电站不会发生事故”为前提，将容易向国民解释的无限责任强加在公司身上。电力公司之所以接受这个条件，是因为他们

认为，无限责任本来就无法承担，对此，国家会出面干预的。

于是，日本社会就失去了“责任”。

在没有法治的社会里，人们无法承担自我责任，而连带责任又被当作“封建制度下的顽疾”而被彻底否定了。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剩下的只有巫术式的无限责任了。

核电站事故之后，东京电力公司的职员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来自“社会”的压力。

抗议的电话一股脑地打向东京电力公司的客服中心，公司职员们24小时都在不停地赔罪。节假日，他们只是在家附近的居酒屋里吃饭，投诉电话就打到公司里来，于是，东京电力公司通知职员们谨慎行事，不要在外面吃饭。我还听说，在东京电力公司里上班的家长参加孩子学校的运动会，也受到人们的指责：“你怎么不到福岛的受害者那里去？”

东京电力公司的职员们绝大多数与核电站事故无关。但在巫术式的责任中，只要你在东京电力公司上班，你就负有“恶名”，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

所有的日本人应该都亲身体验过这种巫术式责任的残酷性。因此，不仅仅是行政机关、公司，甚至连自治会、家长教师联谊会（PTA）等，所有的组织都逃避责任，趋向于“无责任化”。

明治时代的日本是一个风险国家，它是有伊藤博文[1]、山县有朋[2]等幕末的志士们创建的，国家的管理权也在这些“创建者”们

---

① 伊藤博文（1841－1909），日本政治家，日本第1任首相（1885－1888）。——译者注

② 山县有朋（1838－1922），日本政治家，日本第3任首相（1889－1891）、第9任首相（1898－1900）。——译者注

的手里。但无论是国家也罢，公司也罢，创建者一旦引退，这个组织就变得形式化了。于是，国家或公司只剩下一个治理的名而已，不知什么时候，治理结构变得空洞化。

战后日本，占领军强制重组治理结构，但由于日本人无法理解权限与责任一一对应的近代性的治理，因此，只是形式上像样，其内部仍然建立了一个日本人自己熟悉的农村社会。

在没有治理的社会里，也没有“责任”。战争也好，核电站事故也好，日本人虽然也追究责任，但他们拥有的是一个“空的中心”，这一点在日本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

小结（7）

- 前近代：无限责任▶无责任→空的中心

  ▼

- 连带责任（中世的农村社会）
- 近代：有限责任▶自我责任

  法律（契约）的绝对性

- 治理（governance）▶责任与权限是一一对应的
-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股东成为“主权者”重组治理结构

- 公司是大家的▶公司里没有人承担责任

  ▼

- 巫术式的无限责任的世界

15　我们的失败·政治篇

在2009年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获得308个议席，成功地进行了“历史性的”政权交替。然而，鸠山内阁[1]在普天间基地的迁移问题上受挫，紧接着小泽干事长[2]因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而遭到强制起诉。最后，鸠山本人的个人捐款的虚假记录一事被曝光，仅仅过去9个月，鸠山内阁就将政权拱手相让。

后任的菅内阁[3]刚刚成立，就在参议院选举中丧失了大量议席，在众参失衡的国会中，民主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此外，由于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发生，民主党失去管理能力，加之原首脑小泽的固执己见，出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事

---

① 2009年9月成立的内阁，首相由鸠山由纪夫（1947－ ）担任，是为日本第93任首相。——译者注

② 小泽一郎（1943－ ），2008年9月至2009年6月任日本民主党干事长。——译者注

③ 2010年6月成立的内阁，首相由菅直人（1946－ ）担任，是为日本第94任首相。——译者注

态——民主党内部涌现出许多支持"内阁不信任案"的人，仅仅一年三个月的时间，政权就交给了野田内阁[1]。

民主党政权为什么失败了？"历史性的政权交替"仅仅是一场滑稽戏吗？抑或是日本社会本身在本质上出现了问题？

要批判当下，必须学习历史。日本政治、经济功能的不完备并非是最近几年的事，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大约40年前（20世纪70年代）。

观看电视上的讨论节目，我们知道，专家们就"如何医治日本"的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除此之外，关于"日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争论现在基本上已经结束（人们的意见大致上一致）。

下面，我将分别在"政治篇"和"经济篇"两章中回顾一下"我们的失败"的问题。

公共选择的理论

在进行论述之前，我们必须对这样一个问题加以确认，即国家治理结构中发生了严重问题的不仅只有日本，而且这是世界上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曾几何时，"日本一蹶不振，而欧美的民主主义则具有美好的前景"的说法成为定论，但是，当我们看到欧元危机所引起的恐慌、茶党的行为以及"占领华尔街"的政治运动，我们明确了解到世界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民主政治的乌托邦"。

---

① 2011年9月成立的内阁，首相由野田佳彦（1957～ ）担任，是为日本第95任首相。——译者注

关于这一点，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他是政治经济学上“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于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指出。[1]

在市场中，我们每天都重复着决断：“花多少钱买呢”、“这个商品多少钱卖呢。”买了苹果就买不了香蕉了，因此所谓决断就是一种“选择”的问题。经济学就是研究个人或企业做出的这样一种“私人选择”的学问。

布坎南认为，就如同我们在市场中所做的私人的选择一样，在政治上，我们也进行着一种“投票”的选择（如果投票给某个候选人，那么，你就无法将票再投给另外的候选人了）。由此，我们可以用经济学的手法来分析“公共选择”，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公共选择（=政治）中，有三个主要玩家，即政治家、官僚和有权利的人。布坎南假设，正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在市场中任何人都要获利（不愿受损），那么，政治上的玩家们也想将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对此，人们常常批判布坎南否定了人们的公共心理，其实这是个误解。

政治家和官僚中一定会存在这样一种人，即较之于个人的出人头地，他将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或许这只是一种表面文章，实际上他只考虑自身的利益。那么，如何弄清楚这个事实呢？

布坎南的回答十分简洁：

---

① 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图洛克著，加藤宽译，《穷途末路的民主主义》（劲草书房）。

"假定政治上的玩家都是注重经济合理性的人，那么，我们只要看看他是否能够很好地解释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就可以了。"

根据布坎南的假说，政治家最关注的目标就是在下一次选举中当选。无论他具有多么远大的理想，政治家一旦落选，那他就只是"垃圾"而已。

同样，官僚首先考虑的是提升自己的地位，因此，他会竭力扩大自己所属组织的权限。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机关，出人头地的条件是由他带给组织多大的利益而决定的。（即便他有高远的理想，与政治家一样，如果在组织内无法出人头地，那这个理想根本无法实现。）

假设有权利的人都是利己的，那么，他们一定会通过投票以获得多大的经济利益（资助资金、公共事业）为基准选择候选人。本来，绝大多数的选举，无论人们投票与否都根本不会影响到大局。这样的话，注重经济合理性的个人就不会关注选举，那他专门去投票，其中肯定有着某种诱因。

从这个假说出发，布坎南从逻辑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民主政治国家根本无法阻止债务的膨胀。"因为，为了当选，政治家们向有权利的人散发金钱；为了扩大权限，官僚们要求增加预算；而有权利的人则以投票为交换，要求实际利益。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解释是极其令人不快的。

然而，现实情况是，日本国的债务持续膨胀，最终达到史无前例的1 000兆日元。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但此前竟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简洁明了地解释国家债务膨胀的理由。

官僚内阁制与政府机关代表制

政治学家饭尾润①在对政治家、官僚进行了大量的采访调查（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曾对日本这个国家是以怎样的权力关系进行管理的这个问题作了论证，他将日本的管理总结为三个关键词："官僚内阁制"、"政府机关代表制"和"政府与执政党的二元体制"。② 这三个因素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是它们建构了稳定的（很难改变的）日本的"政治"。

所谓议院内阁制是这样一种结构，即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的议员（国民代表）组成议会，国家权力都集中在这个议会之中。在总统制中，权力分散于总统与议会之中，与此相反，议院内阁制的权力由议会集中行使。*

> *在美国议会中，关于联邦债务的上限问题引起极大的争议，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美国总统几乎没有统制议会的权限。在日本，尽管没有政治上的领袖群体，但即便实行了总统制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在议院内阁制中，议会内占多数席位的政党（联合政党）党魁当选为内阁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任命各个政府机关的国务大臣，从而组成政府。在这种权力流动（管理结构）中政府与执政党是一体的，因此，议会中的对立就在政府 = 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

---

① 饭尾润（1962～　），日本政治学家。著有《民营化的政治过程：临调型改革的成果与极限》《日本的治理结构：从官僚内阁制到议院内阁制》《从政局到政策：日本政治的成熟与转变》等。——译者注

② 饭尾润，《日本的治理结构：从官僚内阁制到议院内阁制》（中公新书）。

展开。

但实际上在日本政治中常常出现非常奇妙的现象，本来这在议院内阁制下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这种奇妙的现象就是各个政府机关实质上被赋予了否决权。自民党时代，内阁会议的原则是全体一致同意，遭到大臣反对的议题是得不到内阁会议的通过的。大臣作为所任机关的代理人要求代表机关的利益。

因此，在内阁会议进行表决前，事先沟通成为不可或缺的做法。在内阁会议召开前一天，各个机关的事务次官聚集在一起，先召开事务次官会议。只有在事务次官会议上没有异议的议题才被提交到次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进行议论。

大臣是各个政府机关的代理人，其结合体组成内阁，这就是“官僚内阁制”。

官僚内阁制的特点是，政府最终决议的主体不明确，无法进行必要的表决，政权被悬空化了。这是日本中枢的崩溃（@古贺茂明[①]），但也是日本式治理结构的必然结果。

在民主政治中，国民代表是国会议员，他们治理国家。这就是国民国家。但是在日本，由于官僚制侵蚀了国家，这种治理结构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日本的官僚制通过地方政府（地方自治体、地方公共团体）以及企业团体等将它的根系延伸到社会各个角落。但这个权力网又被各自为政的政府机关所分割，因此，各个政府机关围绕着各

---

① 古贺茂明（1956－　），原日本经产省官僚，著有《日本中枢的崩溃》《官僚的责任》等。——译者注

自的权限问题展开激烈的竞争。

在日本式的官僚制下，政策不是自上而下地传达的，而是通过现实情况的积累形成的。

企业团体等向政府机关提出必要的政策，管辖该政策的部门将这种要求汇总，制作政策草案。这个草案经过叫作“合议”或“相议”的手续后，获得政府机关里的相关局的同意，再经过局长间的同意后成为该机关的议案。

在日本，官僚制并非一种封闭的存在，它与社会的关系极其紧密。这也就是社会上的势力通过企业团体或政治家侵蚀官僚制的情况。也就是说，在日本，所谓官僚制起到了社会各个组织召集人的作用。

日本是政府机关联邦国家

议院内阁制中的国会议员是国民代表，但在官僚内阁制中，社会组织的各式各样的利益都是由官僚代言的。这就是“政府机关代表制”，日本是一个自律的政府机关联邦国家，因此，人们有时将日本称作“政府机关联邦国家日本”（United Ministries of Japan）。

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社会成熟，政策饱和，于是出现了诸多的问题。

官僚们最先考虑的是提出新政策的议案，扩大权限，因此，多个政府机关设立相似的法律，毫无节制地增加法律制度。

随着行政的复杂化以及权限的分散化，拥有“否决权”的人数增加，形成统一意见的时间和成本也相应增加。

最大的问题在于，对既有权力加以干涉的政策议案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一来，官僚内阁制与政府机关代表制就完全应付不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出现的危机。

日本政治的另一大特点是"政府、执政党的二元体制"，各个政党都号称"执政党"，拉大与政府之间的距离。

自民党时代，党的政务调查会承担了实质上的立法活动，"族议员"（派系中的强势议员）实质上掌握了政策决定权。这就是"派系政治"。但如前所述，在官僚内阁制中，政府没有统制官僚的权力，因此，自然而然地政治家们就从其他地方寻找其权限。

得不到执政党同意的法案不会在内阁会议上形成决议，当这个不成文的法律出现时，官僚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策，就不得不向政治家们请求支援。在日本，国会的运营被视为政党的专有权，政府（内阁）是无法干预的，因此执政党议员与在野党议员之间如果没有默契，那么，一个法案就得不到议会的通过。

其结果就出现了一种奇妙的现象，即在"国家与政治"之间，执政党与在野党在国会审议中观点越不一致，官僚就越难以应付，而政治家的权限则越大。

此外，在自民党的人事体系中，大臣成为一种名誉职务，与他的能力和业绩没有关系，这个职务被平等地赋予当选次数达到一定数量以上的人，因此，权力实际上都集中于比官僚们更加精通政策的"族议员"手里。这种现象被称作"政高官低"，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大量出现年轻的官僚们离开政府机关走向政治家道路的事例。

"政府、执政党二元体制"是在官僚内阁制和政府机关代表制

的基础上，作为“国民代表”的政治家们介入行政的一种机制，但他们在行为上为选举区和受支持团体的利益所左右，对整个日本的利益毫不关心。

“日本改造计划”的失败

现在重温民主党的宣言（2009 年众议院选举时的宣言），令人心生感慨。其宣言的开头列举了其政党的政权设想“五原则”。这个鸠山内阁的“五原则”是这样的：

> 原则 1　从一切依赖于官僚的政治转变为政党承担责任的由政治家主导的政治。
>
> 原则 2　从政府与执政党两相区别的二元体制转变为由内阁决策的一元化体制。
>
> 原则 3　从政府机关各自为政的利益转变为由首相官邸主导的国家利益。
>
> 原则 4　从纵向的特权社会转变为横向的纽带社会。
>
> 原则 5　从中央集权转变为地区拥有主动权。

所谓的“官僚内阁制”并非指国务大臣们根据内阁总理大臣的指示管理各政府机关，而是各个大臣作为政府机关的代表行使权力。于是，民主党废除了事前召开事务次官会议进行沟通的形式，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政治家进驻政府机关，行使以政治为主导的事务决定权。（干部层职员的人事任免也由政治家来决定。）

与此同时，政府设立“国家战略局”，以取代事务次官会议，发挥联合调整的作用，此外这个局还承担预算框架的设定工作。

民主党宣言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述。

在"政府机关代表制"中，官僚像使唤自己的手脚一样来使唤地方政府和企业团体，他们为各个社会组织的利益进行代言，参与从政策的提案到实行的整个过程。（同时，利益关系人以政治家和企业团体为中介，对官僚的政策决定产生影响。）于是，民主党全面禁止官僚转职到企业等，目的在于断绝官僚与民间的勾结。

宣言中还写道：大幅度地委以地方政府权限的同时，废止"带有附加条件的补助金"制度，而代之以可以自由使用的"一次性拨款"，这样可以从财政上让地方政府独立，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分工更加明确。减少耕种面积的政策也被废止，代之以向农户施行"户别所得补偿制度"，就像欧盟（EU）所做的那样。这个制度不仅给"农协"——这曾是自民党聚集选票的大户——以沉重打击，而且还可以应对将来大米关税的下调。

"政府、执政党二元体制"通过作为"执政党"的政党与政府之间拉开距离，使得介入"族议员"等党（派系）内势力强大的人掌握的非正式的行政常态化。民主党的宣言还明确提出：政府与执政党一元化，政策决定权集中于内阁。

由于为过去所束缚，自民党缩手缩脚，无所事事，其执政也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看到这一点，民主党从理念上对日本的管理结构作了极为详尽的分析，重新规划设计图，试图改变整个国家管理体系。探究其根源，或许可以追溯到小泽一郎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我们不能说该书对现状所作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对应方法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民主党的"日本改造计划"却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这里面有仅以首相个人的资质无法解释的结构性的原因。

民主党内阁 VS 官僚内阁

按照民主党的"原理主义者"们的理解，政权交替后，日本将并列存在两个权力中心。一个是以通过选举选出的国民代表为基础的民主党内阁，另一个是以政府机关代表为基础的官僚内阁。

一个国家内是不能存在两个权力中心的，因此，民主党内阁必须通过权力斗争打倒官僚内阁。由此，民主党开始了对不同事务工作方面的官僚们的打击，但事实上主战场却在其他地方。

日本的官僚制大体上具有三种权力的根源。

一是官僚本身具有事实上的立法权。

在日本，只有通过内阁法制局审查的法案才能够提交国会。这么做据说是为了在统一的、不相互矛盾的规定中建构一个法令体系。现实当中，能够参考复杂、奇怪的庞大法令数据的人只有该政府机关的官僚，而本应是立法机构的国会却几乎不具备立法功能。

第二是官僚独自占有法律的解释权，事实上就拥有了司法权。

在地方自治体中，一旦出现法令上不清楚的地方，地方上的相关人员就向有关政府机关咨询，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官僚传达的解释是正确的。这也是由于官僚独占法令数据才产生的结果，因此，官僚不仅仅在立法方面，而且在司法方面也行使着他们的权力。

第三是官僚具有编制预算的权力。

日本国的预算是财物省（主计局）"综合调整"了各个政府机

关的需求后编制的，因此，这与官僚给自己作预算没有两样。当然，政治家通过“族议员”等可以干预预算，但这种非正式的影响力丝毫无法减弱官僚的权限。

从宪法上看，日本是三权分立的国家，但实际上政府机关不仅拥有行政权，而且拥有立法权和司法权，甚至还握有预算编制权。更为过分的是，各政府机关可以通过未经法律认证的通告设置规定的范围，或通过认可、许可的方式打破规定，以行使他们对同业界的影响力，确保他们将来转职的去向。

为了断绝这种权力的根源，有必要对政与官的作用进行彻底的重组。

在美国和英国，人们是在“后法破前法”、“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等概念的基础上判断法令的有效性的，他们制定法律，丝毫不在乎法令之间是否相互矛盾，最终是以法院所积累的判例来解决矛盾。小泽一郎以议员立法过于频繁为理由，通过废止内阁法制局来剥夺官僚的立法权，使国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立法机构。

此外，在政治 = 行政的改革方面，小泽一郎的目标在于，在强化司法功能的同时，制止官僚任意解释法令，利益关系者们在司法机关对法令的解释进行辩论。

更进一步，民主党将综合调整预算的功能从财务省转移到国家战略局或内阁预算局，同时，禁止民主党的议员单独地向霞关[1]陈情，党内的要求一律统一到干事长那里。

然而，民主党宣言中的这些内容最终实现了的只有禁止单独

① 霞关位于日本东京都南部的千代田区，是日本政府机关集中的地方。——译者注

向霞关陈情一条，其余的内容都未能涉及官僚的权限。

本来，议院内阁的权威是由宪法保障的，官僚内阁单以这些非正式的习惯根本无法对抗议院内阁。但由于普天间基地迁移问题以及众参两院混乱不堪，内阁失去向心力，加之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和核电站事故等前所未有的国难，以“权力集中”为目的的内阁此时不得不将所有的实际工作全部托付给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于一身的官僚们。

但这决不是说官僚内阁在与民主党内阁的权力斗争中大获全胜。

北风与太阳

“官僚统治”给人的印象大多是各个政府机关共同管理日本，但事实并非如此。官僚制的本质是，政府机关之间，或政府内部的局、科等部门之间争夺权限，在这种争斗中，他们没有共同合作的意思，而是为了使自己（与相关者）的利益（范围）最大化而进行激烈的竞争。

通过意见一致进行事务决定的组织非常善于在扩大经济的同时进行分配，如果整个一张饼都缩小的话，那么相互之间马上就会明争暗斗。太平洋战争中陆军与海军之间的互不相让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们没有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与敌人的战斗中，而是将一部分精力用于内部的争执之中了。

当然，关于这一点，此前人们已经反复地指出过。按说日本的官僚组织聚集了最具智慧的人，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仍然未能自我修正那些缺陷。

一种现象一直都不发生变化，这里面肯定有其合理的理由。

公务员的人事制度并不是独立于日本社会而存在的。将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作为规定的公务员制度是日本式雇佣制度最精华的部分。

在公务员制度改革的理念中，官僚分为策划（综合职位）、实施（一般职位）和技师（专门职位），参与政策起草的策划官僚由新设立的人事局管理，它超越各个政府机关，向政府机关派遣最合适的人才。[1] 这一点如果实现了的话，那么，政府机关的上下级关系就失去意义，日本官僚制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然而，这种理想世界有一个决定性的重要前提条件。

在新的公务员制度中，策划官僚起到政党的智库的作用，但政府机关里并不一定一直有其合适的职位。由于干部的人数是有限制的，因此，策划官僚进入人才储备库等待安排时，有时会在民间企业中工作。这就是美国实行的官与民的“旋转门”（revolving door）制度。

但在日本式的雇佣制度——年功序列和终身雇佣制——中，即便是现役官僚，企业也不愿意中途录用他们。于是，政府机关动用人际关系，让企业无论如何也要录用他，这是日本“官民交流”的实际状态。这当然就成为官民勾结的温床，一旦对这种情况加以禁止，那官僚就不可能再就职，只好待在政府机关。

民主党试图将这种日本式的雇佣习惯继续保留下来，而仅仅把官僚制改造成为美国式的。他们欠缺的是这样一个视角，即美国的公务员制度是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最相吻合的。

---

① 古贺茂明，《日本中枢的崩溃》（讲谈社）。

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非常高，跳槽到其他行业就职的情况也频繁发生，中途进入公司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在能力和业绩方面都被看中的官僚进入民间企业，或者成功的商业人士进入政府机关，在政治上受到重用的情况都会出现。

要想把官僚机制改变为美国式的，就必须使日本式的雇佣制度解体。

日本的社会制度并非出于某个个人的某种意图形成的，它（可能）是在中世的农村社会里自发地产生的，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的演变，在高速成长时期定型成为现在的样子。它深深扎根于我们身边的生活，从中吸取养分。

我们认为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与自己无关，对官僚们紧紧抓住既得权力而不松手的状况感到愤慨，嘲笑他们在事务分工方面进退两难的模样。但是，人们是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变镜子里的形象的。

所谓的“日本改造”并不是禁止官僚们的转职，而是彻底改变日本社会的本质——“家社会主义”。但是，接受联合支援的民主党政权是根本不会自觉地对日本式的雇佣制度加以改变的，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到改变的重要性这一点还值得怀疑。打一开始，民主党宣言就是一个画中的烧饼。

民主党内阁不愿意对有损自身利益的地方进行改革，只是想将外表改变成为符合“全球性标准”的管理结构。由于不能大量拥有没有选举基础的新议员而引起有权利者的不满，民主党既不着手改变国民的既得权利，又要让人们看上去似乎“改革”正在进行，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然而，即使换掉外包装，腐烂

的内容并没有改变。

如此一来，“改革”在预定的和谐中破灭。野田内阁时，大臣重新回到代理人的位置，执政党与政府之间的敌对状态依旧，此前的管理结构又重现。这不是野田首相的领导集体出现了问题，本来在日本式的“家”社会里，除此之外，其他的治理方式都是行不通的。

正因为战后日本的治理结构陷入功能不全的状态，所以人们不得不进行“改革”。由于这个改革的进展极不顺利，因此，即便治理结构又重新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但官僚制度只会引起更加严重的功能不全。

泡沫经济崩溃后的不良债权问题以及金融危机使得日本社会丑态毕露，此后，政治家们聚拢人气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批判官僚。由于政治家们为了在选举中获胜，甚至不惜向魔鬼出卖灵魂，因此，执政党与在野党都热衷于打倒官僚，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寓言故事《北风与太阳》中，为了让行人脱掉外套，先是北风呼呼地吹，然后是太阳火辣辣地照。如果只是让行人处于寒风之中，而自己独占太阳的话，行人只会用外套更加裹紧自己。**

** 全球金融危机后，华尔街投资银行（特别是高盛公司）的干部被财务省的主要部门所录用，反过来，财务省的职员去大型金融机构任职的“旋转门”机制被批判为政、官、财沆瀣一气的元凶。所有的制度都有长处和短处，即使在“公务员制度改革”中，行政机构被改变为美国式的，也不能说一切事情都会迎刃而解。

16 我们的失败·经济篇

现在我们回顾日本战后的政治，可以说这是一段惨淡经营的历史，即这是一段在农村社会型的无限责任 = 无责任体制下，向在经济成长中失败的人提供补助金，以获取社会全体一致同意的历史。这种“散财式的政治”于高速经济增长结束时——即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就无法发挥其作用了。此后，由于一个责任与权限相一致的近代化的治理无法得以建构，一切事务都处于没有决断的情况下，只有资金的借贷一直在增加，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失去的 20 年”。

但这并不仅仅是政治家和官僚们的责任。“家”社会的地方性规则渗透进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统治”着日本人。

日本之所以未能成功地步入全球化，与其说是由于其政治的“三流”，还不如说是由于其经济是“一流”的缘故。

1940年体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学家们指出：与欧美相比，日本的经济是“异质”的。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日本异质论”在日美贸易摩擦中被当作打击日本的道具而使用，因此，日本社会无法认真地接受这些修正主义者（指将日本重新定义为“异质社会”的人们）的批判。

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混乱中，受到“护送船团方式”保护的大型金融机构接二连三地倒闭，此前一直被认为是“没有过错”的高级官僚们因丑闻缠身而遭逮捕，日本式体系的使用年限寿终正寝，这是任何人都看在眼里的。

我们究竟错在哪里？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①]的“1940年体制论”追溯到70年前，探明了日本社会的本质。[②] 在这部书里，野口对战后日本的“出生秘密”进行爆料，他说：日本社会并非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败北而重生，战后，日本延续了战时的国家总动员体制，只不过在表面上打着自由经济的旗号而已。

野口指出，所谓1940年体制，是日本为了使战争得以进行而将经济置于国家统制之下，由岸信介[③]等“革新官僚”们实施的。其特点是：否定自由竞争，限制私人所有权，同时，将电力、通

---

① 野口悠纪雄（1940～ ），日本原官僚，经济学家，著有《泡沫经济学：日本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日本经济：改革的构图》等。——译者注

② 野口悠纪雄，《（增补版）1940年体制：永别了，战时经济》（东洋经济新报社）。

③ 岸信介（1896～1987），日本政治家，曾任日本第56、57任首相。——译者注

信、运输等基础设施国有化，最大化地提高军需产业能力。为此，日本策划了以下一些极其特殊的制度。

①日本型企业

战前的日本企业是以股东为中心运营的，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很大。但在国家总动员的体制下，股东的权力受到限制，企业就不是追求利润的集体了，而成为从业人员为某个共同利益的新集体，之前为部分重化工企业所采用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体系被广泛地采纳。战后，为调整工人与雇主的关系而成立的产业报国会被改组成为各个企业的工会。

②间接金融

战前的日本有发达的资本市场，企业通过直接金融（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进行资金运作的情况十分普遍。但战争使得资金的供应捉襟见肘，出现优先向重化工企业等军需产业分配资金的情况，金融市场失去其功能，与此同时，开始实施主要支付银行制度，即以间接金融进行长期的资金供应。

于是，日本出现了以主要支付银行为中心的一系列企业——即所谓的财阀，资金配置的限制和股票的持有状态都走向常态化。

③官僚体制

即使是在明治"殖产兴业"时代，针对民间企业的政府机关的权限并不大，指导能力也不强。但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昭和恐慌为背景，日本强化了经济统制，各个企业间结成卡特尔，于是就形成了官僚们通过行政指导的形式，对这些卡特尔进行指挥的体制。

革新官僚作为“企业并非为了追求利润，而应为国家提高效益”的出谋划策者，推动了国家总动员体制。

④财政制度

战前，国家税收的1/3是地租、营业税等间接税，地方财政的权力也是分散的。但在1940年的税制改革后，日本变为以所得税、法人税等直接税为中心的税制，为了筹集战争经费，日本引入了征收工资所得税的制度。

此外，为了救济贫困的农民，日本还进行了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即中央向地方分配补助金以及拨款。由此，国家和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战争期间，为了征用大量的劳动力，日本还引入了社会保障制度，如国民年金、国民健康保险等。

⑤土地制度

战争时期，战前的自由放任主义的住宅政策华丽转身，根据《国家总动员法》的规定，日本采用了统制房租、地价和大力保护租地人、租房人权力的政策。在农村地区，为了救济佃农，国家禁止提高租种土地的价格，同时，根据《粮食管理法》大幅度地减轻佃农的负担。

通过以上这些战争时期的“改革”，不必等到占领军进行农地改革，在日本，地主阶层已经被摧毁，这为战后的产业化提供了便利，也为缩小收入差距的大众社会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野口将这种1940年体制的本质称作“生产者优先主义”和“否定竞争”（平等主义）。战后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在一种奇怪的资本主义——即将出口产业的培养作为国家的目标，无视消费

者的利益，不是通过“竞争”而是提倡“共生”——的基础上实现的。

统制经济的局限

在1980年签订的日美框架协议中，日本的资本主义的“异质性”得以强调，以“日本的竞争并非公正（因此产生了巨额的贸易黑字）”的名义打击日本被视为是正当的。但此时，“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成长受到人们的关注。这4个国家和地区，除了曾是英国殖民地的中国香港外，其余3个国家或地区都处于强力政治体制的统治下，这与日本战时统制经济十分相似。1981年，马哈蒂尔出任马来西亚的总理，他提出“向东方看”的主张，认为，经济政策不应以欧美国家，而应以日本为榜样。而主持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邓小平则极其详尽地研究了日本经济成长的情况。

此外，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方面大获成功的只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领导的“智利的奇迹”，而试图进行市场原理主义改革的阿根廷则在财政方面陷入困境，俄罗斯与称作寡头的政治商人进行权力上的联合，以统治俄罗斯经济。*

*也有人认为，弗里德曼领导的“智利的奇迹”也以失业率的增加以及经济差距的加大的失败而告终。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休克主义：揭露灾难乘机型资本主义的实质》①

---

① 原文是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译者注

（岩波书店）。

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实验”，美国派驻大量的经济学家和顾问到这两个国家，试图同时实现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然而，惨淡经营的结果众所周知。

由此看来，现在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新兴国家迎头赶上的时期，统制经济比自由经济更加有效。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令人刮目相看，这并非是中国实行了共产党一党管理体制而获得的成功，而是由于具有强大的统制力才得以实现的。

亚洲各国“成功的法则”是国家培育了出口竞争力较强的产业，在限制国内竞争的同时，将资源分配给出口产业，通过操控利率和汇率使贸易黑字最大化，由此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为了获得经济增长的资金，虽然积极地引进外资，但没有因此而放松限制以及使市场自由化，其实际情况与欧美的资本主义是截然不同性质的。

然而，问题在于，日本在成为亚洲各国增长典范的同时，又成为后来经济长期停滞的反面教材。

日本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统制经济成功地摆脱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日本傲视陷于滞涨（经济低迷下的通货膨胀）的欧美各国，极力讴歌“日本第一”的时代，尽管如此，那时的日本经济已逐渐显露出种种矛盾。在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时期，这种巨大的反差一时间虽然销声匿迹，但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产生强烈的断裂，已不可能维持已有的体系，日本由此拉开了从“改革”战役中撤退出来的“失去的20年”的序幕。

通产省的败北

经济学界的泰斗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因“竞争战略论”而闻名世界，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他开始调查日本的产业政策，这是其调查国家竞争优先的一个大型研究项目之一。当时，日本处于泡沫经济最鼎盛时期，被称之为“创造了一个取代欧美型资本主义的新的资本主义”，集各种赞誉于一身。

但是，波特发现数据中有一些奇怪的数字，感到非常困惑不解。比如说，像图17中这样的数字：[①]

	日本	美国	英国
食品	205	78	74
餐馆、咖啡馆、宾馆	178	68	121
与住宅相关的产品	171	81	101
衣服、鞋等	165	77	73
居住费、水电费	156	91	78
建筑费	155	84	74
交通、通信	141	81	110
医疗、健康	87	136	70

●在1993年OECD各国的平均值为100的基础上进行的比较

图17　生活必需品与服务的价格水平的比较（1993）

这个表格比较了日本、美国和英国的生活必需品与服务的价

① 迈克尔·E·波特著，竹内弘高译，《日本的竞争战略》（钻石社）。

格水平，大约于20年前（1993年），日本的生活水平是OECD各国平均值的1.5~2倍，比美国和英国要高出2~3倍的成本。这种倾向由内外价格差而为人们所熟知，但波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原因在于日本产业政策的失败。

波特说，日本经济两极分化为竞争力极强的少数出口产业和竞争力极弱的大多数国内产业。这是因为日本的产业政策并非培养强有力的产业，而是让极弱的产业退出市场，其结果就是，像僵尸一样的受到国际竞争保护的产业不断沉积下去。

日本经济虽然极其艰难地度过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但由于工资的提升，铝、石油化工、造船、纤维、钢铁等诸多产业却失去了竞争力。因此，（当时的）通产省为了保护这些产业，将它们组合成为“经济低迷卡特尔”，限制进口，提高国内价格，与此同时，向出口产业提供补助金，通过倾销维持“国际价格”。但是，这种保护政策只是赋予企业既得权力，减弱其竞争力而已，不久，日本经济就陷入泥沼。

最典型的就是石油精炼企业，通产省在“能源自给”的名义下，限制精炼石油的进口，阻止像埃克森这样的外资石油精炼企业进入国内市场，以培养“国产”的精炼企业。

其结果是，许多日本企业以获得政府的保护为目的，加入石油精炼企业，因而造成竞争过当以及产能过剩的情况，没有一家企业获得利益。于是，通产省通过行政指导，采取了新的设备投资认可制，同时，为了让企业获得“适当”的利益，大幅度提高国内价格。

然而，这样一来，国内的石油化工业又不得不用远远高于国

际的价格采购原材料，很快其经营就走向死路。于是，通产省又不得不给予石油化工业以特殊的支持。①

简单地说，通产省的产业政策就是为了保护国内产业而结成秘密的卡特尔，将价格转嫁给消费者。这种政策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

出口产业无法以国产的价格高昂的原材料费用来维持国际竞争力，因此，当通产省的产业政策一旦决定提高国内价格，制造业就只好向海外转移，加剧了日本产业的空洞化。由此，如果带来经济的不景气，需要保护的产业和企业就会不断增加，产业和企业又需要更多的支持，日本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此后，秘密卡特尔成为不公平贸易惯例的代名词，受到极其严厉的批判，但通产省所以放弃这种"产业政策"并非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而是他们品尝到政策无法持续下去的后果了。即便如此，为了"向有秩序的产业机构转型"，需要庞大的财政支出，每当采取经济景气对策时，日本的财政赤字就不断高涨。

无休无止的通货紧缩其实就是消除由限制进口和卡特尔引起的内外价格差的过程。2012 年的现在，日本也被列入生活成本高的国家的行列，即便如此，与纽约、伦敦、巴黎等欧美的城市和北京、上海、香港、新加坡等亚洲中心城市相比，日本的物价也并非高得离谱（从不动产泡沫高涨的上海来看，现在的日元即便处于升值的情况下，东京的不动产也相对比较便宜）。

日本的电力、煤气等公共事业以及部分农产品虽然现在仍比国际价格高出许多，但经过"失去的 20 年"，内外的价格之差几

---

① 理查德·卡茨，《腐朽的日本体系》（东洋经济新报社）

乎消失，日本好不容易步入“普通的国家”。

最后的守旧派

现在，“1940 年体制”的统制经济结构几乎失去功效。《日本银行法》被修订，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得以强化。金融市场的监督功能从财务省转移到金融厅，机构设置的目的也从行政指导转向规则的制定、检查和监督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兴业银行被瑞穗银行合并，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与日本债券信用银行不见了踪影。作为主要支付银行的大型银行再也不承担企业集团资金运作的责任，企业从集团中分离出来，与海外企业一道自由地进行交易。

但是，正如野口指出的那样，日本经济中仍残存着战时国家总动员体制的巨大残骸。拒绝任何“改革”的最大的守旧派是企业经营者和工会。

自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以来一直延续着的日本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外国资本的国内投资极其少。日本的企业十分厌恶外国人这个“他者”进入其领地，他们根据股票的持有状况，进行“资本锁国”，经济团体虽然打着全球化的旗号，但反对任何松动让合并及收购变得更加容易的规则。日本企业的董事会都由成功的白领控制，只要不出现经营亏损，一般不从外面邀请其他经营者进来。

经营者受到市场竞争的保护，劳动者也由年功序列和终身雇佣制度保障其一生生活的安定。不过，这本来是难以为继的一种制度。

在日本，公司一旦雇用了正式职员，实际上是不允许解雇他

的。只要公司规模并不是无限地扩大下去，这种人事的金字塔终有一天会倒塌。为此，公司扩大雇用易于解雇的非正式职员。正式职员常常白白加班，工作强度很大，而非正式职员则处于不知何时就被解雇了的不安定之中，社会就出现了这样两种极端化的问题。

此外，在公司将职员视为已有的日本式雇佣制度下根本产生不了流动性强的劳动力市场，职员一旦超过转行的年龄极限35岁时，以及面临公司裁员、倒闭而失去工作时，他们就只能做马路施工时的交通管理员或超市的收银员。进入90年代后，这种担心成为现实，出现因裁员而家庭崩溃以及多重债务缠身的状况。从由于金融危机爆发，失业率达到5%的1998年起，日本每年的自杀人数都超过了3万人。最明显的是中年男性自杀人数的增加，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失业者。

为了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有必要建立一个流动性较强的劳动力市场，以便他们一时失业，就可以在短时间内重新找到新的工作。为此所进行的改革实际上非常简单，也很合乎全球性正义的基准。

①在法律上禁止退休制度

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实际上是超长时间的、有时间界限的雇佣合同制。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拥有这样的权力，即一旦职员到了60岁，公司就可以以"退休"的名义强行解雇他。这无非是一种年龄歧视，现在男性的平均寿命也已达到80岁（女性则是86岁），对多数职员来说，60岁还处于工作精力旺盛时期，因此，退休也就是一种浪费庞大人力资源的

制度。与禁止年龄歧视的美国一样，日本也应该在法律上禁止退休制度，只要职员有意愿和能力，他想工作到什么时候就应该工作到什么时候。（英国自2011年起废止了退休制度）。

②将同工同酬法律化

正如人们所批评的那样，将职员分为“正式”和“非正式”无非是一种现代的身份制度。日本一方面是打着自由民主主义旗号的发达国家，同时又维持着这样一种歧视性的雇佣制度，对此日本人应感到羞耻。与欧盟一样，不管人们在年龄、性别、人种、国籍以及宗教方面有多大的差异，相同的劳动付与相同的报酬应从法律上加以规定，同时，从打短工、干临时工到签订长期雇佣合同，应根据劳动者自己的选择，允许社会具有多元化的劳动形式。

③放松解雇的限制

如果从法律上禁止退休制度以及平等地雇佣非正式职员和正式职员，那么几乎所有的公司都会在用人经费上增加负担，或许企业因此而难以为继。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废除公司内的年功序列制度，有必要使包括降职、减薪的人才再分配制度变得易行。这时，如果还出现无法分配工作而呆在公司里的人，那么，在向他们支付法律规定的补偿金之后，解雇他们，让他们回到劳动力市场。如此一来，日本才有可能出现流动性较强的劳动力市场，而在现在的公司里未能找到有价值的工作而被迫一边站的人们就出现“再挑战”的机会。

但这是从根本上彻底颠覆日本"家"社会主义的改革，短时间内会出现强烈的阵痛。庞大的"公司内部失业者"如果一时间全部被推到社会上，日本的失业率可能会达到10%，这与欧美国家的失业率相当。此外，企业的雇佣习惯并不是说变就能够变的，因此，很难保证失业者马上就能够找到工作。这样一来，没有去处的人们或者只能依靠失业保险和生活最低保障生活，或者只能自杀。从政治方面看，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噩梦。

现在想起来，我以为日本应在经济十分景气的80年代或着伤口尚浅的90年代初期就已经完成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由于失去了那个机会，日本犹如走进死胡同，找不到任何出路。

日本能走向"全球化"吗？

进入明治时代以后，日本虽然十分厌恶"全球化"，但一直拼命努力着走向"全球化"。

战后，日本取得很大的成功，却于20世纪70～80年代在原有的政治、经济的地方性结构方面束手无策。泡沫经济将这种束手无策掩盖起来，但进入90年代后，所有的矛盾喷涌而出。自明治维新以来，过去了140年，这个国家似乎终于被逼到悬崖边。

如果这个分析正确的话，那么，针对它的处方很简单，即以全球性的标准重新构建日本社会。这么做的话，受到规则束缚的市场会发挥效率，经济会走向景气，人们可以变得更加自由（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许多人都这么认为。

然而，情况果真如此吗？

先亮明结论：日本重生成为一个全球性标准的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因为，日本社会里没有“他者”。

全球性标准并非努力就能够获得的，社会结构也并非由理念可以自由设计的。公元前1000年的希腊社会里能够产生民主制，那是地中海这个特殊地区的“奇迹”。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化世界的实验场，那是因为它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移民国家。

日本要成为一个全球性标准的国家，社会必须事先形成一个全球化空间。所谓全球化空间是指不得不与无法包容的“他者”共同生存的世界。

然而，在日本社会里，他者或者被“家”社会所吸纳，或者被排除。只要社会秩序以这种非此即彼的形式维持下去，那么就没有必要变动地方性规则。

在全球化空间里，“他者”既不能被吸纳，也不能被排除，它要求人们“将他者当作相同的人平等地对待”。所谓“他者”，具体地说，是指人种、宗教、文化以及母语并不相同的非日系的日本人。

当然，在日本也存在着非日系的人，如在日朝鲜人、在日韩国人等。但日本社会或者将他们当作“日本人”加以吸收，或者就像是无视他们存在似的，原封不动地以地方性规则加以应对。全球化空间之所以形成，其前提是这个空间里存在着大量的不可能被主流派文化（WASP）所吸纳的“他者”，犹如美国社会里的黑人一般。

如果日本为了缓解人口数量减少的趋势，大规模地接受移民，人口的30%都成为非日系日本人的话，那么，即便是放任不管，

日本也会变成全球性标准的国家。但是，现在的日本从政治、行政到公司、学校，几乎所有的单位都是由"日系日本人"组成的，只要这种状况不发生变化，日本是根本没有走向"全球化"的理由的。

落后一圈的第一名

当然，这并非说日本社会一成不变。无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日本都会被卷入全球化的环境中，与外国这个"他者"相接触的机会会越来越多。

进驻日本的外资企业以及进驻海外的日本企业在吸纳外国人职员的比例上已超过其可以接纳的数目，因此，整个单位有时就会出现以全球性标准运行的情况。

在投机性质的IT企业里，年薪制是理所当然的，但对非常有能力的程序设计师和程序工程师来说，年功序列、终身雇佣等制度只是令人厌恶罢了，但如果不采取这些制度的话，可能是得不到有能力的人才的。

地方性规则的使用年限过期后，企业和行政的行为也开始发生变化。建筑公司不可能在投标前商议价格，管辖机关也不会将企业团体联合起来形成卡特尔。"公正交易委员会"的功能得以强化，此前有名无实的《垄断禁止法》也于最近几年被人们认为适用范围过宽。

但这并非说日本社会已全球化了。日本仍然无法建构一个与全球性标准相对应的社会结构，只不过是从日本社会的边缘部分起全球化局部地进行侵蚀而已。这使得只能以地方性规则运行的中心部分产生不稳定性因素，激起人们的愤怒："我们最重要的东

西（传统、共同体）被来历不明的恐怖性东西夺走了。"叫嚣"武士道"的诅咒的声音之所以一浪高过一浪，就是由于日本社会难以承受住全球化正义的强大压力的缘故。

但这并非是日本一个国家的命运。

在非西欧圈中，日本是最早实行现代化政策的国家。有时中世的农村社会中产生的各式各样的地方性规则被改良，有时则被淘汰，日本最终成长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现在，以中国为首，许多亚洲国家紧随日本其后，当然与日本一样，这些国家也是在各自的地方性规则下进行社会运行的。

韩国之所以举行反美游行，虽然有朝鲜的政治因素在里面，但主要是由于他们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得成功，与日本一样，体验到地方性规则与全球性标准的冲突。在东南亚和中国，可能受到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的地方要更多一些，但不久，中产阶层的既得权利将会受到威胁，可能会出现反全球化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特别是中国社会，由于是在与自由民主主义性质截然不同的制度下运行的，因此，与"美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就更加深刻。

所有的国家都有其地方性规则，全球化是一种超越国家的使政治、经济体系平等化的运动，从历史上来看，出现这种运动也是必然的。当然，美国也不例外。美国不仅是市场原理主义的大本营，同时也是产生最激烈的反全球化（反美国化）言行和运动的地方。日本的知识分子中间展开的对美国主义的批判，如果追根究底的话，其实基本上都是Made in USA（美国制造）的。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常常成为亚洲各国的榜样，但现在也成为地方性规则走向穷途末路、社会受到全球化侵蚀最严重的地方。随

着少子高龄化社会的出现而进行的各式各样的努力都是“走向衰老的亚洲”的明日的投影。美国、欧洲现在正处于长期经济不景气的关口，日本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会落后一圈而站在世界的最前列。

在我们的前面究竟有着怎样的未来呢？

小结（8）

- 日本的政治　日本是政府机关联邦国家

①官僚内阁制

②政府机关代表制

③政府、执政党的二元体制

▼

政府机关之间争夺管理范围而引起功能不全

- 日本的经济 1940 年体制 = 国家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

①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

②主要支付银行制度

③官僚统治

④补助金、拨款与社会保障制度

⑤农地改革与地主阶层的消灭

▼

拒绝“改革”的最大的守旧派 = 企业经营者与工会

PART 3
UTOPIA

17 “大停滞”的时代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再次确认一下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市场的全球化会让世界幸福起来”。

假设日本人均 GDP（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换算成美元）为 100，图 18 表示了这 32 年间（1980～2011 年）中国人与印度人实际购买力（富裕程度）是如何变化的。

例如，“文化大革命”后的 1980 年中国人均实际 GDP 为 251.15 美元，只是日本的（8381.92 美元）的 1/33。但进入 90 年代后，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开始了高速经济增长，到 2011 年达到 8394.07 美元，增长了 32 倍，与 1980 年的日本基本持平（而 2011 年日本的人均实际 GDP 是 34362.07 美元，中日之间的差距缩小为 1/4）。

印度从英国统治下独立以后，一直处于贫困的最底层。冷战结束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中断了经济援助，印度财政更加紧张。但从 90 年代后期以来，市场自由化的效果开始出现，与 1980 年



图 18　中国与印度人均实际 GDP 的增长率

(419.35 美元）相比，2011 年人均实际 GDP 达到 3703.45 美元，增长了大约 8 倍之多。

由于全球化（市场自由化），这 30 年间，在人均实际 GDP 方面，人口达 13 亿的中国（平均）增长了 32 倍，而有 12 亿人口的印度则富裕了 8 倍，与发达国家日本的经济差距（富裕程度差距）大幅度缩小。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与中南美的国家、欧洲与东欧国家之间，冷战时代结束之前，贫穷的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数十亿人的财富得以增长，因此，这 20 年间整个人类的幸福度得到极大的提高，这是毋庸赘言的。

反过来说，这种情况也表明了冷战之前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即所谓的南北问题）大得离谱。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里，而出生于不同地方的富裕程度之间的差距竟然有30 倍之大，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全球化可以缩小这种不平等，因此“从道德上讲它是正确的”。

股票投资产生不了利益

下面我们看两个图表。

图19表示的是1980年1月至1999年12月的20年间美国和日本的股价变化，我们把1980年1月的股价看作1，那两国的股价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图表用对数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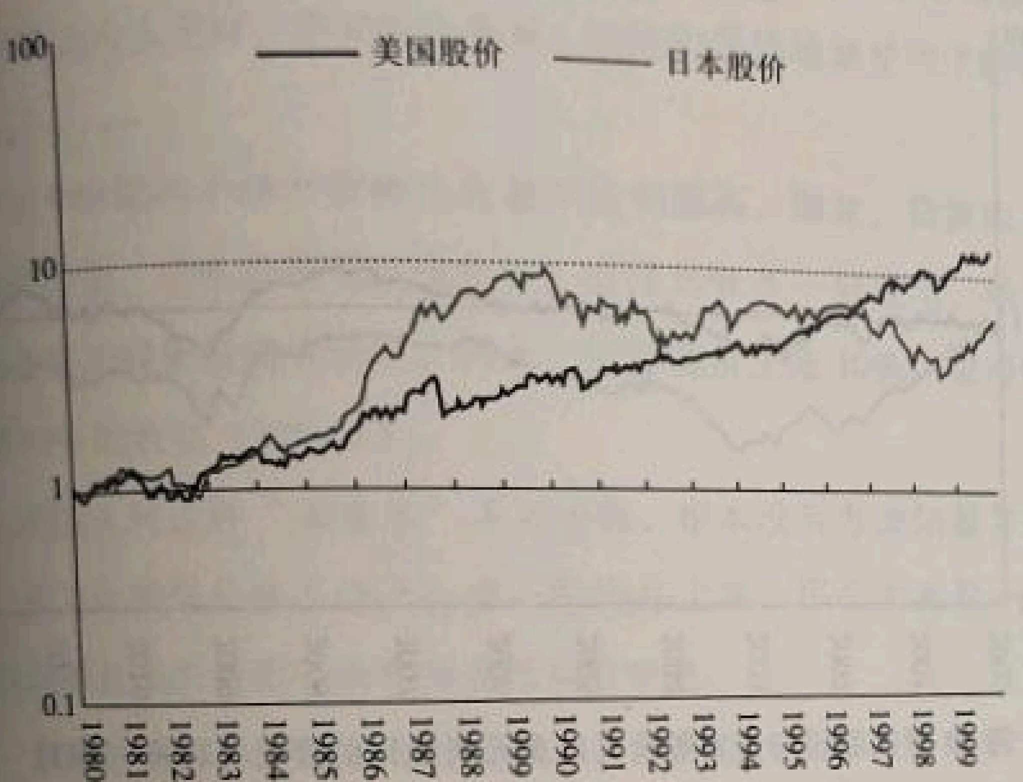


图19　美国股价与日本股价（以美元表示）的变化（1980－1999）

黑线是纽约的股价指数，尽管在1987年10月有过巨大的回落（黑色星期一），但除此之外，从1982年左右，其股价基本上是以直线上升的趋势上涨的，到20世纪末的时候已涨至13倍左右。

颜色较浅的线是日经平均股价，与我们平常看惯了的图表不同的是，这个图换算成了用美元表示。也就是说，从美国的角度看日本的市价时，如果日元升值的话，用美元表示的股价就上涨，如果日元贬值的话则回落。尽管如此，通过这个图表，我们清楚

看到，至1989年的10年间，日本的股价几乎涨了10倍，而泡沫经济破灭后，则进入长期的经济低迷时期。

图20表示的是从2000年1月起至2011年12月为止的12年间美国与日本的股价，我们把2000年1月的股价看作1（同样以对数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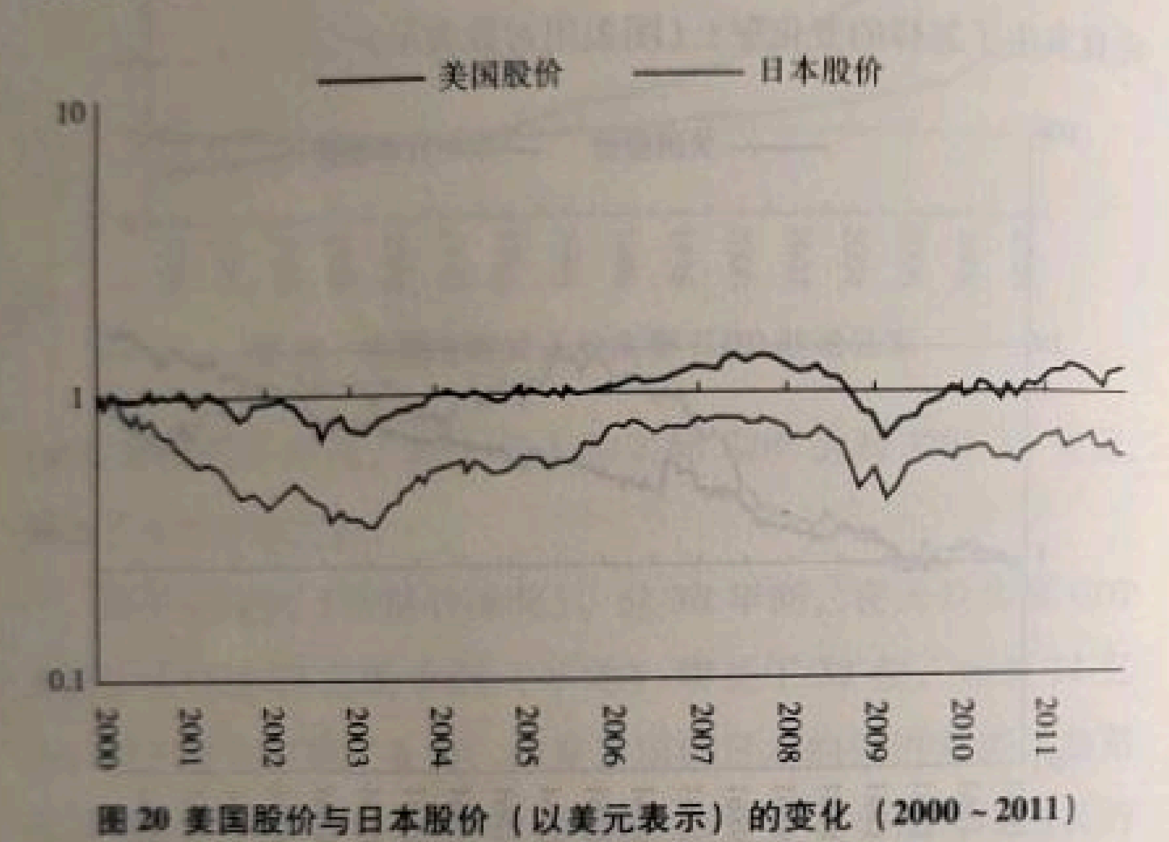


图20 美国股价与日本股价（以美元表示）的变化（2000～2011）

日本的股价于2003年时曾回落了将近1/3，此后又回涨到六成左右的水平。但美国的股价也同样如此，通过该图表，我们明确看到，进入新世纪后，美国股价一直没有上涨。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是共通的。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近10年来，股价基本上没有上涨。欧洲股价看上去呈上升趋势，那是因为英镑和欧元升值的缘故。最近，由于欧元危机导致外汇差价所获得的利益全部丧失。

经过2008年的雷曼冲击以及随后的世界经济危机，世界的投

资家们终于注意到一个简单的事实：除了一部分新兴市场，股票投资已经基本上产生不了利益了。

借债度日的美国

现在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于股价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的“黄金20年”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简单地说，就是这样一个生活信条：“明天要比今天更好，不必担心未来，让我们尽情地享受当下的每一天。”

这个时期的不动产价格也有着明显的提高，因此，贷款购买不动产的话，贷多少就可以赚多少。首付20%买一处住宅，相当于以5倍的回报投资不动产，因此，只要地价上涨10%，就可以获得50%的收益（10%×5）。

美国人对这种“炼金术”不离不弃，根本没有考虑储蓄等问题。因为如果股价和不动产一直不断地往上涨，那么大家是不会选择做利息低的储蓄等有损自身利益的事的。

家庭的储蓄率下降，政府就只能从海外借钱来填补财政赤字。这就是财政赤字与经常收支赤字并生的“孪生赤字”。20世纪80年代，人们都说“美国经济要崩溃”，但与此悲观论相反，只要股价和不动产上涨，这种结构运行得十分完美。

于是，美国讴歌起前所未有的经济景气来。

然而，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2001年9月11日，美国同时发生多起恐怖事件，美国政府与联邦储备银行千方百计地想要阻止经济走入低谷。被称之为“大师”的联邦储备银行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下决心大幅度地降低利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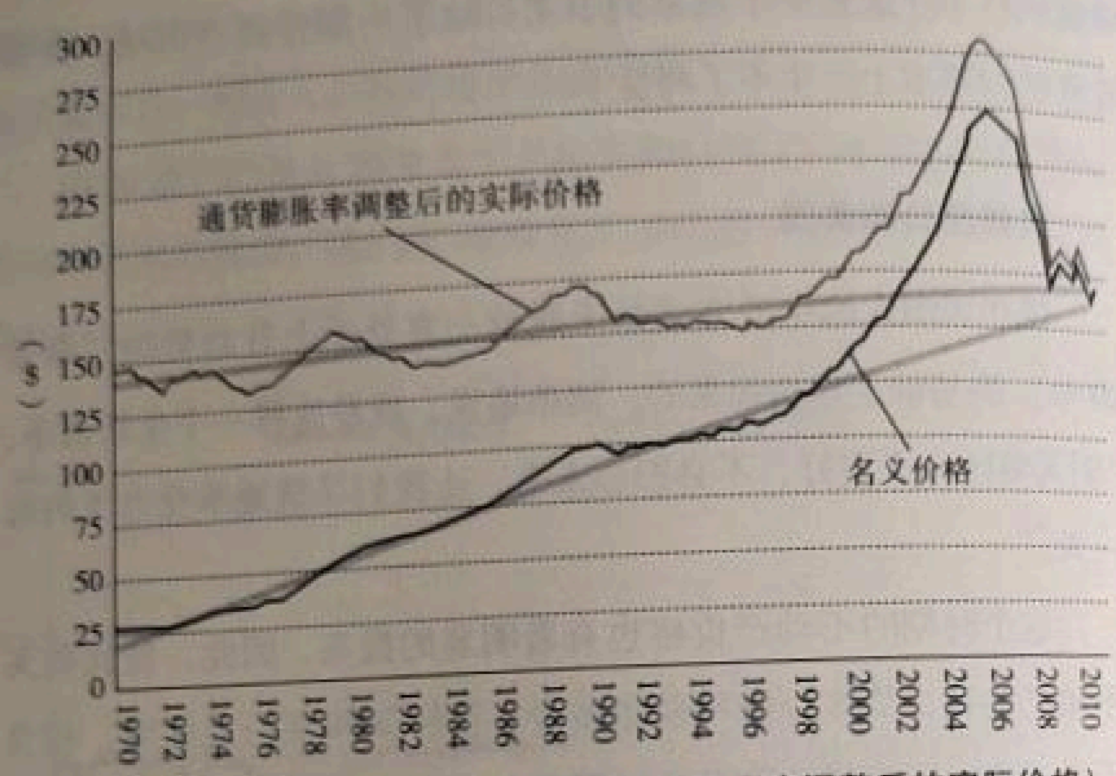


图 21　美国的不动产价值（名义价格/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实际价格）

其结果如图 21 所示。

通过图 21，我们可以知道，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美国的不动产价格自 1970 年以后的 30 年间基本上没有变化（地价的上涨只与通货膨胀率一样）。但是，2000 年后，不动产价格开始猛烈上涨。

这种极其异常的地价上涨以各式各样的理由被正当化了。例如，由于移民的增加，土地的供需发生了变化；世界各地的在自己的国家里没有投资渠道的富人们投资美国的不动产……日本经济泡沫最严重的 20 世纪 80 年代，皇居的测算地价比美国整个加州都要高时，不动产行业的相关人员都高声赞颂道："东京将会成为亚洲金融中心，因此，对这种情况有所估计，让地价上涨是合情合理的。"美国与此情景如出一辙。

然而，当一切都过去了之后，回过头来看，这只不过是过于降低利率而导致的古典式的不动产泡沫而已。如果说与此前的泡

沫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由于金融机构的精英们开发的次级贷款，此前未能得到融资的低收入人群也可以买到自己的住宅，以及将这种贷款证券化之后出售到整个世界（主要是欧洲的金融机构）。

2006年美国的住宅价格达到最高值，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房价暴跌近四成，现在也只回升到2000年的水平。股价和地价都在回落，美国人第一次发觉自己债台高筑，且根本没有偿还的手段。[①]

中产阶级的没落

美国的经常收支出现巨大的赤字，这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化。对此，人们之所以到现在才骚动不安，是因为美国产生财富的机制已无法正常运转的缘故。

日本泡沫经济的导火索是"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引起的日元升值，但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则是经济大国美国引发的全球性的泡沫经济的破灭。其直接原因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大幅度地降低利率，但这并非是经济运行上的失败，其走向破灭过程中有着漫长的前史。

所谓经济，是努力想使自己活得更加富裕一些的人们经营（经济行为）的积累，全球化市场将人们的这个欲望网络化地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在全球化市场中，人工费极低（贫穷）的国家中生产出的商品被出售到购买力较高（富裕）的国家，企业家可以获得极不合理的利益。全球性企业发现了这种结构，通过利己主义的经济活

---

① 拉古拉迈·拉詹，《断层线："大断层"再次招致金融危机》（新潮社）。

动，被称为“人类的顽疾”的南北问题开始得以解决。

但是，市场并没有形成一个向所有的人平等地分配财富的机能。由于全球化经济的剧烈变化，新兴国家人们的生活有所提高，而极其富裕的发达国家却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简单地说，市场原理就是“高价卖出便宜的东西，以获取差额利益”。同样生产丰田汽车，中国工人与日本工人的人工费一天不同，全球化一天就不会停止。

美国早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发现了这种变化，成功地从制造业转身为服务业，被称为全球化的“大赢家”。在硅谷，IT产业兴起，华尔街的投资银行“统治”着金融市场，就像是讴歌着我们的春天一般。

但是，在这种情况背后，中产阶级的所得开始减少。

由于英语是全球化语言，美国企业在国际化方面获得成功，但与此同时，在美国，不仅制造业，而且连服务业的工作也都流入印度等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新兴国家（即向外的国际化）。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与墨西哥有着漫长的国境线，来自拉丁美洲的非法移民不断进入美国，他们“霸占”了饮食行业、建筑行业等低收入的职位（即内在的国际化）。由于这两种国际化，一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开始走向没落。

在美国，仅男性（父亲）工作是难以维持全家生计的，因此，夫妻是双职工的情况非常正常。日本人的年平均劳动时间超过了2200个小时，被人们讽刺为“公司奴隶”，而美国人的年平均工作时间比日本人还要长。美国人通过更加努力的工作，拼命想维持

"社会普遍"的富裕程度（与1979年相比，标准的美国人家庭一年要多工作500个小时，即多工作12周的时间）。①

但在美国社会，全球化并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性动乱，其理由另有所在。这就是利用股价和地价上涨的"借贷生活"。

事到如今，我们回过头来看，才算明白"谜"一般的美国巨大的"孪生赤字"为什么没有引起经济崩溃的原因。

由于跨国企业在全球化方面获得成功，美国市场的股价开始快速回升。此外，一直只能拿到很少工资的人们试图在股票市场上投资，以及用住房贷款购入不动产，以维持富裕生活。

世界金融危机并不是2000年以后不动产泡沫的破灭，而是对20世纪80年代之后持续30年间的超级巨大的泡沫——即贷款越多就越赚钱——进行清算。

硬币的正反面

2009年，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突然间为解决世界金融危机而忙得团团转，这与他的高远理想恰恰相反。在政治上对奥巴马尤其给予重大打击的是得到政府救济的大型保险公司AIG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向金融商品部门的340名高管——他们开发、销售金融衍生产品CDS（Credit Default Swaps，信用违约合同），最终将公司逼向破产的境地——发放1.65亿美元（按当时的汇率大约为162亿日元）的奖金。

AIG公司给出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已与这些高管签订了将支付给他们两年薪金的奖金的协议；另一个是：CDS极其复杂，

① 罗伯特·B·莱克，《余震：中产阶级将不复存在》（东洋经济新报社）。

如果缺少了他们的话，债务清算工作将无法进行。这当然是不合乎道理的，因此，美国人被激怒，许多人来到 AIG 高管的住处进行抗议示威，而且这些高管还接到大量的恐吓信。将这种民愤发展成为政治运动的就是茶党。

当初，奥巴马虽然是以反华尔街的旗号当选总统的，但他不可能清算 AIG 公司，从而点起金融危机的烈火，因此，只好默默承受保守派白人们的愤怒。这些白人们拒绝政府所有的政策，共和党也受到影响，极力反对增加税收和医疗改革制度，反对提高联邦债务的上限，招致美国国债的降级。

此外，2011 年 9 月，在自由派杂志的号召下，年轻人们高喊“占领华尔街”的口号，开始举行示威游行，他们认为，在美国，富裕阶层只占人口的 1%，其余的人都变成了穷人，于是要求缩小贫富之差，打出“We are 99%”的标语。

在美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叛乱”，是由于“美国梦”终结了的缘故。少数派就不要说了，主流派的白人阶层也无法维持此前曾经拥有过的富裕生活了。

大多数情况下，股票投资都是在现金资产的范围内进行的。与此相反，房屋是以住房贷款的高举债的形式购置的，因此，由于地价上涨，资产增加的效果十分巨大。在资产停止增长的 2000 年以后，最最普通的美国人也都以房屋的（未实现的）增值利益作担保，追加购置不动产，以前所未有的气势一直过着富裕的生活。

然而，当泡沫破灭，地价暴跌时，人们的损失急剧膨胀，举债越多损失越大，家庭生活一瞬间便落入低谷。加之金融机构拥

有大量的不良债权，经济极度回落，企业不断地进行人员调整，最终失业率上升到近 10%。尽管联邦储备银行试图提供大量的资金以提升经济的景气，但几乎没有任何效果。

美国经济在股价方面虽然得以维持，但失业率在 9% 上下徘徊。这与泡沫破灭的日本恰恰相反。在日本，失业率尽管没有上升，但股价暴跌，这很好地反映出日美经济结构的差异。

在美国，因经济状况差而调整人员的情况是被认可的。当经营走向恶化时，企业为保护股东的利益，首先进行裁员。由此，失业率暂时性地增加，但如果劳动力市场流动顺利的话，他们不久会被需要劳动力的新企业雇用，就此失业率一定会回落——从理论上讲，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美国的制造业极其虚弱，而且服务性行业的工资又低，他们要与墨西哥等移民劳动力相互竞争。

当然，美国的 IT 产业的优势是岿然不动的，能够与华尔街相抗衡的金融机构也是根本不可能在美国之外的地方成长起来。但它们都是知识密集型产业，这里集中了拥有高度智能的人们，根本没有像制造业那样的雇佣规模。华尔街赚得再多，也不会带给普通的美国人以任何的好处，因此，他们义愤填膺。

产生美国的富裕的机制现在正开始向反方向逆转。大多数美国人发觉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已变得一贫如洗了。

茶党与“占领华尔街”的年轻人的主张针锋相对，毫不妥协，但在“反华尔街”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的愤怒是从“中产阶层的没落”这个共通现象产生出来的，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

“美梦”成泡影

源于华尔街的世界金融危机直接打击欧洲金融机构——他们大量购买了证券化的次级贷款——的经营，投资家们一起撤回资金，因此，不仅在冰岛、东欧各国，而且还在爱尔兰、希腊等欧洲联盟国家也引发了经济危机。其中，危机最严重的国家就是希腊，一时间曾被逼入以国民投票来决定是否退出欧元区的悬崖之地。

由于冷战的终结，欧洲各国从核战争的恐惧中被解放出来。以德国和法国为中心，1993 年成立了欧盟（EU）；1999 年出现欧洲联盟的通用货币——欧元。忽然间，一个能与美国相匹敌的庞大市场出现，欧洲经济大幅度增长，人们甚至认为，将来欧元会取代美元而成为主要货币。

但是，有人指出，自从欧元诞生起那一天，就有制度上的缺陷。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激烈批判主要货币只会约束金融政策，加入国如果自由地行使各自的财政政策的话，是根本无法维持财政规律的。

但是自傲自大的欧洲政治家们根本听不进这种警告，一心只想实现“创立一种取代美元的主要货币”的政治野心。他们无法割舍作为欧洲统一象征的欧元梦，尽管如此，从政治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财政统一的，这一点一目了然。

通过 2007 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希腊危机，历史已经证明究竟哪一个是正确的。进入新世纪后，欧洲的繁荣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表面现象。

欧元曾被看作是德国马克的继承者，其高信用等级可以以低利率进行资金的运作。金融机构通过在欧洲内外以高利率的形式运作这种资金，获得巨额的利益。

欧洲内部的投资方向在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等欧洲南部各国以及爱尔兰（即所谓的PIIGS）等国。欧洲以外的投资方向在波兰、捷克、匈牙利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等东欧国家的不动产方面。

这些国家之前只能以本国的信用等级低的通货付出高额的利率来集资，由于加入欧元区，摇身一变，成为可以想借多少资金就能够借多少资金的国家。发行了大量国债的希腊为准备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积极地进行公共投资，表演了一场“经济高度景气”的戏剧。在西班牙和爱尔兰，不动产的价格也极度上涨，这又招致更多资金的投入。

但是，希腊危机爆发后，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到，这其实是“湿手取粟”式的一本万利的计谋。“魔法”一旦被拆穿，连本来的返还贷款的能力都烟消云散了。

如此看来，不仅在日本，在美国和欧洲，“美梦”也都成为泡影。

吃光了的果实

经济学家、极具人气的博客作者泰勒·考恩指出，在过去的300年前，人类一直食用着“容易收获的果实”，但经济繁荣带来的果实基本上都已经被我们吃光。他将这种情况命名为“大停滞”。①

---

① 泰勒·考恩，《大停滞》（NTT出版）。

所谓支撑着美国经济成长的“容易收获的果实”是无偿的土地、技术革新和未受过教育的聪明的孩子们。

任何人都明白，由西部开发而引起的边疆消失之后，无偿获得土地（这当然是原住民们的土地）的情况不再重现，那么剩下来的其余两个“果实”呢？

从1880年至1940年的60年间，由于电力、汽车、飞机、电话、自来水、医疗、照片、电视以及批量生产线的出现，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时间过去70年后，我们的生活与20世纪50年代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铁路、汽车、冰箱这些东西过去基本上就已经有了，20世纪50年代的人们穿越时光来到现代，恐怕会立刻适应现代社会的。除了互联网之外，当时科幻小说中描写的宇宙旅行、心灵传输等革命性的创新没有一个是实现了的。

之所以未能实现的原因有这样一种假说：20世纪前半叶，人类大脑的机能已经将能够做到的事情大半部分都已经做完了。爱因斯坦虽然是个天才，但从统计学的角度说，与他具有相同智能的人已经出现了好几个。尽管现在的教育环境比以前要完善得多，但能与相对论匹敌的世纪大发现仍然没有出现，现代的爱因斯坦几乎没有可以思考的问题了，或许这是由于他们在华尔街的投资银行以及对冲基金工作的缘故。

还有一个果实也正在枯萎，这就是“未受过教育的聪明的孩子们”。

1900年的美国高中生的毕业率仅为6.4%，但到了1960年后期，就达到80%，至此，就停滞不前了。在日本，高中入学率在

1970年中期就已经超过了90%，没有再上升的余地了。

美国的大学入学率于1900年为400人中有一人进入大学学习(0.25%)，现在则达到40%（日本为45%）。

如果给予头脑聪明、又有上进心的年轻人以教育机会的话，经济生产效率会大幅度提升。但是，现在在美国，3个大学生中就有一人中途退学。这是由于不具备高等教育所必需学力的学生们占据了最底层的大学的缘故。因此，大学的入学率再高也无法带来曾经的经济增长了。

这也就是说，教育费用与效果的比例严重失调。高中可以通过免费制度，让因家计贫困而不得不放弃学业的优秀年轻人获得教育的机会。但是，他们带给社会的追加性财富与其投入的税金相比是完全不成正比的。

因此，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几乎吃光了“果实”，迎来“大停滞”的时代。与此相反，新兴国家的追赶步伐越来越快。

日本的有线电话网络覆盖全国，但新兴国家如果想要建构这样的基础设施，需要花费巨大的资金和很长的时间。但是，运用无线局域网技术可以以极低的成本做同样的事情。不仅如此，拥有有线电话网络的大企业的既得权益越少，或许越可以建构一个更加有效的通信基础设施。

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开始于1980年，由于冷战结束和全球化，其经济增长速度更加加快。这与发达国家的停滞与经济差距扩大的情况恰恰相反。

问题出在国家

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经济高速增长就已经结束，既得利益

的不同，使得政治上的对立暴露出来，社会被分裂。在欧洲，发端于希腊的欧元危机不仅在通货方面，甚至还引起欧盟解体的危险。在长时期通货紧缩的日本，人们预测："日本人口将减少三成，每5个人中就有两个65岁以上的高龄人（占四成）。"没有一个人对未来抱有希望。

当然，在亚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都呈现出经济活跃的状况。但在实行独生子政策的中国自2015年起人口会急剧减少，迎头赶上的步伐终究会停下来，新兴国家也要老去。如果失去所有的经济增长的动力，人类或许会像中世纪那样，迎来长期停滞的时代。不管怎么说，我们将在此后的10年间亲眼看到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变化。

最近几年来，个人与国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天真地相信国家了。

金融危机这样大规模的经济性混乱一旦出现，我们极其自然地会期待国家能够"驾驭"它，走向"正常化"。这是因为，市场就像是一匹暴烈的马，国家理应成为有能力的驾驭者。然而，实际上混乱的原因或许就在于国家。

受到"9·11"的打击后，由于美联储大幅度调低利率，引起大规模的不动产泡沫，由此又引发了世界性金融危机。欧元危机的本质在于，强行地将设计上有重大缺陷的某个通货引入到欧洲这个巨大的市场中。日本1 000兆日元的国债当然是因为国家发行债券产生的。无论哪一个原因都是由国家制造的，经济上的混乱是市场试图纠正其走向歧途的一个过程。

喝酒有害身体，但一边豪饮一边大量服用维生素的话，身体

状况也只能越来越坏。与此相同，欧洲的状况已经坏到欧盟的首脑们需经过多次商谈拿出对策的地步了。如果放任经济混乱的原因不管不顾，要想收拾烂摊子就不那么容易了。

每当"金融危机"爆发时，国家就会向市场投入庞大的资金，想使混乱平息下来，但由此而造成金融市场规模的更加扩大，引起更大的打击。从1997年亚洲通货膨胀危机到世界金融危机的10年间，人们重复着相同的经济泡沫破灭的模式。

但是，国家成为"问题"并非是最近的话题。国民国家是与近代一起诞生的。从那时起，国家就给人类带来各式各样的灾难。所谓近代或许就是由国家来解决国家这个问题的一场苦战。

18 “桥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大阪市市长桥下彻[①]率领的“大阪维新之会”公布了一个叫作“维新八策（船中八策）”的政策集，目的在于国家选举。政策集中除了列举了构想大阪都、实现道州制等表面文章外，还列举了（年金）保险金中途停交、创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首相公选制等颇具刺激性的提案。

“辅佐”桥下的人有堺屋太一[②]、曾在麦肯锡（McKinsey）咨询公司工作过的上山信一[③]（庆应大学教授）、原经产省官僚古贺茂明（《日本中枢的崩溃》的作者）等，这个强大的智囊团和他们的巨大个人魅力相结合，甚至有人认为他们形成了一个左右国政

---

① 桥下彻（1969－ ），日本政治家，自2011年12月起任大阪市市长（第19任）。——译者注

② 堺屋太一（1935－ ），日本作家、评论家，曾任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1998－2000），著有《日本的盛衰：从近代百年展望“知价社会”》《东京塔看到的日本：1958－2008》等。——译者注

③ 上山信一（1957－ ），日本庆应大学教授，著有《大阪维新：桥下改革改变日本》《公共经营的再建构：从大阪改变日本》等。——译者注

的台风眼。

加之他们充分利用推特（Twitter）——其追随者们超过了60万人——发表自己的信念和政治上的主张，针对批判的反击手段也成为人们的话题。桥下市长的“推客”（tweet）① 有时会成为新闻报道，这似乎将网络与旧媒体的关系完全颠倒了。

当然，桥下市长的“政治冒险”之旅才刚刚开始，目前还无法轻易对此加以评价。但其政治哲学（即所谓的“桥主义”）是值得放入历史的脉络中加以探究的。*

* “桥主义”是批判桥下市长“独裁”时最常用的一个标签，其本人强烈反对道：“这是让人联想起法西斯主义②的一种性质极其恶劣的负面宣传。”桥下市长以及“维新之会”的成员们都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因此，他们对“独裁者”、“法西斯分子”的说法极其愤慨，这并非没有道理。在这里，我是在“桥下③市长的政治哲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就如同漫画家小林善范④使用“我主义”⑤ 一词一样。

尽管如此，我的问题十分简单。

桥下市长为什么能够用140字的推特就能够击碎所有的批判？

---

① 即推特中的留言或帖子。——译者注

② “桥主义”（Hashiism）与“法西斯主义”（fascism）的读音极其相近。——译者注

③ 原文是“桥本”，似有误，径改。——译者注

④ 小林善范（1953－　），日本漫画家，代表作有《直奔东大》《大少爷君》等。——译者注

⑤ “我主义”是日本2002年创刊的一部漫画杂志的名字，主编为小林善范。其编辑方针是：为重新建构信赖关系，“从七零八落的价值中找出真正的价值，并把它组合起来”，杂志将刊登“我”喜好的作家、漫画等。“我主义”就是把“我”与“法西斯主义”结合起来的一个说法。——译者注

这里隐藏着“桥主义”的本质性问题。

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

在这里我想就“所谓‘桥主义’就是单纯的新自由主义”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在此之前，我以为有必要对新自由主义（Neo Liberalism）及新保守主义（Neo Conservatism）作以简单的说明。

政治哲学大体上可分为自由主义、自由原理主义、社群主义和功利主义4部分。正如字面所表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就是“新的自由主义”，如果将社群主义当作保守派的话，那新保守主义就是“新的社群主义”。

从定义上说，这应该没有错，但现实生活当中，新自由主义与旧自由主义（旧左翼）、新保守主义与保守派相互敌对，犹如不共戴天的敌人一般。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是无法纳入政治哲学框架里的“异物”，受到现有的政治势力的厌弃。

实际上，“新”这个词素并非继承了此前的历史和思想后赋予它新的价值的意思，而是意味着对现有的政治哲学说“不”的“反自由主义”及“反保守”。他们究竟否定的是什么呢？

社会学家桥本努[①]认为，说到底他们反对的是“福利国家”。[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帝国主义（殖民地主义）时代，国家的目的在于从军事上制服他国，尽可能多地获取领土（殖民地）。因此，投向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向世界宣告，接下来的战争将

---

① 桥本努（1967－　），日本社会学家，著有《自由的社会学》《失去的近代：驱动资本主义的新原因》等。——译者注

② 桥本努，《帝国的条件：自由成长秩序的原理》（弘文堂）。本章的讨论内容多出自该书。

是毁灭人类的最后一次战争。冷战是制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直接交火的一场战争。以"维持现状"为目标，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允许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以及苏联侵略阿富汗的战争，在名义上都是为"自由阵营"或"祖国"的保卫战）。

在这样一种巨大的环境变化之中，国家也改变了模样，"福利国家"开始出现，其最大的目的就是"国民幸福的最大化"。在过去的帝国主义时代，人们认为，获得领土可以增加国民的幸福，而福利国家可以说就是近代国民国家的单纯化。

福利国家除了自卫（国际贡献）之外，不行使武力，尊重他国的主权，一心专注于使领土内的国民幸福起来。英国社会保障制度非常完善，被人们称作是"从摇篮到坟墓"式的保障，以这种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F·罗斯福的新政为端绪的美国大规模的公共投资等就是福利国家的典型。

在当时，凯恩斯经济学还是一种最前沿的理论，这种理论提倡：因经济不景气失业率上升时，国家应以公共事业等消化剩余劳动力。美国和欧洲的自由主义国家之所以纷纷采纳凯恩斯的理论，是因为除此之外没有更有效的对策。另外，还有更强烈的政治上的理由。

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唱着"劳动者乐园"的赞歌。这种社会主义幻想由于1956年的匈牙利动乱（苏联军队镇压匈牙利民主化运动，杀害了数千市民）而走向幻灭，但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的政治势力十分强大，为了对抗这种势力，欧美各国必须向它们显示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经济才能

够使“福利”成为可能。

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除日本之外的发达国家发生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的情况，此前的凯恩斯经济学无法应对这种新的经济不景气现象（越增加政府的支出，通货膨胀越厉害），失去了神通广大的力量。

就在这时，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出现了，他否定中央集权型的福利国家（大政府），主张经济学应向凯恩斯之前的古典自由主义（亚当·斯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回归。这个弗里德曼就是新自由主义的鼻祖。

后福利国家的政治哲学

《自由选择》是体现弗里德曼思想的一部畅销书，在日本，因与该书同名的电视系列节目大受欢迎，弗里德曼的思想也广为人知。简单地说，其思想就是：“通过彻底的民营化，使得臃肿的行政体系变得更加有效率，将国家的限制最小化，以获得市场潜在能力（看不见的手）的最大化。”

弗里德曼除了提倡邮政事业的民营化、通信的自由化、关税的废除以及平时征兵制的废止等外，还主张一些过激的政策，如废除医生、律师等的许可证制度，废止养老金、健康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使吸毒合法化等（弗里德曼是自由原理主义者在精神上的支柱）。

但是，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生在贫困犹太移民家庭的弗里德曼并非主张“抛弃弱者”。他只是认为，“大政府”的福利是没有效率的，不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从国民那里征收巨额的税金，行

政机关将它分配给国民的做法很快就变成了“榨取”国民的体系。

于是，弗里德曼构想了一个新福利制度。在这个新制度下，生活保障制度被废除——因为它让人们失去劳动的欲望，“负的所得税”——即越工作收入越增加——制度被采用。年金及保险等社会保障全部托付给民间的保险公司，社会上的弱者的生活不是由国家，而是由地区的共同体（教会、镇上的社群）资助，资助金并非是税金，而是由捐献者或志愿者承担。“小政府”几乎不向国民征税，因此富裕阶层不会被国家“掠夺”财富，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自己的资产，为社会作贡献。

如此看来，有人可能会惊讶于弗里德曼的思想与“维新八策”有许多相似之处。当然，这反映了弗里德曼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同时也反映了“福利国家走上穷途末路”的现象是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共通的疾患。

如果症状一样的话，毫无疑问处方也是相同的。不仅仅在日本，（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任何地方，以市场原理和民营化为武器向巨大政府开炮的改革者们是弗里德曼最正宗的后裔。

几乎与弗里德曼的思想广泛传播的同时，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新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这是以犹太人——他们对20世纪60年代的“堕落的左翼文化”（吸毒、性、摇滚）感到幻灭——为中心的旧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他们从支持民主党转而支持共和党，提出一种特殊的思想：“为了使美国的正义（自由民主主义）传播到世界各地，不惜使用武力。”①

① 副岛隆彦，《动摇世界霸权国家美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讲谈社+α文库）

正如桥本努指出的那样，除了外交上的好战和宗教的热情外，新保守主义的观点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惊人地相似。

新保守主义从维护传统的保守主义立场批判"大政府"的中央集权式的福利，认为它起到了破坏家庭和地域共同体的作用。他们认为，福利的承担者应是家庭、地域共同体（教会）和地方政府。

新保守主义在安全保障和外交方面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相去甚远，但在内政方面——民营化市场原理的活用、福利制度的分权及分散化——有着更多的共通之处。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作为"后福利国家（新）"的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福利国家（旧）"的政治哲学针锋相对。

应时代之需的新自由主义

进入80年代后，"福利国家的尝试已经失败"的观点成为世界的共识。**

** 在日本，一提起"福利国家"马上就会一如既往地举出瑞典等北欧的国家来，认为其他国家永远不会成为福利国家。这其实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所谓福利国家，是只会在这样一种国家——即在人口稀少（瑞典的人口约为1 000万人）的寒冷地区，居民们固定生活在一个地方（首都），且资源丰富——获得成功的典范。

高举"民营化"和"行政改革"的大旗的里根政府（美国）、撒切尔政府（英国）以及中曾根政府（日本）同时在世界各地出现。

这并非暂时性的现象。这一点从政府换届后，掌握政权的克林顿（美国）、布莱尔（英国）继续沿袭了不同党派的里根、撒切尔政府的改革政策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日本，桥本龙太郎内阁的行政、财政改革在增加消费税的问题受到挫折之后，比美英略微晚一些时候，小泉纯一郎内阁成立，在专门从事经济政策制定的竹中平藏帮助下，正式走向新自由主义的路线（"不改革经济就不会增长"）。

小泉内阁的执政时间达6年之久，关于这个政府的评价至今没有定论，但其后的安倍、福田、麻生等自民党内阁以及由政权交替而出现的鸠山、菅等民主党内阁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被点名成为小泉改革继承人的安倍晋三①虽然试图缓和党内的分裂状况——这种状况是由小泉的"强权"政治引起的，例如他恢复了反对邮政民营化而遭到退党处分的造反议员的党籍等——但在年金记录问题上，其应对不当遭到在野党民主党的攻击，在2007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安倍彻底失败，以身体健康为理由交出政权。紧接着的福田、麻生②两个内阁与小泉、竹中一派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背道而驰，提出了缩小经济差距等目标，但在"较劲国会"③的状态下苦不堪言，只好将政权拱手相让给民主党。

---

① 安倍晋三（1954－　），日本政治家，曾任第90任日本首相（2006年9月－2007年9月），2012年12月起任第96任日本首相。——译者注

② 福田内阁成立于2007年9月，福田康夫（1936－　）任日本第91任首相。麻生内阁成立于2008年9月，麻生太郎（1940－　）任日本第92任首相。——译者注

③ 即执政党在众议院的席位虽然过半，但在参议院却是在野党占据了多数席位，从而形成了国会中众议院与参议院相互对峙（较劲）的情况。——译者注

民主党全面否定小泉的改革政策，但如前所述，仅看他们的宣言的话，会发现其公务员制度改革和政治改革等政策与新自由主义极其相近。以工会作为其最强大支柱的民主党的政策是各种意识形态的大杂烩，至少起草宣言的主要人物是改革派议员，他们并不否定小泉改革，其感情可能几近于"被拔了头筹"的一种近亲憎恶感。

不管怎么说，他们将造成以经济差距（"下流"社会）为主的所有"恶"的原因都一股脑地推到小泉改革的身上，即使改善这种"恶"，使它走上"正轨"，实际上现状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加上世界经济形势和东日本大地震的影响，日本社会的闭塞感越来越强。我们无法否定这样一个讽刺性的事实："小泉时代（2001-2006年）是最好的时代。"

于是，时代需要一种新的新自由主义。这就是"桥主义"。

将所有的改革都归结为新自由主义，当然有其理由。小泉政权之后，政治上一直处于空转的状态，没有一个人能够提出有效的"改变日本"的政策。只有新自由主义能够描绘出一幅后福利国家的具体的形象图。

极端的个人主义

桥下市长是信奉"竞争"的，这一点众所周知。但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将政府功能民营化，让它完全进入市场竞争的经济思想，因此，这就像是给新自由主义下定义一样。如果说"桥主义"中有特色可言的话，那应该是彻底的个人主义。

关于这一点，从桥下市长本人在讨论"维新八策"时强调的

“没收遗产（百分之百的继承税）”的观点中可以了解到。

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征税本身就是国家对所有权的一种侵害，但即使不那么极端，以“小政府”为目标的新自由主义也认为税率最好要低。继承税是典型的双重征税，在发达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已经废止。因为“放任自流地用尽财产不用课税，而留给子孙却课以重税，这等同于国家对热爱家庭的人给予惩罚”。***

*** 税法的一个大原则是“曾被课税的所得不能再次被课税”，即禁止双重课税。我们的劳动所得支付了所得税，储蓄、股票投资、不动产借贷等获利部分也被征税。继承税所征收的对象是已经支付过税金后留在手里的纯资产，因此，对这部分资产征税是明显的双重课税。

但是，作为新自由主义者的桥下市长并不赞同继承税，或许是他认为“权利和义务只属于个人”。如果这样的话，财产拥有者一旦死亡，其财产权也就消失了，那么，其遗产由国家进行回收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将社会当作是单纯的个人集合体的观点不仅为提倡“私人所有权”至上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而且也为重视家庭价值的社群主义者（保守派）所不能接受。当然，这与普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有一定的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过来很好地反映了桥下市长的思想特色。

桥下彻出生于贫困家庭，小学二年级时，他的父亲自杀身亡，母子俩相依为命。后来由于母亲再婚，他移居到大阪。他一边打工挣钱，一边刻苦学习。大学毕业那一年，他通过了司法考试，

在大阪开始走上律师的职业道路。从他彻底的个人主义背景中，我们很容易看出他“不依靠任何人，一个人活了下来”的自负精神。

新自由主义是经济学家等知识界精英人士的思想，一般来说，是为大众所回避的。但桥下市长通过自身的经历知道，无论怎样的言行都不能以“藐视的目光”来对待。他所说的“我要全力支持认真努力的穷人们”的话语中透露出真诚，受到社会上弱势人群的狂热的支持。

与此相反，批判“桥主义”的大学教授、评论家们都是在家境良好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精英，他们的条件比桥下市长要优越得多。当他们发现批判的声音又回到他们自己身上时，他们都默不作声了，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加之日本存在接受这样的“超个人主义”的土壤。当然，这是因为日本人是抛弃了地缘和血缘的世俗的国民，他们认为“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是理所应当的。对“没收遗产”这样具有刺激性的政策之所以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对的声音（或许他们也认为这是无法实现的），是由于绝大多数日本人认为“人死后一切都完了”的缘故。

日本人原本就是对新自由主义极具亲和力的国民。最近10年间，像小泉、桥下这样的获得人们极大欢迎的政治家发出共同的声音绝非偶然。

新自由主义与爱国

新自由主义本来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经济思想，它在意识形态

方面采取的是中立态度，就像弗里德曼那样。参拜靖国神社的保守派政治家们可以是新自由主义者，相反，和平反战的活动家们提倡新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也不奇怪。

但这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本身就缺乏政治上的向心力。人与生俱来的正义情感是自由、平等、共同体，从感情上是无法赞同功利主义的。

如果功利主义者无法让有权利的人去投票的话，那么，处于中立立场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家就会通过功利性的判断，更进一步地向大众宣扬政治上的意识形态。这种新自由主义与“爱国”、“传统”等保守价值相结合，失去了与新保守主义之间的区别。

不过，桥下市长将热情倾注于教育改革和行政改革方面，从他对修改宪法第九条表示出极不关心的姿态可以看出，他根本不关注日本的独立自主。正如他做出终止大阪府立上方演艺资料馆、大阪中央交响乐团、国际儿童文学馆等的文化活动的决定一样，他根本没有将“传统”、“文化”列入其财政重建的范围之内。“国家不介入宗教和文化”，这是正统的自由主义的思想。

在大阪府修改教育条例以及起立合唱《君之代》[1] 方面，也并非是侵犯教育的中立性以及灌输“爱国意识形态”，其问题在于组织管理。“教育委员会做出决定，甚至下达了职务命令，但对不执行的教员没有任何的处罚，这种管理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极为常识性的观点，反过来，这反映了日本教育的极不正常（农村社会的亲近关系）的一面。

“大阪都构想”是为了在世界城市竞争中获胜的一个愿景，为

---

① 日本国歌。——译者注

此，大阪政府废弃了伊丹机场，将关西国际机场当作亚洲的航空枢纽，将海岸地区作为国家战略综合特区，意欲搞活地域经济。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增长战略有其局限性，通过地方分权，实现“不改革经济就不会增长”，这种战略非常简洁明了。

桥下市长认为，亲自“改革机构是政治家最重要的工作”，他是一位“体制改革”（即新保守主义者所说的“regime change”①）的政治家。②

众所周知桥下市长是大前研一③的热心读者。被聘为大阪市特别顾问的上山信一则曾在麦肯锡咨询公司工作，而大前曾长期担任麦肯锡咨询公司日本分公司的代表（毋庸赘言，“大阪维新之会”继承的是大前的“平成维新之会”）。此外，在桥下市长的智囊团里还有改革派的原官僚。毫无疑问，桥下市长是第一次出现于地方政府里的真正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家。

行文至此，我们终于能够回答本章最初提出的疑问了。

批判“桥主义”的人们为什么就那么轻而易举地被只有140个字的推特所击倒呢？

140个字的反驳

新自由主义是以福利国家走向破灭为前提的政治哲学，它与拥护福利国家的旧自由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

① 即政权更迭。——译者注

② 桥下彻、堺屋太一，《体制维新：大阪都》（文春新书）。

③ 大前研一（1943～ ），日本著名管理学家、经济评论家。著有《金钱的流动发生了变化！促进新兴国家的世界经济新规则》《日本复兴计划》等。——译者注

新自由主义针对意识形态的批评用现实加以反驳。例如，针对“重新审视生活保障是对弱势群体的抛弃”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是这样回答的：

支付现金只会削弱劳动欲望。干不干活都可以拿到钱的话，谁还愿意工作呢？****

**** 这并非桥下市长推特的实际内容，而是我编撰的。以下均如此。

针对“重新审视年金制度”的批评的回答是这样的：

在少子高龄化时代，如今的年金制度毫无疑问将无法为继。即使是为了维护高龄者的晚年生活，也必须彻底推翻现行的年金制度。

这样的反驳意见之所以特别强硬，是因为年金、健康保险制度以及生活保障等福利制度事实上都无法发挥其功能了。如果有将来能够维持现行制度的绝妙方案的话，老早就有人实行了。旧自由主义无法提出对策，因此，争论一开始就已经输掉了。

针对“独裁”式的政治手段，反驳的意见在140字以内就够了。

“利用强权加以高压，机构也不会发挥作用。应更多地倾听职员们的意见。”

你在行政的职场上干过吗？一有机会，每一个人都想把要收回既得权利的改革者踢出门外。在这里发生的是一场战争。

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行政队伍在不断地膨胀。像大阪府和大阪市这样规模的行政机构，只要拍一下它，马上就会有灰尘出现。针对大阪市职员所做的邮件调查受到人们的批评，由于揭露出违法的选举活动，媒体终于闭了口。谁都不愿意成为“紧抱着既得权利，尝尽好处”的公务员和工会的拥护者。

关于意见最大的教育改革，反驳起来最容易。

“行政不应该干涉教育。教育应保守其中立的性质。”

如果政治无法干涉教育的话，如何改善这样一个现实，即大阪的学力处于全国最低水平。

桥下市长进行教育改革的契机是，在全国性的学力调查中，大阪的小学生的学力在全国排第41位，中学生排第45位。由于这个结果的发表，人们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父母亲们所追求的不是“教育的中立性”这种表面文章，而是“成果”。

“对是否在唱《君之代》进行调查，这是对个人的思想信仰的不正当干涉。”

你认为，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人能够教学生说“你要遵守规则”吗？

正如桥下市长所说的那样，“政治上的决定是需要强制力的”。“不应该墨守成规地动用规则”、“应随着个人的情绪而灵活地使用规则”等说法无非是农村社会式的无限责任＝无责任的宽容。

就这样，“桥主义”＝新自由主义立刻彻底地反驳了来自拥护过去的社会制度的旧自由主义、保守派和传统主义者的批判。这

并非由于桥下市长是律师，其辩解就成立，而是由于批判者都是固守地方性规则的人，而新自由主义则是世界性（全球化）的思想。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桥主义"的本质在于市场原理主义（促进竞争）、小政府（民营化和改革行政、公务员制度）以及彻底的管理（法治）。这些都是看准了"福利国家走向破灭"的现实，经过40年以上的争论——它是在世界顶级的智慧人士（大多是美国的经济学家）之间展开的——后产生出的实践性的经济政策。桥下市长推特的背后是有着极其庞大的知识积累的。

包容所有建设性的批判

作为"世界性思想"的新自由主义可以通过现实主义（福利国家走向破灭）和全球化的正义（法治）对现有势力的所有批判进行反驳。但实际上，新自由主义还另有其他真正的出彩之处。

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包容所有的具有建设性的批判。

桥下市长提出"中途停交年金"的观点。这个观点看上去似乎是这样一种制度，即即使你支付了年金保险费，但如果你是具有一定限额以上的所得或资产的高龄者，那就得不到年金。然而，这不仅有侵害财产权的嫌疑，而且还避免不了这样一种逆向选择，即越是有高额所得的人或富裕阶层，就越想退出这种年金制度。那么，还不如就按照所约定的数额来支付年金，然后对其所得和资产加以课税，这样做更加现实。假设你就是持这样的批判态度的。

于是，（恐怕）你会收到这样一个"推客"。

如果是建设性的提案，无论怎样的提案我都欢迎。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请多加批判。

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价值自由的功利主义，如果有许多改革穷途末路的福利国家的提案的话，在经过对比研究后，采用成本和效果成正比的提案即可。

有人嘲笑“维新八策”不现实，其实，这是误解了新自由主义的心胸广阔之处。对“桥主义”缺点的批判都被吸收，有助于政策走向的完善。

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最显著地表现在关于引入最低收入的争论方面。

最低收入将“生存权”作为基本的人权，由国家保障全体国民的最低限度所得的一种制度，社会活动家雨宫处凛①——她是批判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理主义的急先锋——强烈主张应引入这种制度，将它作为解决贫困的最后一张牌。

从“小政府”的立场出发，也有人提出，制止国家对社会保障的干涉，应将最低收入作为使行政简单化的一种手段来加以评价。如果已经决定“一律向20岁以上的国民每月支付7万日元”的话，那么年金、失业保险以及社会保障都不需要了。

“维新八策”把最低收入作为政策的课题提出来时，就将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活动家们推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立场上。为了实现最低收入，如果社会活动家们与“维新之会”共同战斗的话，

---

① 雨宫处凛（1975－ ），日本女作家、社会活动家。著有《为了“生存”反击吧！劳动和生存陷入困境时的泡沫经济》《对排除的空气吐吐沫》。——译者注

那么就成为自己十分厌恶的新自由主义的同类了。但如果反对“维新八策”的话，那么在最低收入方面提出的观点就失去一贯性了。

作为功利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将之前的生活保障制度与“负的所得税”和最低收入等替代性方案相提并论，对它们的成本和利益进行了对比考量。社会活动家被迫加入这种“民主的”决策过程，从结果来看，他们对新自由主义助了一臂之力。

超越新自由主义的东西

“桥主义”的未来究竟是怎样的?

桥下市长成功地使大众怀抱“变革”的期待，与美国大选时的巴拉克·奥巴马一样。奥巴马通过批判华盛顿和华尔街获得了支持者，与此相同，只要以公务员为“敌”的政治秀还在上演，桥下市长的人气就不会受到动摇。此前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从来没有在地方上的政界里出现过，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桥下市长的厉害了。

由于福利国家在财政上、制度上都走上穷途末路，旧保守主义和保守派主流在战火点燃之前就已经败北了。新自由主义包容建设性的批判，并对这些批判进行对比研究，将它作为政策草案的素材加以利用。此后，剩下的只是“独裁”、“法西斯主义”的骂声，或者是“对弱势群体冷酷无情”、“言辞粗鲁”等毫无意义的道德论。一个地方政治家的立场能够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在推特上推广，只这一点，“桥主义”就是所向披靡的。

正如掌握政权的奥巴马现在正受到来自共和党总统候选

人——他们是“华盛顿和华尔街的拥护者”——的批判一样，将来，如果桥下市长掌握了国家政治权力的话，也会从正面与国民大众的利益相冲突。政治家的真正价值就是在那个时刻才能体现出来的。

前面我写道：“‘桥主义’是所向披靡的。”然而，新自由主义难道就无法从根本上加以批判吗？

当然，从观念上讲，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可以批判的，但新自由主义是以自由民主主义为根据的全球化思想，对它进行全面否定的话，那就意味着也一同抛弃了“自由”和“民主制”（佐伯启思①《再不提自由和民主主义了》）。功利主义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的，如果“反市场经济”的话，那只能成为像朝鲜那样的国家。新自由主义对改良“市场原理主义”的所有尝试都加以吸收，因此，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人只能说它退缩至“武士道”的传统中去了，别无其他方法。总之，在道理上新自由主义是无法匹敌的。

不过，根据我个人的看法，击破新自由主义的唯一一种政治哲学就是自由意志主义。

在自由意志主义者看来，新自由主义是不彻底的自由主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一种只有以国家为前提才能够成立的思想。

自由意志主义者在全盘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基础上，更可以洞察未来。它不是“小政府”，而是最小国家和无政府资本主

---

① 佐伯启思（1949－ ），日本经济学家、思想家，著有《经济学的犯罪：从稀缺性经济到过剩性经济》《文明的野蛮时代》等。——译者注

人——他们是“华盛顿和华尔街的拥护者”——的批判一样，将来，如果桥下市长掌握了国家政治权力的话，也会从正面与国民大众的利益相冲突。政治家的真正价值就是在那个时刻才能体现出来的。

前面我写道：“‘桥主义’是所向披靡的。”然而，新自由主义难道就无法从根本上加以批判吗？

当然，从观念上讲，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可以批判的，但新自由主义是以自由民主主义为根据的全球化思想，对它进行全面否定的话，那就意味着也一同抛弃了“自由”和“民主制”（佐伯启思①《再不提自由和民主主义了》）。功利主义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的，如果“反市场经济”的话，那只能成为像朝鲜那样的国家。新自由主义对改良“市场原理主义”的所有尝试都加以吸收，因此，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人只能说它退缩至“武士道”的传统中去了，别无其他方法。总之，在道理上新自由主义是无法匹敌的。

不过，根据我个人的看法，击破新自由主义的唯一一种政治哲学就是自由意志主义。

在自由意志主义者看来，新自由主义是不彻底的自由主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一种只有以国家为前提才能够成立的思想。

自由意志主义者在全盘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基础上，更可以洞察未来。它不是“小政府”，而是最小国家和无政府资本主

---

① 佐伯启思（1949～ ），日本经济学家、思想家，著有《经济学的犯罪：从稀缺性经济到过剩性经济》《文明的野蛮时代》等。——译者注

义；它不是行政改革，而是国家本身的民营化；它不是修改《日银法》，而是纸币发行的自由化……这一切听上去似乎荒诞无稽，但这是为国家所束缚的新自由主义所无法描绘的"梦想"。

自由意志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思想，因此，像提倡价值中立的新自由主义一样，没有必要为引起大众的瞩目而向其他的价值观（爱国、传统）献媚。其作为极端的自由主义能够包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因此，它可以利用新自由主义，但不会为新自由主义所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具有超越新自由主义可能性的唯一一种政治哲学。

当然，你可能会嘲笑这是纸上谈兵式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乌托邦。但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和信息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历史中出现了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可能性。这并非是我信口开河，在信奉"网络自由意志论"（cyber-libertarianism，网络空间中的自由意志主义）的硅谷，每个人都是那么认为的。（在日本，一提起自由意志主义者，人们马上就联想起茶党，但是美国西海岸才是现代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大本营。）

当然，我们还不知道"人类历史上的革命"到底是妄想还是能够实现的未来。但脸谱、推特等社交网络服务（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NS）现在终于能够描绘其轮廓了。本书的最后将对此加以叙述。

人们现在有一个疑问，即能否列举出比"桥主义"（新自由主义）更加大的自由呢？

小结（9）

- 在发达国家（日本、美国、欧洲）股价不再上涨。

  泡沫破灭→中产阶级的没落

- 大停滞 = “容易收获的果实” 被吃光了

  ▼

  国家的“问题”由国家来解决的矛盾

- 新自由主义 = 新保守主义▶后“福利国家”的政治哲学

  自由主义 = 福利国家走向穷途末路

  全球化的正义 = 法治

  ▼

  世界思想

- 超越新自由主义的究竟是什么？

19 赛博空间的评价经济

全球化资本主义现在正迎来一个巨大的转机。此后，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未来呢？

在这里，我想从金钱和评价的角度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迈克尔·杰克逊与投资银行家

金钱的边际效用递减，评价就递增。这里虽然使用了经济学术语，但道理却并不复杂。

所谓边际效用是说每增加一个单位所产生的财富（效用）。如果用金钱来说的话，钱包里的1万日元增加到2万日元（追加了1万日元），幸福感（效用）就会急剧增大。

递减的意思是说增加一个单位原材料时的效用在逐渐减少。拥有1亿日元的人增加了1万日元，对幸福感几乎没有多大影响。在贫穷时，这样的金钱的效用极其大，但随着资产的增加，效用逐渐减少（递减），最后变成了零。

与此相反，评价的效用递增。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艺人、文化人、经营者、政治家等，一旦成名后，就想更加出名。与此同时，一旦自己从名人（名流）的地位掉下来的话，就十分害怕人们会忘记自己（图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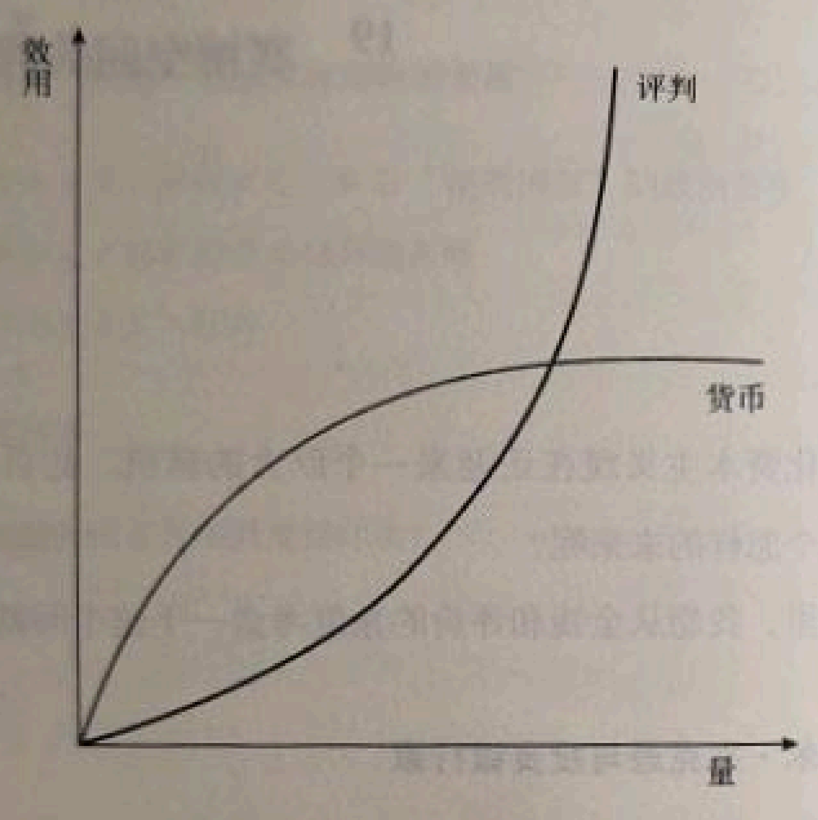


图 22　货币与评价

迈克尔·杰克逊是世界上最受好评的歌手（流行音乐天王），也是亿万富翁，但他未能在洛杉矶的豪宅里度过悠闲自得的余生。当我们观看影片《迈克尔·杰克逊：就是这样》（*Michael Jackson's This Is It*）——这是根据为伦敦演唱会进行排练时的影像资料剪辑而成的——时，可以看出天王是如何苦心孤诣的：这是时隔 13 年的一次演唱会，这位旷世巨星想维持完美的表演以及呈现最好的舞台效果。迈克尔患上重度的失眠症，如果不全身麻醉的话是根本不能入睡的，这也成为他的死因。

货币的效用在递减，而评价的效用却在递增，这是因为评价是社会性动物——人——所追求的“真正的价值”。我们得到朋友的高度评价，或得到恋人的爱情时，会有很大的幸福感。货币只不过是其代替品（如果你是富翁，人们会尊敬你），在货币与评价的交易中，绝大多数人选择评价。

如果只是单纯地赚钱，像“风俗业”[1]和“产废业”[2]这些“人们厌恶”的工作从人力资本的投资效率方面说是很高的。我曾向一位开始从事“风俗业”的朋友询问他从事这个行业的理由，他告诉我说：“因为这个行业的水平太低了。”据说，其竞争对手根本不具备像财务、销售这样的基本经营知识，只是根据动物性的欲望（性欲）从事这个行业的，因此，只要平平常常地做就可以赚钱。（但最近由于竞争激烈，似乎仅平平常常地做，赚钱也不容易了。）

如果只从经济合理性的角度思考的话，不断有新人加入风险高且回报也高的行业，此时超额利润肯定会降低。在美国一流的大学里获得 MBA 学位的人们之所以不从事“风俗业”，是因为即便他赚了很多的钱，但从社会评价来看，还是很不划算的。

另外，如果金钱与评价完全相一致的话，那么人的“欲望之大”就会变得永无止境。这方面的典型人物就是赌徒和投资银行家。

在商业活动中，我们并非都以金钱来衡量所有的评价。“虽然没能够干下去，但的确是一个有意义的项目”、“虽然没有卖出去，

---

① “风俗业”指从事性服务的行业。——译者注

② “产废业”指产业废弃物收集搬运业务。——译者注

但的确是个好作品（书、电影、音乐）"，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这并非是输了还嘴硬的表现。在商业上虽然未能成功，但得到一部分热情粉丝追捧的东西可以为将来的成功奠定基础。

但这种说法并不适用于赌徒们。在赌场上，胜者和败者是完全只依靠金钱来严格判定的，败者是得不到任何筹码。华尔街投资银行是在与赌场相同的评价基准上运营的。从原理上讲，在这里是不存在"虽然损失惨重，却是一个很好的交易"之类的说法的。经销商和贸易商的评价都单纯地由所赚取的金钱多少决定，其他的要素一概不在考量范围之内。这种犹如游戏似的"单纯性"让极具智力的人们中毒（货币依赖症）匪浅，成为他们暴走金融市场的原因。[①]

对华尔街来讲，遵守道德毫无意义。与我们一样，他们也在竞争，希望得到更好一点儿的评价。只不过他们认为，除了赚钱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而已。

自我增殖的资本主义

前面我们说过，评价优先于货币。由图22我们知道，这只是说极其富有的人的情况。世界上许多人现在仍处于生存的边缘，他们除了来自家庭、亲属等共同体（这正是他们得以生存的依赖网）的评价之外，对其他的评价毫不在意。

"极其富有"的定义因人而异，但一般情况下是指拥有"自己

---

① 努里尔·鲁比尼、斯蒂芬·梅姆，《巨大的不安定》（钻石社）。[原文为 *Crisis Economics: A Crash Course in the Future of Finance*，汉译《危机经济学》。——译者注]

和家庭能够在一生中放心生活下去的资产”。这么一来，极其富有的人数就很少，绝大多数人要将货币和评价放到天平上去衡量，只能努力工作，哪怕再富裕一点点。

所谓的资本主义是一种通过欲望和恐怖使自我增殖的体系。以现在的生活水准来说，如果一个人变得贫穷的话，那么他会招致比贫穷生活更大的不幸，这也成为其家庭解体或其本人自杀的原因。之所以经济增长一旦启动就停不下来，是由于人们为这种恐怖所驱赶，加入竞争的缘故。

这种经济行为的积累成为“全球化资本主义”，促进世界的发展。从原理上讲，其自我增殖如果没有外力的抑制是不会停止的。所谓“外力的抑制”是说化学石油燃料的枯竭，或者环境受到破坏，地球不再适合人们的生存等。一句话，就是人类灭亡的时候。

高举环境保护大旗的人们说：“只要回到像江户时代那样的稳定状态下就可以了。”但是，中国、印度、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人们想要过上与发达国家一样的生活，全都奔向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时候，唯有日本从竞争中全身而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江户时代之所以处于稳定状态，是由于没有形成扩大市场的结构（资本主义）。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中国和印度基本上处于稳定状态（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市场遭到破坏），由于全球化而引入资本主义后，突然间开始了经济增长。毫无疑问，首先富裕起来的欧美、日本等国家是没有权利批评他们以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为代价追求富裕的。

尽管如此，地球是有限的，很显然，地球上是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供世界70亿人口都过上与发达国家一样的生活的。中国如果

像现在这样经济增长的话，可能会超越地球环境的极限的。

当然，自从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of Growth*)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受到关注。40年过去后，现在增长仍在持续，这是因为技术革新使得粮食增产的情况大大超过了当时的预测。今后，在能源领域和粮食领域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革新，人类或许还会继续增长下去。

然而，此次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使我们认识到，自1950年获得成功以来，核电技术的开发几乎没有太大的进步。且不提核聚变发电，就连使用钚的高速增殖反应堆也未能商业化，更不用说补充化学石油燃料的太阳能和风能等能源替代产品的技术尚未完成了。今后或许会出现革命性的技术革新，但由于不可能从“无”产生出“有”来，所以也许人们已经尝试了所有的选择了（留给我们的唯一可能也许就是页岩气了）。

地球变暖和臭氧层的破坏之所以成为国际性问题，是因为人们都被迫意识到“增长的极限”了（即便对“环境问题”的评价还有不少的争论）。这样一来，人类的希望究竟在哪里呢？

网络竞拍的道德

互联网最大特点之一是评价的可视化。从图书、电影、餐馆、宾馆到家电产品、美容院、牙医、医院等，我们很自然地在网页上检索对它的评价，然后决定是否购买这个商品或服务。

这种情况给予从事其中某个行业的人以巨大的刺激，他们想在网页中获得更多的好评。（人们认为）这给行业人员和消费者都带来正面的效果。

在餐馆的评价中，由于 CP（cost performance，性价比）是评价的基准，因此店主就以合理的价格提供美味的菜肴。这样的店在美食网站上可以获得较高的评价，这又与招揽顾客挂上钩，其赚取的利润远远超过其降价的部分。另一方面，CP 很差的餐馆只能接受较差的评价，不久就会退出市场。

当然，现实生活中并非一切按此规律运行的。但聚集了大量人气的美食网站通过收集计算各式各样的意见，可以得出甚至比专门的美食评论家们还要客观公正的评价。（大家的意见出乎意料地正确）。*

*据报道，著名美食网站以"每月 10 万日元写 5 条，12 万日元写 10 条"的条件雇专门的写手发表好评。随着美食网站的影响力不断加大，今后，这种行为可能还会继续增加。

充分利用这种方法的是网络竞拍。

在网络竞拍中，竞得者必须以先付款的形式从不明真相的卖家（拍品提供者）手里购买商品（虽然有委托付款服务的委托金体系，但几乎没有人加以利用）。可能有人会认为，拍品提供者可以任意欺骗，但在实际的拍卖过程中却很少产生纠纷。因为竞得者通过评价拍品提供者，实现了高效率的商品流通体系。

竞拍过程中，拍品提供者一旦欺骗消费者，他就会遭到差评的报复。相反，与得到好评的人进行交易的人就会增多。此时最重要的是赞扬拍品提供者，给他们以好评。

用欺诈手法从事商业活动的拍品提供者只能得到差评，但他们可以随时退出竞拍市场，再以其他的名字进行登录。因此，报

复性的效果其实是有限的。

不过，当他一旦退出竞拍市场，其好评也与差评一道被归零。对拍品提供者来说，好评是一个重要的资产，从竞得者那里获得好评的拍品提供者一定要想方设法留在拍卖市场里以获得更多的好评。

参与竞拍的人，如果对同样的商品进行投标的话（被欺骗的可能性极小），那么，他们会选择具有好评的拍品提供者。这样的结构刺激着网络竞拍的拍品提供者，需要他们提供正确的商品说明以及快捷地发送商品。

网络竞拍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并非因为向拍品提供者进行了道德说教，而是因为设计了一个让他们按照道德规范行事的制度。正如在程序设计中，事先按照标准化的方法（构造）进行演算处理一样，在赛博空间里，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都是由通信网络的设计来决定的，在进行限制时，参加者没有必要将伦理和规则也植入其中。

被正确设计了的构造可以让用户按照“道德规范”行事。[①]

所谓“心情好”

比起货币来，人们更喜欢选择评价。由此，“评价经济”就具有了抑制自我增殖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关于其理由，我将简单地用图23来说明。

---

① 劳伦斯·雷席格，《代码：因特网的合法、违法、隐私》（翔泳社）。[原文为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汉译《代码：网络空间中的法律》。——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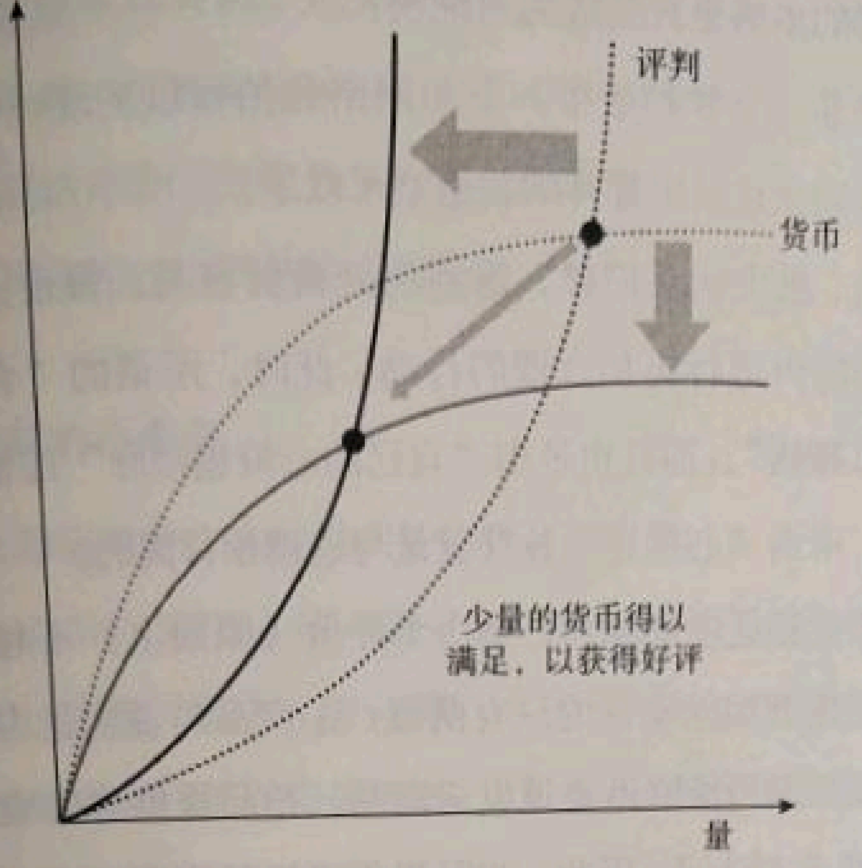


图 23 评价更具有魅力时……

少量的货币得以满足，以获得好评

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评价在被全球化的同时，也被可视化了。就像 Linux 的开发者林纳斯·托瓦兹一样，这是从网络界诞生的一位闻名世界的“名流”。

由此，与只有口头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媒体时代相比，评价的功效急剧扩大。与此同时，由于人的本性是较之于货币更加重视评价，因此如果能够很容易地将好评拿到手的话，货币的功效就会降低。

一旦这样的评价经济出现的话，（从理论上讲）较之于从前，更少的货币会让人满足，而且人们一定会热衷于获得评价。即便以住豪宅、开豪车、乘坐私人飞机旅行等方式炫耀财富，也不会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对毫无意义的赚钱方式不感兴趣。

这样的事情果真会成为可能吗？

这并非一个梦幻故事。正如网络竞拍得以实现一样，只要能够在互联网上设计出那样的构造就可以了。

然而，纸上谈兵简单，落到实处谈何容易。假设人们在构造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更加合理的行动，此时，所谓的“合理”不仅指“可以赚钱”，而且也是指“自己的心情也很好”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所谓“心情好”往往就是与道德相背离的。

网络竞拍之所以成功，是由于评价（原则上）不包含价值判断。此时能够加以验证的只有两点：①商品与说明是否一致，②确认付款后是否能够迅速地发送商品。拍品提供者的观点、人格等问题都无人过问。因此，拍品提供者极易获得差评。不知出了什么差错，送货迟了点，就获得差评，这是他不走运，（一般情况下）拍品提供者的人格不会得到否定。

如果是图书、电影或餐馆、宾馆等的评论的话，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了。你既不可能避免有恶意的投稿人写出不讲道理的评论，有时可能还会遭到竞争对手或同行业其他公司的骚扰。如果许多用户（潜在的顾客）读到这样的评论，其受害程度会更深。

但这并非管理、限制评论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如果承认删除了负面评论的话，那么就会被认为你只刊登了于自己有利的评论，体系本身的可信度就会下降。用户可以自由地参考其他的写有评论的网页，因此，事实上网站一方的限制是行不通的。

这个问题很复杂，但从分散于各处的用户那里收集大量的评价是可以解决一定的问题的。正因为每个人的味觉、嗜好、思维方式都不同，因此，满足所有人的餐馆或者所有人都赞不绝口的

图书、电影等是不存在的。但随着评论数量的增加，评价会自然而然地稳定下来，极其差的评价可以当作特例而加以忽视（不过，并非所有的网站都能够收集到足够数量的评论）。

当然，可以说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匿名贴吧的小奇迹

任何人都很清楚，人并非只带有善意而活着。

在人的心中的某个地方，潜伏着一些负面的情感，如恶意、嫉妒、情结、怨恨、愤懑、憎恶等。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因此这样的情感是从人际关系中产生的，通过向其他人发泄而获得快感。这不是道德上善恶的问题，而是人脑的走线（构造）就是这样的。

我们都是受感情支配的动物，所以，在无意识当中，我们会将自己的情感合理化。

针对他人的言行，我们一旦感到愤怒的话，刹那间就会认为自己是“善”的，对方则是“恶”的，无法摆到桌面上的恶意和憎恶就转化为“正义”。

但在共同体中，我们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压制住这种负面情感的喷发。而在匿名性极高的空间里，这种压制力（共同体的规范）消失，人们的各种负面的情感都会喷涌而出。

人们早就指出像“2 频道”这样的匿名贴吧的问题，在这个贴吧里发生了诸多的纠纷。但从“匿名”这个基本设计来看，“2 频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不仅仅是在志愿者们处理删帖的要求、预告自杀和犯罪的用

户们进行通报方面，而且在很大一部分情况下，根据不同的帖子（主题），参与者之间自发地形成一种秩序，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单方面排除诽谤、中伤的公正场所。如果所有的参与者都只是为了倾吐自己负面的情感而利用匿名贴吧的话，肯定不会出现比"厕所里的乱写乱画"还高明的东西来，因此，我们应该对这个"小小的奇迹"给予更大的关注。

但是，即使如此，很显然，无法删除充满恶意帖子的匿名贴吧是不会成为评价经济的基础的。

对博客的匿名留言也常常引起留言混战（即所谓的"火爆"），这也引发出问题来。留言系统上的构造的缺陷在于留言的显著的不对称性。

绝大多数人读了博客之后是不会留言的（我的博客中，1 000个浏览者中平均只有1个人留言）。

一般情况下，博客浏览者的留言动机可能是对博客的内容感到不对路，或感到反感。这是极其自然的事，如果故意写下"有趣"、"很有帮助"的留言，那一定是个奇怪的人，因为一般来说，有不同意见才会写下一些东西。

这并非说匿名贴吧是卑鄙的、毫无意义的。实际上，我们常常会看到博客中所写的内容是错误的，而留言则是正确的情况。

问题的关键在于博客留言簿的构造有利于选择性地收集负面评价，从而失去了写博客的目的。如果只是从匿名的留言者那里获得一片骂声的话，那么，任何人都不想专门免费提供信息，或阐述意见了。

当然，一些偶像人物、音乐家等人的博客（近况汇报）也有

不少运作得很顺利。这是一种粉丝俱乐部的形式，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遵循着不写负面留言的规则。

然而，当博客的内容具有某种价值观时（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而且还有兴趣、爱好方面的），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留言者被赋予了可以直接反驳博主的难得的机会，因此，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机会是理所当然的（当博主在留言簿中进行反驳时，毫无疑问会“火爆”）。

由此，现在许多博客被设计成不接受留言的形式。这也是博客留言簿的构造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

推特可以扩散好评

有人认为，与贴吧、博客不同，推特是第二代（WEB2.0版）的交流服务工具。这是一个在网络上以140个字为限的短文的形式扩散好评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绝大多数的日本用户是匿名的。

Web 1.0版的贴吧、博客发挥的是一种静态的功能，它保存过去的事件和稿件，与此相对，推特最大的特点是，评论、稿件以时间轴的形式滚动。用户如果对其中的某个评论或稿件感兴趣的话，可以向自己的粉丝“再推”（RT①），转发评论。其粉丝将同样的稿件“再推”，这样，评论以几何级的数字扩大。

推特中设置了减少“网络洪瀑”的一些装置。

本来，推特就像其名称一样是“喃喃自语”的意思，其接受范围要比阐述“意见”的博客要大。即使反驳，也只能在140个字以内，而且其发言会随着时间轴时时刻刻地流动下去，你根本

① 即Re-Tweet的缩写，暂且译作“再推”。——译者注

无法纠缠不放（但推特上的争论等在“汇总网页”上按照时间顺序整理、保存起来）。

除此之外，推特还有一种锁定功能，即删除粉丝所写的负面的感想（不让他发送）。由此，负面的回复被阻止，粉丝们被聚集在一个气氛缓和的圈子里。

推特最大的特点在于可以有目的地向粉丝传播好评。较之于恶评，人们都想传播好评。

如果有这样两种评价——“那家拉面馆难吃得要死”和“好吃得不得了”，你想向自己的粉丝传播哪种评价呢？绝大多数人可能都会“再推”正面的评价，而对负面的评价置之不理。

据说，在古代社会，带来战败消息的使者是要被斩首的。人们做什么事都想找出个因果关系来，因此，好消息就成为赏给自己的一个礼物，而坏消息则成为诅咒。在推特上如果只是“再推”不好的评价，那么就不会再有人来理你的推特了。

当然，推特并非不传播负面评价。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时，推特上流言蜚语满天飞，在核放射污染问题上，一部分专家成为“网络洪瀑”的攻击对象，认为他们“对核放射污染的危险性的评价过于轻描淡写了”。不仅仅是有关艺人们八卦，甚至连不确定真伪的事情，也被当作非常重大或与“正义”、“道德”相关，而积聚了大量的关注度，很容易传播开来（不过，如果是误传的话，马上会有纠正错误的推特出现，这显示了推特具有强行的自我清洁的功能）。

再声明一次，我并非说互联网上不需要负面信息，只要有正面的信息就可以了。纠正误传、错误以及有目的的谎言是必要的，

而且任何人都有对不喜欢的东西写“不喜欢”的自由。

但是，出于“获得许多好评”以及改变人们的行为准则的目的，这个构造必须将选择正面信息优先于选择负面信息。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储蓄好评”永远都不会比“储蓄金钱”而更具魅力。

脸谱的实名制

与推特齐名的 Web 2.0 版的交流工具是脸谱。它拥有全世界的8亿用户，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 SNS（社交网络服务）。但在日本，此前并没有推广开来。其最主要的理由是，脸谱是实名制。**

** 在欧美社会，脸谱得以普及的一个原因是跳槽的人太多了。即使你与他交换了名片，但他的职场发生变化后，你很快便与他联络不上了。但在脸谱上，无论你是搬家、跳槽还是转校，随时都可以了解到你的近况。在流动性很强的社会里，人际关系不是依靠公司、学校等所属机构连接的，而是由个人的历史加以管理的，这种形式要更加合理。

脸谱的登录页面，除了名字外，甚至有学历、职业经历、兴趣、宗教以及政治立场的填写栏，许多人还放上了自己的照片。与此相反，在日本，匿名是主流——就像“2频道”一样，最大的 SNS 是“迷思”（Mixi）。当它刚刚实行实名制时，纠纷不断，因此，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是以匿名登录的假名进行交往的。

在实名制与匿名制下，随着某一方人数的增加而倾向于使用某一方的情况会加大。如果绝大多数人都是以实名利用 SNS，只有自己用假名，这就相当于向其他人告白：我有难言之隐。相反，

在大家都是以假名进行信息交换的地方，只有一个人用实名和本人照片，那也会招致纠纷。

在进出（重来）自由的网络拍卖型的构造中，自己比其他人更加引人注目式的竞争是一种违约策略。因为即便失败了，恶评也可以推倒重来，因此，任何人都想以实名的形式积攒更多的好评。

与此相反，在无法进出的构造中，与其他人做同样的事，却尽可能地不引人注目，避免成为攻击的对象，这是最佳的策略。一个人一旦被恶评（污名）缠身而无法消除的话，那他就只能隐居于匿名的无责任社会里，没有其他安心度日的方法（这就是负面游戏）。

在国外，推特也是以实名制为主的，但在日本却基本上都是匿名。亚马逊的评论，在美国写出姓名、职业和大学名称的人很多。这是因为写评论被认为是获得好评的正面游戏。

日本的互联网空间被匿名性的负面游戏所覆盖，但我们平时几乎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无论是评论、还是博客的留言簿以及推特，我们在利用互联网服务时都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匿名。

不过，最近，这种风气似乎开始慢慢地发生了变化。

在日本，推特粉丝数量最多的是软银董事长孙正义①，他的推文被大约150万人传播。大阪市长桥下彻的粉丝数量大约60万人，其推文在报纸或电视上被报道。推特并非发表推文的平面的交流

---

① 孙正义（1957－　），日本实业家，软银集团的创始人。根据福布斯的调查，2011年，孙正义位于日本富豪排行榜首位；2012年，位于日本富豪排行榜的第二位。——译者注

空间，在以实名进行活动的著名人士（大的集散地）的周围，聚集了匿名的粉丝，而匿名的粉丝们中间又形成一个个小集散地，推特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建构起来的。

毫无疑问，现在在日本，互联网的使用者中仍然是匿名者的人数占据了绝大部分，但其中心位置却被实名的人们——他们想通过正面的游戏获得数量巨大的好评——占据着。

后现代的开始

脸谱之所以实行彻底的实名制，是由于它将自己定位于 Web 2.0 版的正面游戏的基础位置。

而现在，脸谱与推特结合起来，只要登录脸谱，就可以看到朋友们的推特以及他们上传的相片等。但为了实现这种方法，有必要在脸谱和推特上都实行实名制。只有这样，才能与在网上认识的人（从来没有见过面）“交朋友”，建立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

以实名制为前提推广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的脸谱其构造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很快便在整个世界推广开来。这么一来，即将到来的“我们的未来”究竟是怎样的情况呢？

雷切尔·布茨曼和茹·罗杰斯在《共享》（*Share*）一书中预言道：我们将从大量消费以及大量废弃大量生产商品的时代，步入一个新的时代，即通过相互之间共享物品和服务，可以实现“更加有效率的、人性的、不会破坏环境”的生活方式的时代。①

---

① 雷切尔·布茨曼、茹·罗杰斯，《共享：从“共有”中产生出商业的新战略》（日本放送出版协会）。[原文为 *Share——What's Mine Is Yours: The Rise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汉译《我的就是你的：“合作式消费”的兴起》。——译者注]

这种共享的文化不仅仅指拼车、拼房间、拼沙发（向徒步旅行者出租沙发），而且还拼房。这被称之为“换房”（house exchange），例如，你如果想在纽约居住一段时间时，可以与想在日本居住的纽约人在一定的期限内交换房屋居住。

倘若连这种价格昂贵的东西都可以共享的话，人们在生活当中就可以节约相当数量的必需的货币。但要想加入这种“共享市场”必须能够让对方确认对自己的评价。

脸谱的策略就是这种评价确认装置的事实上的标准。此刻的脸谱就成为产生社会性关系本身所不可或缺的基础。我们不仅在结婚、就业方面，甚至能够在聚会、交朋友等日常小事方面通过脸谱进行检索，来确认对方的来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上市公司通过审计制作资产负债表和损益报表等财务报表，向投资者们展示自己的业绩。这是上市公司的“说明责任”。

同样地，在 Web 2.0 版的社交网站上，任何人要想以客观的标准展示“自己”，就必须依赖参与者的评价。在所有人对“我”都负有说明责任的世界里，犹如拥有好的财务报表的公司的股价会涨得很高一样，好的“我”要在社交市场上获得更多的好评。[①]

在脸谱向往的乌托邦的世界里，通过以获得好评而非货币为目的的构造，无论本人的意愿如何，任何人都会成为善人。

由于互联网的技术，所有的评价都被可视化了，这种被可视化的赛博空间也是知识社会的终极形式。在这里，人们并非以时装、名牌等外观来审视自己，而是以知识和见识来甄别自己。

---

① 春日直树，《“迟到”的思考：在后近代社会里生存》（东京大学出版会）。

任何人都喜欢选择好评，而非货币；实名制的个人信息在互联网上被公开、检索；所有的人都成为善人生活着，当社会变成这个样子时，全球化资本主义就会停止自我增殖的运动，近代的结构就失去了其意义，从未有人经历过的后现代社会的时代就会到来。

这是赛博自由意志主义者所描绘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

20 走向自由的乌托邦

根据国际性价值观调查，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世俗的国民。

较之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日本人都这样以为："与其迎合别人，不如活得更像自己"、"自己的人生目标想要由自己来决定"。日本人不相信不灵验的神，既抛弃了地缘关系，又抛弃了血缘关系，生活在"一人一个家庭"的无关系的社会里。对这种特殊的价值观，日本人自己觉得很平常，或许日本人正处于历史的最前沿。

以"我"为中心的时代

由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经济（市场）爆发式地扩展，人们从身份制（阶层社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高举"自由"、"平等"的理想主义大旗。作为针对王权（神权政治）的社会改革——革命运动的近代由此拉开了序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变得更加富裕时，人们的关注点开

始从“社会”转向“自我”。这是“现代的转折点”，也成为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Hippie）运动和“花孩子”（Flower Children）的先驱，后为自我主义（Meism）——这是新新闻主义的旗手汤姆·沃尔夫命名的——的20世纪70年代所延续。

欧洲的社会学家们（安东尼·吉登斯、乌尔利希·贝克）将“过了转折点的现代”称作“后期现代”、“自反性的现代”。在前期近代社会里，人们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改变社会”的思想，但进入后期现代之后，那种“大叙事”（革命）就不再流行了，反而“改变‘自我’”的“小叙事”（自我启发）传播开来。

在“大叙事”中，人们作为一个“群体”被认知，虽然他们极力谴责国家权力和资本主义，但革命思想并没有引起每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关注。

与此相反，“小叙事”中的人们对政治、经济毫无兴趣，他们只愿意面对自己的内心。20纪纪60年代，虽然残存有“改变自己就改变了世界”的理想主义精神，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就再也不流行了，只剩下“成为更加能够挣钱（更加受人欢迎）的我”的功利主义的方法论了。

从前期现代（大叙事）到后期现代（小叙事）的转移是社会变得更富裕、更多元化的必然结果。

在后期现代，“我”成为无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绝对价值（=only one），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特殊的“我”（=number one）是不存在的。由于这种以“我”为中心的思想的存在，革命走向人的内心，“寻找自我”成为人生的目标。

随着“从共同体到自我”的变化，社会的形态也发生了巨变。

液体化的社会

法国政治思想家亚利西斯·德·托克维尔曾于19世纪初访问美国，对美国的社会平等感到十分惊诧。[①]

托克维尔认为，像欧洲那样的身份制社会是不存在不平等的。当时，贵族和平民被认为是"不同"的人，贫民压根就没有想过自己与贵族"作为一个人是平等的"。只有在没有身份差异的平等的社会里才会出现不平等的问题。认为自己与对方是平等的，这时，人们才痛苦地意识到相互之间的不平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是这样一种运动，即让隐而不见的不平等显现出来，通过不断地申诉，使得既有的权威解体。在将无可替代的"我"作为独一无二的绝对价值的后期现代社会里，这个运动使得宗教、阶级和中间共同体空洞化，将社会"液体化"。

在美国、欧洲、日本等"液体化的社会"里，与地域和文化上的差异无关，人们将社会性问题还原到个人环境和异常心理的角度加以解释，比如像"精神创伤"、"成年小孩"、"多重人格"等通俗心理学术语流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在对待贫困的态度上也有着巨大的差异。

在前期现代社会，失业被当作是社会阶层（阶级）的问题，最终凝结成无产阶级发动的阶级斗争。与此相反，在社会问题个人化的后期现代社会里，贫困被认为是个人经历——如家庭、教

---

① 下面的内容是根据宇野重规的《"自我"时代的民主主义》（岩波新书）一书加以阐述的。

育、恋爱、职业体验等——的结果，从主流社会中落伍的人们将不会组成阶级和社会团体，他们将作为无业游民如尼特①、自由职业者）被孤立起来。

传统的共同体之所以解体，也是由于现代实现了福利国家的理想的缘故。我们通过富裕的社会和充实的社会保障制度从农村社会里解放出来，但与此同时又放弃了共同体的安全保障，自己个人承担了所有的风险。

在前期现代社会，从传统的共同体中解放的个人被学校、公司、军队等“现代组织”所吸纳，要遵从这些组织的道德和秩序（意识形态）。在后期现代的消费社会里，这种共同体的道德受到否定，“按照自己的意愿”成了唯一的价值。

后期现代并非后现代（现代之后），而是单纯化了的现代。被称之为“现代病理”的东西是现代必然的结果，在现代的框架内是无法“治愈”的。

无限循环的“我”

将“按照自己的意愿”当作唯一价值基准的生活方式，就是以“自我”为基础独立生活。我们把参照自己决定自己的将来的这种无限循环的结构称作“自反性”的（所谓“自反”其实就是循环）。在“自反式的现代”社会里，所有的人都会陷入这种无限循环之中，而这也是后期现代的主要特征（或本质）。

---

① 尼特是“NEET”的音译。NEET是“not in employment，education or training”的缩写，指既没有职业，也没有学历，更没有接受过职业训练的年轻人。——译者注

在自我中寻找“自我”的自反性现代极其不稳定，如同费舍尔的三维立体画一样。于是，就出现了如何调节不稳定的自我的必要。这就是大家在自我启发读物中所熟悉的称作“自我调节（自我管理）”的心理方法。①

在现代社会中，无法自我管理的人被视为落伍者。这是源自最早闯进自反性的现代国家——美国——的思想，但现在已经广泛传播到日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如日本的大学生在求职活动中必须进行“自我分析”。

患神经官能症、轻微的忧郁症以及 ADHD②（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人激增就是自反性现代的特征。在自我调节的社会里，哭泣、喊叫等感情的发泄行为都被视为“异常”，应该给予精神病学上的治疗。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人在一生中至少得过一次忧郁症的“生涯有病率”达6.5%（是日本总人口的1/15）。在男女差别上，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2倍。这种忧郁症的大众化是自我调节社会中特有的现象。

在人们怀抱着无限循环的根本性不安的自反性现代，社会被“心理学化”，出现了巨大的心理咨询和药物（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麻醉药品）的市场。人格形成的目的是自助（self help），只有自己能够确切地控制住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生活的方式才能够成立，这是一种公共思想。

那么，“自我调节”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呢？

在美国，肥胖者、吸烟者、有婚外恋者被认为是不适合做

① 森真一，《自我调节的监牢：感情管理社会的现实》（讲谈社选书）。

② 即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的缩写。——译者注

经营管理者的。因为，人们认为，上述几点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加以控制的一种习惯，无法管理好自己和家庭的人也一定管理不好一个集体（奥巴马总统的戒烟失败成为新闻的原因就在于此）。

此外，或感情爆发，或失去平和，或脸上不能浮现出自然的微笑都被视为无法进行“自我调节”的证据。在总统大选或预选的电视辩论中，总统候选人的表情被传播到美国各地，失去“自我调节”的人首先就落选了。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监狱的诞生》等著作中反复指出，现代社会的权力不是通过外部对我们进行压制，而是我们本身通过军队、学校、工厂以及监狱的规则和训练将权力内在化了，我们是自己在压制自己。在这里，权力（不是国家）给人们加以物理上的暴力，是为了更具建设性地让你“生存”下去。好的市民在学校取得好成绩，在公司取得好业绩，在家庭是个好丈夫好妻子，由此，人们调节着自己。

后期现代，由于富裕，人们从共同体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但因此我们又陷入由自己给自己打下的基础——“自反性的陷阱”——之中。于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生存”的极其自然的愿望就产生出永无止境的不安。

酷日本（Cool Japan）

在本书的开头，通过国际对比，我们指出日本人特别忌避权威和权力。其数值之异常，说明了日本人在世界上是最世俗的国民。

图3明确地告诉我们，在回答“权威或权力应受到极大的尊重”问题时，处于高位的是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法国、墨西哥等天主教国家。他们听到“权威”、“权力”时，最先想到的是神、教会等宗教性力量。

美国是个宗教国家，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相信天国、地狱，这是众所周知的。总统是体现美国理念（自由民主主义）的人物，在世界上显示权威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厌恶奥巴马总统的茶党人也会赞同应尊重总统的权威。

于是，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人们都极其自然地以某种“超越者”的存在为前提而生活着。但是，在日本社会，为什么这种超越者却不存在呢？

明治时代之前，庶民对天皇一无所知，幕府的将军是世俗的具有权力的人，他不具有宗教性的权威。当然，人们祈祷神佛的保佑，对怨灵的诅咒非常恐惧，但这只是对超自然的东西的一种恐惧心理，即泛灵论，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绝对神”或印度佛教的“真理之法”等观念在日本完全不能够被接受。

明治政府虽然将天皇视作“现人神”，树立起一个超越者的存在，但除此之外，日本并没有一个形成国民国家的内核。这其实是一种“权宜之计”，人们对此心领神会，即便是在战前和战时的国家社会主义氛围极其浓厚的状态下，人们也都知道，天皇实际上只是个人（因此，战后天皇发表“人间宣言”时，人们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

没有超越者的日本也是一个“自我价值应最大限度地加以实现”的社会。

《海贼王》《NANA》等日本动漫的故事核心是："自由的主人公通过冒险和恋爱实现自我。"正由于"酷日本"（Cool Japan）首先触摸到了后期现代的普遍性，因此，全世界的年轻人们成为这些动漫的粉丝。

捣毁伽蓝

在讨厌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日本，带来社会保障（安心）的共同体只能由偶然聚合在一起的人们来创建。这就是"家"，它保护着学校、军队、工厂、公司的人们，以防来自外部世界的不安。

但是，这也给日本人的人生带来巨大的困难。"家"在给人带来安心的同时，又束缚着人。

根据社会调查，较之于美国的劳动者，日本的白领更加讨厌现在的职场，对公司的忠诚度也很低，许多人回答道："如果能够重新来过一次的话，我绝不会进入这个公司"。[①] 这个结果很好地反映出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一种情感，即对学校、公司的一种"两极感情"（过分的迷恋和厌恶）。日本人寻求"家"，又憎恶"家"。

在这里，我将无法进出的封闭的"家"称作"伽蓝"（佛寺），将随时可以进出的开放性空间称作"集市"。在英格尔哈特的价值观地图中，"自我表现度高"的国家都是英语圈（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北欧等欧洲的新教圈。这些国家是由自由与自我责任合为一体的"集市理论"进行社会运行的。与此相反，日本

① 小池和男，《日本产业社会的"神话"》（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则是一个无人负责的社会（无责任社会），而这也限制了人们自由地生活。

日本之所以成为一个"伽蓝"的世界，是因为日本人不知道个人独立生存下去的方法，以及日本社会并非个人能够独立生存下去的场所。

如果没有占绝大多数的"他者"的话，社会就不会成为全球化空间，人们只依赖于地方性规则。这就是日本社会很难改变的原因所在。

但是，现在地方性共同体受到来自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侵蚀，正发生着摇摆。政治、行政、公司等原有的组织因功能不全而使得覆盖整个日本的"伽蓝"发生龟裂，到处出现"集市"的空间。

从个人来说，即使社会本身不发生变化，但从"伽蓝"中走出来，奔向"集市"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按照自身意愿生活"的生活方式既不能保证幸福的人生，也无法保证人在竞争中获得成功。即便如此，人们之所以还是为"集市"所吸引，是因为那里有通往未知的可能性。

在"伽蓝"中，人们压抑自我，只能在兴趣的世界里寻求自我实现。我们并非否定这种生活方式，但我们既然拥有了能够在"集市"世界里生存下去的能力，而让"伽蓝"的生活方式就此毁灭显得有点儿过于可惜。

日本社会里没有"他者"，因此，社会很难发生改变。这样的话，唯一一个比较现实的可能性就是，哪怕是多一个日本人成为"集市"世界的居民，然后他们成为"他者"，毁灭掉这个"伽蓝"的世界。

乌托邦的自由市场

美国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中有一句关于“梦”的叙述。这个“梦”就是：“为构建乌托邦的一种框架”。①

所谓现代是指这样一个时代，即每一个个人脱离由地缘和血缘关系构成的传统的共同体，作为“独立的个人”生存下去。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人又是社会性的动物，如果不隶属于某个共同体（社群）的话，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人是不可能一个人生存下去的）。共同体对每一个成员都加以约束，剥夺他们的自由，但反过来又给他们提供了重要的东西，即安全和归属意识（身份认同）。

因此，诺齐克认为，我们不要否定共同体，而是要思考如何使个人的自由与共同体的规则生死与共。

诺齐克之所以否定国家，是因为国家作为共同体过于庞大，过于约束其成员（国民）了。如果要将具有多元化价值观的国民纳入一个框架内，就必须推行强制措施，对此加以反抗的人会被清除出去。

于是，诺齐克认为，国家并非共同体，而应该是一个单纯的框架（架构）。这个框架是由保护基本人权和私人所有权等基本规则（宪法）以及维持外交、治安等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暴力性的独占）建构起来的，对除此之外的其他价值观都持中立态度。

人们在这个框架内可以自由地组成宗教、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共同体，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原则，即无论哪一个共同体都必

① 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木铎社）。

须由本人的意志可自由地进出。

只要遵守了这个约定，人们在最小国家（框架）内，可以尝试各式各样的乌托邦。诺齐克构想了一个“乌托邦的自由市场”。

对“按照自身意愿”生存的追求是后期现代的普遍价值，即便它是再归性的，可以让不安加剧，或者从原理上讲是不可能进行“自我实现”，但是我们决不能放弃这样的努力。因此，对这种追求本身说三道四——是幸福还是不幸——是毫无意义的。

世界上有许多禁止“按照自身的意愿生存”的社会。我们对当下的日常生活觉得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是，从受到宗教、旧习俗束缚，苦苦挣扎的人来看，能够世俗地生活着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重视共同体价值的保守派警告说，如果追求世俗性的话，社会将四分五裂。但是，从价值观调查和社会调查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日本人其实打心底里就十分厌恶受到共同体（“伽蓝”）的束缚。

诺齐克赋予这条窄路一个希望。在最小国家的框架中，如果构建许多的可以自由进出的社会的话，就可以让“自我”与“共同体”共存。这种情况一旦实现，人们会从“自我”的不安中解脱出来，也会从“共同体”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走向未知的世界

正如人无法自由地改变个性一样，日本人无法抛弃自身的“日本人性”。如此一来，对我们来说，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世界上罕见的极端世俗性（现世利益中心主义）国家里描绘一个蓝图（或梦）。图24就是用英格尔哈特的价值观地图来表示这个蓝图的。

阐述“日本人”的人们大致上分为两种。

一个是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即认为与其压制世俗性，不如重视传统。在政治哲学上，这种观点被称作社群主义，即图24中向下的箭头，欧洲的新教圈和天主教圈的国家都为实现这种价值观而努力（不过，像荷兰、丹麦、瑞典等北欧新教圈国家是世界上最重视自我表现价值的“自我”中心主义社会，而不是传统的社会）。

另一种人认为应在全球性标准下进行社会运行，犹如美国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样，即图24中朝右下方指的箭头。这种近代主义在政治哲学上是自由主义，但正如英格尔哈特价值观地图所显示的那样，这些英语圈国家的国民比欧洲新教圈国家的国民更加重视传统价值。

自明治维新以来，改革日本的这两种观点沿袭了日本人的理想在于欧美，即欧洲和美国。日本人的“梦”自明治时代以来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英格尔哈特在这个价值观地图上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即“不同的文化圈是不相重合的”。当然，对此有必要进行各式各样的解释，但毋庸置疑，我们的价值观受到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强大制约。

由此看来，与中国大陆、韩国、中国台湾同属于儒教圈的日本人通过教育、启蒙等外在力量于短时间内是不会转变为欧洲新教圈和英语圈国家的价值观的。尽管这样的价值观并非遗传性的，但它通过亲子关系以及儿童集体，在人格形成方面给予了深刻的影响，于无意识间决定了人们的思维和行动。

阐述“日本人”的人们大致上分为两种。

一个是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即认为与其压制世俗性，不如重视传统。在政治哲学上，这种观点被称作社群主义，即图24中向下的箭头，欧洲的新教圈和天主教圈的国家都为实现这种价值观而努力（不过，像荷兰、丹麦、瑞典等北欧新教圈国家是世界上最重视自我表现价值的“自我”中心主义社会，而不是传统的社会）。

另一种人认为应在全球性标准下进行社会运行，犹如美国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样，即图24中朝右下方指的箭头。这种近代主义在政治哲学上是自由主义，但正如英格尔哈特价值观地图所显示的那样，这些英语圈国家的国民比欧洲新教圈国家的国民更加重视传统价值。

自明治维新以来，改革日本的这两种观点沿袭了日本人的理想在于欧美，即欧洲和美国。日本人的“梦”自明治时代以来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英格尔哈特在这个价值观地图上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即“不同的文化圈是不相重合的”。当然，对此有必要进行各式各样的解释，但毋庸置疑，我们的价值观受到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强大制约。

由此看来，与中国大陆、韩国、中国台湾同属于儒教圈的日本人通过教育、启蒙等外在力量于短时间内是不会转变为欧洲新教圈和英语圈国家的价值观的。尽管这样的价值观并非遗传性的，但它通过亲子关系以及儿童集体，在人格形成方面给予了深刻的影响，于无意识间决定了人们的思维和行动。

于是，留给我们日本人的唯一希望就是，维持世俗性的现状，构建一个能够自由表现自我的社会。这就是图24中朝右的箭头，它在图的上方指向空白之处，也就是说，它的目标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

这个未知世界应该是由不相信任何超越者（绝对神）的彻头彻尾的世俗的人们构建的，在这个社会里，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进行自我表现和实现自我。这才是“后期现代”的完成式，也一定是唯一一个可以实现罗伯特·诺齐克梦想的“为构建乌托邦的一种框架”的地方。

为建设乌托邦的自由市场，必须有一个能够统治一切的超越者。无论这个超越者是谁，只有处于自由的、“自我性”最前沿的日本人才能够到达诺齐克所说的乌托邦。

通过毁灭地方性共同体（“伽蓝”），将国家只是作为一种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创造无数个可以进出自由的全球化的共同体。如果我们将后期现代（自反性现代）的终点当作是通往乌托邦的入口的话，首先到达这个地方是历史赋予日本人的使命。

这就是我的“梦”。

小结（10）

- 金钱与评价
- 金钱▶边际效用递减
- 评价▶边际效用递增

- 实名制世界▶正面游戏＝尽可能地引人注目
- 匿名的世界▶负面游戏＝尽可能地不引人注目

- 从前期现代（大叙事）到后期现代（小叙事）
- 后期现代▶"自我"中心主义的时代→不是 Number One，而是 Only One
- 自反性的现代▶"我"以"我"为参照的无限循环→自我调节
- 没有超越者的、实际上最世俗的日本人→后期现代的完成

  ▼

  走向自由的乌托邦

他的水龙头里的水是禁止饮用的。大扫除时，扫帚和簸箕也是指定的，不允许碰其他的东西。在班里，谁也不和我们说话。直到学期结束时，在学校里，我几乎从来没有开口说过话。

按照当下流行的说法，这可能就是校园暴力，不过，我并没有因此在心灵上受到创伤，或逃学等，没有发展到那么夸张的地步。

当时我住在银行的宿舍里，在这里有许多与我同龄的孩子们，因此，我放学回家后，跟他们玩耍得很好。升学后，我与那个女孩分在了不同的班级，自然而然地也交上了其他的朋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就忘记了刚刚转学后的那些奇怪的日子。这只不过是我童年时代一个不足挂齿的小插曲而已。

话虽这么讲，我写这件事还是有原因的。

我一直感觉自己与其他日本人有什么不同。这是因为我怎么也无法融进"学校"这个集体，进入中学后，这种感觉仍然萦绕在我的心间。

与此同时，我发觉独自一人待着也并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除了帮助她学习之外，基本上没有对话的机会，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即计算我在学校说了多少话。连续好几天一言不发的情况也并非罕见，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件痛苦、悲伤的事。只是有时会想到："今天又一言不发地度过了。"

此后，我这样的性格没有发生变化。大学毕业后，我根本没去找工作，因为我想，即便进入大公司工作，我肯定也不能与那里的人们很好地相处。

他的水龙头里的水是禁止饮用的。大扫除时，扫帚和簸箕也是指定的，不允许碰其他的东西。在班里，谁也不和我们说话。直到学期结束时，在学校里，我几乎从来没有开口说过话。

按照当下流行的说法，这可能就是校园暴力，不过，我并没有因此在心灵上受到创伤，或逃学等，没有发展到那么夸张的地步。

当时我住在银行的宿舍里，在这里有许多与我同龄的孩子们，因此，我放学回家后，跟他们玩耍得很好。升学后，我与那个女孩分在了不同的班级，自然而然地也交上了其他的朋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就忘记了刚刚转学后的那些奇怪的日子。这只不过是我童年时代一个不足挂齿的小插曲而已。

话虽这么讲，我写这件事还是有原因的。

我一直感觉自己与其他日本人有什么不同。这是因为我怎么也无法融进“学校”这个集体，进入中学后，这种感觉仍然萦绕在我的心间。

与此同时，我发觉独自一人待着也并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除了帮助她学习之外，基本上没有对话的机会，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即计算我在学校说了多少话。连续好几天一言不发的情况也并非罕见，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件痛苦、悲伤的事。只是有时会想到：“今天又一言不发地度过了。”

此后，我这样的性格没有发生变化。大学毕业后，我根本没去找工作，因为我想，即便进入大公司工作，我肯定也不能与那里的人们很好地相处。

反过来说，"与众不同"其实是一种傲慢，也是一种借口——想合理化地解释被社会半淘汰的自己。对此，我有所自觉，即便如此，我从来也没有对自己是与众不同的想法产生过怀疑。

一直以来，我都不想接近"日本人"的世界，这是由白领、公务员、老头、老太太等人组成的世界。对我来说，他们是不同性质的存在，他们指定我喝水的水龙头。

然而，写完这本书后，我终于明白了，我就是那种典型的日本人。

*

在此前的日本人论中，所谓的"日本人的特点"其绝大部分或者是人的本性，或者是农耕社会的行为准则，是世界到处可见的东西。解开"日本人性"之谜的钥匙并非世间流传的"空气=社会"，而是"水=世俗"——这在本书中已经谈及。

当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本书的观点都依赖于先行研究和著述。关于出处，我在书中涉及时都作了介绍，但在这里我还是想再讲一下这一部看上去有点儿与众不同的日本人论的写作过程。社会心理学家山岸俊男通过各式各样的实验，证明了这样一些"反常识"，如"日本人比美国人更个人主义（自私）"、"美国人比日本人更具协调精神，信赖他人"等。他的一系列著作从根本上颠覆了此前日本人的"以和为贵"的观点，这也成为本书写作的出发点。

我是通过社会学家桥本努的著作知道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价值观地图"的。其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结果——"日本人是世界上最突出的世俗性国民"——是对我的另一个冲击。这个结果与

山岸的实验是完整统一的，证明了这样一个假说："空气"的统治是个人主义的结果。（束缚越松，共同体越不能维持。）

毋庸赘言，写作本书的动机是"3·11东日本大地震"和其后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我也与其他绝大多数人一样，呆坐在电视机前，反复地问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得出的结论是，大地震的受害者们感动世界的同情、礼貌与因核电站事故而明朗化的日本的政治、行政机关的可怜相是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只抛弃于自己不利的一面，而只留下于自己有利的一面。1 000年前，日本人就生活在"空气"与"水"之间，今后，这一点应该不会发生变化。

自从有了"将日本人放入括号内"的想法后，我一直对英格尔哈特的价值观地图的"右上的空白"感到不解，也就是说，我不知道那个谁也没有见过的地方究竟有什么。我之所以能够写完本书，是因为我发觉那个地方就是"为构建乌托邦的一种框架"。

罗伯特·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被当作是社群主义的圣经，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书，但直至我读到评论家东浩纪在《一般意志2.0》中对诺齐克详加阐释之前，我并没有想起这部著作。当然，东浩纪的论述与我有很大的区别，但我还是想提一下这件事。

*

自1980年以来，知识界发生了巨大的地壳运动。直截了当地讲，就是范式转变，即试图以达尔文进化论来解释人的心理、行为和社会的结构与阐明大脑结构的脑科学相结合，从进化论的角

度奠定了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哲学、伦理学等在内的所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础。

在《在残酷世界里能够生存下来的唯一方法》一书中，我以"自我启发"为切入点，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进化心理学和脑科学的知识如何重新描绘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设计？在本书中，我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只不过不是用于个人，而是将它用于社会，考察了我们究竟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孪生作品。

正如本书所叙述的那样，我对"日本会变化"并不持乐观的预期。日本社会的停滞有结构上的原因，政治家和官僚们都在有限的条件下干着力所能及的事。也许有人对此观点不满意，但当我们冷静地回顾"失去的20年"时，就会很清楚地发现说教和批判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或许在将来的10年内，我们会体验到社会和经济上的巨大动乱。这不是"世界末日"，但肯定会带给日本人以巨大的冲击，从根本上改变大多数日本人的人生。

最后，在这里我想再一次说说"梦"。

当支撑战后日本繁荣的体系毁灭后，从残骸中会出现新的世界。只有不依赖于国家的、经济上独立的、自由的个人才能够从这个动乱中摆脱出来，走向乌托邦的道路。也就是说他们是能够传播新世纪福音的人。

2012年5月

橘玲

译后记

这是一本标题奇特的书，既非《日本人》，亦非《“日本人”》，而是《(日本人)》，作者在本书开头就表明：《(日本人)》读作“括号里的日本人”。如果我们将它仅仅看作是作者的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之举，恐怕有失武断，因为，当你读完全书后就可以体察到这个标题中蕴含着的作者的真正意图。

在日本，有关“日本人”的论著可谓“车载斗量”，仅以“日本人”为题的著作估计就不下几十部；在我国，我们也可以读到一些以“日本人”为题的著作，如蒋百里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人》等，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要数埃德温·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1910～1990）的《日本人》（*The Japanese*）一书了。

赖肖尔曾于1961～1966年间出任美国驻日本大使一职，辞去大使职务后，他步入学者的行列，在哈佛大学任教。在任教的同时，赖肖尔还撰写了一些有关东方的著作，《日本人》就是其中获得好评的一部。该书英文版出版于1977年，汉译本于三年后的1980年与中

国读者见面。《日本人》从自然环境、历史背景、社会情况、政治制度以及日本与外部世界等五个方面全面细致地讲述了有关日本（人）的知识，应该说是当时较为完备的一部了解日本（人）的著作。《日本人》的汉译本问世的那一年恰好是我走上日语学习道路的一年，在我踏上日本研究道路的启蒙时期能够与这样一部著作遭逢，于我而言，是极其幸运的一件事，因此，我对这部书的印象极其深刻。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部由美国人撰写的有关日本（人）的书，即它是以第三者的眼光审视他国（人）——日本（人）——的著作，由此，我不得不想起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的《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ard：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来——尽管这并非一部题为“日本人”的书籍。

在《（日本人）》一书中，橘玲认为有关“日本人论”的著作是舶来品，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句评判是正确的，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关于“日本人论”的著作无疑要从《菊与刀》说起，换句话说，谈论战后的“日本人论”无论如何是绕不开《菊与刀》的。然而，时过境迁，将近70年——1944年6月，本尼迪克特受命从事日本研究的课题；1946年，其研究成果《菊与刀》出版——过去，《菊与刀》已成为日本研究（日本学）领域的古典，其时效性、局限性日益显著，这是我们必须加以清醒认识的。

且不论《菊与刀》写作的动机，也不谈本尼迪克特在当时所受的诸多的局限——诸如无法实地前往日本进行“田野调查”等，更不说作者对日本文化现象的“误读”，我以为，本书作者橘玲的这样一个观点非常值得玩味：“她不是寻求日本人与美国人的相似之处，

而是必须找出他们之间的相异之处。”（重点为原文所有）这句话点到了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的命门——而本尼迪克特本人在《菊与刀》中则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其（指日本人——引者注）行为和思维习惯与我们是如此不同，以至于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对待。”实际上，不仅是《菊与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便是日本人在论述“日本人”时也都在重蹈本尼迪克特的“覆辙”。在日本人中，如橘玲在书中所列举的土居健郎（1920～2009）、中根千枝（1926～）等都是日本研究（日本学）领域的大家，他们所撰写的《日本人的心理结构》（即《“撒娇”的结构》，1971年）、《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单一社会的理论》（1967年）等也都是“日本（人）论”的重要著作，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在寻找日本人与其他不同国家（民族）的相异之处，以说明日本人的特殊性，而这也成为“日本（人）论”的主流（土居健郎和中根千枝的著作都有汉译本问世，可参看）。长期以来，我们置身于这个主流之中而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即认定日本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日本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我们的大脑为这样的写“日本人的特殊性”的书——即“日本人论”——所支配，深信不已。

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菊与刀》一书在我国的流布。七八年前，当我给研究生开设日本文化论的课程时，曾收集了当时我国出版的所有的《菊与刀》的汉译本，与研究生们一道对照英语原文对它们进行研读、批判。当时国内已经出版了近十种《菊与刀》的译本，七八年过去，我发现国内《菊与刀》的译本还在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可能已近二十种之多，估计今后还会有新的译本问世。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反思。

前面我们提到，尽管《菊与刀》是战后“日本（人）论”的奠基性著作，但其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从讲“日本人的特殊性”的角度来说，《菊与刀》更是“始作俑者”，尤其要加以警惕。换句话说，在我国，谈论“日本人的特殊性”的著作已经“泛滥成灾”，随便抽取一本“日本人论”的著作，无论是国人撰写的，还是译自外国人的，或多或少我们似乎都可以看到《菊与刀》投下的阴影。因此，我们亟需的是与此论调相左的论著，而橘玲的《（日本人）》就是这样的一部著作。由此，我们也看出了作者使用《（日本人）》标题的寓意所在，即作者的“日本人论”是与此前的以《菊与刀》为代表的“日本人论”大相径庭的、“崭新”的“日本人论”。为与此前的“日本人论”相区别，橘玲使用了“（日本人）”这样一个独特的标题。

当然，说橘玲的“日本人论”是“崭新的”并非十分恰切。在本书中，橘玲也指出，首先对“日本人的特殊性”进行反思的是一个叫作哈鲁米·贝夫（Harumi Befu，1930～）的文化人类学家。我们不要为这个英语世界的名字所迷惑，其实他也是一个日本人，准确地说，他是一名美籍日裔学者，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现在日本京都文教大学执教，别府春海是其本名。其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日本文化论》（1987年初版，后屡次再版）中已经看到日本人与美国人并没有太多的区别，除此之外，贝夫（别府）的这部著作的另一大贡献是从文化消费的角度分析了日本文化论是如何被大众消费的问题。

贝夫（别府）能够敏锐地看到这些问题，当然与他跨地域的文化体验——出生于洛杉矶，在日本度过少年时期，在美国接受高等

教育等——关系极为紧密，就像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1951～）一样。布鲁玛是荷兰人，他在日本学习、生活的经验为他提供了极好的观察日本的视角。当他置身于日本时，常常认同“日本人的特殊性”的论调，然而，当他离开日本后，却“发现”以前所认同的“日本人的特殊性”论调往往并不靠谱，于是写下一些论著，诸如 *Behind the Mask：On Sexual Demons，Sacred Mothers，Transvestites，Gangsters，Drifters and Other Japanese Cultural Heroes*（1983 年初版，汉译为《面具下的日本人：解读日本文化的真相》）等。

毫无疑问，在相悖于“日本人的特殊性”的论调方面，橘玲延续了贝夫（别府）、布鲁玛等人的观点，但又有其独特的看法，这些独特的看法融汇于《（日本人）》中，俯拾皆是，仅列举一二如下：

> 日本人虽为人情所羁绊，但他们认为快乐地度过现世就是一切。
>
> 日本人原本就是对新自由主义极具亲和力的国民。
>
> 日本人虽然也追究责任，但他们拥有的是一个“空的中心”，这一点在日本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
>
> 日本之所以未能成功地步入全球化，与其说是由于其政治的“三流”，还不如说是由于其经济是“一流”的缘故。

作者橘玲本人是一位小说家，尤其擅长于经济小说的创作。《（日本人）》是其唯一的有关“日本人论”的著作。如果以日本人非常喜爱日本文化论的消费为前提肯定小说家踏入日本人论的写作的话，那么就彻底低估了《（日本人）》的价值了。

的思索的文本（文章、书籍、影像等）“席卷”了整个日本，毫无疑问，《（日本人）》就是从这些思索中诞生出的一部探究日本国民性（“日本人论”）的著作。

《（日本人）》由日本幻冬社出版于2012年5月，此时，“3·11东日本大地震”刚刚过去一年多。一年多来，日本社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日本人受到了哪些影响？这些都引发了作者橘玲的思考，其思考的过程及结果构成了这本书的全部内容。

2002年，43岁的橘玲以经济小说《洗钱》出道，除了本书外，他还著有《如何拾取成为富翁的黄金羽毛》《在残酷世界里能够生存下来的唯一方法》《大震灾后如何讲述人生》等。

在这些著作中，《（日本人）》一书的话题十分繁杂，抛开“序言”、“引言（微笑的国度”）和“后记”部分不说，全书共分20章，每一章一个话题，每个话题的中心点似乎又比较分散，不过从话题的结论而言，无疑它们又都是指向“日本人论”的。这样的写作方法一方面展现了作者广阔的知识储备，另一方面则显示作者能够从不同的现象中抽象本质的能力。尽管这为翻译“设置”了重重的“障碍”，但于译者而言既充满了刺激性，也极具挑战性。

感谢出版社给予本人“挑战”的机会。如果说在这个“挑战”过程中还存在着缺陷和不足的话，责任完全在译者一方，期待有识之士的批评指正。

周以量

2013年7月初稿于意大利旅次

2013年8月定稿于北京悠见斋

的思索的文本（文章、书籍、影像等）“席卷”了整个日本，毫无疑问，《（日本人）》就是从这些思索中诞生出的一部探究日本国民性（“日本人论”）的著作。

《（日本人）》由日本幻冬社出版于2012年5月，此时，“3·11东日本大地震”刚刚过去一年多。一年多来，日本社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日本人受到了哪些影响？这些都引发了作者橘玲的思考，其思考的过程及结果构成了这本书的全部内容。

2002年，43岁的橘玲以经济小说《洗钱》出道，除了本书外，他还著有《如何拾取成为富翁的黄金羽毛》《在残酷世界里能够生存下来的唯一方法》《大震灾后如何讲述人生》等。

在这些著作中，《（日本人）》一书的话题十分繁杂，抛开“序言”、“引言（微笑的国度”）和“后记”部分不说，全书共分20章，每一章一个话题，每个话题的中心点似乎又比较分散，不过从话题的结论而言，无疑它们又都是指向“日本人论”的。这样的写作方法一方面展现了作者广阔的知识储备，另一方面则显示作者能够从不同的现象中抽象本质的能力。尽管这为翻译“设置”了重重的“障碍”，但于译者而言既充满了刺激性，也极具挑战性。

感谢出版社给予本人“挑战”的机会。如果说在这个“挑战”过程中还存在着缺陷和不足的话，责任完全在译者一方，期待有识之士的批评指正。

周以量

2013年7月初稿于意大利旅次

2013年8月定稿于北京悠见斋

东亚三国丛书 01

根据多国权威机构联合组织的
当代世界价值观调查：

- 为了国家你会积极地参加战争吗？

  仅有15.1%的日本人持积极态度（中国是75.7%）

- 你对自己身为日本人而感到自豪？

  仅有57.4%的日本人持正面态度（中国是75.7%）

- 权威或权力应受到极大的尊重吗？

  仅有3.2%的日本人认为权力应该受到尊重（中国是43.4%）

这是我们以为的日本人吗？
是时候该重新认识日本了！

新福音战士、海贼王、酷日本、妈妈党、纯爱与乱交、孤独死
1940年统制经济体制、“失去的二十年”、“桥主义”……

“迄今为止，对日本人最深入全面的剖析！”
——《读卖新闻》盛赞推荐

超越“日本人论”的古典著作《武士道》《菊与刀》
准确把握当下真实的日本和日本人，告诉我们：
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日本经历着怎样的社会阵痛？
继19世纪明治维新、20世纪战后改革之后
21世纪的日本人，将如何选择自己的未来？



定价：38.00元